

146

金华縣文史資料

艾青題



4

0721

浙江省金华县委员会
史资料委员会 编

目 录

- 太平军在金华.....严 军 (1)
- 辛亥革命时期的金华龙华会.....石 夫 (12)
- 金华县辛亥革命时期旧闻存录.....李 光 蒋英根 (20)
- 辛亥革命时期金华斗争史补遗.....石 夫 (32)
- 傅其永在辛亥革命暨护国运动时期事迹记略.....俞家桢 (37)
- 辛亥革命志士：徐顺达、倪金.....戴兆丰 (51)
- 王廷扬传略.....戴兆丰 (53)
- 怀念先父朱郁荃.....朱坤明 (55)
- 光辉的历程——记民主革命时期金华人民的革命斗争.....
.....中共金华县委党史办公室
金华县档案馆 金华县县志办公室 (60)
- 粟裕将军领导创建宣、遂、汤游击根据地纪实.....潘桂荣 (77)
- 金萧(路西)党组织在金华的活动.....施姬周 (89)
- 解放战争时期路南地区党组织在金华的活动.....胡关炳 (98)
- 解放前夕金华中学地下斗争回忆...白玲 [张知] 王春 (109)
- 大革命时期金华党的主要领导人——钱兆鹏同志.....
.....潘桂荣 (120)
- 傅鸿权烈士史迹.....[刘家泽] 朱元式 傅樟清 (129)
- 怀念吴琅寿同志.....吴甫新 (134)
- 记革命战争年代的一位普通党员——傅鸿善... 傅樟清 (140)

邵飘萍烈士的青少年时代·····	邵寿生	(146)
我所知道的周百皆·····	严金明	(158)
凌凤梧与狱中的方志敏·····	方正 俞龙光	(166)
方文正先生二三事·····	方正	(174)
台湾义勇队以及当时桂林报刊的有关报导·····	黎远明	(177)
金华县中医名人录·····	戴兆丰	(189)
农民的好郎中——黄勇林·····	杜寿权 傅鸿藩 曹钱增	(191)
金华骨伤科名医郑克荣·····	洪时清	(194)
名中医吴玉修·····	蔡东星	(197)
江东名医郭季樵事略·····	郭金城	(201)
缅怀先师吴心禅·····	王秋月	(205)
金华伤科名中医黄乃聪·····	金华市中医医院	(208)
怀念先师黄乃聪·····	洪时清	(211)
张兆智先生小传·····	张华山	(215)
仁寿堂·····	周斌 严宗溥	(220)
金华的棉花·····	叶邦惠	(222)
金华酒摭谈·····	唐梓桑	(228)
婺州名产金佛手·····	邵介安	(233)
漫话金华豆豉·····	唐梓桑	(244)
花果之乡——金华·····	邵介安	(249)
金华酥饼·····	汪松福	(258)
后 记·····		(261)

太平军在金华

严 军

太平天国革命，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革命战火几乎席卷全国城乡各地，时间长达14年之久。在纪念太平天国革命140周年之际，回顾太平军在金华的战斗历程，是有极其深远意义的。

太平军大规模进军金华，是在1861年春。太平天国后期杰出将领侍王李世贤，根据天京军事会议部署，全力解救安庆之围，配合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西征大军活动在浙、赣、皖南一带，牵制清军主力。在三打反动头子曾国藩老巢祁门大营未能取胜之后，由于各路大军未能密切配合，侍王在江西乐平与左宗棠一战失利，为分散清军兵力，断绝清军浙江财源和后方物资供应基地，并根据天王洪秀全把浙江变成天京东南屏障的战略部署，回师浙江。

1861年5月3日，侍王率军经白沙关，占领浙境常山县，次日克江山。接着分兵三路，采取声东击西，打线攻点，包抄迂回，各个击破的战术，全军推向浙东、浙西。侍王亲率中路大军，越过衢州城，由灵山小路直趋龙游，26日破龙游县城，斩知县龙森。27日汤溪知县李元寿听到龙游被克，即自逃遁，遂克汤溪，派大将佐裨天义李尚扬驻守。5月28日侍王率大军兵临金华府城。

金华府城，依山傍水，地势险要。横跨婺江的通济大桥沟通南北，能守能出击。明、清以来，宏伟壮观的通济大桥成为

金华府的城防要地。

金华告急，知府王桐慌忙赶到兰溪向驻守在兰溪的清提督张玉良求援。27日张玉良派参将刘惇元率兵五百，与金华都司安喜合营扎军防守通济桥。28日张玉良亲率百骑而至，提出拆毁附城桥梁，“与团绅不合，遽反（返）。”①

侍王深知用兵贵神速，决定迅速抢攻通济桥，占领金华。28日，天朗气清，守卫通济桥的清兵以为有险可据，毫不在意。知府王桐也认为唯一的通道有重兵把守，又有张玉良派兵来援，高枕无忧，大摆酒筵，演戏聚乐，为母祝寿。正在得意之时，侍王前锋刘政宏率领精兵二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通济大桥进攻。桥上五百清兵顽固抗击，二十多门狗头炮齐轰，双方展开了肉搏战，从卯时战到巳时，清军节节败退。驻守在码门城上的清军，眼看大桥失守，又传闻知府王桐以乞师为名早离城逃之夭夭，清军全无斗志，一哄而散。太平军登梯上城，打开城门，长驱而入。金华知县吴瑞龙，平时鱼肉人民，干尽坏事，听到太平军入城，慌忙换上便衣，向城东荒野逃跑，太平军配合内应，寻捕妖官，终在八角库头（今金华市中心医院之地）将吴抓到，当场斩首，悬首城上示众。县学教谕蔡召南投井而死，分郡委员李学坤衣冠坐守旌孝门以示抗拒，也杀之。全城百姓兴高采烈，挂红彩，放鞭炮，迎接侍王大军进城。当地百姓为了欢庆攻克金华城，编了一首歌谣歌颂道：

“长毛”几时到？

“长毛”四月十九到，

金华府太爷逃跑了。

小码头摆起狗头炮，

迎接“长毛”提早到。

做官人家跑不了，

有钱人家喊倒灶，
穷苦人家哈哈笑。

金华地处浙江中部，又扼钱塘江上游，交通发达，是沟通闽、浙、赣、皖的交通枢纽，素为兵家必争之地。正如清秦湘业、陈钟英在《平浙纪略》一书中所说：“论者谓嘉、湖、宁、绍，根也，餉源所出也；衢、严，节也，所以通江、皖也；温、台、处，叶也，边圉之外障也；以形言之，金华乃浙东之心，而亦浙西所视为安危者也。”清朝官吏许瑶光在金华被克后，惶惶不可终日，向上司申告中也说：“金华上通衢、处，下接绍兴之诸、嵊，西与严州紧连，东隔台州之仙居不过数岭。前明太祖取浙，由金华、浦江入诸暨以定绍兴，实东浙之腹心也”。②侍王李世贤根据历代兵家以先夺取金华而后攻克全浙的战略，就在金华兴造了侍王府，并以此为中心建立了浙江根据地。侍王府就成为太平军在浙江的指挥部。

侍王府位于金华城区之东，面对婺江，后倚高阜，风景优美。据《光绪金华县志》记载，王府旧址唐、宋时为州治所在；元初为浙东道宣慰司署，后为肃政廉访司署；明初朱元璋曾驻于此，后改为巡按御史行台，清在此考秀才而称试士院。太平军攻克金华后，侍王就在此召集工匠，大加修葺，并新建西院，加筑照壁，重建大门，扩充花园，开辟练兵场，高筑望楼，修筑子城等，总计面积达六万三千多平方米，蔚为壮观。虽历经一百多年的沧桑变迁，至今傲然屹立，保存完好，为我国现存太平天国遗址中，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壁画、彩画、木雕、石雕等艺术品最多的一处。是这次革命运动的历史见证，为我国留下了一座珍贵的文化遗产。

侍王以军事家的眼光，战略家的气魄，建立了金华根据地。日夜运筹王府，部署夺取整个浙江。他分兵三路向全浙进

发。一路派部将首王范汝增、戴王黄呈忠，联合诸暨蓬蓬党何文庆起义军，取东阳、克浦江，东趋奉化、余姚，攻克外国侵略者盘踞的宁波城。一路派殷天义徐朗率大军自汤溪进兰溪，过严州，占领浦江，并派崇天义陈荣从义乌进驻东阳。侍王亲率大军克武义、攻永康，直趋台州、温州。太平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不到半年几乎攻克浙江全省。

金华既克，各路太平军又相继取胜，清王朝为抵抗太平军，在各地豢养了一批地方武装——团练，活动十分猖獗。当时金华设有一个团练局，有大大小小团练一百多个。这些团练，按侍王告谕分析，可分为二种，一种是“漏网残妖”，也就是回籍办团练的清政府文武官僚，他们是大地主，当地封建势力的代表者。如浙江巡抚给以六品衔在家办团练的徐虎、郭国宣，武进士出身、历任总兵、革职回籍的提督余万清。另一种是“顽梗为逆，起匪帮妖”，这种人虽不曾在朝做官，可阶级利益使他们本能地起来保护封建制度。这些团练，纠集当地恶棍流氓，无恶不作，危害极大。侍王明察团练危害，下令全力肃清。同时发动政治攻势，贴出告谕，宣传太平天国宗旨，揭露清王朝罪恶，规劝民团解散投诚，欢迎投军效用。侍王攻克金华后，就张贴谕，在谕中首先揭露清王朝：“官以赂得，罪以财免，英豪俊杰，埋没草野，贪官污吏，布满寰区。百姓脂膏，悉供妖胡享受，天下民力，皆为羯狗遣驱。”阐明：“正妖运告绝之时，若我中国人民志切同仇，共诛胡虏，则何虏妖气不靖，民业不安！……本藩痼疾在抱，胸与为怀，尝念率土之人民，本中国之苗裔，故于一路师征，不但倾心来归者抚之以德，即临敌投顺者亦待之以恩。”并发出号召：“自今我师到临，尔为民者果能诚心向化，纳贡投诚，则必善加抚恤，使尔安业如常；设有怀材负异之流，尽可投效军前，自当量材擢

用；即使为兵为勇之辈，若能投明弃暗，归顺天朝，亦当赏予爵秩，奖其忠诚。为此剴切谆谕，仰尔士庶人等，各宜识时顺天，以安身命，如有团练等事，速宜早早解散；倘若执迷不悟，为匪为逆，抗拒王师，本藩定当遣发雄师，痛加诛剿，决不稍有姑容。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其各自择，毋致追悔于莫及也。”③布告张贴，四方响应，人民拥跃参加了太平军，不少团练自动解散，侍王对那些顽固不化的则派出大军逐个歼灭。

当时金华团练势力最大，最顽固的要算余万清。余万清，金华莘村人，绰号水牛精，武进士出身，壬子二年(1852年)在湖南道州当提督，太平军一到，他就弃城而逃，后调防镇江，天兵打下金陵，攻镇江，他也是一战即溃，咸丰帝一怒之下将他革职。后托病回籍，可他不甘失败，在家乡办团练，清廷拨他三万九千两银子，二百支抬枪，在金华、义乌一带招了二、三千人马，驻守在离金华城只有三十余里的五都曹(今曹宅村)。侍王打下金华后，浙江巡抚王有龄慌了手脚，忙宴请诸将，动员赴援，而只有江西援浙客将文瑞应命，他率部进驻金华孝顺街后，即派他的前锋、游击曾得胜来到五都曹，与余万清团练合。

侍王分析军情，决定先打五都曹。因五都曹是金华通浦江、义乌的军需粮道，是向浙北、浙东挺进的必经之路，同时消灭余万清这个最顽固的团练以杀鸡儆猴，也是给援金清将文瑞一个迎头痛击。7月5日，侍王命部将抚天福杨金正率领五百骑为先头部队，拂晓前赶到五都曹，一边鸣螺发炮挑战，一边命将士高喊“消灭曾得胜，活捉余万清”以激其出战。曾得胜听说太平军来攻，急请余万清过营商议。余万清主张先发制人，马上出击；曾得胜认为兵力单薄，只宜固守，不宜轻动。经过一番争执，暂守不战，令士兵静伏以待。次日侍王亲率大军赶到，见

敌人不出战，一面仍命将士轮番高喊，激其怒而令其出战，一面在邻村滕光岭背埋下伏兵。余万清骂曾得胜怯懦胆小，逼令开仗，曾仍坚守不战。于是余万清就独自整队出击，太平军只虚战一阵即向滕光岭背佯败，余率团丁尾追。侍王看着敌人已入伏击圈，一声号令，螺号战鼓齐鸣，伏兵四起，把民团团团围住。这些团丁，本来是些无赖之徒，乌合之众，早吓得魂不附体，抱头鼠窜，溃不成军。余万清在几个团丁的保护下，冲出外围，逃往福建境内。曾得胜听说团练被围，慌了手脚，即将队伍撤到孝顺街，向他的上司总兵文瑞泣诉说“民团挟制官军，屡遭凌辱，大营若遇败挫，必受其害，不如退守义乌，再度进取。”④

余万清这支地方武装消灭了，太平军配合当地农民，打开莘村总兵府的粮仓，把他搜刮来的钱财、粮食分给穷苦百姓，把化了十多年时间强派民工所建造起来的总兵府一把火烧干净。当地人民无不拍手称快，编了一首歌谣唱道：

余万清，水牛精，
做过大总兵，
心头勿灵清，
带民团，打天兵，
吃了大败仗，
抢掠东西不要命。
烧掉莘村总兵府，
变成白地冷清清。

打垮了余万清民团，吓坏了其他小民团，有的自动解散，有的不堪一击。太平军先后歼灭了施有龙民团200余人于北山小凤门岭，叶子省民团200余人于上叶，施光球民团200余人于后畈，盛震贤民团200余人于蛤岩，以及歼灭徐虎民团于塌水桥，胡志纺民团于麻车堰桥，陈画樵民团于莲塘潘，施有虎民

团于杜宅等。12月太平军向汤溪的塔石、山坑山区进军，县学增生胡永谦民团筑垒于百善村之营山，太平军千余人进行围剿，攻破民团营垒，杀掉胡永谦、傅玉成两个头子，当地百姓拍手称快。

太平军攻克金华后，即在城乡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对封建地主豪绅给以狠狠打击，其规模是空前的。按照义乌民团头子朱凤毛的自白，乃是金华地区五代以后最大的一次“浩劫”。⑤

太平天国在浙江虽然没有全面实施《天朝田亩制度》，没有正面去触动封建制度的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但在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总前提下，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广大人民的经济措施，给予封建制度各方面的打击，包括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打击仍然是沉重的。广大贫苦农民在太平军的支持下，起来收回土地所有权，把地主土地“恃强霸种”、“据为一己之私”，焚烧了田契，剥夺了地主阶级的世袭领地。并限制地主阶级剥削，减低租额，“佃农租种田地，缴纳租额，照原租额减半收缴”。致使当时金华地区的“衣冠士女”，个个都“窜如焚林猿，匿如穿墉鼠”，落得“家居田园一旦空”。⑥

太平天国还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部份浮财，称为“打先锋”，一则可供军需，一则给封建统治阶级以一定程度的打击。据《民国汤溪县志》载：“贼乃刺探村中向称殷富之豪，藉端逼勒，罄其所有。”，“掳掠男女、钱、帛、牛、羊、鸡、猪，名曰打先锋”。《义乌兵事纪略》载：“捕里胥，缮粮册，知民间贫富，富户迫令纳款必尽献所蓄而后已。”也就是说，每攻一地，首先把清王朝掌管田赋的“里胥”逮捕，命他把粮册誉录清楚送上，根据粮册多寡，知道谁贫、谁富。如富户，必令他献所蓄浮财。如“有私藏被侦知，辄处以极刑，谓非此不足

以示儆也。”⑦如果地主躲避在外，就要访拏他们的亲属，然后传令出去要他们用现金去赎，称为“赎命钱”。至于“赎命钱”多少要看他们的财力多少来决定。《民国汤溪县志》载：

“……或避匿在外，则访拏其亲属，危词恫喝以要挟之，赎命钱视其家财力为轻重。”经过农民革命运动的打击，封建势力一度土崩瓦解、分崩离析。金华傅村大地主傅小泗，原拥有田地二千余亩，到太平军退出后就破了产，妻子变成了乞丐。由于太平军狠狠打击封建势力，广大人民特意编了民歌赞颂道：“天兵天将下凡了（指太平军），红面的妖怪（指清军）杀光了，绿面的妖怪（指贪官污吏）杀光了，黑面的妖怪（指地主武装）也完蛋了。从前日子泪洗面，现在日子蜜蜜甜”。

太平军是农民的军队，太平天国是农民自己的政权。因此太平军实行了一系列对劳动人民有利的政策，为广大贫苦农民谋幸福。每攻克一地，首先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实行乡官制。《民国汤溪县志》记载：“置乡官，授监军以下各伪职”。“而诸伪乡官多系乡里无赖，为虎作伥，以故凶焰弥炽”。黄侗《义乌兵事纪略》也载：“该伪官曰：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司马。及乡官之属，以地方无赖充之，诸无赖平时为乡党所不齿者，至是皆趾高气扬、恃势报复，残害良善，折辱缙绅，无所不至。”从这些记载来看，太平天国乡官组织是仿照太平军军制组织的。各级乡官名称和太平军正职军官名称相同。都是根据《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制度建立起来的。其正常编制方式为：五家立一伍长，二十五家立一司马，百家立一卒长，五百家立一旅帅，二千五百家立一师帅，一万二千五百户立一军帅。这些乡官全由人民自己推举劳动人民来充任。所谓“无赖”正是过去无权无势的劳苦人民。这些劳动人民过去当

然为官僚地主所不齿，现在翻身作了主人，当然趾高气扬，对这些“缙绅”在政治、经济上给予打击。

太平军为了保护人民，保障农民生活，十分关心农民疾苦，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太平军攻克金华后，即颁发告谕，强调：“凡我军所到之处，无不体恤民情，严禁滋扰，抗拒者治之以法，良善者安之以仁，既未妄戮无辜，更不烧毁民屋”。⑧再三劝谕各地人民“各安恒业”，并采取了兴修水利，调拨谷种，鼓励及时耕种，严禁宰杀耕牛等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因此，连统治阶级的记载也不得不承认“安民之处，可以从容耕作”，使“人皆得食”。

太平军对劳动人民生活十分关心。侍王在金华虽是战事频繁，还是经常走大街，串小巷，了解民间疾苦，帮助解决生活困难，“洞察民瘼”。曾参加太平军的傅维佩之孙傅韵然老人口碑传说：“侍王经常微服察访，有个晚上他来到金华净渠头，看见一户人家深夜还点着灯，听见里面说：“糊来、糊来”，侍王以为是在玩纸牌赌博，就叫门进去，结果是在糊纸盒，侍王问长问短，问寒问暖，了解到她家丈夫、女婿均已死亡，只有母女，孤苦伶仃靠种菜、糊纸盒度日，生活艰苦。侍王第二天就派士兵送去了一张钱串，计一千铜钱，十多斤粮食，母女才知道昨晚来家的是侍王。”这样的事例很多。因此，当时金华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客人串门着长袍，问长问短盈盈笑，看见小干（小孩）双手抱，问依柴米少不少？听说日子不大好，马上送米到锅灶，还问油盐要不要，走后才知侍王到。”

太平军了解到贫苦农民度日困难，就在侍王府前的鼓楼里设立了一个施粥厂，凡是没有吃的，都可以到施粥厂吃粥；没有衣穿的，就从典铺或富户中拿出来分给。部将有关心人民群众

疾苦、得到百姓爱戴的政绩，侍王就及时鼓励嘉奖。部将龚老虎，率领二千人马驻扎在金华傅村。他与士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勤奋备至，对人民敬老抚幼，发粮赠济，深受当地百姓爱戴，人民歌颂说：“龚将军，年纪虽然轻，做事很精明，扶老携幼问长短，礼贤下士很谦心。发出仓谷千万担，救了穷人上万人。如果没有龚将军，偕俩（即我们）哪里有活命”。龚将军的政绩传颂各地，侍王非常重视，亲自赶到傅村视察嘉奖，当地百姓，夹道欢呼，称为盛事。

侍王在金华正当指挥几路大军节节取胜之时，接到天王飞诏，火速赴救金陵。李世贤立即应命，在金华作了周密部署，遂将金华、东阳、汤溪等十万大军交汤溪守将裨天义李尚扬调度，负责整个浙江防御体系，并命金华守将刘政宏“派民十余万开挖城壕，……浚深城北壕沟为久踞计。”1862年10月8日，侍王亲率精锐部队七万余人驰援天京。

侍王离金，浙西战场军力薄弱，左宗棠加紧向金华进攻。加上太平军内部不和，不听李尚扬调度，致使左宗棠越出衢州，金华各地相继被陷。1863年2月28日，汤溪守将李尚扬被部下诱杀，汤溪失陷。3月1日，兰溪失陷，3月2日金华守将刘政宏被迫撤出金华，同日武义、东阳、永康等地太平军也相继撤退。至此，金华各地全部失守，尽为左宗棠军占领。

太平军在金华虽然时间不长，但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对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一次大扫荡，推动了社会前进。

1991年5月28日于侍王府

注：

①《浙中发匪纪略》《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资料选编》
203页

②许瑶光《谈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九日金华失守事略》《谈浙》。

③《侍王李世贤劝四民诚心向化纳贡投诚淳谕》

④《义乌兵事纪略》20页

⑤《义乌兵事纪略》30页

⑥《义乌兵事纪略》31页

⑦《义乌兵事纪略》21页

⑧《侍王李世贤劝四民投诚归顺淳谕》



辛亥革命时期的金华龙华会

石 夫

会党是我国封建社会下层群众的社会组织，组织比较严密，有相当的战斗力和战斗力。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开始领导民主革命时，就认识到会党是中国社会一支巨大的力量，立即加以运用。为了发动会党，他还在檀香正埠拜盟加入洪门。①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广州起义，翌年2月的惠州等地起义都以会党为主力。黄兴为首领的华兴会，蔡元培、陶成章为首领的光复会也都曾发动会党起义。

浙江是当时全国会党势力最集中的四大地区之一，②而金华龙华会是秋瑾发动浙江起义的主力。今年是辛亥革命80周年，为缅怀金华龙华会对辛亥革命的杰出贡献，特写此文以志纪念。

金华会党起源，可上溯到明末清初反清斗争时期。清统治巩固后，会党势力渐衰，活动更为隐蔽。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进驻金华后，会党活动复炽，后来逐步统一到终南会。清末，又在终南会基础上组建成龙华会。龙华会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引导帮助下，成为光复会的同盟军。③会员中的一些骨干，加入中国同盟会。在辛亥革命时期，在浙江和金华有很大影响。龙华会首领张恭，在皖浙起义失败避难日本时，曾向日本社会学家平山周叙述会党内幕。平山周据以写成《中国秘密社会史》。

终南会

终南会又名终南山，是哥老会系统的分支。先由湘传赣，又由赣传入金华、衢州、直至福建建宁一带。

光绪二十三年（1897），左宗棠镇压浙江太平军后，以整饬营务为名，资遣大批军官回原籍。时有何步鸿、朱武因湖南家乡无亲人，流寓金华。他俩原是洪门中人，一怒之下，开创山堂，定名终南会，立誓与清廷作对。并逐步统一了金华林立的党会——张恭领导的千人会、沈荣卿领导的百子会（永康）等。处州双龙会、台州伏虎会等亦属其分支。

终南会组织似哥老会，反清意识较强，封建性质亦很浓厚。其领导机构由香长、盟证、总座（亦名龙头）、正印（副龙头）组成。但香长、盟证在开山收徒时临时推选，事毕即撤。总座，正印，实际上是正副会长。下设内八堂：座堂（管人事升迁）、陪堂（管经济）、元堂（掌印信）、执堂（管内务）、礼堂（管礼仪）、副堂（管交际）、刑堂（司执法）。洪门相传其中有一堂主因犯规被杀，后不再设此堂主。另有外八堂负责执行内八堂交付之事。其名称为：分山主（又称牌把大爷）、当家（钱粮牌把三爷）、管事（牌把五爷）、巡风（牌把六爷）、金口（负责侦察）、八牌（牌把八爷，负责通报）、九牌（处理日常事务）、么大（牌把十爷，处理勤杂事务）。会众受帮规“红十条”约束，主要内容是孝敬父长、手足和睦、叔嫂尊重、不得吃里扒外等。如有违纪，则按“黑十条”处理。如“勾引敌人罪难抛，三刀六眼难恕饶。平日不听拜兄教，四十红棍皮肉焦。”④等等。

终南会会员以农民、手工业者、摊贩、店员、艺人等下层群众为主，也吸收少量官僚、地主、工商业资本家及知识分子

参加，但对他们的考查比较严格。如张恭出身书香门第，本人十二岁中秀才，早有参加终南会之念。终南会命金阿苟“殷勤接待，慎重行事”，严加考察，当确认张恭有反清之志后，才由终南会正副会主两人介绍，参加终南会。

终南会给会员发“宝”（会员证或任职证），也叫“布票”。据终南会会员名中医郑兆权陪同金阿苟送“宝”给张恭时所见，记述云：金阿苟传令时赠辞：“金字牌，银字牌，小弟今日送宝来。仁兄今日接宝后，步步升高坐八台”。张恭答辞：“千树桃花共一家，不同宗祖也同花。今日接过升位宝，感谢仁兄义气夸”。“宝”正面横额有“还我山河”四字，下有“终南山”、“双溪水”、“明月香”、“八咏堂”四行小字。山、水、香、堂下各附七言诗一句，合起来是：终南巍巍气如龙，双溪一泻贯长虹。明月胜迹垂千古，八咏光辉百世雄。下方是恩（赐）承（行）保（举）引（进）四位盟兄姓名，并加盖帅印。背面注明受宝人姓名、职位、升任年月，盖内八堂公章。⑤光绪三十三年（1907）《金华详办匪情形》（载《神州日报》）中有“兹于六月初一、二等日，先后拿获会匪王如槐、吕观兴（按：均系龙华会员）二名，并在王如槐身上抄袋内，搜获票布一纸。……卑职查阅票布所载字句，确系入会的据。”可知龙华会也有布票。

龙华会与光复会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失败，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人民大众视清廷为“洋人的朝廷”。反清运动更加汹涌澎湃。是年，张恭与兰溪蒋乐珊（倬章）在杭州紫阳书院读书，就接受湖南“自立军”首脑唐才常之弟唐才中的“富有票”（才常招集同志入会之会证）。这是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最早与浙江会党之联络。但因自立军很快失败，会票没有发出。⑥可见张恭等人早已萌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光绪二十七、二十八年（1901—1902），终南会会长何步鸿病逝永康，朱武离金而去，终南会群龙无首。永康沈荣卿、武义周华昌到金华与张恭会商。张建议利用当时在金华流传的“若要天下真太平，除非龙华会上人”的民谣，建立龙华会。于5月13日（关羽生日），在金华关王殿正式举行开山仪式。斩鸡沥血，义结金兰。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万死不辞。若萌异心，神人共殛！”众推沈荣卿为会主，张恭、周华昌副之。

龙华会总部设金华，兰溪门金阿苟茶店为其联络点。金华府八县均设分部。永康分部分管东阳、缙云县等县会务，武义分部分管龙游、衢州等地会务。还有仙居应师杰部、天台陈显元部各有会众五、六百人；缙云吕嘉益部千余人。青田、诸暨等县亦有分部，然人数不多。时龙华会员号称五万，实则二万五千多人。⑦

龙华会以五言八句为字号，一县一句，中间一字为县的总红旗代号，余则为各地散红旗的代号。金华分部由徐顺达任总红旗，督理全县会务，下设管事若干人。基层头目叫“草鞋”，管十数人。

龙华会仍属会党性质，但其领导骨干大都是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有些人有举人、监生等头衔，社会影响较大。他们大都足智多谋、文武并重，逐步将反清革命推向深入。光绪三十年（1904），张恭与盛俊、兰溪刘焜（解元、进士）、汤溪洪永鲁（举人）等创办了金华第一张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与现代科学知识的报纸——《萃新报》，其发刊辞云：“为我桑梓

作警晓钟，作渡津筏。异日者，跳出黑暗界，步行红日中，或起点于是欤！”接着张恭、金兆銮等又联合金华府学界知名人士，组织“八婺开通学社”，宣传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主张，普及科学知识。在龙华会里，有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如塌水桥的周禄，高桥的倪嘉根人，卖掉上百亩土地，毁家纾难，支持革命。在徐锡麟、秋瑾发动的皖浙起义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家中连埋葬费都难以筹措。

光绪二十九年，张恭把龙华会员、名花旦李宝剑组建的李庆福戏班归他直接掌握，群众称之为“张恭大班”。光绪三十一年，张又招收儿童学戏，组成汪永庆班，群众称之为“张恭小班”。两个戏班多演亡宋亡明故事。串镇走乡，用以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张并借此作为革命党人的秘密联络点。

金华龙华会又积极组建武装，择地锻造武器。请当时金华以锻造鸟枪枪筒闻名的金正灿，在千人安村锻造土枪，准备武装起义。

光绪三十年上半年，光复会骨干魏兰到金华联络龙华会，双方意见相投，达成共识。八九月间、陶成章为配合黄兴在长沙起义，由杭州至金华部署配合长沙起义的计划。龙华会已通知所属组织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这次起义虽然由于长沙方面很快失败而没有结果，但使龙华会受到了锻炼。而且，陶将《革命军》、《猛回头》、《国民报》等大批报刊送给龙华会众。由是革命书籍遍及浙东各地，革命思想深入中下层社会。⑧光绪卅一年一月，徐锡麟紧接陶成章来金联络龙华会后，曾说过：“涉历四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但又觉得“会党知识浅暗，奚若稍事教训，以兵法相勒。”于是创办大通学堂。金华龙华会正副会长和骨干12人，曾去大通学堂学习。该学堂规约：“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校办事人

之节制；本校之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⑨这就使龙华会与光复会联系在一起。光绪卅二、卅三年，秋瑾两次来金联络龙华会。她拟定的《光复军制》，以“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记号，把光复会会员和会党成员编为八个军，总称光复军。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为协领。以王金发、张恭等会党首领为分统。“其势力所及，上达处州之缙云，亘金华全府……金华府之金华、兰溪、武义、永康、浦江五县，实为其中心。”^⑩

龙华会与皖浙起义

光绪卅三年（1907），徐锡麟、秋瑾发动皖浙起义。四月，秋瑾在大通学堂召集张恭等会党首领共同商讨浙江起义的具体部署。他们的计划是“先由金华起义，处州应之，俟杭城清兵出攻金、处，即以绍兴义军渡江以袭杭城，军学界为内应。若杭城不拔，则返军绍兴，入金华，道衢州，出江西，以通安庆。”^⑪起义日期原定四月间，后改五月初，再改为五月二十六日，最后定为六月十日。但金华诸处仍以二十六日为期。由于起义日期一再改动，会党纪律又较松弛，因而风声泄漏，各地事故不断发生。五月二十二日，龙华会武义分部起义事泄，被捕多人，大通学堂受到牵连。作为浙江起义关键地区的金华，也变起仓卒。被秋瑾委为金、兰（溪）、汤（溪）、浦（江）四县起义总指挥的徐顺达，在起义前夕因与人争田产而入狱。代理其事的交通部长倪金在购买用作起义标帜的黑布时，泄露了起义计划，被清政府逮捕。五月二十四日与徐顺达同时殉难。党人被杀害的有吕观兴等20余人。清政府革去张恭的举人头衔，悬赏白银一千两，缉捕张恭。张只身潜逃至宣平山中的王金宝（已故双龙会主）旧部家中。在他们帮助下，穿黑衣，着佣装，变土音，作船工，从青田经温州出海到上海。未几又

为密探侦知、乃以火烫菜油敷面毁容成麻脸(一说用炒烫黄豆敷脸毁容)东渡日本。龙华会遭此巨大打击，组织涣散。光绪三十四年春，张恭回到上海后，虽曾与陶成章等人“打算把江、浙、闽、皖、赣五省各秘密会党溶合为一，定名为革命协会。”但因张恭被内奸刘光汉(世培)出卖，遭两江总督端方逮捕，未能组织就绪。^⑫

民国3年(1914)，金华源东乡爱婴军起事，澧浦统和党和义浦等乡的匡汉军、华荣党积极响应，遍及金东义(乌)西6个区、40多个乡、近千村庄。其中有些骨干就是龙华会会员。这是金华会党最后的余波。

70多年前，在金华大地上，龙华会为推翻清王朝，投入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进行过相当规模的斗争。不少先贤毁家纾难，毁面容，抛头颅的英勇事迹，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会党“加入了农会，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山、堂、香、水’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⑬中国农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1991年5月1日第四稿

注

①中国青年出版社《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4页。

②魏建猷：《辛亥革命前夜的浙江会党活动》

③陶成章：《浙案纪略》，见《辛亥革命》卷三20页。

④严朴、宋瑞楠《一代英豪》。

⑤同注④

⑥同注②

⑦同注③19页—20页

⑧同注③25页

⑨同注③28页

⑩同注③62—63页

⑩同注③

⑫同注③

⑬1967年版《毛泽东选集》袖珍本38—39页



金华县辛亥革命时期旧闻存录

李 光 蒋英根

今年是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个结束中国二千多年封建帝制的民主革命，不让革命前辈事迹湮没无闻，我们从1989年开始搜集有关民间口头传闻，核查有关的宗谱记载。我们走访了本县源东、傅村、孝顺、鞋塘、长庚、灵岳、澧浦、塘雅等14个乡村，和义乌县下宅乡的萧皇塘村、王阡乡的王莲塘村，记录了24个90岁左右老人的亲见、亲闻的口碑资料，查阅了傅、金、徐、楼、庄、洪、曹、蒋、范氏等12部宗谱中有关的文字记载，综合成这份资料。由于年深日久，当年亲身经历的人都已去世，就是我们曾走访的老人也有四位已陆续去世。因而传闻或许有误，宗谱记载或许有错，无从核实，补录这些资料仅为后贤提供研究线索而已。

一、千人会传闻拾零

张恭是辛亥革命运动金华领导人，是光复军分统，他与王金发是秋瑾的左右手。为进行反清活动，张恭在金华先组织“积谷会”，接着扩大为“千人会”，然后参加“终南会”，后改组“终南会”为“龙华会”，最后率“龙华会”加入“光复会”。

金东、义西一带素以民气剽悍著称，历来是会党活动场

所，张恭在这一带也早有经营。萧皇塘村的吴肇基就是受他影响而弃文习武，为江浙联军攻克南京立过功。1907年金华光复军起义失败，萧皇岩就成了张恭的第一个避难处，当时他曾想组织力量反攻，当然也是利用这一带“千人会”的力量。可惜岁月悠悠，知情人都已去世，有关“千人会”反清活动仅民间尚略有传说，一鳞半爪，已难窥全貌。

张恭是千人会的头头

金华原东角乡80岁以上老人很多都知道前清有个“千人会”，张恭是“千人会”的头头。义乌萧皇塘村96岁的吴琅昆说：“金华有个‘千人会’，为头的是举人张恭，他到过邻村溪口。”溪口村78岁的傅宾龙听他的大伯说：“张恭在我家住过，那年九月初我六村演戏，请的就是张恭的戏班（张恭大班），戏班的花旦李宝剑很有名气。有天我父延缙设宴招待，张恭坐首席”。大叶荷村94岁的曹春生说：“张恭是举人，是个小个子，在鞋塘这带很有名气，很有势力。他组织了个‘千人会’反清朝，这一带有很多人入会。听说畝田洪村洪家达、洪春贵、洪金山、洪家湘都入过‘千人会’，鞋塘村庄槐卿，曹村曹为玉也是。张恭到这带常住洪家达家，家达办了个武堂，招人练武，就是为了打清朝。”

千人会的组织和宗旨

“千人会”有无组织章程和纲领不清楚，我们还没有发现她的文字材料，只能从传闻的蛛丝马迹中探索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千人会”同其他会党一样，入会也采取喝鸡血酒、发愿盟誓等形式。曹春生说，“曹为玉和台州荣一起参加‘千人会’，喝鸡血酒，发愿盟誓，结为兄弟，共患难，同生死”。“千人

会”主张互助，讲义气，讲团结，对下层社会有一定的吸引力。畝田洪村92岁的洪维贤说：“‘千人会’在鞋塘很出名，很有势力，为头是举人张恭，说是人多力量大，我村家达和家湘曾参加”。洪家湘生前对人说：“我什么人都不怕，谁反对我们就要谁的命，一人拿一枚银元就有上千元，任谁的命都可以买来”。任何会党组织除江湖义气外，也都有个奋斗目标，“千人会”也不例外。参加“千人会”的都怀有个美好的理想，打下江山以后就可以平分田地，摔掉贫困帽子，过上好日子。90岁的洪章法说：“我小时听家湘说，等我长大后会有好日子过，种田人有田分，有田种，不会没房住，没饭吃。今天有钱人连坟头也造得很好，将来坟头都要拆掉。”这种进步理想倒与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的主张一致，陶成章在为联络“龙华会”所拟的檄文中说：“收回大明江山”“把田地作为大家公共财产”。可见“千人会”也有她的宗旨，同时也说明她与“龙华会”的渊源关系。

“千人会”同其他会党一样，会员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各怀不同的动机入会。会员中的上层骨干大多是当地有反清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怀有“反清复明”的种族思想，对清廷的腐朽统治不满，同情贫困人民的不幸遭遇，想改变现状。如畝田洪村的中医洪家达，文秀才洪家喜，武秀才洪家泰、洪小泰兄弟俩，任县衙门仵作的傅村傅鸿汶等，他们在这一带原有很好的声望，在“千人会”中也有很高的威信。从传闻中分析，洪家达很可能是金东“千人会”的首领。“千人会”一般会员大多是贫困农民、演员、手工业者，也有无业游民。为了生存，他们需要有一个组织作靠山；为了明天，他们需要有一个朦胧的愿望作寄托；为了斗争，他们需要外界支援。他们中有的想劫富济贫，解除心头不平，如台州荣，后来虽然被

官府杀害，但在当地群众心目中仍然是个传奇式的英雄。有的游民习气较重，也依势横行，他们既有斗争性，也有破坏性。如曹村曹为玉，兄弟五人，人称曹家五虎，民元因赌博与台州荣反目成仇，结义兄弟间相互残杀，父子六人仅留一人。再如洪家湘后亦与李村人械斗被杀。个别富户或因亲戚关系，或出于借会党力量保家产而入会，如鞋塘村的祠堂总理庄槐卿，他与洪家达是儿女亲家，据说亦曾入会，但当财产受到损害时，就会不择手段保护自己。他与曹怀玉同是民元鞋塘同曹村械斗的罪魁祸首，造成两村大部分房屋烧毁，死伤几十人的大惨案；最后双方都借助官方力量镇压对方，保护自己。这就是会党组织缺乏明确斗争纲领，缺乏严密组织，仅凭江湖义气结合，仅凭家长式领导指挥，终于走向反面的共同悲剧。这是历史的、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所结下的苦果。历史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改造旧中国的光荣使命。

千人会与九龙会及其活动

在金东也有称“千人会”为“九龙会”或“九龙党”的。前蒋村施仁正听他父亲说：“他外公范瑶坚（1883—1960）曾参加张恭组织的‘九龙会’，入会发凭证，叫买‘九龙票’（1900年张恭在杭州紫阳书院读书时，曾领取唐才常弟弟才中发给的“自立会”会证“富有票”，“九龙票”亦相类似）。”余宅村83岁的吴球金说：“张恭组织了‘九龙党’，有个叫卸牛的徽班演员小生，入过‘九龙党’（卸牛为张恭小班小生）”。傅宾龙说：“入‘九龙党’的有件外套为标志，外套前襟有九个钮扣。”我们认为“九龙会”或“九龙党”该都是“千人会”后的“龙华会”，是对“龙华会”的讹传。张恭组

织“龙华会”后，当年的“千人会”会员自然大部过渡到“龙华会”，因为不论是“千人会”或“九龙会”或“九龙党”，民间一致公认她的首领都是张恭。“龙华会”的骨干很多是演员和中医，他们利用戏班活动或医务活动串联，掩护会务活动。“千人会”也是如此，如洪家达既是中医，又同洪家泰合办个“洪金玉堂”戏班。有一年洪家泰、小泰兄弟俩带班到严州山区演出（这事当在1905年前，因洪小泰卒于1905年），那一带会党势力很强，会党习于排他，外地戏班进去难以立足。这次洪家泰的戏班去也不例外，他们在一座桥上遇到10多个带器械者的围攻，洪家泰当即向对方说明他带的是张恭的戏班，对方一听是张恭的戏班就十分客气，热情接待。演完戏还亲抬戏箱，护送他们出山。传说有一年张恭戏班到义乌王阡村演戏，受到当地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张恭戏班演员的发辫上都打个结为号，这些人就找辫子有结的殴打，还是“千人会”的台州荣请同他友好的黄莲塘村人来解了围。这都说明不论“九龙党”或“九龙会”或“龙华会”，都与“千人会”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千人会”是有过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洪家达就办了个武堂，为武装斗争培训骨干。据在1904年至1915年间在源东乡新店村开永兴铁店的徐金壁曾对儿子徐忠发说，他曾替“千人会”打过枪械。可见“千人会”要进行武装斗争不是虚传。有斗争就必然有镇压，“千人会”受到过官兵剿捕。前蒋村范瑶坚，小名东苟。据他女婿回忆，他岳父入会后东逃西躲，全家不得安宁。有次岳父被官兵抓住，官兵用绑腿布将他捆牢丢在一边，结果被他挣脱逃走，目睹者说他岳父逃得非常快，飞跑时连辫子都甩直了。官兵追他不上，就割了岳父母亲的一只耳朵泄愤。1907年光复军在金华起义失败，金华知府嵩连兴大狱，大捕“龙华会”人，在县衙当仵作的傅鸿汶得知消息，

急忙通知洪家达等躲避，金东一带的“千人会”员得以及时疏散隐蔽，据说当时无人被捕（后来有些人陆续被捕，如台州荣等，是否与此案有牵连不详），傅鸿汶为保护会友立了一功。

金东千人会中的知名人物

金东的鞋塘、畈田洪、溪口、傅村、施塘头、溪干、塘雅等地为“千人会”的主要据点，传说比较知名的人物有以下一些。

洪家达（1878—1948），监生，学名邦浦，号必闻。为人正直侠义，在当地有很高威望。他以中医为业，可行医不收红包，五里外来就医的有时还留吃中饭。他嫉恶如仇，专与同村开当铺盘剥农民的洪家备作斗，而支持受欺压的贫困农民。他邻居洪孝森三岁丧父，无钱安葬，其母向洪家备暂借15元作安葬费，以两间住房抵押。事后洪家备索债未遂，就封门夺屋，家森母只得到邻村张店财主家作佣人。小家森无人照管，从石阶滚下，跌得头破血流如注，当场晕过去。家达就抱他回家抢救，小家森到半夜才苏醒，总算留下一条命。家达同情他家境贫寒，不仅不收分文药费，还留他在家养伤。伤愈后留家抚养，待他如子，同桌吃饭。家森母要算饭钱也婉辞不收，一直养家森到14岁，才让他出外学做篾匠，离开家达家自立。

洪家喜（1865—1942），文秀才，学名畴，字寿田，号吉卿。家喜与家达为堂兄弟，他协助家达料理会务，并常住金华城内，为“千人会”做通讯联络工作。

洪家泰（1834—1934），武秀才，学名宝金，字玉衡，号华山。他与家达共办“洪金玉堂”（又名小金玉）徽班掩护革命活动。

洪小泰（1837—1905），武秀才，学名谦，字遵先，号辉

扬。他是家泰弟弟，与家泰共同主持戏班业务。

洪家湘（1882—1926），字聚源，号益三，传说他在婺江两岸能号召上千人。

以上数人都是畈田洪村人。

傅鸿汶（1869—1948），傅村人，字秉和，清末任县衙仵作，民国初任法院检验吏。他在衙门消息灵通，担任“千人会”内线工作，有消息由他通知常住城内的洪家喜，再传告洪家达。

阮为头，溪口人，真实名字及生卒年不详，他父亲阮兴是当地绅士。阮为头是“千人会”在溪口村的小头目，传说他手下有20多人。

范琇钱（1853—1920），溪干村人，绰号钱和尚，传说他是塘雅一带“千人会”的头目。

台州荣，真名实姓不详，只知道他父亲是台州人，姓蔡，入赘施塘头村一寡妇家后生下他，故人都叫他台州荣。台州荣青年时期曾在长庚村及三角塘村地主家当长工，会干一手好农活。台州荣自幼胆大，倔强好斗，五岁时有次母亲打他，他就逃到野外过夜。青年时期向林石寺和尚洪法师学武艺。洪法师是当地有名的武林高手，民间传说他有神拳，会飞檐走壁。台州荣虚心好学，尽得洪法师所传，他也成了金东传奇式人物，当时几乎无人不知，有关他的轶事，民间有很多传闻。台州荣喜打抱不平，专与当地有权势的地主豪绅作斗，他劫富济贫，获得当地广大贫困人拥护支持，经常有二三十人跟随他。官兵经常到处搜捕他，清末也曾坐过牢，出狱后仍然坚持斗争。有次官兵到施塘头村围捕，凌晨包围了村庄。他逃出家门后遇到一个抱小孩的妇女，就接过小孩，抱在怀里，一边拍着小孩，一边哼着：“宝宝，别怕，别哭……”，从容地从官兵面前走过去，

居然没有人怀疑，被他混出村去。一到村外山岗上，他就转身朝村里大喊“台州荣在这里”，待官兵追上山去，他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有次他逃出村去，见一人耕田，就说：“老兄你歇一下，抽袋烟，我来耕”。那人交过犁耙抽烟，他就认认真真耕起来，他原是个耕田好手，官兵根本不怀疑，就从他眼皮底下追过去，他又一次脱险。当然，他之所以能多次机智地突围脱险，主要是当地群众愿意掩护他。1915年金东农民暴动，他是三支农民起义军的联络员，又多次冲出重围脱险。最后逃到东阳，被友人出卖被捕，在押回金华途中，官府怕他再次脱逃，就枪杀于孝顺镇老虎园，葬于孝顺镇红朱山。斗转星移，芳草萋萋，坟墓已无踪迹可寻。由于时代的局限，台州荣的斗争有很大盲目性，如民国元年四月初五，挑起鞋塘与曹村的械斗，任意杀人放火，造成震动金华的一大惨案。

二、一个鲜为人知的反清志士

金华曾参加辛亥革命活动的知名人物除张恭外，还有徐顺达（买儿），汪海水，官田黄勇霖，曹宅曹阿狗，让长郑兆权，三清殿宋春基等人。但有一个与秋瑾友好的反清志士，过去的记载均漏录，民间也少有传闻。鲜被人知，他就是雅芳埠村的金南山。

金南山（1877—1915），学名契兰，字铁宕，号梦香。自幼天资聪颖，工诗赋，十九岁考进秀才，二十二岁考一等，因不愿出挨贡费，未得补廪。后来他对清廷的科举制度日益不满，接受了维新思想，认为废科举，办学堂，教育救国是当务之急。他倡先捐资兴学，于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在东藕塘村创办群治学堂，该校为金华县农村首办新制学堂，开风气之先。

同年8月，为求深造，他东渡日本留学，是金华县最早的留学生之一。赴日后受留学生中革命风气的熏陶，思想由维新改良转向革命，同革命志士秋瑾等有交往。1905年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配合清廷镇压我国留日学生中的革命运动。是年12月，陈天华在东京组织我国留学生抗议，为唤起国人觉醒，他决心以身殉国，留下《绝命书》愤而投海自杀。这一事件极大震动了我国留学生，他们纷纷回国，投身国内革命斗争，秋瑾就在1906年回国筹组光复军。南山也在同年回国，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这时秋瑾在联络浙东、西各地会党加入“光复会”。金华“龙华会”号称有五万之众，为“光复会”寄以希望的重要反清组织，徐锡麟、陶成章、秋瑾等均数度来金华与张恭联系。在1907年1月下旬和3月初，秋瑾两次来金华活动，都曾寄住南山家，一同商议革命活动。每当夜深人静，两人在东藕塘堤散步密谈，有时慷慨悲歌，此情此景为南山之弟长山所睹，有文载于《藕塘金氏宗谱》。

1907年“光复会”组织的浙皖起义失败，秋瑾被捕殉难。金华知府嵩连兴大狱，张恭毁容出走，徐顺达等被杀，南山也被迫离家避难，流亡到绍兴一带，颠沛流离，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终成痼疾。武昌起义成功后，南山回归故里，但大疾时愈时发，终至失音，于民国四年（1915）10月16日逝世，终年39岁。综观南山一生，虽无多大建树，但能随进步潮流而动，亦不失一个能知时知世，忧国忧民的革命志士。

三、光复南京的有功之臣

武昌起义成功后，清廷起用袁世凯。袁玩弄权术，授意心腹冯国璋反扑武汉三镇，给革命施加压力，以期诈取日后的民国总统职位。（1911）年11月2日，冯军攻陷汉口，27日攻陷

汉阳。袁军气焰嚣张，武昌一时陷于混乱，革命遇到极大困难。幸而已光复的上海、苏州、浙江的革命军组成江浙联军，猛攻南方重镇南京，牵制盘踞长江下游的清军。经过江浙健儿的浴血奋战，联军终于打败以顽固反动著称的清廷防守南京主力、江南提督张勋等部清军3万余人，两江总督张人俊及张勋等逃至江北，统领王有宏被浙军击毙，12月2日光复南京。南京战役扭转革命危局，稳定革命形势，写下奠定辛亥革命胜利史上的光辉一页。我县今孝顺区一带，当年有数人参加过这一战役，并且立下了战功。

傅鸿淇（1887—1928），今傅村镇上姜村人，当时任江浙联军都督府副官长，代理二十一团团团长，因南京战役立功由上校晋升陆军少将，民国政府授以三等文虎章（本书另有专文，此处不详述）。

徐载金（1876—1836），原为廩膳生，学名震方，字羸生，又名伯虎，现源东乡长塘徐村人，后来弃文习武，1907年毕业于浙江武备学堂，又入浙江炮工学校炮科，1908年毕业。南京战役时，任浙江二十一团营长，光复南京时立有战功，民国政府授以四等文虎章，五等嘉禾章，后由上校晋升陆军少将。但以后走向反面，1936年任福建罗源县长时，被我党领导的农民暴动的起义军镇压。

姜良威（1889—1961），今傅村镇上姜村人，是傅鸿淇的表兄弟辈，辛亥革命时他在傅鸿淇部当兵。江浙联军围攻南京时，浙军主攻麒麟门、朝阳门、太平门。良威受命化装成商人混进南京城，为内应送联络信。当时攻城战十分激烈，炮火纷飞，敌军巡查严密，通过战线入城，随时可能牺牲。良威弟良友，同村姜大潮，傅延仕（1883—1975）在同一部队当兵，得知良威接受这一任务后，都为他担心，良友甚至失

声痛哭，但良威却欣然受命，化装出发，终于完成光荣使命，立下战功。

蒋光灯（1889—1981），今傅村镇畈田蒋村人，字汝照，在部队改名荣魁，绰号毛狗。辛亥革命时在江浙联军当兵，攻克南京时立下战功，民国政府奖给他光荣匾。匾大小两块，小的100×50厘米，朱地金字，中为“有勇知方”四大字，上款为“中华民国元年四月赠蒋荣魁”，有一篆文方印。下款为行书“浙江都督蒋尊簋”，亦有一印章，这块当为原物。另一块240×80厘米，款式文字均同，当为仿原件放大，挂于宗祠之物。这两块匾今尚存于他的外甥家。蒋荣魁复员时带回勋章数枚，最大一枚为银质，还有马刀一把，八十年代初尚存，蒋去世后不知下落。

今源东乡长塘徐村参加江浙联军光复南京战役的还有4人，他们都在攻克南京时立过战功，都曾获民国政府赠给的光荣匾，其款式与给蒋荣魁的相同，都挂于徐氏宗祠内，七十年代因祠堂失火才被烧掉。

徐载弓（1892—1940）。

徐守品（1890—1947）。

徐至金（1884—1940）。

徐守浩（1891—1927）。

1991年4月20日写于孝顺

说明：（1）此稿根据曹春生、方桂进、楼岳成、吴琅昆、傅宾龙、傅延武、洪维贤、洪樟法、洪孝如、洪孝森、楼琪良、施仁政、姜文炉、姜大斋、徐正溪、朱有阮、施永祥、施全园、刘炳寿、胡汝良、严金溪、吴球金、范海清、徐正樟等人回忆口述综合写成。

(2) 此稿写作时曾查阅摘录以下宗谱材料。

《东山傅氏19次修宗谱》

《东山傅氏20次修宗谱》(残存下溪村 6 本)

《东山傅氏20次修宗谱》(残存缸窑山村另六本)

《藕塘金氏宗谱》

《七峰徐氏宗谱》

王阡村存《楼氏宗谱》

《履湖庄氏宗谱》

《凤山洪氏宗谱》

《金华曹氏宗谱》

《蒋氏宗谱》

《清江范氏宗谱》

辛亥革命时期金华斗争史补遗

石 夫

金华县是秋瑾领导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浙江起义的中心和大本营。这在陶成章的《浙案纪略》中讲得比较清楚。因为金华有一个历史悠久、组织严密、反清意志坚决的龙华会，其领导骨干是有反清民主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但目光远大，逐步把单纯的反清斗争转向反帝反清的革命，而且大都具有献身精神。因此，在金华婺江之畔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波涛。金华县地处全省腹心，又是当时金华府的中心，许多重大斗争都发生在金华县。我写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金华龙华会》以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但该文主要为编撰《金华县志》而写，受许多限制，有一些重大史实未能收入。故特写此文，以补拙文之缺！

积谷会和千人会

金华龙华会之所以坚强有力，实得益于积谷会和千人会。积谷会和千人会是反清斗争策略的产物。

积谷会。该会领导人张恭，12岁考取头名秀才，思想异常活跃。他接受过金诚（曾任金华府学堂监督）夷夏之辨的教育，十分佩服抗清不屈而死的东阳张国维、鄞县张煌言；又接受过立宪党人、丽正书院山长汤寿潜的改良主义思潮。对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有深切的危机感。而张恭之父张棫，却大异

其趣，一生循规蹈矩，教书授徒，最怕张恭走康有为、梁启超的道路。故而严加管束、不使越礼法范围一步。故张恭明知金华有反清会党存在而一时未能加入。

张恭不愧是一个深具谋略的反清斗士。他决定采取合法斗争的手段逐步积蓄反清力量。因金华时旱时涝，年岁不丰，张恭乃禀报官府，设立积谷会，以积谷赈济。他首先捐谷100石，以示倡导。官府觉得此举可行，乃拨常平仓谷200石作为仓本。社会名流倡导，官府支持，各界乐善好施者纷纷捐谷入会。张恭在城乡建立8处分仓。并订立了严格的开仓、晒粮、保管、记帐、领（借）谷制度。每遇青黄不接之时，缺粮户可借一月之粮，秋后免息归还。中饥之年日赈粥一餐，大饥之年供粥两餐。后为扩大队伍，规定缴谷一石即可入会。积谷会大得民心。张恭乘机把积谷会改为千人会。他在这两个会里，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如被秋瑾视为心腹的龙华会金华县“红旗”，金、兰、浦、汤四县军事参谋徐顺达，龙华会交通部长倪金等都是千人会的骨干。至今，金华县农村中八九十岁的老人多知有千人会，倒不甚晓得龙华会。

秀才造反

辛亥革命时期的金华，文攻武斗，各放异彩。这里着重介绍秀才造反。

秀才造反以光绪卅年（1904）创刊的《萃新报》为滥觞、为龙头，展开一幕反清反帝、要求自治、发展科学的活动。

《萃新报》案 该报第一期即登出《中国地方自治论》、《日俄开战与中国之关系》等众人瞩目的国内外大事专论。金华府、县因办报人大都是举人、解元等头面人物，不敢妄动，坐以观变。后该报传到严州府学堂，被严州知府锡纶发现，禀

报浙江巡抚，以该报“出言狂悖，请予封禁，以正士风”。幸亏陶成章、魏兰在杭州得知消息，急函告张恭，作好准备，迨清政府前来查禁，报社已改换门庭，金华府、县只得不了了之。但《萃新报》也从此夭折。时谓《萃新报》案。

《八婺开通学社》 学社简章登载于《萃新报》第一期。发起人都是八婺名人，如金华张恭、金兆奎，东阳蔡汝霖（曾任金华府学堂监督）等。简章宣布“以开辟风气，提倡学者重名誉、励节气，养成国民之资格为宗旨”，“拟先设于金华府城，再分立于各邑。”并公开提出第一期、第二期的创办、续办义务。主要是：建立阅报所、演说堂；举办婺学报、编辑教科书；讲求经济学，倡兴工艺局。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已喷薄而出了。

《处(州)、金(华)、衢(州)、严(州)四府调查会》
《萃新报》在第二期、第四期刊载《处金衢严四府调查会之缘起》。此文提出：“调查者自治之母也，自治者调查之产物也。”并尖锐指出：基督传教士、外商来华者公使武官俱在详尽调查中国，而我国人可不竭尽全力以调查乎？《缘起》附有调查体例，分地理、历史、户口、物产（含农业、工艺、商业）、政治、学界、时局调查7大类61个子目。为了使调查缘起得以认真贯彻，除规定每个会员都是调查员外，还聘请若干义务调查员。可惜《萃新报》被查封，调查结果不甚了了。

《猛回头》案 光绪三十年（1904）陶成章来金华县城联络龙华会时，带来一大批《猛回头》、《革命军》等书刊，对推动龙华会众的革命化起了不少作用。金华县曹宅曹阿苟仗义好拳，求入龙华会。张恭见其入会，并赠给《猛回头》一本。曹到处讽诵，向群众宣传。一日，有豪绅夺其亲戚之牛，阿苟怒而斗，终因人单势孤，所带之《猛回头》及龙华会布票（会

证)被豪绅一伙夺去,并告诸官。金华知府嵩连逮捕阿苟,欲追源问根,先利诱后酷刑。阿苟怒曰:堂上之人除尔之外,尽皆龙华会人。嵩连一无所得,怒而杀之。时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众谓之《猛回头》案。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张恭

金华的辛亥革命可以说与张恭相始终。其前半生事迹已见龙华会一文。这里简要记述其南京光复至逝世前的业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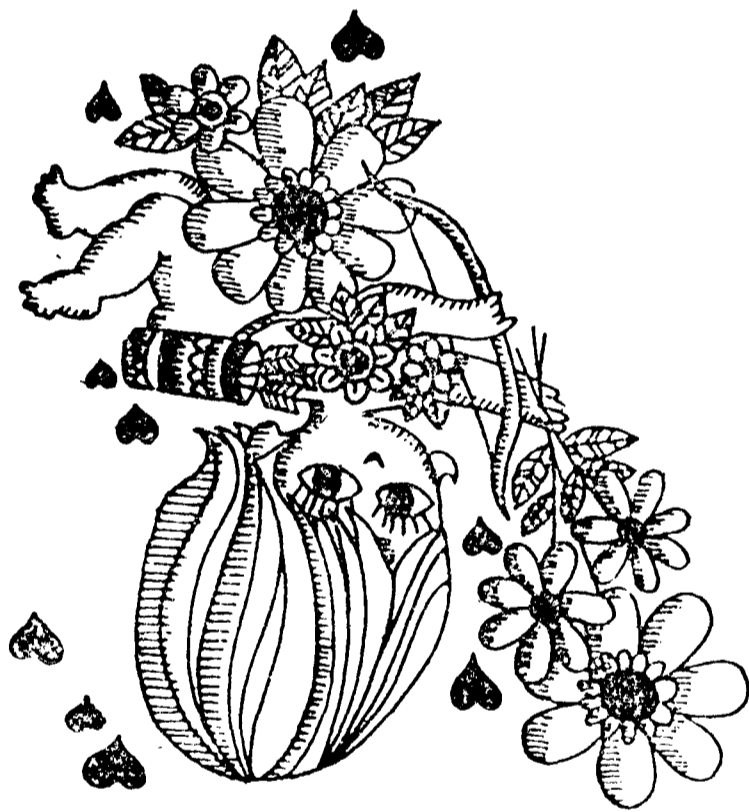
1911年12月南京光复,张恭在南京上元县监狱获释后,立即回到杭州,时立宪党人汤寿潜主持浙政,张恭感到不对头,但汤又是他的授业老师,他不便讲什么。故而立即驰回金华。金华人民万人空巷,在小码头迎接张恭回金。当时任金华军政分府长的朱郁荃捧印让贤,张恭认为革命不是为做官,愿任民团长、训练旧部,准备追随孙中山先生北伐,未接受。南北议和后,张应同志之请,出任同盟会浙江分会会长,举办《平民日报》,宣传民生主义。为庆祝辛亥革命胜利,他亲自执笔编写新戏《民国记》(又名《大破南京》)。此戏主要介绍孙中山、黄兴等人的丰功伟绩、江浙联军光复南京的历史,也穿插一些他一生传奇似的事情。此戏无论从内容、唱词、道白、服装、音乐、台步、舞姿等都作了多方面改革,深受金华观众喜爱,在府城隍庙演出,场场满座。观众看后反映:看了《民国记》,胜利勿容易;前辈泪和血,染红新天地。

民国元年8月,金华县父老为光复金华诸先烈建忠烈祠,并举行追悼大会。张恭抱病溯江回金,途遇风寒,已经咯血。8月25日举行大祭。张恭亲读悼词,他既痛心同盟会之分崩离析,又痛悼陶成章之被刺,捶胸大哭,病情加剧。10月5日终于英年早逝,享年36岁。金华人民按照张恭生前的愿望,乃葬

诸岳王陵旁，经当时省都督府批准，葬于杭州仙霞岭。孙中山先生亲自来杭吊念。

金华辛亥革命时期的杰出代表张恭的业绩将永远彪炳史册！

1991·8·25日于金华市人民医院五病区



傅其永在辛亥革命 暨护国运动时期事迹记略

俞 家 桧

傅其永，谱名鸿淇，字扶骞，别号右泉，1886年出生於金华县傅村乡上姜村，排行第六。少时半耕半读，无出奇处，且讷讷于言。因赴童子试不售而家境又欠裕，去兰溪依其长兄傅怀永。其时傅怀永任云山学堂国文教习有年（注一），傅其永一边执炊，一边读书，故后来傅怀永哭六弟诗有“谁识曾为爨下材”之句。①

傅其永先是毕业于浙江弁目学校。1906年，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后更名陆军军官学校）成立，在杭招生，傅其永初试录取。浙省同时录取四十人，永康吕公望，奉化蒋介石均在內。五月间集体北上，过上海候船时，身为光复会老会员的吕公望，为谋发展革命势力，特邀旧识新知王萼、童保暄、叶志龙、张鸿翔、倪海薰、傅其永等人，访秋瑾於女学报社，畅谈形势。其时秋瑾有光复会与同盟会双重会员身份（注二），当场由吕公望作介绍人，傅其永等欣然填写入盟书。抵保定后，复试合格，傅与吕同编入一期炮科。蒋介石同期不同科。②

1909年军校毕业，傅其永、吕公望一起被分配回浙，傅到新军八十二标见习，吕入督练公所。未几，傅其永与童保暄、王桂林同被派赴天津学习宪兵；而吕公望有感於秋瑾就义后浙

省光复会无异烟消云散，一时形单势孤，闻广西筹建新军，乃联络一些同志前往以谋发展。傅其永等学习期满回浙，同在陆军宪兵营任职，童为督队官，傅、王为队官。自此在宪兵士弁中发展会员，卓见成效。宪兵因职务之便，故在以后革命活动中常担任分送密令，运送军械、警戒探查等职务。②③

1910年春，吕公望因广西事泄失败返浙，重回督练公所。其时浙军中光复会负责人朱瑞，新代理八十一标管带，亲自找吕公望密谈会务情况，並让吕接替会务领导工作，掌管“囿”字形戳记。该字形由“光字头”“复字脚”加口字组成，用作光复会文件的征信。此后，光复会在浙省军队系统迅速发展，尤其是新军几全在掌握之中。会务组织日趋严密，吕公望、朱瑞等七人参与“上级会议”，一切保密，只由吕单线对外联系。傅其永、童保暄等五人参与“中级会议”，凡上级会议决定，由吕召集傅等五人面示，再由傅等向下传达或直接执行。会议地点多在城隍山、紫阳山、与西湖白云庵等处（注三）。其时革命风潮日益汹涌澎湃，浙抚增韫控制甚严，特别对新军有猜忌，故下令分散驻防，规定不许“串联”，并限制武器装备，每人子弹不足五发。吕公望等为加紧准备起事（原有浙省首先发难之议）④，补充枪支弹药是当务之急，乃亲自赴沪，与光复会负责人陶成章、李燮和接洽，由沪方支援手枪及子弹，私运抵杭后，归傅其永等负责接运、收藏与分发。②③

武昌首义消息传来，浙军光复会密谋响应。扩大的“上级会议”连续讨论四次，始於10月19日做出决议：（一）起义时拥汤寿潜（注四）为浙江都督以资号召。（二）派吕公望、王金发等分赴各地发动民军起义，诱城兵外御，使利於杭城发难。（三）定十一月九日为行动日期。在吕公望回杭前，光复会由童保暄临时负责，並保管囿字形戳记。（四）派人往上海李

燮和处运手枪两百支，子弹若干，抵杭后由傅其永等领可靠宪兵接运，秘藏於万松岭敷文书院。③④⑤⑥⑦

上述决议，由吕公望召集童保暄、傅其永等五人小组当面宣布。吕交戮记时再三嘱咐童保暄，若有大事一定要大家商量，不可独断独行。詎知童大印在手，发号施令，不听傅其永等人的劝阻，想趁吕公望未回，提前行动，争取头功，以达到做“都督”的美梦。

从客观上来说，提前发动也是形势所逼。主要是上海光复的消息传到，民心沸腾，谣言一日数起，浙抚已密切注意，有可能抢先下手镇压。在这种情况下，真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傅其永等也只能同意提前。於是五人中级会议共同议订军事部署，童被推为“临时总指挥”。十一月三日，傅其永等派可靠宪兵分头急递正式命令，定当夜后半夜（即四日清晨）开始行动。傅氏本人还有派宪兵会同工程营兵士如期开城门接应新军入城的任务⑧。盖当时各城门一向归满人城守员负责，必须事先控制，城外新军方能长驱直入，事虽细微，责亦重要。另外还有分送枪支弹药与率队进攻任务（见后）。②③④⑤

三日下午七时，傅其永亲自送手枪及子弹抵达南星桥顾乃斌营⑧（八十二标三营），当夜随顾营向凤山门进发。进凤山门有一段插曲，曾在乡里广泛流传。据传兵临城下时，城门紧闭，但其上小洞门开着，此小洞门供观察或传递物件之用。派人前往探视，无敢应者，惧中埋伏。傅其永自告奋勇，只身前趋，静听片刻无音响，即毅然伸头入小洞门窥探，始发现有袖缀白布（起义标志）的士兵在等候，乃招呼开城。当时伸头窥视极为危险，假若满兵尚在，则大刀劈下，人头落地，为此傅其永有“革命不怕死”的美誉。

进城后，傅其永随顾乃斌营直扑抚署。因事先议定：三营

包围抚署两侧；二营进攻抚署后门；傅其永则率“弁目队”（事先选择组成的敢死队）配合著名女志士尹锐志、尹维峻姐妹（注五）带领的上海敢死队进攻抚署大门^{②⑥}。部署就位后，号炮一响，尹维峻左手握手枪、右手执炸弹首先冲入，傅其永与弁目队其他人迅即跟进，直扑二堂。因为抚署卫队早被光复会同志控制，所以未遇抵抗，即扫平全署，巡抚就擒。五日黎明，各处皆攻克，唯旗营顽抗。不久从城隍山炮击清将军署，旗营诸将自知不敌，亦缴械投降，於是杭州全部光复。^{②③④⑤⑦}

总之，光复杭州之役比较顺利，有谓“不折一兵，不费一弹，全赖事前进行之努力，策划之苦心^④。”很显然，这是浙省光复会志士长期革命活动的结果。孙中山在就职临时大总统时曾坦然指出：“光复会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其功表见于天下。”（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一号）实出于肺腑之言。

杭州光复后，各府相继成立军政分府，七日召开省临时议会。在会上，吕公望慷慨陈辞，略谓“南京为我国东南屏蔽，夙为政治、文化、经济之中心，如不速取，则江浙难安枕，大事未可料也！拟急组部队进攻南京，争取革命成功。”盖其时清帝尚未退位，袁世凯军反扑武昌，气焰嚣张，吕氏此议，实体现政治军事远见。正讨论时，镇江徐绍祯乞援急电到。徐绍祯乃南京新军第九镇统制，约万余兵力，因受排挤猜忌仓卒发难，被刚调防南京的张勋巡防兵（四十营）击溃，退驻镇江，故急电向浙、沪求援^⑬。因此吕公望提案获一致通过，并责成吕制订计划。当时浙军兵力不多，装备陈旧，仅可自固，而竟能率先高举义旗，出省远征，实为大局考虑！於是浙军攻宁支队成立，支队长朱瑞，参谋长吕公望，傅其永任司令部参军（据宗谱载傅并任联军司令部副官长）。所有干部人

选，皆光复会员中佼佼者。⑨⑩

十一月九日，吕公望带领参军傅其永，偕参谋一人，副官二人，先期到上海。此行一方面照会沪督陈其美与淞督李燮和（注六），筹组联军会攻南京；一方面通过光复会关系向江南制造局交涉，领到最新管退过山炮四尊，编入本支队。接着，吕、傅等径赴镇江，与徐绍祜商议。适遇原第九镇马队管带谢祖康，经吕等说服，谢祖康召集已溃散的骑兵百余名来归。为筹军马，吕、傅等又返回上海，向陈其美商借军马120匹。初时陈尚踌躇，经晓以利害，始如愿以偿，於是又增添马队。至是，浙军已成为“步、马、炮、工、辎”五兵种齐全的支队，战斗力大大加强。这当然主要归功於吕公望运筹有方，但傅其永一直追随在侧，起了一定的协助与参谋作用。②⑨

十一月十二日，浙江攻宁支队开拔，由火车运送，经上海、苏州至镇江，举徐绍祜为联军司令。詎知十八日议事时，徐推诿准备未足，无兵可出；镇督林述庆（注七）与徐有隙，也推诿不出兵；而沪、淞军亦未到达，会师无期。浙军乃迅集全体军官於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经吕公望指陈形势，略谓“方今张勋立足未稳，我军锐气方刚；若拖延时日，北兵源源集结，则革命军难以抵敌。”於是群情激奋，傅其永等一致认为宜速不宜缓，乃决计孤军挺进。⑨⑩⑪

二十一日，黎天才（注八）率岑春暄沪寓的卫队兵二百余名赶到，愿听浙军指挥。黎骁勇善战，吕公望命马队与黎部衔枚疾进，夜袭幕府山炮台（在南京城北三公里许，临长江）。次日拂晓传来捷报，军心为之一振。⑨⑩⑪⑬

当晚，司令部召集参军、参谋会议。傅其永等咸谓兵少攻城，於兵法不利，必须出奇制胜，最好先诱敌出城，我方於遭遇战中先声夺人，才是取胜之道。於是决定一方面命幕府山炮

兵向城内开炮诱敌，促使张勋兵出城；一方面加紧准备各线部署，再从各队挑选出先锋敢死队健儿二百名待命。⑨

二十五日拂晓，参军傅其永率先锋敢死队一百名从中路挺进马群（南京城东约六公里）；另一百名由参军裘绍带队从右翼进占紫金山东段，以掩护大队前进。大队至麒麟门（城东十公里）附近，傅其永部已在马群与敌遭遇，司令部接傅紧急报告，即迅速开进。这时先锋敢死队已抢占有利地形，在傅其永沉着指挥下，向敌军猛烈射击。张勋巡防兵素称凶悍，自恃人众械精，又新破第九镇新军，骄横不可一世，突遇强劲对手，懵懵然不知所以，等到醒悟，驱全军压了过来，而浙军大队已及时赶到。吕公望一马当先，亲临前沿，向傅其永了解情况后，边观察边绘作战草图，指挥全大队左右展开，进入阵地。於是官兵一鼓作气，所向披靡，张军节节败退，至下午四时许，浙军已夺获五个山头，逼近孝陵卫（离城三公里）。是夜，双方收缩阵地宿营休整。⑨⑩⑪

二十六日拂晓，张勋为挽回颓势，出倾城兵力，向浙军施行包围战术，形势非常危险。但浙军官兵多数奋勇异常，反复争夺，支队领导与参军、参谋均临前线，鼓动士气，指挥防御。坚持到下午四时许，浙军火力已被敌压倒，有不能支持之势。幸有吴淞兵一营（实亦浙人、注八）适从中路赶到，而浙军马队巡逻方回，也自左侧冲上来，於是军心复振。这时司令部断然下令吹起冲锋号，全线奋勇出击，张勋军不知虚实，顿时大溃，残兵退守城中，从此不敢出城一步。浙军进薄城下，时已傍晚，旋退孝陵卫扎营。⑨⑩⑪

是役，傅其永始终身先士卒，沉着指挥，使先锋敢死队充分发挥尖刀作用，並及时申报前沿阵地情况，供司令部决策。故颇为支队领导所倚重。

二十七日，浙军司令部集体讨论攻城之事，翌日深夜，以地雷炸城墙无功退回。於是司令部再集参军、参谋与各队队官议策，决计先攻天堡城。天堡城雄踞紫金山顶，为攻克南京的必要制高点，炮火可控制全城。先是，随后赶到的沪军洪承点部，自愿向联军司令部（已跟进前移至麒麟门）请攻天堡城，结果损兵甚多，退回镇江。至此，浙军又接过这一艰巨任务，以后几经反复，血战一昼夜，始於一日清晨攻克天堡城。⑨⑩⑪

天堡城攻克后，即向上运去最新过山炮三尊，迳向城内督署轰击，张勋等心惊胆怕，只得弃城登军舰逃往江北。十二月二日，各军相继入城，南京宣告光复。此役浙军居首功，为各方所公认，也得到近代史专家的肯定。⑨⑩⑪

吕公望、傅其永等入城后，当即营救金华老光复会员张恭出狱，并资助返浙。

1911年初，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结束后，孙中山与江浙联军将领一起摄影留念（该照片一直珍藏於傅其永家，笔者少年时曾见及，惜抗战时毁於日寇轰炸）。未久，浙江攻宁支队扩编为第六师，编入黄兴所领导的北伐军序列。朱瑞任师长，吕公望任第一旅旅长，傅其永任职不详。班师回浙后，朱瑞任督军，吕任师长，傅其永一度为其下属炮兵团团长，旋调步兵第二十一团团团长。

一月中旬清帝退位，袁世凯取代孙中山为大总统，即以南京驻军庞杂和节省粮饷为借口，逼各部裁军，实为削弱革命力量计。浙军处境日蹙，乃於五月间班师回浙。其后，吕公望任嘉湖镇守使，驻湖州，傅团随往。不久同改驻嘉兴。

1915年底，讨袁护国运动兴起，滇、黔、桂、粤相继独立。1916年4月初，吕公望与傅其永密商响应护国，这从北洋派杨

善德（驻上海第四师师长）致南京冯国璋的急电中可看出端倪，该电文中提到：

“顷接嘉兴吕镇守使、傅团长电称：刻下时局未靖……，公望，其永……以免生灵涂炭为目的……只知维持浙境治安。状此电闻……勿生误会。”⑱

这显然是准备独立而向毗邻驻军采取安抚的对策。4月13日，吕公望率傅其永等所属文武官员正式通电宣告嘉湖地区独立，明确表示拥护共和，谴责袁氏，脱离与北京政府的关系。⑲

4月19日，吕公望率全体浙军将领（傅亦署名）发出宣告浙军独立通电，中有谓：“方今四海分崩，众心离涣……果拥兵负隅，则败亡可待……。公望等当整饬军旅，严阵以待。”此电文更进一步表示护国的决心。⑲

先是，驻杭旅长童保暄，为响应护国运动，於12日率兵临将军署，将军朱瑞（注十）出逃，乃逼巡按使屈映光任都督。屈表面上领衔通电独立，而暗地里却向袁氏通诚。这一见不得人的勾当，因受袁世凯公开通令嘉奖而暴露於世，引起舆论大哗，有“粤浙两光两面光”之讥（粤龙济光也搞假独立）。这就发生了吕公望与傅其永进军杭城之举。吕、傅联络浙省其他将领向屈责难，屈被迫辞职，群推吕为首领，於是19日以吕公望领衔的浙江宣告独立通电。⑲

5月16日，吕公望正式就任浙江都督。

浙江的独立，使袁世凯及其爪牙大为震惊，正如当时盘踞上海的张宗昌急呈冯国璋文中所谓：“查滇黔桂粤相继独立，时局艰难已呈尾大不掉之象。第各该省远在西南，其势力仅限於一隅，譬犹手足之疾而非腹心之患，自浙省响应，於是变生肘腋，迫在眉睫。”故力劝冯早日用武力镇压⑳。事实上袁世凯闻浙警，也曾令正在海路的运兵船转向浙江镇压，结果因军

舰在温州海面失事未成。①⑥另一方面，护国阵营对浙省独立亦有很高评价，如黄兴致吕公望等电文中有“砥柱东南”之誉。其后黄兴致金山致公堂函中也提到：“浙江独立后……，昨已推吕公望（系旧同志）代之，……将来东南局面，定可望其发展。”②②

6月6日袁世凯气绝。

综观吕公望领导浙军参加护国运动，确实促进大好形势，虽然整个运动以妥协而告终，但吕氏功不可没，而傅其永则始终追随左右，精诚支持，从二人最初通电可以看出，显然亦参与擘划，并付诸行动。

自吕公望任浙省都督后，嘉湖镇守使一度由傅其永代理。当时北邻虎视眈眈，故有防守北陲之重责。以后黎元洪接大总统位，始暂安一段时期。但不到半年，又发生浙军内讧之事，影响傅氏后半生的“命运”。

盖浙军中派系甚多，将领间互相猜忌，甚至倾轧。前时，在一致对敌的情况下，矛盾被掩盖，而一旦形势稍安，则争权夺利之心复萌。有夏超者（注十一），任省会警察厅厅长有年，飞扬跋扈，素有“警察王”之称，根本不把新督军放在眼里，遇事掣肘。同时浙军中尚有张载阳、周凤岐等，亦自恃老资格，不听调度，思驱吕而代之。因此夏、张、周密谋倒吕。此事被吕知悉，为削夏超势力，乃呈文北京政府，保举傅其永为警察厅厅长。此呈文由黎元洪批准，正式任命下达，夏超升任省警务处长，遗缺由傅其永继任。警务处长无实权，明升实降，这就触发了夏超等的“兵变”。“12月26日，新任警察厅长到厅接事，在该厅举行欢宴时，突然有形似军人的彪形大汉多人涌进来，把傅其永扭到大门外，打得遍体鳞伤，半死半活。”同日，吕公望出走嘉兴。31日，吕自嘉兴发通电，中

有：“夏超胆敢主使驻厅巡逻队长林文史率众凶殴傅其永，傅身受重伤，生死莫测。全城警察罢岗，并煽动省城一部分军人……监守银行电局，捏造公望辞职电报……”云云。^{①7}

以上记载，可以略窥当日浙军发生内讧的大概。“内讧”事起后，原属吕、傅麾下官兵十分愤慨，准备与夏超之流决一死战。此时傅其永正在医院治疗，不顾伤痛，四出奔走，竭力劝阻，说“个人名誉地位其次，杭城数十万民众性命财产为重”。由于傅氏的宽广胸怀，终于消弥了一场战祸，当时杭人甚为感德，曾停市罢工以作声援。即此可见，乡里称赞傅氏忠实、老实，信非虚誉。

由于内讧，北京段祺瑞政府乘机插手，明令其亲信杨善德继任浙江督军，并率其第四师入浙。夏超等至此始发觉已落入北洋派所设的圈套，原来的如意算盘落空，因而又转向拥吕、留吕。然为时已晚，几经通电、请愿，亦未能挽回“浙人治浙”的局面。北军源源开入，浙省从此被纳入北洋派势力范围。吕公望以另有重任的名义被调入京。傅其永因受人身侮辱，十分心灰意冷，决意解甲归田，终于在1917年初，领了一笔“遣散费”回到金华。为息影家园，在城内雅堂街口建居室（今市政府大门正对面）。并与友人蒋景璠（艾青之父）合伙开设酒酱坊於傅村，店号永福祥，实有感於仕途艰险，思改业工商，亦虑及其后生计故也。

1918年夏秋之交，傅其永复出。盖是年夏章士钊特邀吕公望（注十二）自京南下广州^{②7}，效力於护法军政府。当时援闽浙军童保暄（已归顺北洋派）反对护法，攻粤得利，广州震动。吕公望此行，实肩负策反童部重任。因童部多半为吕之旧属，故未旬日即获巨大成功。以后护法军政府将浙军反正部队扩编为一师一旅，任命吕公望为浙军护法军总司令，开赴汕

头。扩编过程中，吕电告四方，故旧纷纷前往，傅其永亦与也！这是傅氏复出的缘由。在护法军任职期间，傅氏病假居多，有无建树，未见可稽史料；据其家人回忆，最后升到混成旅旅长，还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北伐，不久因心脏病发，乃请长假返里，时为1922年。自此一直在家休养，大概是宁汉分裂时，蒋介石在南京找到吕公望，托吕找两个人，一是杨永泰，一是傅其永。吕写信给傅，告知蒋介石想请他出山，傅回信以病恳辞。傅於1927年病逝，其故旧挽联中有云：“今人几见有全身？！”乃喻军阀混战时期，官兵横死者多，故有朝不保夕之虑，能全身而善终，亦足使人称羨，洵写实也！

傅其永从戎期间，曾获二等嘉禾勋章与三等文虎勋章各一枚。原配早逝，继娶金氏爱愉，生四子一女，今均健在。幼子傅延墀已入美籍，当代数学家，任印第安那大学终身教授。

附 注

（注一）傅怀永，字冰如，谱名鸿河，乡里尊称“老河先”，前清廪生，毕生致力于教育，在兰溪云山学堂执教二十四年，晚年返乡就职于育德小学，吴晗、艾青均曾执弟子礼。（参见《金华文史资料》第二辑136页；第三辑48页。）

（注二）光复会成立于1904年冬，初期会员有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次年在日本与同盟会合并，很多会员有双重身份。江浙一带多仍沿用光复会旧名进行活动。1909年以后，光复会与同盟会分裂，主要是对革命策略意见有分歧，但推翻满清的大目标是一致的。

（注三）白云庵即月下老人祠，在南屏山麓，有曲径可通湖边，历来是光复会志士聚会之处，主持意周和尚同情革命。^⑮

（注四）汤寿潜，君主立宪派。浙省保路（沪杭甬铁路）

运动中表现尚佳，稍有声望，曾任浙省咨议局局长。⑬⑭

（注五）尹锐志、尹维峻姐妹，嵊县人，曾与秋瑾共事。上海“锐进（峻）学社”即由尹氏姐妹与秋瑾、陶成章、徐锡麟等建立，乃光复会各省同志秘密联络机关。二尹参与过上海、杭州、南京光复之役。

（注六）李燮和，字执中，湖南人，光复会骨干，曾亡命南洋进行革命活动多年，后回上海组织光复军。上海光复后，被拥为吴淞都督，在支援光复杭州与攻取南京两役中，都有一定的功绩。建立民国后被袁世凯所收买，成为可耻的筹安会一员。

（注七）林述庆，原第九镇三十三标管带，光复会员，武昌起义后在镇江发难，成立镇江军政府，故称镇督。后入京依袁世凯，1913年暴病死，人咸疑为袁党所毒毙。

（注八）因岑春暄原任两广总督，故有称黎为粤军；又因黎原属龙济光部，或称之为济军；李燮和光复军曾供给过军饷，故又视为淞军，史载十分混乱，乃各部都想争功之故。实际是一支独立的小队伍，攻宁时暂归浙军指挥。黎本人参加过中法、甲午、护国、护法战争，一生转战南北，有黎老虎之称。

（注九）此吴淞兵一营实系浙人王文庆（光复会员）所招募的台州兵。因王当时隶属于光复军，故称吴淞兵。南京光复后王文庆所部即并入浙军。

（注十）朱瑞被袁世凯封为兴武将军，已死心塌地跟袁。

（注十一）夏超，青田人，1903年入杭州武备学堂，1905年毕业留校任学生队长。该校毕业生多在浙军中任职，故夏与浙军关系颇深（张、周均为武备学堂出身）。夏的“省长”美梦，一直到投靠孙传芳才实现。北伐时经吕公望策反，反孙

失败，被孙所杀。

（注十二）据章士钊自撰文^⑬，1918年夏，章被聘为广州护法军政府秘书长，行前往见段祺瑞，段说：“你别去当炮灰。”盖指童保暄攻粤节节胜利事。章特邀吕公望（时在京失意）南下。就是为了让吕去做策反童部工作。

参 考 文 献

- ①《宾庐诗草》 傅怀永著 家藏抄本
- ②《吕公望自传》 家藏抄本
- ③《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 吕公望撰 《近代史资料》
1954年第1期104—117页
- ④《浙江辛亥革命光复记事》 张效巡撰 《近代史资料》
1954年第1期118—124页
- ⑤《光复杭州回忆录》 钟丰玉撰 同上书89页
- ⑥《辛亥革命史》 章开源等著 下册126—134页
- ⑦《浙江辛亥革命纪实》 褚辅成撰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
刊·辛亥革命(七)》149页
- ⑧《浙江光复之役》 邹鲁撰 同⑦128页
- ⑨《辛亥革命浙军攻克南京纪实》 吕公望撰 《近代史资
料》1954年第2期33页
- ⑩《辛亥革命浙军进攻南京记事》 张效巡撰 同上书43页
- ⑪《浙军攻取南京详情》 辛亥10月21日时报 转引同⑦163页
- ⑫《革命缀言》 杨啸天著 转引同⑦79页
- ⑬《辛亥江南光复实录》 钱基博撰 转引同⑦38页
- ⑭《吴淞光复军纪略》 汉史氏撰 转引同⑦33页
- ⑮《辛亥革命史稿》 金冲及等著 第一卷346页
- 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陶菊隐著 第二册198页

- ⑰同上书 第三册43页
- ⑱《护国运动资料选编》 601页
- ⑲《袁氏盗国记》 183—186页 转引自⑱602页
- ⑳《护国军纪事》 转引自⑱604页
- ㉑《大树堂来鸿集》 转引自⑱600页
- ㉒《中华新报》1916年5月23日，7月8日。 转引自⑱588页
- ㉓《北洋军阀史料选辑》 下册 29页
- 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陶菊隐 第七册82页
- ㉕《中国国民党历史事件·人物·资料辑录》 27页
- ㉖《光复会又一女杰尹维峻》 裘振纲撰 《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7辑（续）
- 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陶菊隐著 第四册158页



辛亥革命志士：徐顺达 倪金

戴兆丰

徐顺达（1869—1907），字猛伍，以字行。俗号买儿。乾西乡天狮畈人。为人干练多才艺，善拳术。好友重信，在乡里受人推重。为当时在金华进行反清活动的民主革命人士张恭所赏识。在张恭戏班里任武旦角色，并管理帐务。经张恭介绍入龙华会后，又成为张的得力助手。在龙华会职掌红旗，秋瑾又委为光复军参谋，指挥金华、兰溪、浦江、汤溪四县军事。1904（光绪三十）年，陶成章和魏兰为联络龙华会配合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在湖南长沙起义，先后来过金华，成章就住在顺达家。成章极称赞顺达的才干，说他“对龙华会友感情深挚，凡会中兄弟一闻猛哥命，市者无不弃筐篚，耕者无不弃耒耜，竭蹶踊跃以从事”。1905年秋瑾到金华，见顺达干练有为，倚为心腹。后来顺达与义乌吴琳谦、武义周华昌便成为秋瑾所最信任的三人。1907年，徐锡麟、秋瑾发动皖浙起义前夕，顺达因与豪绅争田产，竟被押狱中，龙华会众激起公愤，准备劫牢救他，适秋瑾五月廿六日浙江起义出师令下，金华党人大喜，正欲行动，因会友倪金言语失慎，事机泄漏，为当时知府嵩连所侦悉，二十四日急将顺达杀害。年仅39岁。

倪金（？—1907），临江乡倪家村人。武秀才。性豪爽。

精拳术，授徒甚众。与徐顺达为莫逆之交。由顺达介绍加入“龙华会”与“光复会”。秋瑾授为交通部长，并嘱带同弟子要听从顺达指挥。1907年，顺达入狱，金百计营救。适秋瑾发出浙江起义令，金先到狱中告诉顺达，立即持银数百两往布店购买大量黑布。店主以黑布非常用物，惊奇地询问用途，金一时失慎，竟直告将作起义军号衣，并说还要缀“汉”字于肩上以作标识。店主以为言语疯狂，金愤与争论，喧吵中，事遂被知府衙役所侦悉，急报知府嵩连，立即命令警官祝连元前往拘捕。祝、宣平人，为金授拳门徒，故意迟迟其行，暗中遣心腹告金速逃。但终被嵩连追获，与徐顺达同日被杀害。

民国初，金华县人民在府城隍庙旁建立“烈士祠”，奉祀张恭及徐顺达、倪金等革命志士（祠今废）。

王廷扬传略

戴兆丰

王廷扬（1866—1937），字孚川，金华县澧浦蒲塘村人。家境贫寒，得外家资助才得读书应考。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人，二十四年成进士。任工部屯田司主事。庚子年曾随西行供职。改授江苏、广东知县加同知衔。襄办广西龙州边防。后调任留学日本监督，浙江省视学，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等职。宣统元年（1909）当选为浙江咨议局和北京咨政院议员。民国成立，历任义乌县民政长，浙江都督府顾问，临时参议院议员，浙江省议会议员，江西高等审判厅书记官长，内务部秘书，浙江省军务善后督办公署咨议，省长公署顾问，自治筹备处评议员。晚年寓居杭州，任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监察委员兼省贫儿院院长。

王廷扬早年加入同盟会，与孙中山时有书信往来（由其家属保存的孙中山来信，于“文革”中被毁）。与秋瑾烈士亦早在日本就结识论交（据《六六私乘补遗》）。光绪三十三年（1907）光复会策动的浙江保路运动中，浙江各界人士于八月十六日在杭州召开特别抵制会，拒绝清政府以出让苏杭甬路权向英国借款150万英镑。王廷扬被推为副会长，主持会务。王积极领导反对这一丧权辱国之举，抵制运动声势浩大，金、衢、严、台四府各认50万元，表示抗议借款。王给“浙江旅沪

同乡会”信中并说，拟组织“决死党”与路共存亡。锋芒直指英帝国主义，清政府惶恐万状。因而这保路运动也遂即成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导火线。

王廷扬工书法，尤善榜书。亦能画兰，暮年生活，鬻书自给。生平热心公益，不言家事。七十寿辰，杭垣友好集资赠送楼屋一座。即日书契写明捐赠聋哑学校。又立遗嘱将书籍70余箱捐赠故乡学校。临终前数小时，还曾手书“少为身后子孙计，先恤眼前苦难人”一联，表明胸臆。

著作有《湖山草堂集》、《山鸟山花馆文稿》、《诗选》等。附录其《蒲塘十景诗》中《清塘烟雨》一首，以飨读者：

村居春雨足池塘，漠漠连村云水乡。
隔岸锄犁闻叱犊，几家蓑笠正分秧；
衙官鼓吹蛙双部，舞羽低昂鹭一行；
泼泼游鱼知趁涨，儿童三两集鱼梁。

怀念先父朱郁荃

朱 坤 明

先父朱郁荃，谱名元善，字味青（惠卿），号复梅，晚年号领中。1857年9月21日出生于义乌陇头朱村农民家庭，他父（我的祖父）朱聘园是农村私塾教师，教子甚严。他幼时聪颖，而又能苦读，据说每晚我祖父要于枕上授书，次晨即背诵。16岁受学于乡贤朱辉卿先生，21岁进秀才。稠城张辉卿先生器重其才，将爱女许其为妻，婚后，因家境贫寒，为谋生计，在村里设馆授徒。1891年以优贡参加廷试得一等，后曾任安徽芜湖、河南长葛等县知县。他为官清正廉明，常微服下乡体察民情，处理案牍更是夜以继日，不辞辛苦。1895年他任芜湖知县时，正值洪水为患，省吏慑于部令，要派款偿付对外国赔款，禁止下属报灾。先父认为“不能剜瘠民之肉，来填外人之欲”，仍亲自勘察灾情，据实申报，为民请命。省吏以我父违抗政令，撤职调督修江堤河道。离任之日，乡亲塞途相送。1902年署河南长葛知县，办案神速，指导农民发展经济成绩显著，省里让先父报功，先父说只要民众有利就好，个人之功何有，不肯上报。

在清廷腐败，外强侵略，国步维艰，民众生活日益贫困的情况下，先父亦与众多知识分子一样，寻求救国富民的出路，对1897年康梁维新变法很为赞同，曾写过《大同真谛》一文支

持变法，並提出“复兴生产，藏富于民”的主张，要用“随处宣扬，多方奖励”的方法来动员民众，创造一个“振作萎靡，老少安怀，贫苦救济，礼尚成风，亲贤和利，道不拾遗，夜不户闭”的大同世界。但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家父看破了封建王朝的顽固反动性，于1904年辞去河南长葛知县职，弃官回籍，全家寓居金华太史第故址（现为酒坊巷）。早先，我族祖朱之锡（号梅麓）曾任兵部尚书、河道总督治理黄河功迹显著，死后追封过永宁侯，敕赐春秋祠祭，黄河下游及运河沿岸各县均立庙称大王庙祀之，先父为让乡人子弟追念先贤伟迹，勉以上进，请准在金华太史第建朱大王庙，后此庙房屋归省立金华医院使用（现为金华中心医院宿舍）。

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1905年家父和在日本留学的大哥朱章宝（隐青），姊夫丁儒为（品青）都参加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革命。1907年河南河内县招民垦荒，先父募集乡农数十人前往垦荒，实践他采用科学方法，改良农业生产的素愿。1911年辛亥革命，先父从河南垦荒回金华，我大哥朱章宝和姊夫丁儒为均从日本留学回金华，他们联合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力量，响应武昌起义，直接参加革命工作，保卫金华郡城，免遭破坏，安定了民心，受到郡人拥护。浙江光复后，郡人共举先父出任金华军政分府督军，据说先父再三让贤推辞，浙江督军汤寿潜因先父保卫地方有功，请准授予文虎勋章，并多次力促先父出任金华军政分府督军。1912年夏，金华、汤溪、兰溪一带旱灾，米价暴涨，人心混乱，先父亲往汤溪重点灾区抚民救灾，据说当时有几个反对辛亥革命的复辟之徒，乘先父不在金华之机，秘密策划，制造谣言，组织同党，到处鸣锣喊号，煽动饥民和暴徒入城焚烧抢掠，制造混乱，并将我家在太史第巷的私宅书籍衣服全部焚为焦土。军警虽抓捕了若干名暴

徒，先父闻讯赶回申明情况，所捕者均系迫于饥荒的受骗者，未忍深究，说不能以私愤而亏仁厚之德，将所捕者全部释放。此后，先父辞去军政分府督军职。1914年除夕，先父回顾总结了自己一生经历，认识到改良办法是救不了中国的，在《乙卯除夕述怀》诗中写道：“六十年来悟昨非，岁阑依旧典朝衣，逢人辄为披肝示，结果终嫌与愿违，世界大同忘己利，民生无补忍家肥，创兴公益无奢望，未到功成誓不归”。是年，他率若干乡农去汤溪白沙乡垦荒，白沙乡一带土瘠民贫，田赋独重，先父有心改变其穷困状况，在此结茅为屋，挂“学稼轩”门匾，以明其志，带头并劝当地农民，共同兴修水利，引水灌田，沤草造肥，烧牛骨灰，选择良种等，实行科学种田，勤耕细作。经他苦斗三年，瘠土变良田，农产量倍增，深受乡农欢迎。1916年家庭经济逐渐恢复，就在金华三牌楼仓茅亭购置一套住宅（此屋现为八咏路316号，由军分区拆建为军人宿舍），先父在此度过了他的晚年。先父为人对自己是节衣省食，艰苦朴素，作字必端楷，燕居必危坐，见人有过必直言，济人之急必尽力，对人力行敬爱功夫，毕生精力都用在如何教育群众，提高民族素质，如何发展实业，藏富于民和从事公益事业等，其目的欲有造于大同世界也。

先父办教育很热心，弃官回来就在家乡创办了梅陇小学，每次回乡都要关心了解学校情况，帮助学校解决困难。亦很关心成人教育，所到之处都宣传办农民夜校，讲提高农民文化知识和社会道德观念的重要。当了解到办夜校所需教材有困难时，克服自己两眼生翳，视力衰弱的困难，在金华仓茅亭寓所闭门编写教材，短小时内即写成《孝经白话解说》和增删《三字经》两本书，有振笔数千言而忘其目疾的刻苦精神。并自己出资刻板印刷，分送各夜校为识字课本。

先父在为民众开发资源，兴办实业方面，虽一再亏损，其志不少衰。为开发寿昌寿源煤矿，他四出募资金，股款收缴不齐，他出典住宅，卖掉白沙乡垦殖农田，变款数千金垫付股金，事成利在人，事败责归己，开发煤矿未成，所垫资金亦无法收回。他在金华仓茅亭私宅还办过平民缝纫班和服装厂，聘请技工朱元悟、朱克赞为师，招贫苦家妇女为徒，边教学、边生产加工，由于初办技术低，质量差，产品销不出，加上资金不足，难以为继而停办。义乌北区农村生产豆腐皮是较普遍的农家副业，先父见金华、汤溪农村较贫困，想把豆腐皮生产技术引来，就自己出资买设备，聘请义乌师傅传授技术，招贫困户到我家来学。先父对兴办公益事业或为人排忧解难，虽远程徒涉亦不知劳，1917年义乌拟修县志，公推先父主其事，他勇于承担，并作出实施方案，想通过修志采访民风，并为整理地政打下基础，惜县财政无力举行而中辍。义乌与诸暨交界的云雾山有官山数千亩，两县山民常为争樵牧而发生械斗，官方不予解决，纠纷年年不已，先父自告奋勇，涉山越岭，前往调查，经双方同意以岗划界，立出界碑，纠纷遂止，并在界内成立林业公会，劝山民栽植林木，发展经济。金华至低田大路木桥年年损坏维修，乡人请先父为头筹建石桥，他对修桥铺路更乐于赞助，为在乡绅富户间募集资金。

1921年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义乌人陈望道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我堂兄朱章喜早年在上海参加共产党，常与同学、同志来我家与我父接触交谈，共产主义思想给我父有一定影响，他对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人很器重、很爱护，蒋介石叛变，在上海大屠杀共产党人，我堂兄朱章喜与金华籍学生纷纷从上海逃回金华，为保护他们，先父聘请了三位共产党员（即金华傅村傅鸿权、金华浦口村陈敬森，义乌何店村盛奇

品)到义乌梅陇小学教书，掩护他们在金东义西开展革命活动，直到被国民党反动派发觉，要对他们镇压时，才撤离梅陇小学，避到桐乡县屠甸镇去。据说后来傅鸿权在上海被捕，牺牲于苏州监狱，陈敬森也被捕，杀害于杭州监狱，先父对他们为革命而牺牲是很悲痛的。由于反动派大杀共产党人，先父只好装成迷信者，天天闭户潜修，奉神参道，但他心里十分明白，要革命，没有一支革命的军队就只有送死。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些事实给他带来了希望，认为大地光明将要降临，他自己年迈了，把1927年11月24日出生的儿子起名为“坤明”，以此表明他的心迹。

先父于1934年7月19日患背痲死于金华仓茅亭街53号。

光辉的历程

——记民主革命时期金华人民的革命斗争

中共金华县委党史办公室

金 华 县 档 案 馆

金 华 县 县 志 办 公 室

金华县自1925年开始建党至今已有65周年了。这65年的历史是一部光辉的历史、战斗的历史、胜利的历史。本文主要记述金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斗争的概况，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在这24年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中，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英勇顽强拼搏，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迎来了胜利，建立了人民的政权，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一)

金华人民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861年太平天国后期重要将领李世贤以金华为中心，建立起太平军浙中根据地，坚持抗清斗争达二年之久。1901年，张恭、沈荣卿为推翻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在金华创建龙华会，成为秋瑾1907年浙江起义的主力和本营。1914年前后，金华东部和南部地区的爱婴军、匡汉军、华荣党、统一党等举事，其中一些骨干曾是龙华会的会员。这些都是金华人民，反抗封建暴虐的斗争。这些斗争虽然

给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先后都失败了。人们沉沦于痛苦的探索、迷惘之中。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唤起了金华人民的觉醒。在“五四”运动中，金华省立第七中学、第七师范学校的学生，联合各界人民组织“抗日救国会”，组织集会游行，开展罢课、罢工、罢市斗争，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开办“平民夜校”，成立“白话文研究会”，出版《金华报》、《童灯》、《曙光》等进步刊物，宣传先进思想。演出“青岛泪”、“日本人侵略中国”等自编剧，开展劝禁、抵制日货，联合工人、商店职工、城市小资产阶级共同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随着“五四”爱国运动影响的不断深入，传播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向导》、《新青年》、《每周评论》不断传入金华。马克思主义在金华的初步传播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展，为在金华建立党的组织，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省立七中（1923年7月七中七师并为七中）以学生会名义，组织联合各界人民召开“五卅”惨案后援大会，成立“金华各界‘五卅’惨案后援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开展三罢（罢课、罢工、罢市）斗争。组织宣传队到金华城乡和旧府属各县广泛开展反帝爱国宣传和募捐、支援上海工人正义斗争。在斗争中，金华第七中学师范部学生千一（现名千家驹），由共产党员、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常务委员宣中华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嗣后，千一介绍了钱兆鹏、章驹等入党。同年秋，建立了金华第一个党的支部，时有党员6人。这是金华地区最早成立的党支部。同时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国民党金华直属区党部。1926年7月，千一毕业离校后，成立中共金华独立支部，书记钱兆鹏，直属中共

上海区委（江浙区委）领导。金华独支遵照党的“三大”《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精神，全力推进金华各民主阶级统一战线的形成。值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金华独支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组织宣传队，在城乡广泛宣传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意义，由平民夜校印发《打倒军阀孙传芳宣言》，号召民众打倒孙传芳，支援北伐军。党组织还在工、农、商、学各界组织运输队，筹捐慰劳品，教唱国民革命歌。同时，积极发展国民党组织，筹建县党部。

1926年12月，北伐军第一次到达金华，钱兆鹏在五百滩上举行了欢迎大会，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国民党金华县临时县党部。金华独支通过国民党县党部，组织各种民众团体，在城乡大力推进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在金华的反动势力，没收教会财产，赶走唯一留在金华的英国传教士荻牧师，收回帝国主义在金华办学的教育权。当北伐军撤退至衢州时，党组织又立即组织三十余党团员为战地服务团，分别组成宣传队、侦探队、破坏队随北伐军行动。1927年1月底，北伐军取得了兰、龙、汤战役的决定性胜利。2月初，北伐军第二次抵达金华，正式成立了以钱兆鹏、严行等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主的中国国民党金华县党部，撤换了县知事，先后逮捕惩办了文新、东震八个乡的保安团长。摧毁了军阀在金的反动统治机构。金华工农群众运动迅猛发展，县总工会、农会、妇女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纷纷成立。有1500多名工人参加了各行业工会，组织成立了有40余人的工人纠察队。仅赤松、芙峰两个乡就有20多个村建立起农会，全县有65个村成立农会，有会员3385名。在斗争中，党组织积极发展工农积极分子入党，到3月底，全县中共党员发展到20人。在党的领导下，金华城乡广泛开展了罢工、增薪、减租减息、清算公

常庙产斗争，严惩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有力地冲击了反动官僚、土豪劣绅的封建社会基础。

正当我县工农群众运动高涨之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5日波及金华，16日国民党金华县党部被武装查封，中共金华独立支部书记钱兆鹏于6月6日被捕。在狱中钱兆鹏同志不为敌人的淫威所屈服，继续坚持斗争，对前来探监的美伦袜厂的女工说：“要勇敢些，要继续斗争下去，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8月4日，敌人慑于革命群众的义愤，在法院监狱秘密枪杀了钱兆鹏。中共金华独立支部遭到严重破坏。

(二)

1927年10月以后，浙江省委、浙西特委曾派遣姜挺、邵溥慈、陆克忠、曾志达等分别四次先后来金华，贯彻“八七”会议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在城区建立了工人支部、学生支部和党的区委，并准备在金华城区组织“浙西筹委会办事处”和金华县委，终因金华城区反动势力集中，白色恐怖严重，未能实现，已建立的党组织亦遭到破坏。可是党的组织却在金华（含汤溪）与义乌、宣平、遂昌、龙游、兰溪等县的毗邻地区恢复、建立和发展起来。

1927年5月在上海艺大入党的汪锦波由党组织派遣到兰溪后，6月由兰溪县委派其回到家乡金、兰、汤交界的泽口、湖田、下周、下汪、罗埠、莲湖、汤溪镇等地区组织农会，发展组织。翌年6月建立中共汤溪支部，是原汤溪县最早建立的党的组织。党支部组织发动农会会员，配合兰溪秋收暴动，烧毁地主房屋、田契、帐册，砍杀恶霸地主，围攻警察局，但遭国民

党省防军“围剿”镇压。年底汪锦波被捕，支部停止活动。

1928年2月，中共宣平县委派陈玉川来金华南部地区与武义、宣平毗邻的安地、蒋里一带活动，于1929年4月建立党的总支，总支书记蒋宝贤。在党总支的直接领导下，1930年初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红军北路军游击队”，蒋宝贤兼任总指挥。公开提出“天下农民是一家”，“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口号，密切配合红十三军和邻县宣平、武义、永康等农民武装暴动，向财主派粮筹款，开仓济贫，多次缴获了国民党雅畈、武义柳滩等地警察局的枪支，武装自己。1930年5月，队伍已发展到1500多人，活动地区以雅畈、安地石角山为中心，发展到汤溪的东屏、思村、福民山和金华的金店、白竹、罗店北山一带。活动范围遍及我县4个区15个乡。这支红军队伍英勇顽强的斗争，历时一年，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在金华的反动统治，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镇压而失败。在斗争中不少共产党员被捕或遭到枪杀，但在敌人面前他们表现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摧的革命气概。总指挥蒋宝贤被捕后，敌人用尽了各种酷刑，仍坚强不屈，被敌人枪杀于金华南市街大桥头牛市场。就义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党员是杀不尽的！”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和坚定的革命信念。

1928年7月，义乌畈田朱党支部派地下党员刘家泽、傅鸿权、何濂等来金华东部塔江山一带从事建党工作，先后在塔江山、浦口、低田、深塘坞、大路沈等10多个村发展党员60余名，建立党的支部10多个。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农民协会，实行减租减息，打土豪、清算祠堂庙产。1930年7月，党中央派曾志达到金东塔江山，在低田村的一个溪滩里召开了浙西地区13个县的县委领导人会议，准备以塔江山为中心，与各县联

系，积极筹划武器弹药，组织暴动大队，攻城劫狱，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由于义乌县委领导人吴溶品被捕牺牲，党内又出了叛徒，计划泄露，并遇上大风大雨，各县农军无法集中，暴动没有成功。

1932年，中共永康中心县委为了与闽浙赣苏区打通路线，派原永康县工委书记徐同江（阿宝）、中共党员义乌鱼曹头革命军负责人朱金则（金宝）来汤溪罗埠、芝肚坑、银坑等地活动。1933年秋，在罗埠镇建立中共汤溪县工委，书记曹世泽（后为胡德福）。1935年秋，由于曹世泽叛变，汤溪工委遭到破坏，停止活动。朱金宝以修洋伞为名，到遂、宣、汤交界的芝肚坑、银坑等地活动发展党员20余名。

1931年——1933年在金衢严三府交界处的汤、龙、兰、寿几县交界地区，由中共党员、红十三军成员郑秣领导组织起红十三军第二师发展到1500余名，原湖镇和汤溪两区所属的7个乡镇、50多个自然村就有534人参加了红二师。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开展减租斗争，筹划武装暴动。这支队伍由于叛徒江天吉的叛变出卖，在敌人血腥屠杀下被迫解散。自郑秣以下有17名红军领导骨干惨遭敌人杀害。但许多红二师的战士仍誓守当年参加红军时“永走这条路，永不反悔”的誓言，采取种种办法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据查，当年湖镇、汤溪地区500余名红二师战士中就有108人拒不自首。他们隐姓埋名，离乡背井，四出外逃；有的红军骨干外逃他乡，至死不回；有的红军战士还带着红二师的符号逃往福建、昌化、于潜等地，直到1949年解放才又带着红二师的符号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

1935年3月，粟裕、刘英同志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挺进浙江，创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转战于浙赣线中段以南地区。5月部队进入宣、遂、汤地区，朱金宝与红军部队取得联系，在挺

进师政委会直接领导下，在银坑、芝肚坑、龙葱、周坞、黄坛井、小洋坑、溪口等地与遂（昌）宣（平）毗邻地区，建立中共遂汤区委。部队多次迂迴战斗在我县的南山、汤溪地区和铁路两侧的大小集镇，三次攻打汤溪县城，打击敌人，保存自己。红军所到之处，打土豪、除恶霸、开仓济贫。1935年5月20日（农历四月十八日）始，挺进师首次到达我县汤溪地区的银坑、上阳、塔石、岭上、厚大、汤溪镇、兰贝、梧桐、乌云、周村、高儒、枫坞、苏村、井下、高田、及外畈的马畈坑、郑宅等地。仅在上阳就将财主项炳申、项炳文家的六万斤粮食和衣服全部分给贫苦农民。镇压了陈长豪、项炳申、范永新、徐寿升等国民党乡保长、土豪劣绅。现在枫坞等地还有当年红军书写的“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等宣传标语。当年汤溪山区沿途参加红军的就有50余人。1937年2月，红军粉碎了敌人第3次围剿后，粟裕、谢文清再次带部队来到我县银坑、芝肚坑、周坞、小洋坑，沙畈、白峰头、龙葱、田甫和宣平的紫坑、遂昌的门阵等地活动。是年夏，建立中共宣遂汤边区工委（在汤溪境内有4个支部36名党员），并建立方圆近百里的游击根据地，直接领导根据地人民的斗争和建设，直到国共和谈成功，粟裕带部队赴平阳和刘英会合，奉命率部队北上抗日，留下警卫员赖德标和朱金宝同志坚持斗争。

三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同年底杭州沦陷，金华成为战时浙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上海、杭州、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等一大批爱国青年、文化界知名人士、地下党员汇集金华进行抗日救亡活

动。1937年11月，徐洁身以东南日报印刷厂工人身份为掩护，随中共浙江省临工委机关迁移来金，在金华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恢复发展党的组织。1938年1月成立中共金华印工特别支部。同年3月，建立中共金华县工委。1938年5月7日，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成立（9月转为正式省委），派王易（汪光焕）、林一心、王明阳、刘一民等同志来金华整顿金衢地区党组织。5月，建立金衢特委。同时改组了金华县工委，特委常委林一心任工委书记。7月，“县工委”改为“县委”，由张文岑继任书记。

1939年3月17日至4月6日，周恩来同志亲临浙江视察，3次来到金华，在金华秘密会见了东南三省党的领导人，召开了中共浙江省委会议，对浙江党的工作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周恩来同志指出：浙江党组织经过1938年的大发展，今后要加强巩固工作；也要继续发展，尤其向空白的地区发展，但必须巩固重于发展，质量重于数量；对来历不明，政治面貌不清的党员，要进行审查，严防国民党特务、汉奸和托派分子混入党内；要加强党员教育，培养干部特别要培养军事干部，派到沦陷区去工作。并在金华中学向军官教导队作了题为《建军的重要性与社会军事化的实施》的报告；在金华抗日自卫委员会向读书会、民先、政工队等各界代表作了《第二期抗战中应有之努力》的讲话；多次与时任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洽谈公务；还广泛地接见了国民党军政人员、抗日团体领导人员、文化界知名人士等等。周恩来同志来浙三到金华，对金华乃至全省军民坚持持久抗战，巩固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浙江党领导全省人民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战最后胜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1938年3月县工委成立到1941年10月，金华县（工）委

先后有徐洁身、林一心、张文岑、唐智和、翟毅、江征帆、吴拯黎、汪和康八位县委书记。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开办进步书店，主编抗日刊物，举办各种抗日工作训练班，进行抗日救亡教育，联络国民党和进步民主人士，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在傅村、溪口等地组织农会，实行“二五”减租。这一时期金华县党员已发展到164人。并先后建立城区、东乡、南乡三个区委、17个支部，连同武义区委，和属义乌县委领导的金东义西区委，中共金华县委下辖有4个区委。1940年7月，金衢特委分设为中共金属特委和衢属工委。1941年10月，根据上级指示，改“委员会制”为特派员制，金华县设联络员。在汤溪地区，1938年6月，金衢特委曾派特委组织部长刘一民到汤溪县建立“汤溪特支”，由于领导人不久离去，特支于1939年1月停止活动。宣、遂、汤边区的党组织，1939年秋由于叛徒钟石银出卖，一度遭到严重破坏。1940年3月，处属特委派遂昌中心县委农民部长杨荣到宣、遂、汤边区，恢复中共遂、宣、汤、区委。1944年3月，遂昌、宣平、汤溪三县国民党政府联合对边区进行所谓“剿匪”、“清乡”，仅汤属党员就有10名被捕，邱根泰、邱米泰、郑福增、陈永峰、华水根等五位地下党员被枪杀在遂昌门阵，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这一带坚持斗争的闽浙临边委书记宣恩金（化名老婆婆）和一些党员骨干被迫转移到遂昌、缙云等地活动。

1942年5月19日，根据日军将占领浙赣线，金（华）义（乌）浦（江）等地即将沦陷的严峻形势，金属地区特派员陈雨笠，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召开了柳村会议。会议决定恢复义乌县委，肖江（江征帆）为书记，杨明经任县委委员兼武装部长。并确定以金华东部（现孝顺区傅

村，源东一带）和义乌西部地区（吴店、上溪一带）为中心组建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

1943年2月，义乌县委改为金义县委，书记梅凯。1944年2月，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扩大和开辟地域的需要，改金义县委为金义浦县委，书记杨广平。这时，重新建立了金东区委。到1945年3月，金华县境内设有金东、路南2个区委，1¹个支部，党员已发展到132名。是月，金华山工委成立，陈雨笠任书记。金义浦抗日根据地自1942年9月起，先后建立过的抗日民主政权有：金东义西联防办事处，金义浦联防办事处、金义浦抗日自卫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办事处和金义浦办事处，均由吴山民任主任。1945年6月，金义浦办事处改称为金义浦兰总办事处，主任王平夷，副主任何茂钟。在金华县境内，设立金东办事处，建立傅村、畈田、洞源、鞋塘、岩屏五个乡民主政府。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农抗总会、妇女会、工会和乡级的农抗、妇女抗日救国民众团体，领导群众拥军支前、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发展生产，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开展反伪化、反扫荡斗争。在根据地创建、发展和巩固过程中，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八大队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她的光辉业绩，一直在金义浦人民中传颂。这支抗日武装1942年7月建立，初称金东义西抗日自卫大队，开始为了灰色隐蔽，虚挂国民党钱南军别动第一支队第八大队的番号。1942年底改称金义联防第八自卫大队。1943年12月，被命名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第八大队。先后由杨德鉴、李一群、王平夷任大队长。1942年10月14日，八大队“首战萧皇塘”，当场击毙吉田少尉以下8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抵抗的神话。在对日、伪、顽错综复杂而又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八大队多次粉碎了日、伪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巩固扩大了

金义浦抗日根据地，直到日本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八大队在金义浦地区浴血奋战40个月。期间，在我县的源东、曹宅、潘村、孝顺等地就进行过五次重要的战斗。

继1942年8月间八大队成立初，追袭侵扰杨家、傅村敌伪至寿山祠的战斗之后，1943年7月18日和22日，我八大队三中、二中队，在长塘徐村前和自长塘徐殿山脚至二头塘村前，直至杨大桥三里战线，分别取得对沈店调防日军的伏击战、追击战的胜利。先后共歼敌8名，伤敌13人，俘敌1人。显示了我老区军民“不怕被抢光、烧光，誓与日本侵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

1944年11月23日，八大队取得了尖岭脚反击战的胜利，击毙了邢小显部四中队队长郑日升，缴获枪支8支，把邢部赶回兰溪柏树下老窠，既粉碎了邢部大举进犯我金义浦根据地的阴谋，又配合了金萧支队，取得了反击浙保、日、伪“联合扫荡”的胜利。12月6日八大队又和坚勇大队一起奔袭兰溪柏树下顽匪邢部老巢，毙敌30余名，俘敌大队副蒋建中以下63名。

1945年5月13日，八大队取得潘村伏击战成功，全歼由黑棋带领的到潘村抢粮的一个日军小分队，这次伏击战毙敌19人，俘敌5人，缴获机枪一挺，掷弹筒二只，步枪10余支。

1945年8月13日拂晓，八大队又密切配合新四军浙东纵队十支二大队，胜利地进行了曹宅战斗，打垮了盘踞在曹宅的邢小显部，俘获了邢部特务长方廷荣、方宝剑，文书李奋英和几十名顽兵，缴获部分枪支弹药，还捉拿了邢小显的干老子曹宅大地主曹镛庵。

1945年8月15日深夜，八大队又取得孝顺战斗的胜利。这是我八大队执行朱总司令敦促日伪向我军投降命令的一个重大胜利。这次战斗俘获了驻守孝顺据点的一个伪军中队的全部人

枪，还抓获了9名作恶多端的武装便衣汉奸。

此外，还有：

1942年8月夜袭大汉奸、汪伪浙闽皖赣四省行营指挥官傅延文和全歼土顽傅六妹反动武装集团的战斗，11月在义西歼灭刘文扬部后又击毙金东顽兵郎机根的战斗，1944年4月处决金东一霸曹景泰、5月塘西桥伏击战后，秋冬又在金东洋畈歼灭金华直隶独立三中队的战斗，以及1945年春独立区队在傅村镇公判、镇压大汉奸俞荣和等等。

四

抗战胜利后，根据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和为促成国共和谈成功，避免内战，主动撤出包括浙江在内的南方八省根据地的指示精神，我金义浦抗日根据地党、政、军干部800多人于26日傍晚集中金东禅林祠，奉命北撤。刚撤离金义浦抗日根据地，国民党21师和浙保二个团就纠集邢小显等土顽部队，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武装清剿”，屠杀革命战士。他们设立“清剿指挥部”，搜捕八大队伤病员和坚持斗争的地下党员。在军事清剿的同时，又推行“政治清剿”，即所谓“宣抚”、招降、设立“联防委员会”，复辟其乡保政权，实行“联保切结”，强迫抗日群众、八大队军、烈属进行所谓“登记”、“自首”。一时满天乌云翻滚，到处白色恐怖，留下坚持斗争的党员、干部和金东区中队被迫转入地下或趋避他乡。

可是，任何艰难险阻都压不垮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决心和意志。金萧支队北撤时，浙东区党委决定，留下马青为金萧地区特派员，金萧地委决定应飞为中共金华地区临工委书记。1945年10月马青回到金萧地区组织领导武装斗

争。是月4日应飞回到金义浦兰地区，根据上级党依靠群众、依靠山地、组织短小精悍的秘密武装、准备建立游击基地的指示，陆续联络上留下坚持金义浦兰武装斗争的吴琅寿、王一虎和金东区的傅洵浒、路南的黄璐、义西的陈英以及永康、武义、兰溪、缙云等地留下坚持斗争的同志。1946年1月5日，金东特派员傅洵浒遭国民党特务枪杀。6月，周芝山任金义浦特派员。10月，在马青同志的领导支持下，应飞组建了金华地区武工队。11月，金义浦特派员由赵之逊继任。1947年4月，中共金华地区临工委撤销，应飞为金华地区特派员。5月，马青指示建立金武特派员制，陶健为特派员。同月，应飞率吴甫新、王一虎等同志，缴获了国民党澧浦乡公所14支枪。7月初，中共路西工委成立，工委决定：大量建军，创建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抗丁、抗粮，以配合武装斗争。8月，武工队改编为浙江省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队第三大队。9月，根据中共路西工委指示，在金、义、浦边区成立中共金义县工委，赵之逊任书记。同月应飞根据马青指示，派吴甫新等组成金义浦武工队，从永康回金义浦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在11月13日义亭缴枪成功后，赵之逊宣布武工队扩建为金义浦人民游击中队，中队长吴甫新，吴琅寿为指导员。1948年2月3日，金义浦人民游击中队袭击驻鞋塘的浙保一个加强连获胜，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20余支。到3月下旬，游击中队已发展到60多人枪，配有轻机枪6挺，步枪40余支，10多支短枪和两个掷弹筒。路西领导宣布，游击中队改编为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部第八大队，大队长赵之逊，副大队长吴甫新。4月28日，根据中共浙东临委指示，吴甫新率部回路南，6月5日与在永康活动的三大队合编为六支队八大队。赵之逊回金义浦后，从八大队抽调沈长春等五六位同志组成金义县武工队，队

长沈长春，指导员陈英。5月，金义县政府在金东溪口成立，赵之逊兼任县长。8月9日赵之逊在源东乡杨公村被叛徒、反革命分子王成惨杀。1948年10月，金萧支队第八大队成立，大队长吴甫新、教导员李铁峰。在墩头战斗获胜后，八大队配合金萧支队主力进行外线出击，一路上宣传抗丁、抗粮、抗税，摧毁国民党基层政权，开仓济贫，发动群众。历时11天，路经浦江、义乌、东阳、金华四县边境，行程500多里。期间，支队主力袭击了我县境内的国民党曹宅、岩屏乡公所，逮捕其乡长，烧毁田赋、壮丁册。12月，中共金萧工委决定在金、义、浦、兰地区成立中共路北县工委，同时成立路北县政府，书记李铁峰，县长季鸿业。同月，路北县工委决定建立金义区委、区署和区武工队。1949年1月，八大队又武装袭击国民党驻雅高的自卫中队，迫使驻金东、雅高、溪口、莲塘潘据点的国民党军队撤回金华城里。2月初，经吴甫新、畷田朱地下党支部策动，敌203师某部班长刘章宝拉出一个排投奔六支八大；敌金华县自卫队施马儿等5人携枪向我八大队投诚。18日，金萧支队特工人员策动国民党203师重机枪连起义成功。4月7日驻佛堂、义乌县自卫三中队起义，至大军渡江前夕，我党已控制了金华广大农村，盘踞金华的浙西师管区和国民党203师已被我人民武装分割包围，金华县城已成了一座孤城。4月23日李铁峰调严衢地区开展工作，胡文接任路北县工委书记。5月2日，八大一中改编为路北县自卫大队，大队长季鸿业。至解放前夕，部队已发展到4个中队，300多人枪。

在金汤地区，1948年9月成立的“农工自救团”，到12月已分布金汤地区14个乡，成员有160余人。是月，路北县工委派金萧支队干训班结业徐文佩为特派员回乡和金明一起

开辟金汤新区。1949年2月，路北县工委决定改金汤区特派员为金汤区委，20日智取新昌桥守桥交警队获胜后，当晚成立了金汤区署、区中队。3月，划归路南地区领导，金汤区中队由路南地区党的特派员、六支队领导改编为六支队第十大队，由徐文佩任代理大队长。4月5日，国民党交警第一总队三大队九中队在长山村起义，改编为十大队二中队。到解放前夕，六支十大已发展到250余人，配有六零炮4门火箭炮1门，轻机枪15挺，汤姆冲锋枪29支，卡宾枪22支，美式仿二四式步枪200余支。

在路南（金义南）地区，1949年1月路南地区领导决定成立路南（金义南）区署和区武工队。2月，金、义、永、武办事处成立，主任胡一元。金义南区署、区武工队归属其领导。4月，金义南区署分为义乌佛堂区署和金华澧浦区署。

为了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早在1946年秋，胡一元、陶健借永康芝英酱油厂在金华设分厂之机，在金华芝英酱油厂内建立了党的领导小组，成为党在金华城区活动的一个基点，该厂党组织在金华城内积极领导、开展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1947年9月，由中共上海局青年组指派洪德明到英大组建党支部，1948年3、4月间，英大支部建立，吴仲沂为支部书记。同年9月间，中共闽浙赣城工部派党员卓青考入英大，和早到金华的城工部同志林山、夏明在金华中小学教师中开展建党活动。同年12月，中共路北县工委派施姬周回到英大，建立了另一个中共英大临时支部。在党的领导下，英士大学的学生运动一直很活跃。根据党中央指示，开展“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春，建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1948年12月后，发动70多名英大学生和其他知识青年参加金萧支队，还有一部分英大学生去永康参加第六支队。1949

年3月，中共闽浙边城工委金华支部建立，下设县师、丽泽中学、金中、鞋塘、澧浦5个小组，书记夏明。同时在汤溪的中枢二校建立中共闽浙边城工委龙游支部汤溪小组。他们在城乡开展了统战、策反、组织“读书会”、印发革命传单宣传党的政策，会同当地地下党和武工队开展各项活动。同月，路北县工委派朱育茂为金华县城区特派员。后中共金萧工委又陆续派楼金、朱因等同志来金华城区加强城市工作。为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于5月6日，经朱因与我各方有关同志协商成立“金华城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次日又建立“金城办事处”。为迎接金华的解放，作了大量工作。

1949年5月7日和8日，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六支队和地下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力量，密切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兵团十二军、十一军解放了金华和汤溪。5月10日，金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十一军军长曾绍山任军管会主任，政治部主任刘华清和冯起任副主任。8日，汤溪县军管会成立，主任刘瑄。15日中共金华县委成立，书记燕依民，18日金华县人民政府成立，县长赵季武。17日中共汤溪县委、汤溪县人民政府成立，书记张景祥，县长蔺景沂。民主革命时期，两县党的组织在领导金华人民的革命斗争中经历了创建、破坏、再恢复、建立、又遭受挫折，到巩固发展、直至最后取得胜利的艰难曲折的斗争历程，有119名党的优秀儿女为革命英勇牺牲。他们的光辉业绩、崇高品质永载史册，激励后人。

金华、汤溪解放后，两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胜利地进行了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恢复国民经济等政治和经济的斗争，人民政权日益巩固，1956年底又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党的“八大”路线指引下，开始全面进行社会

主义建设。1958年汤溪县并入金华县。党和人民经受了三年困难和“文化大革命”的考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金华县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全县人民继承革命先烈遗志，发扬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苦创业、图振兴，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新金华而努力奋进。

执笔 潘桂荣

1991. 9. 26.



栗裕将军领导创建 宣、遂、汤游击根据地纪实

潘桂荣

以汤溪银坑、芝肚坑，遂昌门阵，宣平紫坑为中心的方圆近百里的汤、遂、宣边区，群山连绵，地广人稀，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就有30余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栗裕将军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创建浙西南、浙南大块游击根据地的同时，亲自创建了这一游击根据地。这是当年国民党白色恐怖下，浙赣线南边的一盏红灯。正如栗裕将军在《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一文中写的：“这个后方，在刘建绪的‘围剿’时期，发挥了顽强的战斗力，成为我们在浙赣线以南和浙西南地区坚持斗争的重要基地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栗裕将军就在这根据地，主持了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并率部与坚持在浙南斗争的挺进师政委刘英同志会合，北上抗日。

突 进 北 线

1935年1月，闽浙赣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电示，以抗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立即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新的革命根据地，保卫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长征。

新组建的挺进师，由先遣队红十军团参谋长栗裕任师长，

政治部主任刘英任政委，下设三个支队，共五百多人枪。1935年2月27日，挺进师自赣东北苏区出发，经上饶县灵山乌鸦弄，日夜兼程，向东行进，且战且走，渡过了信河，敏捷地冲过敌人六道防线后，经闽北苏区，夜袭仙霞岭，路经广（广丰）浦（浦城）路仙阳镇、忠信、住溪，忍受着饥寒和极度的疲劳，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敌人的堵击。4月28日，斋郎战斗的胜利，打开了进入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的通道。5月初，挺进师进入龙（泉）、遂（昌）、松（阳）三县边界地区，部队已有四个纵队，二个独立支队。师政治委员会决定，一、二纵队开辟基本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其余各部则由师部率领北进，辗转游击于浙赣线以南地区，以造声势，掩护一、二纵队开辟工作。深受国民党反动统治之苦的浙西南人民，在挺进师的发动下，转眼间燃烧起熊熊革命烈火，极大地震惊了浙江的统治阶级，时国民党《东南日报》惊呼“松遂龙各县大半赤化。”敌人集中了浙江保安团四个团，十一个保安大队，和南京税警一个团共约八、九个团的兵力，分四路向挺进师进攻，妄图将挺进师扼杀于立足未稳之际。

为粉碎敌人的“进剿”计划，挺进师即兵分二路，外线出击。一路到龙泉、遂昌、江山、衢州一带活动，一路则由粟裕、刘英亲自率领，乘敌后空虚之际，突进北线，到汤溪、龙游、金华、宣平、遂昌之间、杭江铁路中段二侧，辗转不停地开展游击活动，把那烈火引向浙赣铁路沿线。在此期间，挺进师在汤溪、金华境内的战斗行动主要有：

1935年5月20日（农历四月十八日），由粟裕、刘英率领的北路军从松阳的下窑江、东坑，过遂昌的近港岭，到门阵至我县银坑。红军一进村即开展宣传，发动群众，斗土豪劣绅，杀了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国民党副乡长陈长豪及戴荣

森、陈锦芳等人，村民拍手称快。红军将五户地主的浮财分给贫苦农民，村里村外的土墙上张贴和书写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白军是压迫农民的军队”、“参加红军最光荣”等大幅标语。此后，留下20余人在银坑、门阵等地坚持游击活动。大部队由农民戴祥满带路到达上阳村，处决了恶霸、国民党乡长项炳申。当晚十二时，部队又进袭南坑，当场击毙了顽抗的恶霸地主邱建。部队经祝家畈村时，又惩办了曾当过国民党团长的劣绅张文贵。尔后，部队进入龙游地界，袭击龙游溪口庙下。

5月29日（农历四月廿三日），粟裕、刘英又率部300余人从交椅山到达我县塔石，从塔石出发，经东店、百善、岭上、陶寺，到达厚大。在厚大当场处决了国民党乡长范正芳，以解民恨。部队直逼汤溪县城，围城袭击三小时之久。城内敌人惊慌失措，乱成一团。尔后，我部即从南门外进入山区。到达兰贝、梧桐村后，又立即开展宣传，书写标语，将地主家的稻谷、衣服分给穷苦农民。其中一部分战士押着从厚大抓来的国民党镇长、恶霸范永新，兰贝的恶霸财主徐寿升到梧桐村，发动群众斗争后处决。次日，部队从梧桐出发，大部队经潭背、东山折向西，经乌云、周村、高儒、井上再次抵达上阳。在上阳召开了村民大会，宣传红军的政策，讲明红军的性质。会后，将地主项炳申、项炳文家的六万斤粮食及衣服全部分给穷苦农民。事后，部队又折入龙游、遂昌等地行动。另一小队伍十八位战士，从梧桐出发经马畈坑来到外畈郑宅，从郑宅小学里取得地图一张，军号一把，留下二元四角钱，即往宣平方向进发。

6月4日（农历五月初四），红军一支队100余人，从龙游廖家坑口过我县上阳岗，经莘畈到枫坞村。红军一到枫坞，

就组织开展宣传活动，在村内外墙上书写“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等大幅标语。当晚惩办了当地恶霸，将粮食、衣服等财物分给农民，并宰猪请群众吃。次日晨，部队经苏村过井下、塔石，会同从龙游东乡之大公殿过来的一支红军队伍，在银岭与敌保安团发生了遭遇战，敌伤亡三十余人而溃逃。我部到高田宿营，另一部分战士从枫坞出发，绕过苏村，经青草、乌云、岭脚、高儒到高田。一路上，打土豪，救济贫苦农民。在南坑，又处决了为非作歹的国民党保长连福。在银坑村附近，我红军与增派来高田、银坑“清剿”的敌保安团激战，敌伤亡十余人。为保存实力，我红军撤出阵地，前往遂昌。

由于粟、刘直接率领的北路军突进北线，在浙赣铁路两侧转辗不停地穿梭游击，每到一处，深入发动群众，坚决惩办罪大恶极的区乡保长和土豪劣绅，没收他们的财产，分配给穷苦群众，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经十多天的行动，把革命烈火引到了浙赣铁路沿线。国民党浙江省主席坐卧不安，打着“抚慰灾民”的旗号，带领一个士官教育团，于6月12日到达金华，为浙西南反动势力助威。挺进师得知后，即给敌人以突然袭击，在宣平吴宅和小溪口缴获其二个连的全部精良武器，迫使其匆匆溜回杭州。敌人的第一次“清剿”遂宣告失败。

在我武装斗争的保卫下，浙西南根据地的组织建设工作得到迅速发展。在短短的一个月中，浙西南十几个县的群众发动起来了，松阳、遂昌、龙泉、浦城、丽水等基本地区内普遍建立了革命群众组织；一些地区还建立了党团组织、红色游击队和临时苏维埃政府。在我遂汤边区还建立了遂汤区委。在斗争中，挺进师不断地壮大和发展。

由于挺进师艰苦卓绝的斗争，浙西南革命斗争开创了一个新局面。这引起了整个东南各省以至反动头子蒋介石的恐慌。蒋介石命令成立浙南剿匪指挥部，将闽浙赣皖四省“剿匪总部”移驻江山，并大量征集补充兵员，调遣了主力部队十八军罗卓英部等九个师以上的兵力，于1935年秋冬向我浙西南游击基地大举围剿进攻。

1935年9月，师政治委员会决定主力南移到闽浙边行动。部队抵达闽东根据地寿宁县境内，与闽东特委负责人叶飞会合。10月5日，经政委会和闽东特委联席会议决定，由刘英、粟裕、叶飞等十三人组成闽浙边临时省委。并相应成立了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由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委。1936年2月，泰顺丰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会议决定：为粉碎敌人“围剿”，确保我浙南基本地区根据地的建设，由粟裕、谢文清、张有焜率浙西南独立师200多人到浙西南做恢复工作，再次突进北线。部队在粟裕同志直接指挥下，每天打二、三次遭遇战，行走120余里，直向北行动。过了铁路线，一直打到天台山附近，把敌人牵引出来，达到调离敌人之目的。3月中旬，部队又杀回马枪，迅速杀回铁路沿线，在杭州、金华、汤溪、龙游铁路两侧打击敌人。在此期间，部队又一次夜袭汤溪县城后，经塔石、银坑、门阵、处坞岭到龙泉隐蔽宿营。尔后，部队又向东行动，经永康、缙云等地，5月间回浙南基地。

从1935年9月至1936年6月，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虽然一度暂时丧失，但在浙南又开辟了大块游击根据地。游击战在浙西南、浙闽边、浙南、浙东更广大的地区开展起来。罗卓英的“围剿”没有得逞，挺进师却获得更大胜利。

1936年冬，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反共、停止

内战的条件。可是，蒋介石为了消灭我南方八省游击队，加紧对我南方红色游击根据地的“围剿”。在浙江委派了国民党CC派骨干分子朱家骅接替黄绍竑任省主席，又委任第四路“剿匪”总指挥刘建绪为闽、浙、皖、赣四省边区主任，并限令刘数月内扑灭浙江红军。刘建绪拼凑了十余万兵力，采取“拉网式”战术，由北而南，由西而东，围攻浙南和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强迫群众组织“联甲”，移民并村，烧毁零星房屋、茅棚，油盐柴米按人头计量配给，妄图“竭泽而渔”，围困消灭红军。面对敌人对挺进师发起的第二次大“围剿”，临时省委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片做群众工作，发展党的组织，保存有生力量，建立根据地。组织大批赤色工作团，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你梳过来，我钻过去”的战术，陆续挺进到敌后方和侧翼，保存了有生力量。

根据地的建立

在浙西南和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粟裕同志深深考虑到：为了在浙江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腹地区，长期坚持斗争，既必须建立比较巩固的大块游击根据地，又必须为部队提供更多的“落脚点”和“跳板”，即在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的周围建立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若干个游击基点。宣遂汤游击根据地，就是根据粟裕这一指导思想而建立的。

宣（平）、遂（昌）、汤（溪）边区，以银坑、紫坑、门阵为中心，坐南向北，背靠大岭，面对金（华）汤（溪）平原，群峰守望，竹木葱茏，地处三县交界处，控制着宣平至金华、丽水经遂昌到龙游、金华至衢州的铁路和公路三条交通线，位置十分显要。早在1930年浙南红十三军举旗革命，对这一带就有很大影响。1932年冬，中共永康中心县委根据中共中

央上海局“为打通与闽、浙、赣苏区联系的通道”的指示，就派中共党员朱金宝(又名朱金则，老金)以修雨伞、补雨鞋为名，到汤溪的银坑、芝肚坑，遂昌的门阵、处坞岭，宣平的紫坑一带进行革命活动。秘密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培养积极分子入党。经一年多的活动，在银坑、芝肚坑等地发展了十多名党员，门阵发展了九名党员。根据中心县委指示，暂时没有建立党的组织。由于这一带群众基础好，又处三县交界处，地势显要，峡谷陡峭，给养困难，国民党的大部队施展不开，几次进山搜剿，都遭到游击队伏击，伤亡不少，再也不敢贸然进山。1935年5月，粟裕带领挺进师在这一带活动时，朱金宝就找粟裕、刘英汇报了情况，接上了党组织关系，并在粟裕的直接关怀下建立了中共遂汤区委。1935年冬，国民党对挺进师进行第一次“围剿”时，由于宣遂汤边区没有公开建政，工作比较隐蔽，被划到包围圈外，因此没有受到严重摧残。为此，粟裕和挺进师供给部长、没收委员会主任谢文清等同志早就研究要建立以汤溪银坑、芝肚坑，遂昌门阵，宣平紫坑为中心的方圆近百里的宣遂汤游击根据地。

1935年6月3日(农历五月三日)，挺进师第三次打下遂昌王村口后，司令部设在王村口，就着手准备建立以王村口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谢文清受命带六个同志到铁路沿线摸情况，从遂昌王村口出发来到汤溪、遂昌、金华、宣平、武义五县交界地区汤溪溪口和遂昌门阵一带，与先前已在这一带进行党的组织宣传活动的朱金宝同志联系上。通过近一个月时间的活动，结识了处坞岭的邱根太、周坞的戴祖禄、门阵的廖金水，经多次接触谈话后，分别介绍他们入党，并确定处坞岭邱根太家为联络站。谢文清等同志调查了解了这一带的民情、敌情、地理环境后，即返回王村口。

1936年3月，粟裕和谢文清为了调动敌人，确保浙南游击

根据地的开辟和恢复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率领浙西南独立师，从浙南向北突进，一天行军120里，采取迂回战术，在浙赣线南侧活动。部队打到青田高市陈诚的老家，打到武义汤恩伯的家乡，逼近蒋介石老家奉化溪口，又狠杀回马枪袭击汤溪县城，再次来到宣、遂、汤边区。在汤溪、周坞，布置戴祖禄以教书为掩护，为党做好宣传工作，争取群众，组织群众。1937年初，粟裕、谢文清分别带领武装工作团回到浙西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一、二月间，粟裕、谢文清先后带武装工作团60余人来到宣遂汤边区，在汤溪的芝肚坑、周坞，遂昌的门阵、处坞岭，宣平的紫坑、和尚殿等地建立秘密联络站。在这一带的山、坑、坞、岭处搭棚扎营。白天在山上练兵或帮助群众种苞萝，晚上下山做群众工作，发展党的组织。这一年的元宵，粟裕还在芝肚坑支持并观看了群众迎龙灯，给每户贫苦农民发银元一块，共度元宵佳节。该年夏，在粟裕的亲自主持下，在宣平的紫坑建立了中共宣遂汤工委，由粟裕警卫员赖德标任工委书记，朱金宝和罗中义任委员，下设11个支部，有党员120余人。在汤溪的芝肚坑、银坑、周坞、白峰头建有4个支部，共36位党员。

中共宣遂汤工委建立后，粟裕等领导人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势，采取了公开的武装斗争同隐蔽的群众工作紧密结合的策略，在边区建立了“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即争取原来的保、甲长为我们办事；或把秘密党员派进去担任国民党保、甲长，并以抗日为前提，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对象，改打土豪、分田地征收“抗日捐”，建立了由我党直接领导的两面政权形式的宣遂汤游击根据地。

游击根据地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和红军同甘苦、共患难，同呼吸、共命运。为了减轻根据地群众的负担，部队采用动员

土豪自愿为红军捐助经费，即募交抗日捐，以部队出具凭证又帮其保密的办法筹款。对不老实的，则严加惩处。如汤溪周村有个地主乡长，拒不缴纳抗日捐，部队给予严厉警告，并进行罚款。开始他不以为然，还扬言部队“没有这个本事”，后来把他抓了起来，很快把捐款和罚款如数送来了。红军在根据地虽然处在战争年代，仍然十分注意发展山区经济，重视群众经济利益。根据地允许山区土特产外运经销，欢迎平原客商进山做买卖，使商品得到流通，满足了基本群众的需要，也保证了部队的一部分军需用品的供应。为了保护群众生产，部队经常转到外线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敌人。敌人不敢贸然进入根据地，即使进来也找不到红军，还要遭到红军的伏击。这期间，敌人曾经三次企图在大粟园、芝肚坑、门阵袭击红军，但因为群众作耳目，都扑了空。在那艰苦斗争的岁月里，根据地群众无论是老大爷，还是小姑娘，都不分日夜地为红军送粮送信，护理伤员，掩护子弟兵。

北 上 抗 日

“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可是在宣遂汤边区活动的红军，由于消息闭塞，还不知道实情，就决定派一支小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去溪口镇调查，与龙游县长通了电话，从中得到了证实，并在镇上搜集了一批报纸带回根据地。据此，粟裕在边区召开了干部会议，对全体同志进行形势和任务教育，同时要求全体指战员提高警惕，严防意外情况的发生。9月中旬，将由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浙军区司令员粟裕、政委刘英等署名的《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派员送至国民党遂昌县政府和县党部。国民党遂昌县当局于9月18日给粟裕等复函：“敬请即刻选派全权代表携带原信为证，到金岸与本府所派代表接洽一

切”云云。在此期间，国民党汤溪县县长王重辉与遂昌县县长林树艺，开始曾玩弄“剿抚兼施”的手法，电请四省边署派部队协剿，阴谋借此机会消灭边区红军。粟裕同志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及时识破了对方阴谋。

10月14日，国民党遂昌县当局又怀着“招抚”红军的企图，派县兵役科长朱镇山为“全权代表”到根据地谈判。朱镇山与粟裕、谢文清、刘清扬等同志会晤时，提出了要红军去遂昌集合。粟裕等同志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指出：为了共同抗日，挽救国家危亡，为中华民族争生存，我们不咎既往，愿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可是前提应是以民族利益为重，共同抗日。合作不是谁投降谁，改编更不是收编，国共双方应是平等的。义正辞严，决不让步，对方不得不放弃了“招抚”的幻想。

当日下午，我方以谢文清、刘清扬为代表，与国民党遂昌县当局代表朱镇山等在门阵张平家堂屋进行谈判。我方代表提出：①我军保持独立；②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③我军为迅速开赴抗日前线，随即去平阳集中整训，沿途国民党方面不得为难；④我军停止打土豪，国民党政府要为我军补充弹药、给养。对方表示愿意立即回县汇报，尽快答复。我部所持的严正立场，正坚持了我党我军的原则性和独立性。

朱镇山于10月16日给县长林树艺的报告中写道：“未能达到招抚之使命。”报告了我党我军对合作抗日之诚意，以及我方提出的条件。国民党遂昌县当局表示同意。至此，宣告双方谈判已达成协议。此时，宣遂汤边区也获悉，在温州的刘英领导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已同国民党浙江省当局达成了协议。粟裕即令部队集中练兵，开展形势教育。宣遂汤工委同时向群众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并发动群众为部队筹办给养，缝制新衣。在

汤溪银坑村集中参加练兵的红军，就有50余人。银坑村的郭勇进、陈德荣、龚日苟，田甫的马儿头等七位同志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了红军。部队离开根据地前，在门阵的白沙庙举行了军民联欢会。粟裕同志亲自请了木偶戏班演了三天戏。

10月18日，粟裕将军率部告别根据地的父老乡亲。从遂昌门阵出发，经石练、湖山、王村口、大潘坑、青田到达飞云江南岸，和刘英同志派来的联络员相遇，随即奔赴平阳北港，同刘英胜利会合。此时，浙南各地集中于平阳北港山门街的各路部队，共有500多人，和1935年初挺进师进浙江的人数相当。部队随即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下设三个支队，一个教导队。为了加强抗战力量，临时省委在山门街畴溪小学开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训练干部，补充新兵。1938年4月18日，粟裕将军率领挺进师主力到达歙县岩寺，加入了新四军的战斗行列，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实现了1934年7月党中央赋予的先遣抗日的光荣使命。

挺进师在浙江坚持斗争的三年中，金华、汤溪南部山区成为挺进师游击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足迹遍及我县的四个区（汤溪、^{坑坑}山坑、塔石、雅畈），二十七个乡镇，在我县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粟裕将军亲自创建的宣遂汤游击根据地，在我党我军土地革命时期的游击战争史中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本文资料来源：

1、刘英：1940年夏写的《北上抗日与坚持闽浙边三年斗争》

(金档10~1~42)

2、粟裕：①1959年5月谈的《回忆闽东浙南的革命斗争》

(金档10~1~44)

②《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3、谢文清：《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的战斗活动》

4、张金祥、朱金宝、戴祖禄、廖金水、郭勇进、戴来登，戴祥满，胡玉明、项廷鉴、徐庆贤、徐庭桂、徐云清、徐庭杨、陈维伟、包瑞禄、李光有、余天顺、傅东寿、华宗富、盛彩华、张樟清等人，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回忆资料。

(金档10~1~46)

5、红军闽浙军区司令员粟裕等致国民党遂昌县县长函。

(遂昌县民国档案 遂县1—6—663)

6、国民党遂昌县政府、县党部致红军闽浙军区各级将校函，

(遂昌县民国档案 遂县1—6—663)

7、汤溪县政府张任第一时期工作总结报告(1935.5.17—8.30)

(金华县民国档案 汤02—178)

金萧(路西)党组织在金华的活动

施姬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国终于赢得了八年抗战的胜利。正当举国人民欢腾雀跃之际，“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已磨刀霍霍，声势汹汹地从峨眉山下来抢夺胜利果实，内战危险迫在眉睫。为了人民的休养生息，为了促进国共两党的和谈，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建国的前途，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包括浙江在内的8块抗日根据地，党在金（华）义（乌）浦（江）兰（溪）地区创建的抗日劲旅——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第八大队奉命跟着北撤。行前中共金萧地委委员、金华山工委书记陈雨笠安排义西的陈英、黄璐、朱恒卿，金东的傅洵浒、王一虎，浦江的黄祖明，兰溪的朱炳桂，永康的李立倚、李秀芝等同志，和以吴琅寿为首的金东区中队坚持原地斗争。在上虞集中时，金萧地委决定留下地委委员马青为金萧地区特派员，领导诸（暨）北、路西（浙赣线萧山、诸暨、浦江等地以西）、诸义东（阳）、金义浦、嵊西等地70多名党员干部坚持斗争。要求树立党的旗帜，依靠群众，立足山区，组织短小精悍的秘密武装，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准备接受新的任务。可此时国民党陆军二十一师、浙保2个团纠集土顽金华的邢小显、义乌南乡联防大队和北乡第五大队以及浦江“小邦基”部队，疯狂向我金义浦兰根据地“清剿”、“宣抚”，搜捕杀害抗日有功的共产党人和积极分子，强迫抗

日群众“自首登记”“联保切结”，一时白色恐怖笼罩金义浦兰。吴琅寿率领的金东区中队被迫解散隐蔽。

1946年初，因坏人告密，金东特派员傅洵泮被国民党特务枪杀于傅村田头，金东党组织活动中断。6月，马青派周芝山为金义浦特派员。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国共停战协定和政协《和平建国协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内战正式爆发。8月，马青根据延安新华社广播要求各地开展武装斗争，粉碎国民党进攻的号召，决定发动群众，在金萧地区重新开展武装斗争；派人帮助中共金华地区临工委书记应飞建立金华地区武工队，赵之逊任金义浦特派员。赵来后积极为重建武装作准备。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工作，金东义西等地开始恢复党的活动，群众重树斗争的信心。

1947年7月，浙赣线以西，富春江以东地区成立了中共路西工委，书记蒋明达，委员蒋忠、赵之逊。同时成立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部，司令彭林（挂名），副司令蒋忠、张任伟，政委马青，副政委蒋明达，辖1个大队。第一次工委会议决定，改变分散隐蔽斗争时期的斗争方针，要求大量建军，创建游击基地，组织游击小组，发动群众抗丁抗粮，以配合武装斗争；争取乡保长，分化瓦解敌人，摧毁反动的基层政权；大量发展党员，尽快组织路西、路东和金义县工委、县政府。9月，根据中共浙东工委副书记马青的指示，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队第三大队长应飞调该队中队长吴甫新、指导员吴琅寿等6人到赵之逊处，成立金义浦武工队，队长吴甫新，指导员吴琅寿。并按马青指示，宣布成立金义县工委，书记赵之逊，以加强党对武装斗争的统一领导。11月13日，马青亲自决策，赵之逊吴甫新率金义浦武工队在白天奇袭义亭火车站，取得解除国民党驻军一六〇师1个排的武装，缴获机枪2挺、掷弹筒2

只、步枪20余支的重大胜利，群众纷纷反映：“八大队回来了！”青壮年踊跃参军，部队很快发展到40余人，扩编为金义浦人民游击中队。在袭击金东山下施之敌（另文已写述）后，赵之逊、吴甫新又率队袭击国民党浦江县警察局黄宅分驻所，缴获步枪7支。

1948年2月3日，为粉碎驻金东敌浙保1个营和金华义乌敌自卫队对我的“围剿”，经赵之逊、吴甫新认真研究，决定先发制人，在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深夜，出敌不意地袭击驻鞋塘敌1个加强连，经奋勇拼搏，再次取得歼敌1个排，缴获机枪4挺，步枪20余支的光辉胜利。惟中队长吴甫新等4人负伤。在金东丁村、义西吴店等村群众掩护下，伤员们躲过敌人的严密搜查，伤愈后安然归队。战后第三天，国民党第四专署专员钟诗杰、金华县长杨振急忙召开绥靖会议，总结“鞋塘挨打”的教训，要求各地扩大充实自卫队，加强“清剿”，并在重要集镇和交通要道建筑碉堡，布设乡村电话线等等。同时，国民党中央委员樊崧甫自杭赴会亲自督促“清剿”。自2月下旬开始，我部被迫连续作战，以致弹药消耗殆尽，战士疲劳不堪。经赵之逊征求班以上干部意见，决定部队暂时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使敌人找不到目标，又利于休整部队，设法补充弹药。3月中旬，接蒋明达来信通知，才集合部队开赴路西。4月上旬，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部决定将金义浦人民游击中队改编为抗暴第八大队，大队长赵之逊，大队附吴甫新。随即参加攻克敌诸暨高城头据点的战斗。5月初，根据中共浙东临委（由原浙东工委改组而成）指示，抗暴第八大队40余人携6挺机枪由吴甫新带领调赴路南，与应飞领导的三大队合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六支队，支队长应飞，政委卜明。辖主力第八大队，大队长应飞兼，大队附吴甫新（后任大队长）。赵子逊返

金义时带回 9 名武装，决心重建部队。5 月 30 日，在金东溪口宣布成立金义县政府，县长赵之逊；同时成立金义县武工队，队长沈长春，指导员陈英。不久，县武工队袭击敌义乌江湾乡公所自卫队，缴获步枪 10 支，队伍很快发展到 30 余人。8 月初，赵之逊派沈长春、陈英等人去路南联系工作，自己率队在金浦山区活动；9 日夜，在金东杨公村，赵之逊等 3 人被叛徒原长枪班班长王成等 4 人蓄意杀害，并携枪逃跑，队伍解体，致使金义地区的斗争遭到严重挫折。同月底，吴甫新率六支八大一中前来义西追捕携带机枪逃跑的陈小姆，吴关福等 6 人，在地下党帮助下顺利完成了任务。经请示六支队领导同意，吴暂率部留金义地区坚持斗争，以弥补赵之逊牺牲所造成的损失。

9 月，浙东临委派张凡等 10 多人来路西加强党的领导。张凡任路西工委书记，蒋明达为副书记（同年 12 月，改称金萧工委）。同月 15 日，在浦江石门，张凡宣布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部改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支队长蒋明达，政委张凡，并号召粉碎“围剿”，主动出击，扩大活动区域，为开创金萧新局面而斗争。10 月，吴甫新率部前往路西，向金萧支队领导请求汇报工作；月底，为恢复加强金义地区的斗争，支队领导将吴甫新率领的六支八大一中与李铁峰领导的江东县三大队（活动在桐庐、建德、浦江、兰溪边区）暂时合编为金萧支队第八大队，大队长吴甫新，教导员李铁峰。不久，在吴甫新亲自侦察和指挥下，一举攻克敌浦江墩头据点，歼灭 1 个自卫队，打出了军威，打通了浦南通化至金义地区的走廊。为打乱敌人部署，争取主动，李、吴决定外线出击。自 11 月 11 日开始，经浦东进入义北，穿过铁路奔袭义东廿三里，至东阳县境转折义南、金南，再越浙赣线和金华江，抵达金东义西，于 21 日回归浦南。前后 11 天，行程 500 里，经浦、义、东、金 4 县

边境，一路广泛宣传抗丁、抗粮、抗税，摧毁敌基层政权乡公所和警察所，焚毁田赋壮丁清册，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开仓济贫，发动群众参军。既扰乱打击了敌人，又锻炼提高了部队。与此同时，张凡率金萧支队主力第三次外线出击，自诸暨进入浦东平原，再经盘前袭击国民党金北曹宅岩屏乡公所，俘乡长等五六人，然后经义西山区返浦西，也是一路宣传和发动群众，大刷标语，号召“抗丁、抗粮、抗税”。这两次不谋而合的“外线出击”行动，对金义浦地区人民群众的斗志，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随后，八大队又攻克敌浦江杭口坪据点，并配合拔除敌桐庐灰岗据点。12月中旬，按浙东临委指示，吴甫新奉命率原六支八大一中回路南建制。八大队由徐有恒任大队附，并编入兰浦区中队，仍保持2个中队建制。同时，金萧工委决定在金义浦兰边区建立中共路北县工委和县政府，书记李铁峰，县长季鸿业，辖兰浦、义南和金义区委（陈英、施姬周为正副书记），和兰浦、浦东、义北及金义区署（区长傅宜）。各区都建立武工队或区中队，金义区武工队长沈长春（后吴日升）。

1949年1月5日，为打开金东局面，李铁峰率八大队进攻敌驻雅高金华自卫二中队，虽未攻下但杀伤其20余人，并在太阳岭脚与追敌激战大半天，将其击溃。随后又连续冲破敌金义浦兰4县自卫队的“围剿”，在义北金山脚打了个漂亮的反击战，并参加粉碎敌二〇三师对我根据地的“围剿”。同年1月，路北县工委派在金萧支队干训班结业徐文佩、金明，回原籍开辟已有一定群众基础的金汤（溪）地区。2月上旬，建立金汤区委和武工队，区委书记兼队长徐文佩。20日，徐、金率领“农工自救团”18人，大白天智取国民党交警队驻守的铁路新昌桥桥头堡获胜。当晚，宣布成立路北县政府金汤区署和区中

队，区长金明，中队长徐文佩。接着，徐率队打开国民党在石门、琅琊徐的粮仓，分粮给贫苦农民；袭击一些乡公所，焚毁各种反动文件；处决恶霸地主，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并摆脱国民党金、汤两县自卫队和交警连400余人的跟踪“围剿”。3月上旬，金汤区划归中共路南特派员领导，不久金汤区中队扩编为六支队十大队。同时，结合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积极开展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2月初，金义区委、区署策动国民党金华县自卫二中队施马儿等5人，携带机枪2挺、长短枪4支起义。2月中旬，八大队、金义区委、区署、武工队和民兵，配合金萧支队敌工股，策动国民党二〇三师六〇九团二营重机枪连连附黄和庆等7人，加上打入内应的钱方同志等4人，携带马克沁重机枪4挺、子弹4箱和美式步枪2支，自雅芳埠起义。稍后，路北县府、义南区委又策动国民党义乌县三中队起义。4月，根据上级指示和工作需要，金义区署单独成立金东武工队，由施姬周率领负责金东工作，曾发展至向金北曹宅、二仙桥一带派粮派款。大军渡江前夕，李铁峰奉命带八大队二中队开辟严衢，提胡文为路北县工委书记，八大队改编为路北县自卫大队，至金华解放时已发展至包括4个中队300多人枪。5月初，任命施姬周为金东特派员时，金东武工队已发展为拥有70多人枪的区中队。金东原有党组织经整顿恢复，傅村已重建党支部，杨家、凤塘、畈田蒋、深塘坞、石狮塘、长塘徐、山下施、丁村、丁阳岭、东前施等处有党小组或党员，解放初向第八地委组织部移交组织关系的党员达80余人。

随着革命形势的飞跃发展，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已成为加强部队和根据地建设的当务之急。1948年12月下旬，根据金萧工委指示，李铁峰派施姬周到金华英士大学“建立党组织，动员学生参军。”当年底，施在英大发展了5个党员（后发展至

20余人),宣布成立中共英大临时支部(属路北工委,与1948年4月中共杭州市工委已首先在英大建立的支部不同组织系统),书记吴复元,吴参军后由彭康泰负责。施先后到英大秘密工作4次。1949年3月上旬,为加强城市工作的统一领导,施之英大工作奉命移交中共路北金华城区特派员朱育茂负责;同月下旬,金萧工委敌工部(后改城工部)派路北情报组副组长楼金前来金华工作;并与英大“青年军联谊会”负责人韩潮取得联系。4月,浙东临委“陈蔡会议”对城市工作重新作了部署,鉴于金华处于浙中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控浙赣线之要冲,扼金温公路之咽喉,为东南残敌南逃两广、东遁瓯海的必经之地,决定金华城市工作由临委直接领导,委托浙东行政公署第三专署专员蒋明达负责。会后,蒋即派原诸暨县城解放委员会负责人朱因和叶新同志前来加强金华城市工作。同时,金萧工委城工部又派周文来金配合楼金工作。以上金萧工委所属各方面力量,与中共闽浙赣城工部在金负责人卓青、夏明(女)(该组织于1949年2月与金萧工委建立工作关系)建立联系,相互配合,协调行动,在金华解放前的半年左右时间里,开展了一系列迎接解放的活动:

1、积极动员知识青年参军。自1949年1月开始至5月初,由英大党支部为主,动员金华、兰溪、义乌、东阳和杭州、上海、南京等地大中学生参加金萧支队达200余人(内英大学生70多人);并在校参加并领导了“应变护校”、“营救被捕学生”、“反对反动校长邓传楷到职”、“迎接解放”等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2、建立联络网点。英大支部先后在金华城内旌孝街赵金海、牌塘东陵小学邵俊德、仁义里陈云松和兰溪城内、义乌城内、佛堂以及东阳城内、巍山、廿里牌等处,建立直通金

义、东磐游击区的联络站和地下交通线，负责传递文件信息、动员参军、接待过往人员、代购游击区紧缺物资、调查当地情况和沟通兄弟部队之间的相互联系等工作。

3、广泛进行统战工作。努力争取团结各界人士，如与曾任我金义浦兰抗日根据地办事处副主任、当时任国民党金华县参议会副议长的何茂钟和曾任我义西区民主乡长、当时在金经营工商业的吴世荣，以及大革命时期老党员（后脱党）、当时任八婺女中总务主任的严行和抗战初期老党员（后脱党）、当时在家闲居的钱荪蔚等民主人士；与英大查猛济、许德瑗、卓如、叶作舟、漆竹生等进步教授；与金华简师校长宋文翰、牙科医师章介平以及另一金华县参议会副议长廖警新等开明人士，均先后建立联系，向他们介绍形势和党的政策，鼓励他们支持和参加革命活动，帮助调查掌握金华反动党团军警宪特及社团人员和各阶层思想动态等情况。

4、重视开展宣传工作。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个别宣传教育，介绍进步书刊，传递邮寄革命传单、有关文件和金萧工委机关报《金萧报》（三日刊），散发张贴金萧支队《告蒋军官兵书》、《告金华人民书》、浙东行政公署颁布的《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立功自赎条例》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约法八章》等。英大地下党还曾秘密收听、抄录传阅新华社广播，宣传革命胜利形势和党的城市政策，号召各界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

5、开展策反工作。英大地下党支部曾掩护金萧支队敌工股长陈理农在校隐蔽居住，帮助策动蒋军二〇三师六〇九团重机枪连的起义工作；派人帮助策动国民党东阳南湖区区长杜锦堂率部起义；会同韩潮争取国民党浙西师管区少校街政工干事陈公佩弃暗投明，并由他设法搞到50余支步枪以及策动国民党金华县警察局督察长潘怀锦率部分警察起义。朱因、叶新来后，通

过关系直接找国民党浙西师管区少将参谋长赵纪三、中将司令周振强谈判和平解放金华事宜,虽赵、周为败退过金的李延年兵团所裹挟而未成功,但停留在岭下朱为我军包围而投降。周文也对国民党金华县政府主任秘书宗福芝做了争取工作,使之帮助保存敌档等等,对分化瓦解敌人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百万雄师过大江”,大军直捣江浙,蒋军兵败溃退,在金华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之际,为了加强地下党工作的统一领导,迎接解放,5月6日上午,我几方面人员在营房巷1号中共闽浙赣地下党员肖杨家集会,成立了金华城市工作委员会,推朱因、朱育茂为正副主任。5月7日晨,人民解放军二野十二军三十五师一〇四团解放金华,随后十一军三十三师跟进。上午城工委全体同志进驻原金华县政府,宣布成立浙东行署第三专署金华城工办事处,朱因为特派员,城工委改由朱育茂为主任。10日,金华市军管会成立,主任曾绍山,副主任刘华清、冯起。金华城工委和城工办事处宣告撤销,其人员大部参加军管会工作。12日,市军管会召开地方工作会议,刘华清副主任宣布将金华全县分为一、二、三、四、五5个区署和各区区长的任命,除一区外,其他各区区长都是由坚持干部担任。18日,南下干部鲁中南大队由冯起、杨源时率领并由马青陪同抵全。随后,召开了南北干部会师会议,宣布成立中共浙江省第八地委和专署暨金华等县委和县政府,正式宣告金华游击战争和地下党活动的胜利结束。

回顾解放战争时期金华四年的革命斗争史,从隐蔽坚持到重新拿起武器,由农村公开斗争发展为与城市地下斗争相结合,直至迎了解放,这是艰难曲折、玉汝于成的历程。靠的是党的正确领导,也是党依靠和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历程。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谨以本文作为对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的纪念。

1991年6月29日

解放战争时期路南地区

党组织在金华的活动

胡关炳

路南地区是解放战争时期浙东 6 块游击根据地之一。它位于浙江中部、浙赣铁路以南（以永康为中心），包括永康、武义两县及金华、汤溪、宣平、义乌、东阳、磐安、缙云等县的部分地区。

路南，在解放战争前期是整个金萧地区的一个组成部分。1948年2月，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决定将全金萧地区以浙赣线为界一分为三：路东、路西和路南后，才有“路南地区”的名称。

金华，是路南地区党组织的重要活动区域。为了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谋求人民的解放，路南地区党组织在金华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

1945年9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以及地方党政干部奉命北撤，开赴苏北。途经上虞章家埠时，中共金萧地委派原中共金义浦县委委员、金萧支队八大队组织股长应飞返回金义浦地区，组建中共金华地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金萧地区党的特派员马青领导下，坚持原地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在金义浦抗日根据地坚持斗争的新四军金东游击纵队金萧线人民抗日自卫支队（简称金萧支队）第八大队北撤后，金义浦抗日根据地形势迅速逆转。国民党金、义、浦、兰县政府派遣地方武装配合其正规军二十一师和浙江保安部队2个团，对金义浦抗日根据地实施疯狂的“清剿”，留在原地坚持斗争的党员干部均转入地下或暂出避风。留下的唯一武装力量——金东区中队亦无法立足，为保存革命力量，被迫将武装人员解散隐蔽，武器由其负责人吴琅寿和义（路）南区委负责人王一虎一起藏匿在吴琅寿母亲的墓穴里（后被敌搜走）。吴、王两人随中共永武工委交通员李文华转移到永康，应飞在返回义西后不久也转移到永康，与吴、王会合。

1946年3月，中共金华地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决定集结力量，重建革命武装。10月，马青派杨亦明等4人到永康帮助工作，随即在永康建立金华地区武工队。杨亦明任队长，吴甫新任副队长（翌年杨调回诸暨，吴为队长），吴琅寿任指导员。1947年3月，武工队回到金义地区，地方党组织动员方道炉、马振荣、郑根基、方坚等参加地区武工队，扩大了队伍。5月，武工队在澧浦敌乡公所缴获步枪13支及一些子弹，在金华农村重新开始了武装斗争。7月，金华地区武工队与处属武装合编为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队，金华地区武工队改编为第三总队第二支队第三大队（下只设1个中队），应飞兼任大队长，吴甫新、吴琅寿分别任中队长、指导员。9月，遵照马青指示，应飞从三大队抽调了吴甫新、吴琅寿等6人组建隶属路西工委委员、中共金义浦特派员赵之逊领导的金义浦武工队，吴甫新、吴琅寿分别任队长、指导员，开辟金义浦地区工作。11月13日奇袭义亭车站敌军获胜，当晚就将武工队扩编为金义浦人民游击中队。在1948年2月3日奇袭金华鞋塘战斗胜利后，于

4月又将金义浦人民游击中队改编为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部第八大队。5月底，根据中共浙东临委指示，抗暴八大队40余人由吴甫新带领调路南。6月，路南地区主力部队——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六支队成立，并相继成立了第八、第七、第九大队和金汤武宣武工队。

1949年1月，第八大队由大队长吴甫新率领10多人到金义南地区活动，宣布成立金义南区署和区武工队，黄睿任区长，王一虎任指导员，曹祥任武工队长。3月，金义南区武工队在曹祥带领下，趁金华澧浦镇集市，当众镇压了恶霸地主王广灶，并张贴布告，宣布其十大罪恶，群众拍手叫好。4月，金义南区署划分为佛堂、澧浦两个区署，澧浦区署区长兼指导员王一虎，隶属浙东第五区行政专员公署下属的金武永义办事处（主任胡一元）领导。

1949年春，在金汤地区成立了隶属金萧路北县工委领导的金汤区委、区署和区中队，徐文佩、滕伯兰（金明）分别任区委书记、区长，徐文佩兼任中队长。1949年3月1日，中共金萧工委副书记、金萧支队支队长蒋明达指示路北县负责人李铁峰、季鸿业：“最近金南、汤溪发展的武装，为求统一指挥与集中运用起见，你们应移交路南”。李铁峰遵照指示，负责与陶健联系，并给金汤区署、区中队写了转给路南六支队的备用介绍信。16日，徐文佩、滕伯兰一行共18人，从福民山区向武义出发，在温村与六支队金汤武宣武工队会合，17日晚抵武义少妃乡。金汤区中队在少妃乡大菜村教育整顿后，中共路南地区特派员，六支队政委卜明宣布，金汤区署划归路南管辖，徐文佩任区特派员兼区长，金汤区中队改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六支队第十大队（只有1个中队），副大队长兼中队长徐文佩，另派程兴炎任政治指导员。20日即返回金汤地区。十大队返回后，于

3月下旬就捣毁了金华琅琊徐村的国民党招兵站。斯时，金华安地附近有一支祸害人民的队伍，为首者徐克济，金华长山村人，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在国民党军队任营长。1948年所在部队被我解放军击溃后，他只身逃回老家。回乡后纠集当地的地痞流氓三四十人，又捞来了一个“团长”的官衔，企图霸占安地山区，与人民为敌。他曾派人到十大队驻地，要十大队向他投降。十大队领导将计就计，派滕松基、沈汝德2人携械前往“邀请”徐克济到十大队驻地商谈“投降”事宜。徐执意要十大队派员到他的驻地上干口村商谈。经一番周折，滕松基他们强行将其“请”到东子马龙，副大队长对其晓以大义，阐明我党我军政策，劝其改邪归正，但徐克济坚持反动立场，誓与人民为敌。为消除隐患，逐将其处决，并张贴了布告，将罪行公诸于众。树倒猢狲散，徐克济处决后，其部下也就一哄而散。1949年4月5日，国民党交警总队第三大队第九中队长牛中民在金华长山率部起义，投向十大队。不久，接六支队领导通知，交警九中队由十大队整编，徐文佩任代理大队长，牛中民任副大队长。下辖2个中队，1个侦察排。一中队中队长张志华，指导员单戈。二中队中队长徐文佩兼，指导员程兴炎。侦察排长滕松基。

至此，路南地区党组织已在金华、汤溪两地建立了澧浦和金汤两个区级地方人民政权，并有澧浦区中队和十大队两支革命力量战斗在这两地的农村。

（二）

路南地区党组织还重视金华城区工作的开辟。1946年夏，永康友谊酿造厂因酿制的芝英酱油在金华销路很好，有的股东就想在金华建厂。该厂地下党组小组认为，金华城区是浙江中

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我党在市区的工作很薄弱，在金华建厂有利于开辟党在城区的工作。党小组长胡一元和陶健同志遂将这一情况向中共金华地区临工委书记应飞作了汇报，应同意胡、陶的建议。陶健到金华作了供销等情况的调查后，即以“去金华设厂有利于业务的发展”为由，鼓动股东在金华设厂。是年秋，该厂经理、进步民主人士徐宗歧在主要股东、进步民主人士胡钦海、胡思周、章孟春等人的支持下，在金华中山路开办了“芝英酱油厂”。胡一元、陶健即以该厂技术员、会计的身份随厂来金，一起来金的党员还有黄光耀、牟得华、郑义传、童春等。到金后，在厂内建立了党小组，胡一元任组长。考虑到工场工人中党员较多，又便于隐蔽，即以工场为立足点，然后向外发展。同时又将酱油厂建成我党在金华的一个联络点，金义浦特派员赵之逊就以与胡一元是同学关系来厂联系，并以治病为名，在厂里住了一段时间。酱油厂在四牌楼设立了一个发行所，一共有3个人，胡思周（后参加六支队）任经理，除郑义传外还有一名学徒陈正印也是培养对象（后发展入党），所以党小组研究工作经常在发行所楼上进行。

芝英酱油厂党小组建立后，就积极向外开展活动。首先把英士大学的进步学生作为主要工作对象。当时英大刚从温州搬迁金华不久。闽浙赣城工部下属的党组织、中共杭州支部、路西地区党组织都在英大学生中进行活动，但当时地下党活动实行单线联系，因此互不发生关系。胡一元、陶健利用各种机会，到英大进行调查，对该校进步学生社团“民主社”有了更多的了解，掌握了在英大的永康籍学生曾参加永康的一个大学生社团“五峰学会”的情况，从他们发表的政治见解中，了解他们有民主倾向。于是利用跟英大学生特别是永康籍的学生交

朋友、叙乡谊等方式对他们进行工作，并从中培养建党对象。首先把经济系永康籍学生徐金龙（方高）给以重点培养，使他很快的提高了思想觉悟。他与永康籍同学颜启华（经济系学生）、潘钧（电机系学生）、楼志韶（土木系学生）等团结在一起，并逐步形成了一个没有组织名称的秘密核心。酱油厂党小组把他们作为宣传、团结、争取青年学生走向革命的桥梁，团结了一批青年学生，积极参与反蒋斗争，促进了爱国学生运动的发展。酱油厂党小组还在城区工人中开展活动。到金华铁路工人中作调查，宣传党的主张，号召工人起来斗争，推翻万恶的社会制度；在汉文印刷厂等单位也进行了活动，培养建党对象。为了在金华城郊建立据点，中共金华地区临工委一度还派遣党员施香沛（施湘）到金华含香和后徐小学，林筱宜到金华长山小学以教书作掩护，开展活动。

1947年4月，中共浙东工委书记马青到永康检查指导工作，撤销中共金华地区临工委，建立特派员制，任命应飞为金华地区特派员。同月，中共兰溪特派员朱炳桂和建德地下党负责人胡恒山，去永康参加马青召开的会议，途中不幸被捕，关押在金华监狱。应飞决定武装劫狱，马青亲自布置酱油厂党小组，设法了解监狱戒备、地形等情况，为武装劫狱作准备。胡一元通过同乡、同学等各种关系，了解到金华警察局的武器装备及巡查路线等情况，并到与监狱房舍相连的金华法院，实地视看地形，勘察劫狱路线。他还与陶健以同学的名义先后探监，与朱炳桂等取得联系，暗示“家中”很关心他们，要他们坚持斗争。同时派牟得华以亲属名义送上地区党组织给他的生活费，并由他保持与狱中的联系。金义浦特派员赵之逊也计划把仅有的一点武装在离城不远处驻下，准备劫狱。不久，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朱炳桂组织难友越狱暴动，事先将暴动计划

藏在破棉被内交探监者带出，但酱油厂党小组不了解棉被内的秘密，结果错过了机会。由于没有外应，难友们虽冲出了监狱的第一道门，未能突破第二道门，越狱失败。敌人对朱等严加看管，拷上了重镣手铐。此后虽仍派牟得华与狱中联系，但总不顺利，武装劫狱计划只好放弃。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发布所谓“戡乱建国总动员令”，在其统治区内到处抓丁征粮搜刮民脂民膏，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怨声载道。1947年3月，敌在浙江第一期征丁业已结束，壮丁已陆续送往前线。由于敌孤注一掷以支持正面战场，估计第二次的抽丁必然会很快地到来，其规模比第一次还要大。据此，中共浙东工委指示各地党组织把最能激发人民的斗争情绪、最能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行动的反抽丁斗争，作为重要任务来抓。4月，马青去永康后，部署大造舆论，有组织、有目的、有领导的进行抗丁、抗粮、抗税的“三抗”斗争。在永康刻印“三抗”标语，分送金、永、武、缙各县。10月9日，国民党“双十节”前夜，各县同时张贴以“浙江壮丁自救军”名义印发的“我们要活下去，反对内战、反对征丁，反对征粮！”“欢迎开明地主和我们联合！”“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卖国独裁！”等标语。金华城区在陶健的指挥下，为张贴标语进行充分的思想发动，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制订了周密的措施，并作了明确的分工，城西由酱油厂党员负责，城东由徐金龙等英大进步学生负责。一夜之间，在火车站、大桥头等来往人员最多的场所，在全城各处都贴满了“三抗”标语。这次“三抗”斗争，范围广、行动快，效果好、影响大，震惊了国民党政府，唤醒了民众。给国民党庆祝“双十节”献上了一份“厚礼”。

1947年初夏，友联酿造厂因股东意见不合，金华、永康2个厂分别独立经营，胡一元调回永康。5月，马青任命陶健为金武特派员，领导金华、武义党的工作，陶健就以自行经商为名离开了酱油厂。但陶仍以特派员身份通过施湘与徐金龙和英大学生联系，指导英大学生的民主运动，不断为英大学生提供进步书刊。徐金龙曾按陶健指示写信在天津工作的“会员”施世雄，要他回武义动员其父施金和（抗战期间曾任自卫大队长）献枪支援游击队，经过工作，施金和献出了一支短枪和一些子弹。是年冬，徐金龙等英大进步学生还在金华雅堂街后街小学举办了“民众夜校”，吸收初识文字的男女青年和工人参加。讲政治形势，学文化，教唱《朱大嫂送鸡蛋》、《古怪歌》、《团结就是力量》等进步歌曲，夜校办得生动活泼，连隔壁的两个小尼姑都来要求参加。夜校办了半年多，就被当局强令停办。

1947年10月，王冰陪浙东工委书记刘清扬去上海，刘、王在上海被捕。王冰被捕后不久就叛变投敌，亲来金义地区进行破坏活动。由于王冰曾在酱油厂落过脚，酱油厂自然成为其破坏的一个目标。1948年3月，叛徒王冰带领特务破坏了酱油厂这个路南地区党的秘密联络点和桥头堡，该厂党员郑义传、陈正印和职工家属胡秀吟在四牌楼门市部被捕。陶健立即通知在金华城区的党员逐步有计划地撤离。金华酱油厂的党小组停止了活动。英大学生徐金龙也奉命撤离金华，赴永康参加游击队。但党对英大的工作并未中断，陶健通过颜启华单线联络，开展活动。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路南地区革命形势越来越好，但干部缺乏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为了培养干部，提高部队素质，党组织积极动员英大进步学生参加游击队。1949年2

月初，颜启华、潘钧、楼志韶、吕东明、倪贻泽、应万民、徐克明、余典等英大学生赴永康参加第六支队。潘钧根据路南游击根据地远离浙东临委，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状况，用自制的电子管收音机，在雪峰山区成功地收录到新华社的新闻电讯稿，3月上旬《新路南报》成立时，潘钧任社长。其他人经过六支队干部教导队的培训，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颜启华化名陈明，仍奉命回英大工作。

1949年3月，路南地区正副特派员奉浙东临委指示，率路南地区主力部队成功地组织了松（阳）丽（水）起义后，成立了浙东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路南军分区司令部。随着根据地和游击区的不断发展和迎接解放接管城市的需要，在下旬第五行署和军分区联合举办了军政革命干部学校，并在《新路南报》刊登了招生通告。陶健指示陈明迅速动员英大进步学生参加六支队，并寄去了一批《新路南报》。尽管当时敌特严密监视并企图破坏通往游击区的交通线，但在胜利形势的鼓舞下，英大梁杰子、裘尧鉴、朱翔峰、宁湘君等一批学生投笔从戎，冲破重重障碍，参加了六支队。

（三）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飞渡长江。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残兵败将仓惶溃逃，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乘胜追击。坚持战斗在金华、汤溪的路南游击健儿，破公路、毁桥梁，以阻止敌人南逃，主动出击，奋勇作战，为迎接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4月，澧浦区中队在婺江王弄塘（横垄塘）地方阻击国民党浙保一个排，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20余支。5月7日，澧浦区中队又袭击了洪村芳的国民党驻军，缴获了步枪40余支。

区中队已是一支拥有84人，轻机枪6挺、冲锋枪5支、短枪10支、长枪60余支的地方人民武装。

4月底，六支队第十大队得到国民党二〇三师一个连，窜至莘畈村，杀猪宰羊掳掠人民财产的消息后，迅即将该村包围，随即向敌人实放炮击，敌人乱成一片，纷纷抱头鼠窜，结果全部被俘。俘虏经教育后，全部释放回家；5月初，第十大队20余人在后陈山村对溃逃的敌二〇三师1个营进行伏击，战斗打响后，敌即弃枪逃命。不到半小时战斗即结束，我军缴获了六〇炮、轻机枪、自动步枪等多种武器；同时，二〇三师1个连（连长王志斌）的散兵，在金华南山亦被我第十大队包围，经反复喊话，敌人拒不投降，最后全部被歼。此时，第十大队已有250余人，装备有六〇炮4门、火炮1门、轻机枪15挺、汤姆冲锋枪29支、卡宾枪22支、步枪200余支。

此外，我金汤区署曾派人与国民党汤溪县县长徐国祯接触，策动其率自卫队起义。在大军压境、兵临城下的形势下，徐表示愿意起义，并将2支手枪送给金汤区署以示诚意。5月5日，徐国祯派李进来协商起义事宜，双方约定当天晚上将汤溪县自卫队拉到厚大树，以鸣枪作为联络信号。第二天，程兴炎代表十大队进行谈判。组织策反汤溪自卫队的工作，中共闽浙赣城工部汤溪小组也在进行，他们曾多次接触教育“国大”代表、汤溪的实权派章如铨，章也表示俟机策动自卫队起义投诚。因此在东夏村一个庙里谈判时，汤溪小组也派潘长发、金玉熊2代表参加。经一个小时的谈判，由闽浙赣城工部汤溪小组接受县自卫队的起义。汤溪解放后，由汤溪小组将自卫队带回城里，交解放大军接收。

1949年5月7日金华解放。10日金华市军管会成立。12日市军管会召开地方工作会议，将金华市划为五个区，原澧浦区

区长王一虎被任命为三区（澧孝区）区长。澧孝区署遵照市军管会指示，为大军南下筹集大米80多万斤，柴草、马料100多万斤。

5月8日，等六支队十大队配合人民解放军十一军三十三师解放汤溪。6月5日，第十大队奉六支队部命令，赴金华二仙桥由浙江省第八（金华）军分区进行整编。整编后，第十大队编为汤溪县大队，大队长李启盛，徐文佩任副大队长，陈玉龙任副教导员。下设3个中队，第三中队留驻汤溪，一、二中队调往武义、宣平一带执行剿匪任务，继续为人民革命事业而战斗。



解放前夕金华中学地下斗争回忆

白玲

张知

王春

一、反动派的严密控制

金华中学（现金华一中，下称金中），学生勤奋苦读成风，而且社会政治活动十分活跃。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加强了对学生的控制。1947年，派了军训官宋逢唐和一个姓杨的训育主任到金中。这个杨某是从蒋经国的“新赣南”来的，他名义上是教英语，实际上搞政治活动。1948年，省教育厅又派来两个军训教官，这些人严密监视着学生的活动，日常的班级活动要登记，每星期不得超过三次；学生会开会，训导主任列席监督等。

二、校园的阵阵春风

尽管反动派严密控制，层层封锁，但挡不住革命的春风吹进校园，也锁不住青年学生追求真理的火热的心。

1947年上半年，全国掀起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英士大学的游行队伍来到金中，金中就有不少学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同年下半年，外国神父打了金中学生，金中同学大闹真神堂。

1947年冬，杭高学生包钟锐（即包文俊，原为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成员，后入党，曾任杭高地下党支部书记）来校串连，

宣传革命道理，分析社会发展趋势，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

在这前后，杭州市中学生、我党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成员盛斯猷，因搞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金华老家，与金中的陈炳根、吴治民、倪爱英等同学交流对形势的看法，引导大家阅读革命文艺和政治理论书籍。1948年春，为了推动金中的学生运动，盛斯猷又通过杭州地下党，以春游名义把杭州市中一个比较进步的班级拉到金华，和金中同学联欢，演唱了《茶馆小调》、《您是灯塔》、《唱出一个春天来》、《山哪边呀好地方》等进步歌曲，演出了《朱大嫂送鸡蛋》等革命歌舞，同时，金中学生吴治民到了杭州，与地下党员包文俊以及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成员广为接触，思想上受了很大影响。

春风阵阵，吹进了金中校园。

三、武斗事件中的觉醒

1948年、金中学生在与杭州进步学生密切往来的同时，与金华英士大学学生的联系也加强了。

英士大学，反动力量较强，但进步学生也很多，学生运动开展得比金中早。当时英大校长汤吉禾是国民党 C·C 派人物，进步力量掀起了“倒汤”运动。

1948年5月28日，是金中52周年校庆日。为了欢度校庆和欢送毕业同学，学生们排演了话剧、京剧、婺剧等许多节目。由于学校学生较多，而会场较小，因此决定联欢会不接待校外来宾。英士大学少数别有用心的青年军学生，就借口看文艺节目，拉拢一批人冲击校门；金中的军训教官则借口“维持秩序，保护学校”，挑动金中学生与之对抗，而引起了武斗事件。

这场武斗造成了严重的果：金中受到严重破坏，有几十个

学生被打伤，学校被迫暂时“放假”，同学们带着仇恨英大学生的心情离开学校；英大学生也有几十人受伤，英大校长汤吉禾为了破坏英大和金中的团结，并转移“倒汤”的注意力，趁机煽动“一致对外”，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也从中挑拨，使英大许多学生对金中也产生很大反感。

面对这一局势，进步学生通过对大量事实的分析，觉察到：有人在挑拨煽动，搞阴谋，妄图破坏学生的团结，转移进步学生的斗争目标。于是吴治民、陈炳根、倪爱英等同学撰写了一份《告全国人民书》，在全省各地以至全国许多学校散发，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挑起武斗的真相，擦亮了广大师生员工和金华人民的眼睛，激起了各界人民对国民党特务的痛恨。

人们从武斗事件中觉醒，事实教育了广大师生，也使进步青年认识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当时的《金中半月刊》上就有过这样的诗：

“铁棍捣碎了我们的大门。
血泪洗清了我们的眼睛，
我们发现了门外的路，
发现了门内的鬼，
我们将怨恨化作力，
去
杀鬼，去
走路，那
伸向太阳的路。”

1948年夏，中共杭州市工委书记钟沛璋适时赶到金华，帮助英大地下党支部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强调要认清反动派的阴谋，引导同学正确对待这一事件，避免上当受骗，扩大事态。后来，英大农学院学生地下党支部书记吴仲沂，根据上

级指示，与金中学生骨干进步学生吴治民进行取系。吴仲沂发展吴治民参加“N·D”（即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不久，又发展陈炳根、倪爱英两同学参加。为了发动广大进步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根据吴仲沂的意见，决定在金中进步同学中组织一个秘密的“读书会”。九月初的一个晚上，他们聚集在陈炳根家拟定了一个“读书会”的组织大纲，确定“读书会”的任务是传阅进步书籍和传播革命思想，教育、团结、组织青年，发展进步力量，反对反动统治。会上，建立了核心组，吴治民为组长，还对组织发展工作进行了具体分工。

会后，通过分头工作，首批发展的会员近十人。这样，一个在我党领导下的，以“N·D”为核心的进步学生的秘密组织“读书会”在金中正式诞生了。

四、争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斗争

“读书会”成立后的第一场斗争就是争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

国民党反动派万万没有想到，武斗事件反而使金中学生进一步觉醒，他们就改用了另一手，积极扶植亲信，妄图把学生活动引入邪路。

1948年夏天，正当进步学生加强与校内外学生联系，揭露武斗真相的时候，反动的军训教官、训育主任就指使他们的亲信，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以“联络友谊”为名，成立了一个由他们控制的学生组织“更新社”。这个组织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与进步同学闹对立，唱反调，甚至监视进步同学的活动。

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在1948年秋天开学后，“更新社”

就把重点放在争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上，“读书会”就和“更新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了更有效的团结教育广大同学，和便于进行合法斗争，“读书会”必须掌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于是，采取在同学中广泛酝酿协商的办法，推出了一批候选人。这批人多数是学生生活的积极分子，有的本来是学生自治会的骨干或学生自己选举的各班班主任，平时与学生打成一片，为同学们做了不少好事，有较高的威信。如武斗以后，协助学校维持秩序，积极组建或参加“护校委员会”、“学校重建委员会”；又如出面和学校当局谈判，改一次缴足粮食为缓缴或分期缴，使家境贫寒的同学能按时入学。

在此同时，“更新社”在他们的后台军训教官、训育主任的指使下，也推出了一批候选人。这些人有的思想反动，有的以跑上层路线“听话”出名，好几名是军训教官指定的按军训编制的各班的中队长。

由于以上情况，竞选中，“读书会”推出的候选人明显占上风。对此，“更新社”不甘心失败，竟采取了涂改选票的卑劣手段。“读书会”成员立即予以揭露。选举结果，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常务理事以及一些主要部门的负责人都由“读书会”会员及支持读书会的进步同学担任。军训教官、训导主任等企图通过“更新社”控制学生自治会的企图破灭了。

五、传播革命进步思想的红色书库

通过学生自治会这一合法组织，“读书会”大力开展了各种团结教育广大同学的革命活动。当时，学生自治会的学校服务部长是“读书会”核心成员陈炳根，利用这一职务，带了相当于当时十二担米的经费，通过杭州地下党的同志，在杭州几

个书店里购买了了时代、生活、新知、读书等进步出版社出版的大量进步书籍。回校后，又将各班级的十多个服务部干事组织起来，办起了学生自治会借书处，将这批书及时送到同学手里。这样，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被开垦的处女地》、《铁流》等苏联小说和《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小二黑结婚》、《马凡陀山歌》等革命根据地的文艺作品及《实用经济学大纲》、《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的书籍就在同学中间公开传播了。学生自治会借书处成了传播进步思想的红色书库。

六、有声有色的革命文艺活动

当时，学生自治会的文娱部长是由“读书会”核心成员倪爱英担任的。文娱部积极开展进步的文娱活动，引导同学们在革命激情的薰陶之下，接受进步思想。1948年秋季，金中来了一位年轻的音乐教师方观昌，他是中共闽浙赣边区党委城工部地下党员。他一来，就指导学生自治会文娱部进一步把进步的文娱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例如，编印了《山哪边呀好地方》、《民歌选》等歌曲集，通过金中歌咏团的演唱，校园里到处响起了《您是灯塔》、《游击队之歌》、《黄河大合唱》、《毕业歌》、《新女性》、《唱出一个春天来》、《茶馆小调》、《请问您呀大白米》等进步歌声；礼堂里还上演了《查户口》、《升官图》、《王大娘补缸》等进步话剧、歌舞剧、活报剧。在进步书籍和革命文艺的共同推动下，学校里到处洋溢着青年人的革命朝气。

七、为革命呐喊的《金中半月刊》和“民主墙”

学生自治会办的《金中半月刊》，是一个重要的舆论阵

地，这个刊物旗帜鲜明，及时表达进步同学的态度，传播革命真理的声音。她刊登了“吃不饱饭，如何教书，某某中学罢教”一类的社会新闻；发表了“愿当太平犬，不作乱世民吗？”一类的评论文章。1948年“双十节”，金中校门外鼓楼前发现一张署名省立金中的标语，内容是“剿灭毛匪”云云。《金中半月刊》就发表了“本报讯”，在介绍上述标语后说：“然径自治会声明，今年双十节并未张贴任何标语，不知何人故意弄眩虚拟，其用心如何，殊可怪也！”既明确表达了学生自治会的原则立场，又使国民党反动派抓不住把柄。《金中半月刊》还登出过《试论“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论文。此版校方发现后不准寄出，但在校内已广为散发了。

学生自治会选举时，竞选双方贴了大量海报。竞选结束后，“读书会”就利用这一阵地开辟了一个“民主墙”，用不署名的形式纵谈国家大事，评论学校工作，活跃了校内民主空气。却引起了学校那几个反动教员的恐慌，在训育主任的干预下，“民主墙”只办了两期就被禁止了。

八、从“N·D”到城工部

“读书会”开始组织时是以“N·D”为核心的，它接受中共杭州市工委系统的地下党领导。

1948年秋季，方观昌（陈平）来金中当音乐教师，到校后，他积极与“读书会”的核心组同志联系，大力支持“读书会”的活动。根据城工部金华支部的建议，以后“读书会”直接受城工部地下党的领导。根据地下工作的原则，一个组织只接受一个系统的领导。自此以后，“读书会”就正式接受闽浙赣边区闽浙地委城工部金华支部的领导，停止了与杭州市工委系

统党组织的联系。不久，闽浙地委工部金华支部就在一中发展党员，成立了党小组。原先组织的“读书会”也就成为党的外围组织进行活动。这学期末，城工部发展了党员二人，“读书会”的核心小组也就增加到四人。

1949年初，英大有十多人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一些学生运动的骨干被迫转移。在金中，由于“读书会”活动的进一步开展，一些同志也引起当局的注意，训育主任公开在校务会上提出：要开除进步学生。为防不测，党组织决定一批同志转移，送到金萧支队工作。由于一些骨干的离开，“读书会”重新组建了核心组。不久，城工部又在金中发展了一批党员，朱广为党小组长。党小组一般每周开一次会，汇报情况，研究工作，决定策略。卓青同志有时也到会指导。“读书会”核心组开会，均根据党小组的意图，进一步作具体的研究、安排。这样，尽管原来的一些骨干被迫离开，但“读书会”的领导并没有削弱，党对“读书会”的领导更具体了。

九、通过学生自治会进行合法斗争

1949新学期一开学，“读书会”又与“更新社”展开争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斗争，结果仍取得了很大成功，常务理事、副常务理事、部长等职务都掌握在“读书会”会员和进步同学手里，学生自治会主席也是“读书会”有意支持的同学，“读书会”通过学生自治会继续进行各种合法斗争。

金中原校长胡步蟾是在金中任教十多年的老教师，也是个对生物学有一定研究并出版过著作的学者，思想也比较开明，在学生中有威信。但1949年春，却被免职了。而派来一个当过国民党内政部地政司司长的人物来接任。他还带来了几个亲信，安插在图书馆当管理员和在厨房当老板。金中党小组对此

专门进行了分析，认为教育厅作这样的人事安排明显是企图控制学校和破坏学生运动，必须与之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确定通过“读书会”团结同学，由学生自治会出面，开展了一个“送旧不迎新”的活动。这就是为老校长胡步蟾专门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学生和教师代表致热烈的欢送词，还放鞭炮，演出文艺节目，并且在《东南日报》上登了欢送广告。相反，对新校长则不仅不欢迎，而且每当开会，他讲话时，就组织同学嘘他，使他很尴尬。接着，又开展了反对他按插亲信在图书馆当管理员和当厨房老板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这就会更加团结教育了广大教师和学生。

当时学生入学注册，从开始到截止，有七天时间，由于学生是陆续入学的，膳食节余较多，“七日膳余”，一直全归学校所有。“读书会”就通过学生自治会发动了收回“七日膳余”的斗争。最后，校方让步，将膳余交学生自治会支配。

十、放手发展，大胆工作，扩大斗争

经过1948年半年的工作，到1949年这个学期，在进一步开展斗争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组织的时机成熟了。这时，上级党组织根据当时的形势指示“读书会”要“放手发展，大胆工作，迎接解放”。“读书会”在1949年上半年的几个月里，又发展了会员41人。其中在金中有37人；另在作新中学有4人。

“读书会”的工作也更放手了。首先利用《金中半月刊》公开发表“反内战、反迫害”的文章，不但在校内散发、张贴，还寄往全国许多大、中学校。由于色彩太浓，主编洪其均曾先后被校长和训育主任传训过，说“师管区传话来，《金中半月刊》有红色嫌疑，你应负责”。洪就以“投稿不署名，无法找到作者”来搪塞，并将此事告诉同学，取得同学的支持。

这学期，学生自治会购买了更多的进步书籍，在同学中广泛传阅。还编印新的进步歌曲，在校园里唱得更欢。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镇压学生运动，金中自治会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致电声援南京学生。

这学期，老师们因薪水太低，物价飞涨而罢教，学生自治会积极给予支持。学校工友生活困难，学生自治会又发动同学捐米补助。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师生员工的团结。学校当局开了进步学生的黑名单，有的教师知道了，主动告诉学生，使这些学生采取了防范措施。

十一、变“应节”为护校，迎接金华解放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在金中四月份举行的一次周会上，校长说：“局势紧张，要准备应变”。金中党小组立即进行了研究，认为“应变”是国民党对付我党的措施，但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一口号，来为我们的护校斗争服务，关键是掌握“应变会”的领导权。于是，党小组决定，在学生自治会里主动提出：通过公开选举产生“应变会”。并具体研究了“应变会”的人事安排。选举结果，“应变会”的主要骨干大多数是“读书会”成员或它联系的进步同学。“应变会”成立后，就开展了迎接金华解放的活动，“应变会”的宣传股负责编印《应变快报》，传播我军胜利的消息；调查股负责了解同学思想，调查校中粮米煤油的储备；联络股一方面负责联络校内教职员工，一方面加强与金华城内大中学校的联系；警卫股负责门卫巡逻等内部警卫工作，以警卫为名，学生自治会还从军训教官那里把二十多支军训用的步枪拿了过来，用于夜间巡逻，保障学校安全，由于各须工作做得好，同学们思想比较安定，绝大多数同学坚持留校，学校也没

有受到任何破坏。

十二、巩固成果，走向革命的大天地

1949年5月7日，金华解放了。“读书会”开始公开活动，正式定名为“大众读书会”，选举了领导机构，在校内组织大家学习党的城市政策“约法八章”等；到校外出壁报，组织街头宣传，讲革命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还协助军管会做社会调查工作等。解放初，社会秩序还比较乱，敌人在农村的活动还相当猖獗，如刘宝淦同志就因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工作而受到土匪的威胁，被土匪抄了家，但他没有因此而退缩不前。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事业的需要，“读书会”会员纷纷参军或参加地方工作。继续留在学校里的，则成为学联和学生会的骨干，担任金华市学联筹委会副主席、理事、金中学生会主席等等。金华开始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多数又成了第一批团员。金中“读书会”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溶化在整个革命的大溶炉中，

（根据卓青、吴仲沂、盛斯猷、周士铭、陈平、何平、朱广，楼金、刘宝淦、魏桥、白玲、张知、王春提供的资料，先后由白玲、张知、王春整理而成。）

大革命时期金华党的主要领导人 ——钱兆鹏同志

潘 桂 荣

钱兆鹏（1907—1927）字叶缪，又名奚求、胜芝，浙江金华县仙桥乡下钱村人（现隶金华市婺城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左派）。1926年任中共金华独立支部书记，并兼任国民党金华县党部（左）执行委员（后为常务委员）。1927年6月6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8月4日被枪杀于金华法院监狱。

为雪国耻 立下壮志

1907年6月17日（即古历五月初七），兆鹏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父亲钱乐川是个乡村小学教师，母亲余氏是位淳朴勤劳的农村妇女。兆鹏自幼聪颖，勤劳好学，8岁随父上乡村小学念书，15岁毕业于金华县第三高级小学。不仅学业成绩优异，体育锻炼也很突出，在运动会上多次夺得名次。

1921年8月，正值“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继续遍及全国，兆鹏考入浙江省立第七师范学校（该校1923年7月与金华七中合并）。学校当局克扣学生的伙食费，中饱私囊，兆鹏组织同学闹膳，校方被迫接受学生会提出的各项条件。在斗争中，兆鹏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学联会代表。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侵略、掠夺日益加剧，国内军阀连年混战，丧权辱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这一切，时刻刺痛着每个有爱国心的青年，正如当年金华学联会兆鹏亲手创办的《五九》特刊发刊词中所说：“耻而不知，其得为国乎！然则是刊之发行，所以知耻也。知耻近乎勇，勇则必有雪耻之一日！”面对黑暗现实，兆鹏在《向导》、《新青年》、《赤光》等进步刊物的影响下，怀着改革社会和洗雪国耻的壮志，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之学说，并特地写信给陈独秀求教。与此同时，他和同学挚友千家驹、章驹一道与校内外进步青年宣中华、潘风涂、张新锦、季达才等人密切联系，共同联络各校学生以及社会进步人士，积极参与和组织了纪念“辛亥革命”、“五四”、“五九”等集会、游行活动，以及抵制日、英洋货运动。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6月，黄埔军校开学，兆鹏原要和七中部分进步同学积极前往（后兆鹏因家庭原因未能实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噩耗传来，兆鹏和千家驹于15日在东岳庙主持了有千余人参加的追悼会。在会上，宣传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痛斥了军阀的倒行逆施，号召青年学生关心国家命运，团结奋斗。

同年，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兆鹏和千家驹以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在西市街洪茂旅馆发起召开了各界人士联席会议，组织“金华‘五卅’惨案后援会”。6月初，兆鹏、千家驹、严行等同志在七中运动场主持召开有五、六千人参加的“金华‘五卅惨案’后援大会”，隆重追悼顾正红烈士，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并宣布，全面开展“三罢”（罢工、罢市、罢课）斗争。会后，兆鹏带队进行反帝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途经西市街专营洋货的“大元”商店，出于群愤，当即砸碎

了该店的招牌和柜台，并查抄了该店库存英、日产的香烟，当众烧毁。事后，还组织了检查，每天到码头、商店检查英日货。在兆鹏的组织发动下，七中师生开展了全校性罢课斗争，组成了“金华‘五卅惨案’后援会宣传队”，深入到旧金华府属八县和金华县乡村集镇，向城乡广大人民介绍“五卅惨案”真相，揭露帝国主义侵华暴行，号召民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反对军阀统治，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募集爱国捐1000多银元，支援上海工人兄弟的正义斗争。

经过“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洗礼，七中师范部学生千一（即千家驹），由共产党员、国民党浙江省临时党部常务委员宣中华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继而，兆鹏、章驹等由千家驹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金华第一个党的组织。同时，他们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成立了国民党金华直辖区党部，千家驹为区党部常务委员，兆鹏为执行委员。

心志坚定 顽强斗争

兆鹏自入党那一天起，就决心为党的事业而献身。1927年秋，兆鹏还积极支持社会人士创办八婺女子初级中学，以抵制奴化教育和解决女子上中学问题（当时七中不招女生，只教会学校成美女中招收女生）。

为开展党的工作，是年下半年兆鹏转入高中部师范科学习。1926年1月，以七中高中部师范科学生为主，成立了金华七中丽泽团。在团内，兆鹏以研究学术为名，传阅《向导》、《新青年》、《创造》等进步书刊，座谈形势，交流思想，培养积极分子。例如，兆鹏经常向方乃木宣讲“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教育他参加党组织。不久，方乃木由兆鹏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兆鹏的积极组织活动下，丽泽团的成员

积极从事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活动，七中校史记载该团活动时指出：“国民革命军底定浙江之时，参加革命战线者为数甚多，乃以清党之故，被难牺牲亦复不少。”

1926年5月9日，为雪国耻，唤醒民众，兆鹏在金华学生联合会组编的《五九》特刊上发表了题为《五九纪念真义》的文章。文章指出“‘五九’案件真可谓是不平等条约中之最不平等等者，此项条约完全由于袁世凯欲遂称帝的野心，投诚于日本帝国主义，轻易牺牲了人民一切的利益。”号召民众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推翻军阀统治。

同年5月28日，正当国民革命政府秣马厉兵，筹划北伐之时，在兆鹏的积极宣传组织下，正式成立了金华七中学生会，以开展救国工作。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七中同学和金华各界群众继续兴起抵制洋货运动。兆鹏带领七中同学积极参与了对仇货的调查、劝禁等工作，同时领导学生会一面联络社会各界“组织审调仇货委员会，冀收经济绝交之全功”；一面“请求校中编练学生军，俾得于必要时效命疆场。”

7月，正当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之时，中共金华独立支部成立，兆鹏任书记。同时，建立金华第一个团组织——共青团金华支部，由兆鹏兼任书记。为发展壮大党的队伍，兆鹏即着手进行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是年夏，他偕同千家驹专程去其家乡武义开辟党的工作。通过活动，由他俩介绍了武义的邵李清、何觉人、李守初、王惠质、王子如、蒋卓南等六同志入党，建立了武义县第一个党组织。嗣后，中共义乌独支成立，隶属金华独支领导。

金华独立支部建立不久，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党团书记潘风涂同志，受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左)的派遣和中共杭州地委的委托，为开展配合北伐的工作来金华巡视。兆鹏连续召开党团员

会议，座谈革命形势，学习党团工作的方针，讨论了有关问题。与此同时，以国民党组织的名义，举行了有学生及各行业代表百余人参加的报告会。会后，兆鹏又召集了几位搞农运工作的同志陪同潘风涂到郊区了解农运工作情况，学习讨论上级关于农运工作的指示。

8月，兆鹏代表学生联合会和严行一起接办了金华平民夜校（即民众学校），利用夜校这一阵地，鼓动民众投入反帝反军阀斗争，在夜校印发《反对军阀孙传芳宣言》号召民众起来，打倒孙传芳，支援北伐军。

为迎接北伐军的胜利到来，兆鹏积极联络各界人士，组织宣传队，在工、农、商、学各界秘密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筹募慰劳品。同时，兆鹏又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积极发展国民党组织和筹建国民党县党部。

12月上旬，北伐军东路军先头部队由江西入浙，抵达金华，兆鹏等同志组织金华各界人民热烈欢迎。这一天，整个婺城鞭炮齐鸣，歌声响彻上空，革命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随即在通济桥外五百滩上举行了万人欢迎大会，兆鹏代表各界人民致欢迎词。晚上，在武胜营、真神堂等群众活动场所，分别举行了军民联欢会。会后，兆鹏组织学生宣传队分赴金华八县进行宣传。

组织农工 团结战斗

北伐军到达金华后，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国民党金华县（临时）县党部成立。严行任常务委员，兆鹏为执行委员（后为常务委员），并兼任组织部长、青年部长。从此，党组织常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对外开展工作。

是月，在党的领导下，乘北伐军到来的有利形势，金华掀

起了反帝、驱洋斗争的怒潮。兆鹏带领学生、工人首先来到了美帝国主义在金华办的作新中学和成美女中，领导两校的爱国师生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的斗争，使美帝国主义分子（成美女中的校长）大惊失色。紧接着，兆鹏代表县党部在两校学生、教徒（负责管理学校的）联席会议上庄严宣告：收回两校教育权。并亲自担任两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同时公布了五条办学方针，即一、由学生会派出代表出席校务委员会；二、改聘有爱国思想的教师任教；三、学校经济公开；四、废止圣经课；五、取消到教堂作礼拜。受到两校爱国师生的热烈拥护。兆鹏还组织带领百名学生、工人，先后没收了金华酒坊巷的真神堂，石狮子头的天主堂，净渠头的内地会，后街的普教社等帝国主义在金华办的教堂和教会财产，赶走了仅存的英国传教士荻牧师。

与此同时，兆鹏和党内其他同志在各界积极发动组织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妇女联合会、小教联合会等群众团体。宣传左派国民党组织的政纲，发展壮大左派国民党组织。兆鹏又先后多次回家乡，到上、下钱村，在东藕塘一带宣传反帝反封建，组织农会，秘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展党的组织。在兆鹏的宣传鼓动下，金华赤松乡一带最早组织起农会，秘密建立起党的组织，并开展了减租斗争，为党在金华农村开展农运工作打下了基础。

1927年1月中旬，驻金的北伐军战略撤退至衢州，闽军阀周荫人部窜来金华。兆鹏将三十余名党、团员组成战地服务团，下分宣传队、侦察（探）队、破坏队等，随北伐军行动，沿途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民众工作，给了北伐军以人力、物力的支援。29日，北伐军进军浙江，关键性的龙汤战役打响，兆鹏和战地服务团同志，分头发动群众，为北伐军送饭、带路、

运送枪支弹药、抬担架。在金衢地区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突破了孙军的防线，取得了龙汤战役的胜利。

同年2月初，北伐军重新进驻金华，正式成立了以兆鹏、严行等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主的国民党金华县党部，撤换了县知事并先后惩办了文新、东震等八个乡的保安团长，摧毁了军阀势力在金的统治机构。

为推动金华革命运动深入发展，兆鹏在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党代表胡公冕的协助下，夜以继日，连续召开县党部会议，共商革命大计，着重讨论了严惩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问题，对作恶多端的大土豪劣绅，逐个列举罪状，制定严惩措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闻讯惶恐万分，有的托人送礼说情，均遭到兆鹏严厉的训斥和拒绝。

2月18日北伐军克复杭州，兆鹏在府城隍主持召开万人庆祝大会。会上公开斗争了大土豪何公荫。会后，进行盛大游行。游行队伍经后街时，封闭了专售英日美食糖的“公大”糖栈。晚上，全城挂灯结彩，欢庆胜利。尔后，兆鹏又根据党部决定，扣押了利用职权乘机大发洋财的曹宅派出所所长余弼成。继而对无视党部决定擅自释放该“所长”的反动营长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党政军和人民团体代表的联席会议上，兆鹏提出了由国民党县长蔡源抓回污吏“所长”，限令反动营长二日内离开金华，并将事件经过呈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委会，通电全国等三项动议，受到各界代表的一致拥护。在斗争的高潮中，金华县总工会宣告成立，各行各业职工一千五百多人加入了自已行业的工会组织。为保障工人的利益，还建立了四十余人的工人纠察队。全县大部分乡也都建立起农会组织，兆鹏亲自组织领导的赤松、芙峰两乡就有20多个村建立村农会，

有会员三千多名。

在此期间，兆鹏又组织领导了金华工人开展罢工增薪斗争，还亲自到当时金华最大、女工最多，受苦最深的美伦袜厂组织罢工。兆鹏先在该厂工人骨干中组织工会，秘密建立起组织，然后发动全厂女工开展罢工。开始美伦袜厂老板汪惠斋对工人采取高压手段，并以关厂威胁工人，兆鹏及时识破资本家的阴谋诡计，教育工人坚持斗争，另一方面发动其他厂同时罢工，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声援美伦袜厂女工的罢工斗争。经过28天的斗争，资本家被迫答应全厂工人接原工资增加20%。在此基础上，兆鹏又指示县总工会发起组织各行各业工会与资方签订了第一个劳资协议。

高风亮节 英勇就义

正当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之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形势逆转。金华逃往杭州的国民党右派、贪官污吏、大土豪都成了清党委员，他们密谋逮捕金华左派县党部主要领导、共产党人钱兆鹏等。根据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电示，兆鹏从容地处理好党内机密文件后，即去金华南山脚殿塔村隐蔽。不幸的是，当他在一个多月后，为筹集车费去江西寻找组织，托人给家里送信时走漏了消息，遂于6月6日在金华县殿塔村被捕。中共杭州地委派来金华组织暴动的张新锦同志也同时被捕。在狱中，兆鹏和新锦两同志互相勉励，坚持斗争。兆鹏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钢铁般的意志和崇高气节。他鼓励前来探监的美伦袜厂女工同志说：“要勇敢些，继续斗争下去，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金华县长接国民党省政府密电，于1927年8月4日，令将钱兆鹏、张新锦立即执行枪决，并呈报备案。当天傍晚，钱兆鹏和

张新锦两同志同时在法院监狱的空地上惨遭枪杀。临刑前，钱兆鹏泰然自若、昂首挺胸，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牺牲时年仅二十岁。

兆鹏为改造旧社会，实现伟大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奋勇前进。

本文资料来源：

- (1) 钱兆鹏、千家驹、章驹等四人合影，和钱兆鹏在照片上题词。
- (2) 千家驹：1960年给金华县委的信。
- (3) 严行：1960年回忆录。
- (4) 潘风涂：1960年回忆录。
- (5) 施世珍：1960年8月17日回忆录。
- (6)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组织发展的概况》。
- (7) “金华七中学校一览”。
- (8) 杨虎、徐义君、《北伐军挺进浙江史略》。
- (9) “中国济难会全国总会”印的复制件。
- (10) 金华玉泉钱氏宗谱三十五卷。
- (11) 1926年金华学生联合会编印的《五·九》特刊。
- (12) 徐云从、方乃木、杨祖才、黄善楷、宋文藻、洪仰昆、何茂钟、诸葛宝生、成顺祥等人回忆资料。
- (13) 原国民党金华县长姚端（姚定忱）交代资料。

傅鸿权烈士史迹

刘家泽

朱元式

傅樟清

傅鸿权，男，又名达夫，化名施伯纶等，汉族，金华县寿昌乡深塘坞村人。1919年秋考入浙江省立第七中学，1923年夏毕业。他聪颖好学，各门学科成绩名列前茅，特别是国文，出类拔萃，校方常常张贴他的作文，以资示范。当年吴晗等学友，亦争相阅读，以为楷模。鸿权同志指望投考当时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以冀深造。无奈因家境贫寒，父亲去世，难以遂愿。中学毕业后，即执教于小学，以维生计。

1923年秋，被当地辛亥革命老人朱郁荃聘为义乌西区陇头朱梅陇小学教师。由于学识超群，教学勤奋有方，深受学生的爱戴和社会的好评，特别得到一位孤儿朱元武的孀母吴夫人的莫大器重，敦聘为兼任家庭教师。他视孤儿为骨肉兄弟，言传身教，关怀备至，两人自此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鸿权同志平易近人，乐于助人。如贫农朱元佳，年老体弱多病，孤鰥一人，生活困难，鸿权常在课余，热情照料老人，视同父母；对群众要求代写书信、契约等，也无一拒绝，深得周围群众称颂。

1927年至1928年间，由于鸿权同志教学有方，工作热忱，声誉日高，附近小学争相聘请。遂应聘于肃田小学，任高年级

主任导师。在这短短一、二年间，随着革命洪流的起伏，他思潮翻腾，寝食不安。但见国共合作，封建军阀一个个被北伐军打倒，帝国主义者惶惶不可终日，各地的贪官劣绅，亦一时消声匿迹；正当广大劳苦大众行将翻身之日，不料蒋介石叛变革命，成了新军阀，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竟牺牲在他的屠刀之下。期间，鸿权同志除兢兢业业教学外，还经常与共产党员刘家泽接触，阅读一些进步书报，接受一些革命理论。为追求革命真理，他千方百计寻求革命书报，如郭沫若同志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书。使他开拓了视野，提高了认识，特别是当时革命斗争的现实，更给了他深刻的教育和有力的促进。鸿权在梅陇小学任教时，遇到早期学生运动的先驱陈敬森烈士，他也在该校任教，两人一见如故，亲密无间。嗣后，当陈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幸被捕入狱的消息传来时，他痛哭流泪，义愤填膺，遂约学生朱元武赴杭探监，以警示坚持革命到底的决心。后来执教于肃田小学，目睹校长朱晁新横行乡里，恶贯满盈；北伐军光复浙江时曾一度通缉潜逃无踪，清党后即卷土重来，故技重演，勾结反动官府，搜罗地主恶棍为爪牙，敲诈勒索，搜刮民财，以办学校为名，霸占公产，中饱私囊，置教职工生活于不顾。鸿权同志对此十分气忿，常与同事、同学何濂（何朗然）和潜居家乡的刘家泽（曾任国民党（左）义乌县党部组织部长，清党后被通缉）共叙心曲，以鸣不平，彼此结为莫逆之交。

1928年，冯雪峰以执教义乌县中学为掩护，与当地中共党员王樟有共同在城乡从事党的地下活动。这年夏天，傅鸿权和何濂由王樟有、刘家泽介绍参加共产党，并建立畝田朱党支部，鸿权于1929年春任支部书记。鸿权与刘家泽、何濂等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在金华东区的塔江山、低田、浦口、大路

沈、深塘坞等10多个村落，宣传、发动、领导贫雇农组织农会；发展党员，先后在上述村落建立了十来个支部；向地主豪门展开清算斗争。同时常到傅村一带与蒋碧成（蒋山）等同志联系指导工作，为以后金东义西地区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播下了革命火种。

1929年初，鉴于当时交通以船运为主，船工又多为义乌籍人，是交通线上一支革命的主力军，对开展活动意义重大。为了开辟金华城区工作，鸿权同志曾受组织指派，在金华城内从事船工的组织工作。

1929年春，冯雪峰同志等，因遭国民党当局通缉，无法在家乡立足，乃转移上海，执教于左翼的“中华艺术大学”。不久，即函促鸿权等同志，速离险境，至上海艺大工作，旋即投入党的活动。他不避艰险，与艺大广大师生，深入工厂，宣传革命，组织工人革命队伍。每逢重要革命纪念日，他更满腔热血，投入示威运动，张贴革命标语。由于艺大活动频繁，遭到租界当局横蛮干涉，被强行查封而停办。不久，组织上商定借现代中学内附设“现代学艺研究所”，以供前艺大师生作为继续教学和活动的场所。鸿权住宿在所内，虽生活简朴清贫，革命意志更为坚定，革命工作更为积极。不多时，该所同样遭到租者当局查封。

1930年春，冯雪峰同志等为了便于学生继续求学，着手筹办中华文艺研究班，鸿权也参予其事。以洪琛为校长（实际上是冯雪峰、王学文两同志负责），鸿权在教务处工作。这研究班实际上是一个隐蔽的革命活动据点，人员来往络绎不绝，组织聚会不断，最后也于同年冬初遭租界巡捕房查抄封闭了。鸿权身处逆境，但他未被吓倒，反而更沉着坚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战斗。同年秋，组织上另在复兴公园附近里弄内租借

两幢住宅，挂名“外国语专修馆”，以供原有学生秘密活动。10月间，适值刘家泽从日本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日警押送回沪，冯雪峰遂约刘家泽改名刘得华担任专修馆馆长。期间，鸿权与家泽朝夕相处，情同手足。同年寒假，专修馆因经费支绌被迫停办，鸿权遂由同乡、现代中学校校长盛奇品介绍在该校任职。

1932年2月18日下午9时80分，鸿权同志（化名施伯纶）和战友张平，遵照党的指示，在上海旧公共租界静安寺路近哈同路处散发革命传单，并在沿途电线杆上和围墙上张贴和书写革命标语时，不幸被租界巡捕、侦探逮捕，并抄出放浆糊金属香烟盒一只、粉笔三支、传单六张和《赤旗报》一张等物证，当即被扣押在静安寺法租界巡捕房。19日上午9时，被引渡到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等二分院第二法庭审讯。刘家泽和朱元式两人惊闻之下，朝夕不安，毅然敦请名律师史良同志向法庭为鸿权提出正义申诉，并邀请其出庭申辩。史良同志慨然允诺。4月15日下午1时，第二法庭以“危害民国罪”对傅鸿权开庭审判时，鸿权当庭起立，大义凛然，满怀爱国激情，以不惜牺牲的无畏精神，痛斥反动当局破坏国共合作，勾结帝国主义，屠杀爱国志士，义正辞严，震撼听众。史良律师也站在爱祖国爱人民的正义立场上，为鸿权同志的爱国热忱，伸张正义，并大声疾呼要求法庭当场宣判鸿权同志无罪，立即释放出狱。但万恶的国民党反动当局，竟怙恶不悛，强词夺理，擅以“危害民国罪”，遂于同年5月9日判处鸿权同志有期徒刑2年6个月，送交上海工部局监狱执行。8月4日，以所谓“大赦条例”裁定“减处有期徒刑判一年”“减刑结果扣至贰拾贰年拾壹月贰拾捌日期满释放”的决定。监禁期满时，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却于11月30日，以“施伯纶（即傅鸿权的化名）狡猾异常，不将经过情况吐实，言词之间尚未完全觉悟”等为

借口，作出“转送反省院予以感化”的裁决，于12月7日押送江苏反省院执行监禁感化。鸿权在反省院监狱期间，坚贞不屈，革命意志更加坚定。1934年6月22日，反省院第26次评判会议决议“反省期内思想尚无转变，判评结果，察看三个月”，再次被监禁“感化”了三个月。

由于鸿权同志先后在上海工部局监狱和江苏反省院监禁期间，身受国民党特务、狱吏的迫害和非人的狱中生活的折磨，摧残致疾，全身虚肿。最后，不幸于1934年7月10日，被夺去宝贵的生命，壮烈牺牲，年仅31岁。同志们惊闻噩耗，无不悲愤填膺。傅鸿权烈士永垂不朽！

怀念吴琅寿同志

吴 甫 新

吴琅寿同志，是我同乡，也是我的战友。1947年11月17日，在袭击金华县山下施之敌的行动中，为了抢救战友，英勇牺牲，转瞬已40余年了。每当我忆及与他在一起的日子，不禁感慨万千。现特将他高尚品德和感人事迹追忆于下，以抒发对战友缅怀之情。

吴琅寿同志，义乌吴店镇上店村人。出身在雇农家庭，从小生活很苦。在他出生前二个月，父病逝。不久，母因忧伤日夜悲啼致双目失明。后家又遭火灾，只得在同村的表兄沈良福（1937年入党的中共党员）家借一间破屋存身，靠他哥哥吴琅进替人做长、短工挣点米钱，艰难度日。他七、八岁就帮助料理家务，十岁替人放牛。十二岁，母、兄让他读书，终因家境清寒，只念了三年初小就辍学参加劳动。1937年，地下党在该村和离村五里的下宅村发起筹办了民众夜校。他白天劳动，晚上进夜校读书。在夜校老师、地下党员金天静的启发教育下，他懂得了一些粗浅的革命道理，积极要求参加革命。1938年春，他刚满十七岁，由金天静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吴琅寿同志入党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种抗

日救亡活动。配合由地下党掌握领导权的县战时政治工作队，组织抗日农会、开展“二五”减租、减息等斗争，在斗争中成长起来。

1942年5月，义乌沦陷。中共党组织决定建立抗日武装，我与他先后参加了八大队。但不久他调任中共金东区委委员，我留在部队。1943年，组织上决定他兼任金义浦抗日根据地的畈田乡政治指导员。该乡处于抗日根据地前沿，群众基础较差，情况也较复杂，敌、伪、顽军队又常来骚扰，工作困难，任务艰巨，但他毅然接任。由于他能密切联系群众，统战工作也搞得较好，善于团结中上层人士，较快地打开局面，完成上级党组织所交给的任务。不久，他调任金东区中队副指导员，1943年6月，任区中队指导员。

1945年8月下旬，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上级党组织指定他和区中队留在金义浦地区，由他负责坚持对敌武装斗争，后又指定他为中共金华地区临工委委员。他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挑起这副重担。部队刚北撤，国民党二十一师，会同当地的反动武装义乌的南联、北乡的第五大队、金华的邢小显部和浦江的小邦基部，对我根据地疯狂地进行“清乡”、“扫荡”，形势十分严峻。为保存革命力量，根据北撤前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指示，他决定区武装人员暂时回家隐蔽，把武器集中掩埋在他母亲的坟墓里。他和王一虎、李文华（永康地下交通员）三人一起外撤至永康，并很快与中共金华地区临工委书记应飞会合。吴琅寿同志到永康后，隐蔽在当地的地下党员李文华、应康明等家里，改名叫李岩福，学得一口永康话，他待人和气，又很勤劳，同当地群众关系搞得很好。他遵照党组织的决定，来回奔波于金华、义乌、永康等地，寻找失去联系的同志，帮助他们恢复与地下党组织的联系，以继续开展武装斗

争。

1946年10月，临工委决定成立金华地区武工队，队长杨明，我为副队长，吴琅寿任指导员。1947年3月杨亦明调走后我任队长。武工队成立后，面对数十倍的敌人，冒着极大风险，闯到财主、国民党官僚家派粮筹款和缴枪，壮大革命武装。当时我们常露宿野外或住山洞，吃不饱，穿不暖，环境十分艰苦，但他毫不在意，以革命必胜的信念和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激励同志的斗志。1946年11月13日，中共金萧地区特派员马青通知我们火速赶到嵯县东白山，隐蔽待命。我们武工队随应飞、周芝山等领导，经过二天二夜行军，按时到达，并于19日参加了袭击嵯县石璜镇的军事行动。在战斗中，吴琅寿同志第一个冲进敌营房，配合当地同志，顺利地解除了石璜自卫分队二个班的武装，缴获了三挺机枪、三十余支步枪、十余支短枪。石璜缴枪后，我们武工队带回缴来的一挺机枪随应飞回金华地区开展武装斗争。1947年2月间，我们武工队又去建德三都街原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少将处长、当时建德县参议员丰道德家缴枪，丰家隔壁就是敌警察所。琅寿同志分工负责教育和监视集中起来的丰家全部人员，使我们能安全地经近二小时的工作（教育和审问其子、妻），迫使他们交出二支卡宾枪、二支短枪，保证了缴枪斗争的胜利。

1947年7月，中共浙东工委书记刘清扬、副书记马青和应飞三领导带领我们武工队去丽水雪峰与浙南特委丽水地区负责人傅振军、宣恩金同志领导的武装部队会合，议定将金属和处属的武装合并成立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队，统一指挥这两地区的武装斗争。金属地区武装编为第三大队，大队长应飞，大队下设一个中队，我任中队长，吴琅寿同志任指导员。9月间，根据马青同志指示成立金义浦武工队，重新开展金义浦

地区的武装斗争。组织决定我为队长，他任政治指导员。

我们这支仅有6个人6支短枪的武工队一回到金义浦地区后，马青同志就指示我们组织一次对敌军的战斗，以扩大影响和发展武装。经我们周密侦察调查，决定袭击国民党一六四师驻在义亭车站的一个排，并制定了具体战斗方案，上报马青同志。在马青同志指示下，11月13日下午2时，我们这支已扩大到18人但只有6支短枪的武工队，奇袭义亭车站敌军，获得了胜利，缴获了敌军轻机枪2挺、步枪20余支、枪榴弹筒2只和大量子弹。在战斗中，吴琅寿同志化装成伪军官，手持一封假信，带化装为勤务兵的吴瑾，最先接近敌人，解决了门岗，又和我们一起冲进敌营房，他与我各缴获一挺机枪，敌人猝不及防，只有举手投降。吴琅寿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打响金义浦地区武装斗争第一炮，是立了一功的。当晚中共金义浦地区特派员赵之逊，根据马青的指示，宣布把武工队扩编为金义浦人民游击中队，我为中队长，吴任指导员。

义亭车站战斗的胜利，大大震惊了敌人。“浙保”部队会同当地的县自卫总队来金义浦地区，对我们进行“围剿”，他们到处抓人，骚扰百姓。特别是敌金华县自卫总队的便衣队，经常到金华源东乡山下施村，欺压百姓，胡作非为，无恶不作，当地群众纷纷要求我们为民除害。我们根据上级指示和人民的要求，决定对敌便衣队进行一次袭击。1947年11月17日凌晨，我们从山下施村附近的白水坞村出发，兵分两路：一路由吴琅寿带领，在天亮前埋伏在山下施村右侧往沈店村大路边小山坡上，准备打伏击；我带一路，准备待闹市散集后直冲便衣队常来鬼混的赌场。当我这路刚冲进赌场打响第一枪时，吴琅寿同志即下达准备战斗的命令，这时一位新同志在拉出插在腰里的手榴弹时，不慎拉掉了导火线，手榴弹直冒烟，而这同志

却惊呆了，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吴琅寿同志为抢救同志、不耽误战机，奋不顾身，一个箭步夺过手榴弹，想丢往远处，谁料刚夺到手的手榴弹就爆炸了。那个新同志得救了，附近的战友也无伤亡，而我们的好战友吴琅寿同志倒在血泊里，连一句话也未留下就壮烈牺牲了！事后，我们全队同志怀着悲痛的心情，流着泪在丁村买了一口棺材，将烈士遗体安埋在丁阳岭村附近的一个山腰里。

吴琅寿同志自入党后，对党的事业一向兢兢业业，党叫干啥就干啥，从不讨价还价，计较个人得失。党分配的任务，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对敌作战，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艰苦朴素，烟酒不沾，常年累月穿着破衣服。在畷田乡当指导员期间，他向当时在区委工作的莫鑫河借一件旧夹袄过了二个严冬。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常有缴获，他从不私自占用，有衣服先让其他同志穿用或上交统一处理。我俩身边，经常带着部队用的金银和钱钞，每次路过他家，看到他兄嫂生活很困难，他从不向组织要求照顾和补助，自己更从不随意化公家一分钱。

吴琅寿同志安息吧！当年我们为之奋斗的解放事业已取得胜利。我们活着的同志时刻在怀念你，革命根据地人民也不会忘记你！

附：

一首传颂吴琅寿同志的歌谣

这首歌谣，当时在金东、义西革命根据地广为流传，至今未湮没，现抄录于下：

指导员 吴琅寿，英勇事迹真不少。
每次战斗带头冲，结束亲把战场扫。
对待士兵赛兄弟，行军总把背包挑。
休息忙着送茶水，夜深又把岗哨查。
群众纪律遵守好，一针一线不要它。
砍柴挑水帮群众，生活艰苦人人夸。
节约津贴他不用，救济穷人真不少。
提起琅寿指导员，个个称他好领导。

（金华县党史办供，俞龙光录）

记革命战争年代的一位普通党员

——傅鸿善

傅樟清

傅鸿善，金华县寿昌乡深塘坞村人，受弟傅鸿权、妹夫蒋山的教育影响，较早接受革命思想。1928年冬，由我的父亲傅鸿权（革命烈士，1931年在上海被捕，1934年牺牲）、王樟有（义乌人，后叛变）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一心向着党，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了许多值得怀念的工作。现将其革命战争年代的几个斗争生活片段，记录如下，以之告慰英灵。

一、打土豪，闹翻身

1928年7月，中共义乌畈田朱支部，派党员刘家泽、傅鸿权、何濂等在金东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先后在义浦乡塔江山、浦口、月潭、莘村、寿昌乡深塘坞、大路沈等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十来个农村党支部。深塘坞村被发展的党员有傅银弟、傅鸿善、傅良春、傅樟妹、傅延江、傅鸿荷等六人。1928年建立了支部，樟妹为支部书记。他们白天劳动，晚上秘密开会，张贴传单，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开展打土豪、减租减息等革命活动。深塘坞村又小又穷，当时没地主土豪可打，稍有点文

化的傅鸿善、傅银弟就发动群众将矛头对准公常地主，进行清算、减租、减息。那些祠堂执事，怕得发抖，托人求情。六个党员铁面无情地进行了清算、减租等斗争，给公常地主以经济上打击，给受苦群众以经济实惠。他们将“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等革命标语张贴在“香火前”等公共场所（直到解放初还保存这些标语）。革命斗争纵深发展时，冯雪峰、傅鸿权等遭国民党当局通缉，被迫转移到上海。失去了上级党组织领导，金东义西一带刚刚掀起的革命洪流转向低潮。傅鸿善等同志也被迫四处隐蔽，以躲避国民党的追捕。

二、打鬼子，保家乡

1942年春，日寇铁蹄践踏金华大地。经过国内二次革命战争洗礼的金东义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抗日保家乡，纷纷建起游击小组，与日寇、汉奸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人民在斗争中逐渐提高革命觉悟，逐渐形成了从傅村、吴店到上溪、黄山、溪华一小块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这时深塘坞村原来的六个地下党员，有的病故，有的蜕变，有的消沉，傅银弟则脱产闹革命去了。村里的责任，落在傅鸿善身上，他夜以继日地培养骨干，发动群众，建立农会自卫队。七十来户的小村，组织起二十多人的武装民兵，日夜站岗放哨，以防日本鬼子突然袭击。动员了六个青年，参加第八大队或政权工作。全村进行了减租减息，对祠堂公常进行了清算，并改组公常理事。抗日民主革命运动在全村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了。傅鸿善虽年近半百，却兴奋得像个小伙子。1944年端午节，为了庆祝抗日战争节节胜利，他和另一个农会干部傅延月，登台演出了“小尼姑下山（僧尼会）”。两位半百老人笨手笨脚却又神态逼真的表演，常常逗得台下众多村民哄堂大笑。此

时，人们似乎忘记此地是距离鬼子据点仅八华里的沦陷区，而是名实相符的解放区了。

三、为重建八大队出力

鬼子投降，抗战胜利，人民并没有享受和平。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第八大队奉命北撤，国民党将八大队等革命同志家属称为“匪属”。抗日老战士傅洵浒等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田头，傅鸿善因去浦江行医（有祖传中草药治肺癆之医术）幸免遇难，后经开明绅士何文风等人的保护，才得以幸存。屠杀革命志士的血雨腥风，再次使人们懂得，必须以武装的革命打倒武装的反革命。1947年农历十月初一，金义浦三县党的特派员赵之逊，金义浦武工队中队长吴甫新，指导员吴琅寿等十余位同志身带仅有的六支短枪，经过周密准备，出敌不意，对进驻义亭车站的国民党一六四师一个排，发起突然袭击，一举全歼守敌三十余人，缴获轻机枪两挺，枪榴弹筒二只，二十余支步枪和数担子弹、手榴弹。

义亭战斗为第八大队的重建打响第一枪。接着，这支人民武装又到浦江黄宅镇缴了伪警察所的枪，到金华县山下施集市上袭击了伪自卫总队。紧接着，又派出短枪组在金东义西杀了一些作恶多端的国民党特务分子。人民武装频频出击，节节胜利，一时间“八大队回来了”的声威大震，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金义浦三县伪政权十分恐慌，忙请浙江省保安司令部派重兵前来清剿，仅三十余人的人民武装处在敌人步步紧逼境地。在这个时候，掩护子弟兵，避敌锋芒，保存自己，就成了地方党的紧迫任务。傅鸿善又一次义不容辞地担此重任。

1947年农历十月下旬的一个傍晚，伯伯傅鸿善突然约我陪他到下溪大姑家玩。两人冒着冰冷寒风，避过苍头村，直插下溪

村。这时我很纳闷：伯伯为什么一路上很少讲话，而且讲得很轻？在漆黑的夜间为什么不走大路，而要绕过苍头村走田间小路？更为不解的是到了下溪村，为什么不去大姑家而去了一个陌生人的家？我们一进屋，主人似早有准备，热情请坐倒茶。此时伯伯介绍屋主夫妇，丈夫叫傅加良，妻子叫吴宝英，他俩都是地下联络工作人员。只见加良叔走进里屋，少许同时跟出两个人：一个满头浓发、白净皮肤，英俊潇洒的年轻人，酷似一位大学生，要不是腰插快慢机，肩披短军大衣，谁也不相信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义亭、鞋塘缴枪战斗的军事指挥员，后来先担任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第八大队长，后调任第六支队第八大队长的吴甫新同志；另一位是在抗日战争时入党，后任路北县金义区区长傅延长（傅宜）同志。吴甫新向我们简要介绍了当时华东战场形势和当前敌人对他们的围剿情况。接着，由伯伯同我带他们一行三十多人沿小路到伯伯家。队伍先在村旁一古墓边休息，伯伯陪几个同志先进屋，几分钟后大家一起鱼贯而入，住在伯伯家当柴屋磨坊的三间一字形平房里。这里比较隐蔽，前后都有通道，万一情况有变，队伍可迅速退出，抢占有利地形。进屋后，同志们就席地而睡，四五人合盖一条粗布被，生活是够艰苦的。次日，伯伯一早买回猪肉、豆腐等招待子弟兵。尽管伯伯家生活不宽裕，但支持自己队伍从不吝惜，经常有革命同志途经伯伯家，总受到热情接待，直至解放。

次日，我约傅得化等四个青年，去看望自己队伍。吴甫新将我介绍给金义浦党的特派员赵之逊（后又兼任金义县长，1948年8月为叛徒王成所害）。赵之逊向我们讲解了许多革命道理。并一一询问我们情况。这时我们得知参加义亭战斗的沈长春、沈堂良、曹祥、吴瑾、吴琅汉、傅宜等同志都在。次日晚上，部队要转移了。为了考验新参军的陈六弟等同志，几个领导人

事先同伯伯商量，由伯伯进屋谎报有情况，敌人来了。此时虽已深夜，听此突然而来的“紧急敌情”，都从容不迫，迅速行动，只二、三分钟，就带出所有武器弹药，分三组冲出去。当队伍撤到村外预定地点集合时，同志们才知道这是一场演习。

1948年，这个武装中队再次由吴甫新率领来到伯伯家。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自1949年春节前后起，英士大学学生，年仅二十出头的中共金义区委副书记施姬周同志开始经常来往于傅鸿善家。伯伯详细向上级党组织领导汇报工作，请示问题，施姬周同志则向他传达上级指示，布置新的任务等等。白色恐怖下的革命活动，使他俩结成深厚的战斗友谊，一直到解放后，施姬周同志调离金义区委为止。

当时暗藏革命同志是犯法的，将成批人民武装接到家中驻住，必有杀身之祸。人民武装数十人多次住在伯伯家，这事几乎半个村庄的群众都知道，为什么能安然无恙呢？道理在于真正的钢墙铁壁是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人民群众。尽管伪浙保第四大队和金、义、浦三县自卫总队以及其他反动武装上千人的不断围剿，人民武装不仅得以保存，而且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终于配合解放大军解放了金华大地。

解放后、傅鸿善担任村、乡农会主任，直至年老多病退休，并于1965年病故。经过严冬考验的人，特别懂得春天的温暖。解放后，傅鸿善夜以继日地工作自不待说；解放初期，他就亲手将三个刚成年的子女全部送去参军参干，以此表示自己对党的一片真诚。

伯伯傅鸿善的一生，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是一个忠于共产主义

信念的基层老党员。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六日于金华四中

资 料 来 源

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 蒋山回忆

(2) 朱元式回忆 (现住杭州)

(3) 刘家泽回忆 (刘家泽当时与冯雪峰一起，在义乌从事革命活动，曾任中共义乌县委委员。后被捕脱党，并曾在敌军统工作。1949年又参加上海起义，1988年改为离休，1989年病故于上海。)

(4) 傅银弟回忆

二、抗日战争时期：

(1) 蒋山回忆

(2) 傅志忠回忆 (现离休在江西弋阳县)

(3) 作者当时已十五岁，已略知傅鸿善革命活动简况

三、解放战争时期：

(1) 吴甫新回忆 (当时任金萧支队第八大队长后任第六支队第八大队长，现离休金华)

(2) 施姬周回忆 (当时任中共路北县金义区委副书记，现离休金华)

(3) 作者本人回忆

邵飘萍烈士的青少年时代

邵 寿 生

邵飘萍的祖籍是浙江东阳。祖居在离南马乡约十里许北山麓的一个山村里。据说古时这里叫黄毛塔，因明朝时出了一个御史名邵翮，讳紫溪，就改称紫溪村。

邵飘萍的祖父邵煜光是一个“勤劳稼穡”的朴实农民，其妻张氏系山里头庠生张文浩之女。邵煜光后随太平军李世贤部南下福建，不知所终。留有三子，次子坦茂是飘萍之父，字德才、枝香、复堂，号馥斋、似海，学名桂林。邵氏家贫，仅三间土屋存身，张氏靠纺织土布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

邵桂林自幼受到伯父、堂兄嫂的恩育和培养。他从小性颖悟，伯父邵煜滨知其可教，就“饮之、食之、教之、诲之”，视为己子。煜滨之子坦才、媳许氏也视堂弟如手足。桂林能在贫苦家庭中成长起来，是靠伯父和堂兄嫂成全的。桂林廿二岁考中秀才，时他已成家，于1872年娶坟上村贫苦农民的女儿徐珠凤（1851—1944）为妻。由于家贫，无法实现到金华丽正书院就读的愿望。时清廷腐败，国耻日增，亦无意于仕途，就专以教私塾为生。

邵桂林后迁住金华，我曾再三向家父邵伟（系飘萍长兄新胙之子）了解其迁住金华的原因，他说据祖父桂林生前谈起，主要是因贫穷而到金华谋生。而另一原因是回避邵族中大小房

之间的矛盾和争斗（桂林死时，家父已卅二岁，不会误记讹传）。桂林自娶妻后，陆续生有五个儿女，虽徐氏贤慧朴实，很能吃苦耐劳，常帮助人家做些短工以补维持生计之不足，但桂林上有老母，长兄在堂，人口众多，债台高筑，真是家贫如洗。桂林无一身较好的衣服，出身作客，用颜色相近的纸裱糊在衣衫的破洞处。为生活所迫，他有时只好挺而走险，为人当“枪手”（即考试时为人作刀）。为此，他吃了不少苦头，甚至坐过牢。而邵族大小房之间的矛盾和争斗，也迫使他离乡出走。紫溪邵氏是东阳南乡大族，按邵氏宗谱桂林他们属小房。大小房之间由于种种利益关系，结怨颇深，甚至发生械斗。一次，在祠堂祭祖时，长房中有人唆使打手打伤煜滨之子坦才，桂林自幼受伯父及堂兄嫂恩养，敬如父母，因此气愤难平。他自幼习武，学有一身功夫，为不平而常发生斗殴，结下了冤仇。明则涉讼官府，暗则唆使打手行刺，每欲置桂林于死地。为此，他曾隐居在东阳王坎头一带，以教书糊口，历时年余。1884年1月，他已卅三岁，穷困潦倒又打官司，终于负债三百大洋，决定离东阳避祸，到金华谋生。他身上仅有一千二百文钱，带着妻子儿女五人，艰苦跋涉二天，步行到了金华。桂林虽离家，但家中尚有老母和长兄坦楠，为了照顾老母，就将九岁的次子新华留在家里。时长女新女已在王坎头一王姓家为童养媳。紫溪邵氏宗谱载有一篇他学生邵景棠所写的《坦茂公行传》，其文曰：“越数年，迭遭波折，家益窘。……夫子负老母，系妻子，之婺东，假馆宏开绛帐……。”就明确指出他迁徙金华的重要原因。

桂林到金华后，先是借住在金华东市街一位东阳同乡曹祥家里。在曹家住了两个月后，为办私塾，就移居东市街芝英考寓。共招收了十多名学生，伙食由桂林之妻代炊。自此，桂林

才真正在金华扎根立业。

1886年10月11日（农历九月十四日），桂林之妻在芝英考寓生下了第六个孩子，即邵飘萍。桂林在妻临产前夜梦见自己到了金华孔庙大成殿，见庙里小菩萨可爱，随即偷背了一个回来，刚步出庙门，听有追赶声，就背着小菩萨逃，不幸失手落地打碎，醒来却是一梦。因梦游大成殿，故将孩子取名新成。孩子生在戌时（晚上七点到九点），并非夜深人静，由于初到金华，人地生疏，来不及请接生婆，桂林只得不顾当地习俗，自己接生。桂林信阴阳之说，钻研《周易》，平时除教书外，喜欢看风水、排八字。每生一个孩子，以及后来的孙子辈，他都要排八字，算祸福。桂林根据新成出生的年、月、日、时辰为丙戌、戊戌、甲辰和甲戌，就认为“三戌冲辰祸不浅”，这孩子的命运注定要多灾多难，加之生前的不详之梦，就一直为之忧心忡忡。

邵飘萍生下时家境清贫，父亲每天要管教十几个学生，母亲除顾好自己的孩子外，还要为学生做饭，非常辛苦。所以他自幼由其大姊新女抚抱看管。新女原先在虚岁七岁时给东阳王坎头一王姓家为童养媳，常遭婆婆打骂虐待，虽幸得公公心善，时加爱护，但也实难忍受，十一岁（1889年）时，他公公让她带干粮逃回金华，于十六岁时才回东阳结婚。由于邵飘萍自幼受大姊照料，因此姐弟俩感情至深。1902年秋飘萍赴杭州浙江高等学堂读书时，新女曾资助过他，飘萍非常感激其姐，曾多次对汤修慧夫人谈起，解放后汤夫人还念及此事。1917年飘萍把大姐之长女王宝英送杭女师就读，后又携带赴北京入北京平民大学深造，改名王淑娅，毕业后他通过党组织关系将王淑娅送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王淑娅于1927年学成回国时，邵飘萍已于前一年牺牲。

邵飘萍五岁时即随父在私塾读书，聪敏过人。其父对他的教育也极为严格，睡前要背一天读过的书，天未晓就催他起床，如果贪睡就一脚蹬过去，直到他哭起来。偷懒时令其跪地，边朗读边用烟筒击其头部，有时打出许多包块方止。他稍长大，四书、五经、已读过半，能作诗答对。金华知府继良风闻其事，在他八岁那年，派衙役把他带到知府衙门，亲试其才，他随手捡起一个有缺块的古铜钱，令其打一成语，邵飘萍随口作答：“不成方圆”。知府又问读过什么书后，甚感高兴，就赠给他两佰个大方钱及糕点一包带回家。以后知府继良和王姓知县常召去作诗答对，当他们满意时便有赏赐。

邵桂林是个穷儒，家口又多，为了糊口时常到金华农村唐宅、天姆山、石门，兰溪诸葛和衢州等地坐馆，他总随带新成在身边读书，新成是学生中最年轻的一个。有一年在金华唐宅坐馆，住在唐桂燕家里。此时新成久患痢疾，他父亲用忌食荤腥的办法以求其自愈，新成因久痢不愈而更嘴馋。适有人蒸了一碗陈年火腿敬奉老师，桂林舍不得一下吃光放在书箱里，为新成侦知，就全偷吃光。桂林发现后，有点冒火，但面对瘦弱的孩子，没给予责罚。而那天晚上新成却整整泻了一夜，而痢疾却从此好了（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我曾请教飘萍的外甥王石玺名老中医，他说营养不良引起的腹泻陈年火腿可能吃好，金华人早有陈年火腿能治痢疾之说）。新成十岁时，他父在金华天姆山一座经堂里坐馆。有一天桂林外出，嘱咐一个年岁较大的学生代管，父亲不在这就是新成的天下了，他玩够后回到屋里，侧目一看，是一个同学坐在他父亲位置上，他就大模大样的踱了进来，口里说着：“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知所畏也。”此话发自一个小孩之口，同学们无不称奇。后在石门坐馆时，新成把一个同学的书涂了许多字，那同学告知老师，这

下他父亲恼火了，一定要打手杖，后经一年长的同学求情，才关进一间屋子，丢进一本书，要在一定的时间背出指定的文章。有一个同学叫倪惠卿的，素知老师说话是算数的，深为他背不出而担心，数次到窗下劝其狠读，但新成只把书翻来复去，若无其事，等到叫背时却一字不漏。有一次，一批邵桂林的学生应童子试，大凡应试之年，考生云集金华府。这些学生借住在芝英考寓老师家里。这年应试的题目是“兵革”两字。考后大家都在议论各自得意之作，不时发出笑声。正在这时突然传来了笑声，“你们作错了”。这声音来自门口衣着平常、头上梳根小辫子年方十二岁的新成口中冒出来的。这句带有轻视性的话，使这些考生有些发呆了。内中有个叫思藻的简直冒火了，“你这个小鬼知道个屁！”但新成并不畏缩，而且踱了进来，口里还滔滔不绝的讲述见解：兵革者军备也（据辞源“兵革”一辞泛指军备或战争之意）。这些考生由于不切题终于无一人考中。

邵飘萍十三岁那年（1899年），他父亲鼓励他去应试，并取得学名锡康。考官根据他的成绩本可取第一名，为顾及他年幼中考而骄傲就定为第十名。金华知县又赐名镜清，以后他改名为振青。十五岁时由他父亲陪同到紫溪邵氏宗祠开贺并拜祖，祠堂中赏以银元80元，邵飘萍父子携款步行到佛堂拟乘船回金华。此事引起紫溪一帮青年人的不服气，疑其中有诈，几个青年随后追至，向邵飘萍索要银元，飘萍并不计较，将银元交回给几个青年人，空手而归。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回东阳祖居。这次回祖居却留下了若干墨迹，他给堂侄贵禄写了一付对联：“待其酒力醒茶烟歇，可以调素琴阅金经”。又给堂叔写了一付对联：“汾阳大富贵亦寿考，虚陵蓄道德能文章”。

在1889年到1902年期间，金华有位知名人物张恭（1877—1912年），早年中举，富有民族革命思想，与同乡志士组织龙华会，后龙华会与光复会联合，张恭任光复会分统。张恭为人有胆识，谈吐豪爽。张恭是举人，飘萍是秀才，同在一个县城，故有过密切交往，同时都具有进步思想常引起共鸣，后来成为知交。1912年邵飘萍在杭州主编《汉民日报》时，张恭曾到报馆看望过飘萍。通过张恭的关系，飘萍和秋瑾、徐锡麟等人也有通讯上的联系，秋瑾被捕前还曾写信给邵飘萍，但信收到时，秋瑾已就义，飘萍叹息不已。一次张恭秘密入城活动，为清府、县密探发现，追捕甚急而城门已关闭，惶惶逃遁，适为飘萍之父邵桂林所见（时邵家已移居花溪考寓），当即引避对面一荒园柴火堆内，入夜桂林与其长子新胙用梨篮和绳索从城墙下放至城外而脱险。辛亥革命后，张恭任金华民团长，一次邵桂林携壶上街打酒，适遇张恭，张恭就一把拉住邵桂林说：“你是我真正的朋友”，即请进民团驻地火神殿，当张恭款待邵桂林时，邵想起一把酒壶还忘在门口窗台上，急着想去拿酒壶，张恭笑着说：“不要紧。如果丢了赔你一把金酒壶”这则轶事是由邵桂林亲自对他的子孙们讲述而流传下来的。

1902年秋，邵飘萍由大哥新胙陪同从兰溪乘船赴杭州浙江高等学校读书，其时家贫，费用是从金华王兴泰商店借贷了一百元。到杭后新胙由陆路步行回金华，途遇一条山沟有几条鲤鱼在游动，他即下水捕鱼，因山水冰凉，旋即打了一个寒颤而感身体不适，回家后病情加重，不久即病逝，飘萍闻之甚为悲痛。

邵飘萍进高校后，致仕的念头均已烟消云散。他接触到许多书报杂志，眼界顿时开阔起来。他很喜欢梁启超的文章，并刻意模仿。从报刊杂志中他明白了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之争，

有一次他作文痛斥张之洞的“劝学篇”而受到校方严斥，由于他多次把自己的新思想写进考卷中，险被学校开除。他在浙江高校读的是文科，学杂费、伙食费均自理，他常不去上课而以自学为主。他在高校的同学有陈布雷、张任之、邵元冲等，在《陈布雷外传》中有一段记载：“陈布雷与邵振青每日几乎有一小时离开课堂，在寝室或操场空地上自己读书，所读以文学、史地笔记小册子为多，涉猎广泛。”陈布雷在回忆高校时亦有一段文字：“余此时面颊园满，同学戏以面包孩儿呼余，忆为邵振青所开始，由面包而Bread，再由译音而改为布雷。”由此可见，飘萍在同学间亦善于调侃戏谑。飘萍最早的新闻活动始于浙江高校，据张任天老先生回忆：他与邵飘萍、陈布雷等是在浙高时同班同学，高校开运动会时，他们三人不喜欢运动，没有参加竞赛项目，但又不甘寂寞。于是3人一合计，就办了个《一日报》，由陈布雷任编辑，邵振青和他为访员（记者）。共出了20余期，当天油印出版，分发老师、同窗和社会名流，很受大家欢迎。在高校时期，邵飘萍为上海《申报》、杭州《汉民日报》司地方通讯，以激烈的言论揭露土豪劣绅之恶劣行为。时在报刊上不断讨论科学救国、维新救国、革命救国等主张，飘萍认为要从唤起民众着手，报纸对国家和人民的作用很大，由此萌发了新闻救国的思想。邵飘萍有感于父亲与长房多年结仇，曾写信劝说父亲“君子不以族为仇”，并主动写信给长房有关子弟。当时长房也有不少子弟在外读书和工作，飘萍主动与之交往，随着岁月推移，其仇遂解。

1908年秋，邵飘萍从浙江高等学堂以优等毕业回到金华。当时金华中学堂校长、京师大学堂毕业的义乌人胡敏时非常赏识邵飘萍，聘他为该校文史教师，同时又在长山书院、金华师范兼课，每月工资及稿费收入二百多大洋，因交游甚广，常入

不敷出。这一年，由父母作主与金华苏孟乡朱店村农村姑娘沈小奶（1891—1922）结婚。结婚时男方没送彩礼，女方没陪嫁，新房里放着一张旧床和几样家俱，女方也并不计较，他们的新房在金华游宅街。但这段婚姻却留有一则趣闻：结婚前飘萍常去岳父家看望未婚妻，见小奶缠着足就劝她放足，小奶思想有顾虑。有一次他看到小奶的缠足布竟拿了刀砍成数段，小奶就从此放足了。婚后不久，小奶产下一女婴，取名娇娇，即长女乃贤，后为郭根夫人。

金华中学酒坊巷教堂附近，门口有高台阶的一座平房里开有一家小照相馆，主人姓汤，江苏吴县人，早年在幕府当过师爷，只有一独生女儿名汤修慧（1890—1986）。飘萍因常去照像而逐渐熟悉。飘萍父桂林为怀念长兄坦楠无嗣，遂将飘萍过继坦楠为子，当时习俗，一子承祧两房，每房可各为其娶一妻，因此，在1910年由双方父母作主邵飘萍又与汤修慧在汤宅结婚。家俱等均系汤宅旧物，由邵家送去若干只鸡、肉类及蔬菜以置备酒席。飘萍与汤夫人相处和谐，有一则趣闻可资佐证。他堂弟邵逸轩曾送给一幅猛虎图，有一次汤夫人将这幅画取下来挂在房门上，引起夫妇之间一番戏谑。原来汤夫人思想较解放，性格开朗中带有几分幽默，她的生肖属虎，飘萍属狗，挂画之举，寓有“以虎克狗”之意。飘萍见了，领会其意，就哈哈大笑起来。飘萍在家庭成员之间还善于调解纠纷，有一次年轻守寡的大嫂与二嫂吵架，大嫂一气之下去东关经堂尼姑庵当尼姑，当他获知此事后，立即背了一袋大米奔向经堂，好在嫂尚未削鬓，他将一袋米赠送老尼，将大嫂劝慰护送回家。

飘萍是文史教师，课上得特别好。他以激昂的爱国热情讲课，常以历史典故为国家的兴衰大发感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

一天窜入《汉民日报》纵火破坏，刚把火点着，即被报社人发现，迅即扑灭。一次飘萍刚完成一篇稿件，出门散步，没走多远，一群流氓前来纠缠，其中一个冲向飘萍，故意将他眼镜撞落在地，以挑起事端，好动手打人。飘萍不为所动，泰然自若地将眼镜拾起来，放进口袋，拔脚就走，临行还向他们拱手说“对不起”，流氓们无法下手，只得作罢。邵飘萍在《汉民日报》期间，曾亲撰不少评论文章，光在近年来出版的《邵飘萍选集》上下卷收入的就有64篇（从1911年11月24日至1912年5月13日）。二月革命事起，邵著论攻击军政执法处处长许畏三甚力，并与稽辅臣等一般人有所谋略，在1912年在杭州会见过孙中山先生和黄兴。据邵飘萍自己说：在办《汉民日报》三年间，日与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逮捕三次，坐了九个月的牢，最后《汉民日报》被袁世凯电令封闭。1913年春二月革命失败后，袁的势力伸入浙江，以邵飘萍参加二月革命为借口而逮捕了他。据祝文秀回忆：狱中昏暗潮湿，臭虫很多，飘萍在狱中无事，就弄来了一张纸，将一只只臭虫抓起来，等狱官提问时，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讲”，飘萍回答说：别的还可以，就是这些东西使人不得安宁，请你看看。说着就把纸打开，把臭虫撒在狱官面前。飘萍从狱中带出消息，嘱夫人汤修慧设法营救，汤日夜奔走，始获释。时《汉民日报》已封闭，无事可做，曾执教于杭州女师，汤修慧亦在女师就读。不久即转赴上海，从1913年3月到1914年1月这段时期内，飘萍为上海《申报》执笔，这段时间收入《邵飘萍选集》的杂评有16篇，其中有关于宋教仁被谋杀案的评论3篇。

1914年春，邵飘萍曾从杭州骑一匹白马回金华探视双亲，当时有4名武装人员护送，到金后护送人员即返杭，这是邵飘萍最后一次返回金华。在金华逗留时期，金华地方法院，金华

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均设宴欢迎，他忙于应酬。有人对他说：你和督军很熟，要个县知事当当不难，飘萍嗤之以鼻。不久由其父邵桂林及夫人汤修慧陪同从兰溪乘船回杭，路过兰溪时，兰溪县知事曾设宴欢送。1914年冬，为避袁世凯通缉，从上海到日本留学，踏上了新的征途。

飘萍到日本后，进入政法学校就读。斯时他既非官费生，家中又无力负担，只得靠半工半读维持生计。他与同学潘公弼及东阳某君三人组成东京通讯社，专司东京通讯，靠稿费维持生计。当时他住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福田公寓的一日本警官家里。飘萍东渡时原欲与夫人汤慧修同行，当时因汤在杭女师就读而未能同行。不久汤患病，经济发生困难，致书飘萍求援以治病。但飘萍在日本经济上也十分窘困，在几封用日本东京通讯社信笺给他夫人的复信中，曾提到甚至交不出下个月的伙食费，但亦向夫人表明了自己的志向，其中笔者见到的两封信中提到：“弟以傲骨天成，岂能寄人篱下，故唯有勉励所为，欲以新闻记者终其身，世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君亦赞成否？”因夫人生病，他写信说：“曰随波逐流同去附和，弟宁死不能为此，”把身边仅有的一只金戒子寄回，作为治病费用。邵在日本与孙中山、黄兴、陈英士、黄膺白、陈友仁等中华革命党人相稔熟，与李大钊、章士钊也在日本时相识，章士钊在回忆这时的邵飘萍说：“温温一美好少年”。飘萍在东京通讯社向国内发回大量东京通讯，报导东京华侨和留学生的反袁斗争情况，这些消息传到国内，如火上加油，推动国内反袁运动。时日本与袁世凯秘密谈判“二十一条”，这是在极其秘密情况下进行的。时隔不久，外国报纸有揭露其真相者。飘萍立即驰报国内，国内舆论大哗，全国人民陷入极度愤慨之中。邵以首先在国内揭露“二十一条”而驰名报界。

1916年春，上海新闻界为了加强反袁力量，电邀邵飘萍回国，飘萍怀着新闻救国的志愿匆匆返国（他最后一篇东京通讯社发的稿件为东京外交要闻（十四）载于1916年3月23日《申报》，回国时间是在3月下旬），被聘为上海《申报》、《时报》、《时事新报》主笔。1916年7月邵飘萍接受《申报》聘约担任该报驻京特派员，他是中国报纸有特派记者称号的第一人。这一年他刚好29岁。自此，他就在北京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一直到壮烈牺牲。

后 记

本人曾于1984年写就《邵飘萍家世及其青少年时代》一文，刊登于《东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1985），文中许多内容已为邵飘萍的研究者和传记作者广泛引用。近年本人重新参阅有关资料，在进一步查访中发现了一些新的资料以及原作上个别误传和年代推断上的错误，故补充、更正后重新整理成本文，以求对邵飘萍的青少年时代有个较为完整的记述，供研究者参考。

本文主要根据曾与邵飘萍在同一大家庭中生活过的家父（飘萍之侄）邵伟（1900—1987）、伯母（飘萍侄媳）申阿鸾（1900—1986）、飘萍外甥王石玺（1911—）、庐雪生（1915—）及许多邵家亲属提供的资料整理，并参考了祝文秀、旭文、胡星寿等人的文章及紫溪邵氏家谱，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我所知道的周百皆

严 金 明

(一)

1935年秋，我刚从金华中学师范科毕业，校长方豪介绍我到杭州浙江省立贫儿院当教员。记得是1937年上半年，一天，杭州师范的一名教员来找我，他叫周百皆，金华人。我从未出过远门，常思念家乡，听到乡音，分外亲切。不久，我俩就成了朋友。

周百皆在杭师教英语，他精通英、俄、日三国语言，知识面很广，社会科学知识特别丰富，使我羡慕、钦佩、尊敬。我常把他当老师。和周百皆几次交谈后，我逐渐懂得一些革命道理。才知道金华一带因循守旧，思想落后，七中政治空气更是闭塞。他和我谈的听起来都是新鲜的。尤其是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周百皆约我到西湖龙井一带玩了一天，在这天里，和我谈得更多，使我懂得更多的革命道理。这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有意在培养我。

抗日战争开始，1937年11月，嘉兴沦陷，杭州告急，人心浮动。学校机关相继撤离，民政厅对其所属贫儿院竟招呼都不打一个，早已自顾自逃到方岩去了。

贫儿院院长李次九，在杭颇有声望，但已七十多岁，他怕

搬动，对迁校迟迟不作决定。急得贫儿院师生如热锅上的蚂蚁，既不愿留在杭州当汉奸，又不愿把贫儿院丢掉不管。正在危急之时，周百皆匆匆赶到。他下命令似地对我说：“你们必须马上撤离杭州，越快越好。先到金华，选校址离交通线要远。”又在我肩上拍拍：“挑起担子，立即行动，莫怕困难！”他一番催促，鼓起了我的勇气，我就向李次九提出具体建议，李终于同意我们搬迁。于是在兵荒马乱中，贫儿院匆匆迁移到金华。

贫儿院搬迁，先到金华城。这时我们还没有确定该向那里搬。船傍岸，我即去找周百皆。他住在四牌楼恒达百货商店右首一所平房里（即今解放东路44号弄内）。家中只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向她问周百皆，她不很听懂，只说这是周策的家。原来周百皆在家里叫周策。

周百皆对我说：“金华也不是保险的地方，将来可能还是会沦陷，你要找个比较好的山区，准备将来打游击。”于是我多方访问，最后确定了灵岳乡里郑村。

贫儿院迁到里郑，得到了黄宾虹妹妹、当地小学校长黄乃耐的帮助，很快安顿就绪，正式上课。以后周百皆约定每星期都到里郑来联系一次，每次都按时赶到。金华到里郑五十华里，往返一百里，全靠步行。他的时间观念特别强，从不误时。这种工作精神，使我深深感动！

我介绍他和员工一一见面，他对什么人都很亲切，人家都很乐意和他接近。晚上请他到村外石桥上和全体院童讲话。这石桥两边石栏干很阔，胜似长凳，桥上干净平坦，能容好多人，夜间就成为我们的室外课堂。

周百皆畅谈抗战形势，说得大家都欢欣鼓舞，抗战信心倍增，似乎已看见了胜利的光明前景。十来个旁听的农民，也听

得很开心。夸周先生说得好。当他们知道周先生到里郑往返每走一百里时，无不表示尊敬。

有一次他来里郑，第二天东方透白时，催我起床，陪他到野外散步。走到僻静处，立定问我：“你和方豪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们的校长，我是他的学生，大概是因为我当过学生自治会主席，比较熟悉，所以给我介绍工作。没有别的关系。”我一边回答，一边在想，他无故提这种问题做什么？

他又很慎重地对我说：“为了保证抗日的胜利，我们必须把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如果仍是一盘散沙，我们只有亡国、灭种！没有出路！”这道理，当然我也懂。

他继续说：“蒋介石一贯怕抗日，现在被迫抗日也不坚决。所以一切抗日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才能真正发挥抗日作用。才能最后取得胜利，达到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人民自由的目的。所以我希望你参加中国共产党。”他看着我在思考，观察着我的反应，又补充说：“我们的共产党是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不是冒牌的。是真正抗日的，是为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党。”

我原以为共产党离我们遥远得很，谁知眼前就有。有人说她好，有事实，我相信；有人攻击她，不符事实，我反感！我是以是否爱护自己的国家民族，来作选择标准的。只要是真正抗日的，能救国的，我就赞成。死，我不怕。经过周百皆详细讲解以后，我坚定了对共产党的信念，马上提出申请入党，并被批准。

（二）

我参加党以后，组织生活要到金华城里过。会议地点设在周百皆家里。一共三人，还有一个叫黄中美，他俩和蒋经国都

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周说黄是研究秘密工作的。

党小组长是周百皆。他讲了国内外形势，黄中美补充了一些当地情况。

黄中美的公开身份是两浙盐运处的一个什么官员，他有一个勤务员，叫老刘，湖南口音，周百皆的生活也由他照顾。

周百皆说：“金华，是日寇必争之地，国民党军队无力固守，如一旦沦陷，各单位只有退到南、北两山，我们也只有凭借南北两山的天然形势打游击。明天我想到南山转一下，看看情况。”我们当然赞成。

第二天，我们从里郑出发。陪同他一起去的，除我外，还有我的好友项金土。

项金土，金华孝顺镇后项村人，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他追求真理，如饥如渴；找寻党组织，如痴如狂。这次巡游南山，与群众接触交谈中，有几次他谈话太暴露，欠妥当。后来周单独对我说：“现在是国共合作，看起来形势大好，其实，在大好形势的覆盖下，暗中的斗争，非常尖锐。项金土讲话没有策略，容易暴露，容易出事，需进行一段时间的党外教育，对他的吸收，暂缓一步。”谁知项金土性急如烈火，他变卖了一些东西，凑集川资，把年幼的弟弟妹妹三人交托给我，于1938年9月，通过民先的组织介绍，直奔武汉去了。不久又从武汉转到延安。到延安后，项曾写回来一封信，说已参加抗大学习，改名雷雨。以后又从河北省行唐县来了一封信，说已分配工作了。通信地址是“河北省行唐县陈庄镇一心堂药号雷雨收”。从那信以后，一直没有信来。

我们到南山山区的路线，是计划从里郑，经龙潭下、义乌廿八都、小加庾、让河街，回到孝顺。一路上没有闲情去领略那雄伟壮丽的山景。周百皆随时要和碰见的老百姓攀谈，问地形，

问生活，连老百姓家养几头猪都问。我和项金土不懂什么，好象只是在做他的警卫。

路过一个村庄，记不起村名了（据查是义乌赤岸镇神坛村），周百皆说冯雪峰在此，他要去访。冯雪峰是有名的作家，我也想见他一面。冯中等身材、瘦瘦个子，戴顶毛线小帽，粗布长衫，非常朴实，请我们到里面坐。他家里人正在忙着包馄饨。周和冯两人谈得很起劲，从抗战形势到国际形势，从国内形势到本地情况，从谈话中看到他们交情的深厚。很快他家人已在每人面前都摆上了一大碗馄饨，可他俩的谈话，还舍不得暂停。离别的时候，冯雪峰送我们到村外还要再送，依依握别！真是风沙里的骆驼，当风沙越猛的时候，靠得越紧。听了冯雪峰的谈话，我也舍不得他离开。

过义乌廿八都，经小加庾再到让河街时，听说一姓杨的已在组织游击队，并在吸收人员。周百皆了解了一些情况，没有去访问他们。

周百皆原想找让河街有名的乡绅何茂钟谈谈，可能周想激发何的爱国思想，解决经济问题。但又变了卦，他说：“何不了解一下我们，表面应付，浪费时间，以后再说吧！”于是我们就经孝顺，再回里郑。

周百皆在里郑和附近各村，做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工作，以采用座谈的方式居多，我在各村都有熟人，周经过我的介绍，人家就分外地尊敬了。做群众工作，周百皆有一套，旁听的人越来越多。有时也通过保长，找了一些人来。座谈的效果很好，有的群众坚决要组织游击队。我想如果要成立游击队的话，马上可以成立，三五十人不成问题。周百皆批评我：“我们的工作，才做了一点点，不仅对群众的影响范围太小，思想也没有巩固，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其实，成立游击队，我是有思想负担的。不会开枪、不会练兵、不会指挥作战，我还有什么用？周百皆笑了：“你真傻，什么都靠我们自己，能成得了什么事业呢！将来人多了，各种各样的人才都会有，只要我们把游击队组织起来，领导问题，新四军会派人来的。你可以当文化教员，政治指导员，文艺工作者，或搞宣传，搞后勤，人缺得很，来几十几百都要，何愁你一个人没有工作？”我思想上的疙瘩解开了。

（三）

1938年初，成立了“金华县抗日后援会”。周百皆是金华人，组织上叫他到抗日后援会争取一席。后援会的主任是金华县县长王力航，副主任是县府秘书黄××。（江山人，军统分子，）还有一个副主任就是周百皆。成立抗日后援会的同时，还要成立政治工作队。周百皆发动地下党党员和进步青年尽量参加，并叫我也参加，贫儿院工作由在院老师许为通等负责。在周的动员下，我参加了，一起参加的还有李树华、施坤炉、施忠贤等五六人。

参加政工队要经过考试，主考官是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录取的人都要到金华罗店北山小学黄绍竑临时住处，由黄绍竑作个别谈话。

政工队要受一个月的政训，主要科目有精神讲话，（由各部门主管官员负责），歌咏（由18集国军宣传队麦新负责。麦即大刀进行曲的作者），军事训练（部队派人来），游击战术（周百皆负责并发油印讲义）等。

政工队内部矛盾重重，主要负责人名义上是县长王力航，实际工作是秘书黄××，他想排除异己，独揽大权，千方百计要排挤周百皆。周则常在大会发言中指责他们的缺点和错误，

颇使他们难堪。矛盾愈演愈烈。有一次，黄组织他们的爪牙，在周讲话时，有意发出怪声，向周发难。地下党的政工队员，因人数少，突然出现此情况，束手无策。中立派则坐观成败，一言不发，使周百皆陷于孤军奋战的情况。

政训结束了，我和李树华被分派在第三分队，驻在雅畈一个祠堂里，和洪流、洪荒、金菊如、陆田等在一起，洪流是队长，我担任副队长。他们各方面的水平都不比我低，我影响不了他们，而且驻雅畈以后和周百皆见面不方便，贫儿院的工作又不能完全丢开，因此我回到里郑贫儿院。

(四)

1938年5月间，我在党小组所规定过组织生活的前一天，有事到金华。周百皆连连拍手说：“真巧，真巧，我正想你早一天来，苦于无法通知，你来得真巧！”我感到意外，忙问：“有事吗？”他拿了一封信给我看，信中催他早点动身，到江西赣州去工作。信末的署名是“热冰”。“热冰”是谁？他说“热冰就是蒋经国，蒋介石的大儿子，我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他在苏联公开发表文章骂他父亲蒋介石，表现积极，现任赣州专员，要我去帮助工作。已经由长江局批准，同意我去，並决定明天动身，所以说你来得真好！”

晚饭由黄中美请客，到一家小菜馆，为周百皆饯行，邀我作陪。晚饭后，回周百皆家，开党小组会，并交代我转移组织关系的联系方法。会后周百皆收拾行装，我和黄中美协助。

次日，送周百皆起程。我按指定的方法，与地下党的领导人张文岑取得联系，并陪他一起到贫儿院。张只看了一个大概情况，没有和学生讲话，周一走后，打游击的计划成了泡影。

周百皆到赣州以后，一直没有信来，听说他很忙。蒋经国

调离赣州以后，周百皆的情况仍杳然无闻。一直到1946年的下半年，东南日报上有一则豆腐干般大小的花边新闻，题为《烽火中的幸运儿周百皆》，说他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被俘后释放，平安回家。到1947年春，我们才见了面。八年的阔别，我对他表示了深切的怀念！

据周百皆自己说，他在赣州专员公署，是给蒋经国当秘书的，协助蒋做了些计划工作。以后曾参加抗日远征军，当炮兵团团长，远征到缅甸。抗日胜利以后，他离开部队回国。回国有许多人，人家都携带了些贵重物资回来，他只带干粮和食品罐头。因为没有飞机，必须翻越重重山岭才能回国。那些携带珍贵物资的，不是带到半路丢掉，就是回不了国。他的行囊愈走愈轻，得以安全回来。回来以后，叫他去长春市当教育局长。长春解放了，军管会把反动政府的中高级官员收押审查，他把组织关系说了，优先释放，所以就出现了东南日报上《烽火中的幸运儿周百皆》那则新闻。

(五)

周百皆自长春回来以后，即着手在金华办丽泽中学，被公推为理事长。学校聘请宋文翰为校长，地址选定在金华城义乌门内。宋文翰是有名的老教师，所以丽泽中学也办得很有起色。记得是1947年秋开学的。1948年，蒋经国要他到青年军去工作，他未去。1949年1月，周带我到杭州狮虎桥，我问他找谁？他说找蒋经国。但迎出来的屋主人却是王世杰。据周说，也是留苏同学，蒋经国的朋友，据王说，蒋经国已全家搬走了。王不日也将搬走。从那次和周百皆一起以后，一直没有消息。据有的朋友说，周带了他的爱人朱戈和小孩子已去上海，在上海北新书局编译外国著作。

凌凤梧与狱中的方志敏

方正 俞龙光

编者按

本文是根据作者凌凤梧生前口述、死后所遗文稿及方志敏夫人解放后曾和凌会面并有信件往来等事实整理写成。

关于方志敏烈士文稿从狱中辗转传送出去的经过，多种书刊报章有过记述，但对送稿人及经过始末，众说不一。近来一些报刊多说是由胡逸民转送给鲁迅的，这一说法的来源都是根据胡逸民一己之口述。

现存方志敏夫人解放后给凌凤梧的信，虽未提及文稿转送的问题，但这些信件往来及会面的事实，说明烈士夫人是深知烈士在狱中时和凌凤梧的关系的。这些佐证，说明凌的所说，绝非无根据的影响之谈。刊载此文，供研究者参考。

方志敏同志在狱中的半年间，为后人留下的文稿有十三篇，约14万字。其中有一封未具收信人姓名的《遗信》，信中说：

为防备敌人突然提我出去枪毙，故我将你的介绍信写好了。是写给我党的中央，内容是说明我在狱中所做的事，所写的文稿，与你的关系，你的过去和现在同情帮助革命的事实，由你答应交稿与中央，请中央派人与你接洽等情。写了三张信纸，在右上角点一点作记号，另一封给孙夫（手稿上缺“人”字），在右下角上下都点了一点，一封给鲁迅先生，在左下角上点了两点，请记着记号。

请你记住对我的诺言，无论如何，你要将我的文稿送去，万不能听人打破嘴而毁约！我知你是有决断的人，但你的周围的人，太不好了，尽是一些黑暗朋友！只要你向光明路上前进一步，他们就千方百计把你拖转去两步。他们不要你做人，而要你当狗！就是你的夫人，现在也表示缺乏勇气，当然她还算是她们之群中一个难得的佼佼者。大丈夫作事，应有最大的决心，见义勇为，见危不惧，要引导人走上光明之路，不要被人拖入黑暗之潭！

晚间蚊虫咬人很利害，你家有没有多余的旧帐子？有，即给我一床；没有，我想托人去旧衣店买一床价贱的纱帐。

即致

敬礼 高的廿元，想不到办法给他吗？

（注：着重点是原有的。）

这封遗信，是写给谁的？对此，张知著的《方志敏》（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年1月版）一书中作过说明：“这封《遗信》，没有写明受信人的姓名。据查，是写给凌凤梧的。凌凤梧，浙江人，是敌看守所的秘书，还代理过几个月的所长，挂上尉军衔。”

凌凤梧，字吟秋，生于1898年，金华县孝顺镇人。早年毕业于上海文森氏英语专科学校，后又进上海法政大学攻读。毕业后在浙江桐庐县政府任科员，后在县法院任书记官。1934年，在桐庐县法院离职后，去江西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先是任书记（缮写工作），后调任看守所代理所长。

方志敏同志是在统率先遣队北上抗日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优势兵力的围袭而不幸被俘的。于1935年2月，移送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前隶属于蒋介石行营），关押在北营坊看守所，当时的所长姓钟。不久，凌凤梧接替任代理所长。方志敏同志是国民党政府的“要犯”，其时，已由三等号子移入“优待号”。“优待号”，单人独间，主要是关押国民党要员和富商的，当时犯了事的国民党航空总署署长徐培根和受袒共嫌疑的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监狱长胡逸民等也关押在这里。方志敏虽移入“优待号”，但他是“优待号”里唯一带着一副十多斤重镣的“优待犯”。他的“优待室”安排在看守所长和看守员住室之间，对面是看守所办公室，戒备森严，其言行均受监视。

凌凤梧首次与方志敏接触，是在他任代所长后不久，是因方提出减轻脚镣的要求而进囚室见面的。这次短暂的接触仅谈及减镣问题，面对方给重镣压得红肿而带有血痕的双脚，凌当即表示为其设法请求，并请方写一要求减镣的笺条。当天下午，凌去军法处找姓曹的处长，给方提出要求减镣，未获准。第二天上午，再次找曹，在凌表明负责不出问题和有利于劝降后，才获准。凌回所后即令看守员黄克明（金华县塘雅人）给方换上了一副最轻的脚镣。在减镣后的第二天下午，凌再次去囚室，一见面，方就对减镣表示感谢，且说：“我知道你很关心我们难友们的生活，连看守勤务都说你好。你来了没几天，在狱粮方面就没有煤油气和细沙了，使难友们能吃得下饭。过去，管牢狱的人，都巴不得犯人吃不下饭，好克扣囚粮。你能注意这点，就是清廉的表现。希望今后对难友们的生活，在可能范围内多多照顾。”凌表应允，并说：“方先生今后对生活上有什么意见，不妨由看守勤务叫办公室上士文书高家骏面谈转达或直接招呼我面谈。”方听后说：“那是好极了，你有事请便，我们下次再谈”。

通过两次接触和侧面探询，方志敏对凌的为人有所了解，主动通过高文书约谈。凌凤梧在接任代理所长时，上司原曾指示他劝降。因此，后来凌又多次到囚室与方会面。经过多次接触交谈，凌不但没有说服方，反为方所感化。凌原出身在书香门第，在官场混了几年后，面对社会腐败、官场丑恶的现实，加之在官场不得志，早已愤世嫉俗，满腹牢骚。所以，当方历指国民党用人唯亲、腐败不堪，共产党爱国爱民，并指责国民党反共不抗日等事实时，凌听后感信服。连刘珍年、徐培根那样的国民党要员都对凌说方志敏率军北上抗日是有功的，凌哪里还会再去劝降呢？！特别是当方说起“我看你是忠实人，连胡

逸民也跟我说起你很忠实。我们共产党一向尊重忠实人的，可是国民党就不是这样，忠实往往要吃亏。”这使凌很有触动。一次，当凌谈起在看法学丛书，想改良狱政、办好监狱时，方指出在国民党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而实际上凌也原已感一筹莫展，听后确感有道理。方还劝凌不要醉心官场，他说：“我看你是个求学问的人，不是做官的，还是当个教员，做点学问，这样既能养家糊口，也能为人民做点好事。”这话使凌从中也得到启示。特别是方志敏同志不为威武所屈、富贵所淫的高风亮节，使凌十分钦佩。方志敏自移入“优待室”后，国民党当局几乎每天都派人来劝降，上至顾祝同、省党部书记、司令部大员，下至方的故交、亲朋、同窗都被动员来劝降，但均未奏效。甚至蒋介石屈尊来监狱，亲自诱说，许以高官厚禄，方不为所动，严词拒绝，并说：“谢谢蒋先生，我的生命只有三十六岁，你赶快下令执行吧！”停了一停后又补上一句“快下命令吧！”方志敏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更使凌感动。凌凤梧就这样在方志敏的启示和感召下，逐步觉醒，与方的关系也日渐密切，终于滋长了同情革命的思想。

嗣后，凌凤梧利用工作之便，冒风险，帮助方志敏。先是为方借书报，传递消息。就是在受嫌调回军法处后，还将蒋介石密电（即蒋指令顾祝同等劝诱方投诚的密电）偷抄出来交高文书给方；当方表示如在几个月内不执行，想多写点东西时，凌就提供写文稿用的笔砚纸张（公开场合说是令方写“自首材料”）；当方给信需要蚊帐和还债时，凌就资助他二十五块银元；在日常管理上也尽量给方以方便，方的囚室白天不上锁，他可以利用各监号集中在露天吃饭时，站在门口，等难友走过，将事先准备好的笺条授给他们，增强他们的斗志。一次，看守勤务在普通监垃圾桶里发现一张写给李自珍和张宪中的笺

条，凌认得是方的字迹，不予上报，给予庇护。狱中难友刘文保之妻，时常送饭菜等食物给其夫，有好吃的刘总叫送给方一些，天冷了，还把一床破被单补好给方，所员黄克明向凌反映，凌也未加干预。更重要的是会同高文书共同帮助方将部分遗稿送出，并支持方准备越狱。

高文书，即高家骏，又名高易鹏，毛锦生系他的化名，浙江绍兴人。学生出身，在杭州当过店员，因找不到生活出路，到南昌参加军法处招聘缮写人员的考试，被录取当上了上士文书。当时，他仅廿三岁，好接近人。由于凌的认可并视为亲信，他在缮写有闲时，得以常去方囚室闲谈，听讲革命故事，在方志敏的教育下，思想有了进步，两人也有了感情。时常帮助照顾方的生活。凌与高相互都了解彼此与方的接触，两人相互信赖，共同帮助方志敏。

方志敏由于凌凤梧等给予方便和帮助，得以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等不少文稿。他曾将《可爱的中国》等部分文稿和信件托凌送出，还内附一封给凌的信，即本文开头的《遗信》。后来，当凌发觉上司对他有怀疑的迹象，预感到要大祸临头时，就将包扎好的文稿和信托付给高文书保管，伺机送出。凌所以将此重任托付给高，是因他知高有一女友程全昭在杭州教书，而且高曾坦诚相告，知她是地下党员。因此经方同意，由高电约程到南昌。凌引她与方晤谈后，方就让高将一包文稿和密信交给了她，并为她改名李贞，还给了她二十块钱路费。密信是用米汤写的，信上分别作了记号，其中一封信和一包文稿是给鲁迅的，一封是给宋庆龄的（给党中央的信在右角上点了一点，给孙夫人的右角上下各点了一点，给鲁迅的左角点了一点）。不久，程即绕道九江去上海。

在凌凤梧受到怀疑调回军法处后，高文书常到军法处为方

探听消息或转达要求。有一次高带了方的一张笺条，对凌的帮助表示感谢，内说：“木吾兄，倘得生还之日，中国革命史上多添一页。”后党组织策划方志敏越狱，高到军法处，和凌商量，凌即表愿意相机帮助。隔几天，高再次通告越狱的具体计划，由高借故为方联系到狱外看病，以便伺机外逃。但因军法处不批准，加之监狱又因怕地下党劫狱增哨添岗，防范更严，越狱之举遂成泡影。

程全昭离开南昌后，久无音信，方很焦急，高文书自告奋勇，为方送信并探听文稿下落。他到军法处告诉凌，并说：“我准备借口处理家事向看守所请长假，这次出去不回来了。”凌嘱咐他行动要仔细谨慎。高在请准假后，于7月30日取道九江去上海，随带方志敏交给他的给宋庆龄、鲁迅、茅盾和李公朴的四封密信。高一去后，也杳无音信。直到1962年5月，高来金华孝顺探望凌凤梧，才知李贞不负所托，把方给鲁迅的信和文稿交给了内山书店，由内山书店转给了鲁迅，另外两封信也都送到了。高自己所带的四封信，将给李公朴的信送去后，发现有人跟踪，即匆忙返回杭州，另三封信未送到，后来销毁了。

1935年8月6日凌晨，方志敏同志壮烈牺牲。狱警从烈士囚室内搜出他写给凌的几张笺条和其他的所谓“罪证”。笺条的内容是感谢凌对他减轻脚镣并答复已收到凌给的廿五元。这样就以“通匪”罪将凌凤梧拘捕入狱。但此时的凌已不是过去的凌凤梧了，他经受了方志敏的教育，并为其所感化，且已有入狱的预感和思想准备。因此，虽几经审讯，并遭酷刑逼供，但凌拒不承认“通匪”，毫不气馁地以国民党的法律为自己辩护。当军法官抛出所谓罪证时，他却以奉上司令，给方以特殊照顾，耐心“劝降”为理由，据理力争，驳得军法官理屈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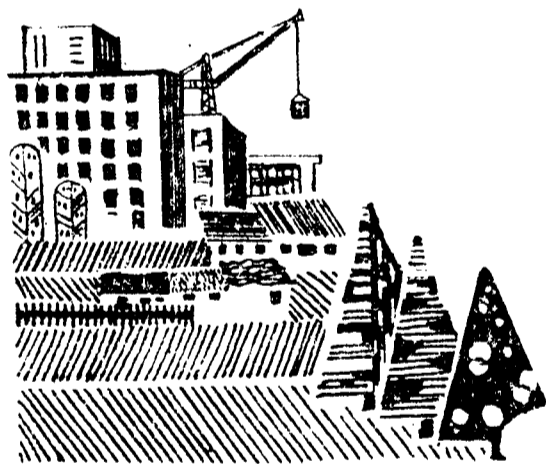
穷，无言以对。其后，由于定罪证据不充分，更重要的有同乡、同学、副处长钱协民营救讲情，获“从轻发落”，撤职押解回原籍。后来，凌凤梧就按方志敏烈士生前所指引的，从事执教生涯。先后在义乌中学、处州中学、私立两浙盐务中学、武义县中、东阳北麓中学等校任教。解放后，曾任东阳县政协委员。

1952年，凌凤梧突然收到方志敏烈士夫人、江西省卫生厅厅长缪敏试邮之信，此后就常有书信往来。缪曾要他忆写方志敏在狱中时所见所闻的纪实，他遵嘱撰写了稿子寄去。在缪的一次来信中，还提到请外交部打听胡逸民先生的下落。关于胡逸民，凌在生前曾对他的学生方正说起过，在当时由于胡是中央监狱的监狱长，虽以政治犯身份入狱，但上司关照给予特殊照顾，加之胡的言行傲慢，派头也不象罪犯，疑他是负有特殊使命。因此，对他存有戒心，但又不敢得罪他，还给他更多自由。他要求去“优待室”看方志敏，按监规是不允许的，但还是同意他自由往来。但凌要求方志敏千万不要向胡提及他俩间交往之内情，方也信守诺言。因此胡一直不了解凌、方的交往，只知道凌这人好讲话，他在《狱中结识方志敏》一文中说：“前任所长调走了，新来的所长是个好好先生，很好说话，我想要怎样，他都答应。他允许我夜里也可以到方志敏囚室自由谈话，不加干涉。”而凌和胡不搭界，也不知胡、方交往之内情，更不知胡出狱后也为方志敏送过部分文稿。

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曾多方设法寻找方志敏烈士遗骨。1957年从南昌市郊下沙窝方志敏就义处挖到一些残缺不全的骸骨，其中两块胫骨（一左一右）上，套着一副锈迹斑斑的铁镣，引起了省委、省府的重视。缪敏建议以江西省民政厅名义电请凌凤梧去辨认遗骨并谈方志敏事迹。凌遂于1957年4月13日

去南昌，配合有关部门，终于认定了烈士遗骸。凌在南昌逗留了三天始归。临别时，缪敏赠送了一大册烈士手稿影印本《可爱的中国》，并亲笔在扉页上题词，落款时间是1957年4月15日；还赠送给凌一套新呢制服和一帧全家合照。此后，缪敏还多次来过信，在1962年凌凤梧病逝时，还拍来信电，并汇款为凌治丧。

凌凤梧先生虽早已病逝，但他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岁月里，不顾自身安危，同情革命，帮助狱中革命者的精神，是值得人们忆念的。由于这段史实鲜为人知，特撰写此文。



方文正先生二三事

方 正

方文正先生（1892—1958），字乐胥，浙江省金华县孝顺镇人。1918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七师范（即今金华师范前身）。1920年6月，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他与施复亮、陈望道同租赁东京一间民宅。他们一起切磋学问，谈论国内外局势，相处十分融洽。

1923年回国，先后受聘于浙江法政专科学校及上海法政大学任教。写过民法专著。著名爱国七君子中的史良、王造时、沙千里及解放后曾任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的吴山民，都曾是他的学生。

1929年，国民政府任命他担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副主任。蒋介石曾数次召见他谈话。在方文正先生之父八十寿辰时，“御笔”亲赐题“懿行可风”的寿匾。后来此匾悬于方氏宗祠内。

1935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活动逐步升级，频繁进行军事挑衅，派遣大批侵略军入关，威胁平津。国民政府非但不派兵抗日，反而派何应钦同日本的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时称《何梅协定》，答应撤退河北的中国军队，取缔一切抗日组织、停止抗日活动。这期间蒋介石曾欲任命方文正先生去中国驻日大使馆任职。方闻此讯，权

衡得失，思之再三，决定托病辞职。此时局势混乱，辞职后的方文正先生，仍然受特务机关的怀疑和监视，言行均不自由，被迫迁居上海。

1936年，国内各阶层人民和海外华侨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他们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同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警察局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史良等七人，这就是“七君子事件”。宋庆龄等发表声明，抗议国民政府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强烈要求释放七君子；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此时，方文正联络一些原上海法政大学同事，联名写“请愿书”，要求国民政府举兵抗日，释放七君子。并撰文阐述他们的观点，发表于《大公日报》和《申报》。

1937年，侵华日军大肆收买汉奸卖国贼，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妄图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进而占领全中国。敌伪“华北自治政府”筹委会曾派人作说客，以高官厚禄相引诱，聘请他去“自治政府外交部”任职。方文正对来人说，“我是中国人，岂能贪图富贵，背叛祖国，卖国求荣”！遂下逐客令，骂得说客脸红耳赤，垂头丧气地溜走了。

1938年，方文正先生迁居四川重庆，开办律师事务所，调解了不少错综复杂的民事纠纷。重庆法院知其底细，对他写的状子往往格外慎重处理，不敢疏忽，在当地颇有声誉。他当时与共产党知名人士李达夫妇交往甚密，成了莫逆之交。

1949年全国解放后，他欣然接受聘请，在上海黄浦区任民政科长。同年8月，应邀参加全国政协代表会议，讨论拟订《共同纲领草案》。有人问他，为什么国民政府任他为外交官员时硬要辞职，同僚劝他去台湾，又婉言谢绝，而人民政府聘

请他，却又欣然应允呢！？他的回答很干脆：“我是中国人，我要维护民族尊严。”“位卑未敢忘忧国”，“我愿意为人民政权尽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任职期间，廉洁奉公，忠于职守，于1958年病逝，终年66岁。

方文正先生一生，并无彪炳千秋的功勋，仅是一位普通的爱国人士。但他那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高风亮节，深得后人敬仰。



台湾义勇队以及当时 桂林报刊的有关报导

桂林市党史办 黎远明

(一)

1939年1月在浙江金华正式成立的台湾义勇队，是台湾籍著名爱国人士李友邦为主席的台湾独立革命党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发起组织和领导的，由散居在祖国各地的台胞组成的抗日救亡组织。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很快燃烧到江、浙，沪、宁、杭相继沦陷。金华成为当时东南各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各界抗日救亡组织相继出现。时李友邦也来到金华。

李友邦，系台湾省台北市鹭洲乡人，19岁即为孙中山先生所赏识的学生，1924年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响应孙中山先生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的号召，创建了“台湾独立革命党”。其党人散布沿海各省以及南洋和菲律宾。李友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创建和领导的台湾独立革命党的“独立”是要使台湾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下争取独立，独立之后，要“返归祖国，以共同建立三民主义之新国家”（与现在的“台独”组织性质是截然相反的）。李友邦曾著文《台湾要独立，也要返回祖国》，阐明了上述宗旨。因此，台湾独立革命党是进步的。大

革命失败后，李友邦因不满国民党背叛孙中山先生创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当局所捕，监禁于杭州陆军监狱，与骆耕漠为同监难友。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始出狱，先寓居丽水，后来金华。他坚决主张抗日，向他的党员指出两方面任务：第一，号召台胞参加祖国抗日战争；第二，潜至台湾本土发动各种暴动。后又以台湾独立革命党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号召散居祖国各地的台胞加入义勇队，参加祖国的抗战，谋求自身的解放。

1938年11月上旬，李友邦和张一之（原名张启权，现名张毕来，贵州炉山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台湾独立革命党总部秘书，现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去台胞居住较为集中的福建崇安，在台胞召开的欢迎会上，号召台胞为祖国抗战出力。当场就有许多台胞参加台湾义勇队。1939年1月，张一之留崇安继续做发动工作，李友邦则带领第一批报名参加义勇队的30余名台胞，回到了金华。随即在当时的金华酒坊巷18号成立了台湾义勇队，李友邦兼任队长。1939年3月，张一之又从崇安把第二批报名参加义勇队的30名台胞带到了金华，编入了义勇队。同月，在金华出版的《东南战线》发表了《台湾独立革命党最近行动大纲》，号召在台同胞：抗拒缴纳赋税；反对抽征壮丁来内地作战和开垦；已被诱迫来内地的同胞，要组织哗变；破坏台湾生产和交通；扩大阿里山的反日游击队；组织义勇队参加祖国抗战；发动台湾罢工、罢市、罢课运动；扩大反战、反法西斯宣传。此后，随着台湾义勇队影响的扩大，还不断地有台胞来到金华要求参加义勇队，使义勇队队伍不断扩大，就成立了总队，编为二个区队，区队下又分设了若干小队，李友邦任总队长，张一之为秘书。据1940年1月《朝鲜义勇队通讯》第三十一期金若山写的《建立东方各民族友谊的

新基础》一文中说：“台湾革命同志于1939年9月在浙江金华组织了台湾义勇队”，这应是指总队成立的时间。

李友邦和其台湾独立革命党在金华倡建台湾义勇队之始，即得到中共浙江省委的关怀和帮助，派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书记骆耕漠与他联系，建议把流亡在福建崇安一带的台胞动员到浙江抗日前线，从而在金华创立了台湾义勇队。后来又从浙江遂昌把张一之调来，专职协助李友邦工作，任台湾独立革命党总部和台湾义勇队总部秘书。1939年夏天又派李炜（原名夏如如，现名夏云）到台湾义勇队工作，负责台湾少年团，任少年团指导员。在台湾义勇队还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张一之，除张、李两人外，党员还有朱行。李友邦与中共关系很好，有事共商讨。有一次国民党要给他活动经费，他就找骆耕漠商量是否接受，骆同中共金衢特委汪光焕商量后，建议他可以接受。特别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对台湾义勇队非常关怀。台湾义勇队成立后，归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领导。1939年3月周副主席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浙江视察，3月17日傍晚，到金华。在去天目山与黄绍竑会晤后，赴绍兴等地视察，于4月初又返回金华。4月4日下午，亲临铁岭头10号（今金华市府第一招待所，当时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歌咏队和上海慰问第三战区将士流动剧团住所），看望了台湾义勇队全体队员，在场的还有歌咏队和剧团人员，共50多人（骆耕漠亦在场）。周副主席听取张一之关于组建台湾义勇队的情况汇报后，鼓励大家“要努力做好台胞的组织工作，要牢记自己的任务。”并就如何开展工作，作了具体指示。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教诲，更加鼓舞了义勇队队员们的斗志。

台湾义勇队是金华几个抗日救亡团体中人数较多，影响最

大的一个。它一成立，即每周出版《台湾周报》，以宣传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革命运动，宣传祖国的抗战。1940年4月15日，又创办了《台湾先锋》（月刊）。台湾义勇队从城市到农村，从社团到军队，从后方到前线，自金华到桂林，其活动一直延伸至重庆。活动内容主要为“对敌宣传、医药救护、参加生产三项。”

政治工作和对敌宣传，瓦解敌军和教化俘虏，是台湾义勇队的主要工作。他们分赴抗日前线，深入部队开展宣传活动，以亲身经历，向战士们倾吐台湾同胞40多年离开祖国怀抱，被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统治、剥削、压迫和残杀的苦难，宣传抗战的必要性和正义性，激励官兵的抗日斗志。他们还直接与被俘的在日军中的日本人和台湾人接触，进行反法西斯宣传。他们分期分批到几个陆军师和一些单位，帮助翻译敌军文件、审讯俘虏、收听敌军广播、分析敌情，帮助士兵们学习日语喊话、教唱日本歌曲。

在他们诸多的工作中，医疗卫生工作，成绩尤为显著。在队员中有很大大一部分原是医务人员。义勇队经常组织他们深入农村、部队和各单位进行巡迴治疗，深受各方欢迎。在金华城内设有医疗所，台湾义勇队医生不仅医术高明，且对病人热心，深受群众赞誉，“台湾医生”成为专用名词，在金华城乡广为流传。他们曾为流亡至金华灵岳乡的战时儿童保育院的儿童检查身体，发现全院280名儿童，竟患有400多人次的各种疾病（有的一人患几种病），经过他们2个月的精心治疗和护理，全部儿童恢复了健康。又为金华县二仙桥小学、民运工作人员训练班等单位学生、学员检查体格，种牛痘、治病。后根据群众的要求，先后在金华郊区和义乌、兰溪、衢州三县建立医疗站和医院。还派医生参加战地医院工作，也到浙东前线担

任医疗、翻译和宣传工作。

台湾义勇队还从事战事生产。队员中的科技人员发挥各人的特长，曾协助金华药品生产合作社采用国产原料，制造战时急需的一些药品。协助云和县筹建樟脑制造厂和福建省建设厅在崇安建立樟脑制造厂。

总之，台湾义勇队建立后，为祖国的抗战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

在建立台湾义勇队后，即成立了“台湾义勇队少年团”。李友邦兼任团长，李炜为指导员，具体负责少年团工作。还请当时在桂林的新安旅行团，派了黄志义和徐光俩小朋友来少年团帮助学习和工作，后来他俩也成了少年团团员。据蒋莱写的《伟大的同情——记台湾少年团》（载于1939年11月15日《朝鲜义勇队通讯》第二十九期）文中记载：台湾少年团成立于1939年2月。

台湾少年团的团员，基本上是台湾义勇队队员的子女。台湾义勇队在金华成立时，有好些队员把孩子也一起带来，参加了少年团。几十个团员中，除三人外，其余都是台湾人。按当时规定：十五岁以下，才参加少年团。因此，最大的为十五岁，最小的只八岁。少年团设宣传、生活、总务三股，下分小队。小队长和各股股长，都是选举的，指导员由团长李友邦任命。

台湾义勇队队员们把孩子带来，目的本就要他们参加抗战，在抗战活动中经受锻炼。台湾少年团就是以此为宗旨而组织起来的。李友邦在《我们的工作》（载《台湾先锋》第一期）一文中说得很清楚：本队组织下，现有一“台湾少年团”，团员皆系由敌人血手中逃出来的八九岁至十四五岁的儿

童。少年团的组织，一方面，是儿童们深受日人的压迫，当此祖国抗战时期，忍不住跳出奴隶的圈子，愿意在祖国的战线中生长，尽一点能尽的力。另一方面，深知台湾革命的成功，非短时间之事，是需长时期的奋斗，台湾儿童，要在祖国抗战之中，锻炼他们自己，以便将来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最后斗争之用。在《台湾少年团团歌》（张一之词，牛光祖曲）中也写有这样的歌词：“我们会痛恨，不会哭泣；我们要生存，不要灭亡；在压迫下斗争，在斗争里学习，在学习中成长。”也体现了上述宗旨。

台湾少年团一建立，在组织学习的同时，就投入了战时服务工作。他们边学习，边开展工作，而且是马上学、马上用。学习内容和社会进化史、日本侵华史、台湾革命史、政治时事、日文和英语、艺术和军事常识等，还加强练习写钢板字并印刷、练习收发无线电报等特种技能的训练。他们所能做的工作，主要是宣传抗战，不外乎讲演、演戏、画画、唱歌等等。最初他们只能说快板，唱《卖梨膏糖》、说相声、吹口琴、写慰问信，都是以抗战为内容的。后来就演起独幕小剧，演经过改编的《放下你的鞭子》，还学会唱日语反战歌。再后来还会写短文，《台锋先锋》月刊曾特辟一栏叫《台湾少年》，登载他们的文章。

在1939年初台湾少年团成立时，浙江省动员委员会文化事业委员会号召文化人献金，台湾少年团团员首开纪录，《东南战线》第四期加以报导，并登了“小台胞踊跃献金”的照片。少年团还与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共同发起募捐运动，为东沙洲前方将士募捐。是年4月4日，台湾少年团参加金华县儿童节扩大宣传，演出节目，并发表了《告祖国小朋友书》。

少年团最初只在金华活动，在金华县城乡流动宣传，参加

设在金华的浙江省儿童夏令营，举行小朋友联欢大会，与小小剧团一起和军管区开军民联欢大会，教东关小学学生唱抗战歌曲。后来走出金华，到浦江、兰溪、龙游、绍兴、诸暨、宁波、衢县，还经江西上饶到福建，还到过皖南徽州、屯溪等地。一路上，他们演出独幕剧《为了大家》、《打死汉奸》、《最后胜利》等。

台湾少年团还深入前线从事抗日宣传和做教育战俘工作。1940年一二月间，少年团部分团员在李炜带领下到前线慰问前线将士，进行抗日宣传。在诸暨徐家坞一带前线就碰到日本战俘，孩子们就对他们进行工作。一个叫梅本源一的日俘，听小团员能说日本话，觉得很惊奇，后知是台湾小朋友，感到很高兴又很内疚。表示决心要和大家一道打倒日本军阀，反对侵略战争。

台湾少年团的活动十分活跃，得到了各方的称赞，东南党政军及民众团体，争相延请他们协助工作。

(三)

台湾义勇队总队部虽设在浙江金华，但与桂林有着密切的关系。李友邦和张一之曾数次到桂林开展活动，特别是李友邦常从金华到重庆，途经桂林，都要停留活动。桂林人民对台湾义勇队，也非常关切并给予支持。桂林出版的报刊也常刊载有关台湾义勇队的文章和报导，为其宣传，提供舆论上的支持。因此，在当时，桂林实际上也成了台湾义勇队的重要活动基地，是台湾义勇队对外开展宣传活动的主要窗口。迄今，桂林还保存着颇多的有关台湾义勇队的宝贵历史资料，现摘录部分整理如下。

台湾义勇队成立前，在1938年4月16日的《战时艺术》（社

址在桂林象鼻山脚，由生活书店经销）第四期上刊出了胡明树《是时候了——檄朝鲜人、台湾人》一文，表明了桂林人民盼望台湾同胞早日建立抗日组织。同年11月14日，《广西日报》第二版刊登了建瓯《台湾革命党响应祖国》一文，迅速报导了台湾独立革命党的活动情况。报导中说：“台湾独立革命党为响应祖国抗战完成自身解放，派代表李友邦等回国，唤起国内同胞，一致作长期抗战，并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勉全台同胞立即奋起反抗暴力，解除亡国痛苦与耻辱。”

台湾义勇队成立后，其活动情况更常见诸于桂林各报刊。1939年6月11日的《朝鲜义勇队通讯》（朝鲜义勇队编辑发行，通讯处是桂林水东门外东灵街1号）第十五期上发表了张一之的《为“保卫祖国，解放台湾”而斗争——台湾义勇队略记》，介绍了台湾义勇队的成立及其活动情况。同年7月1日该刊第十七期上又发表了6月7日台湾义勇队致朝鲜义勇队的信，标题是《台湾义勇队致本队同志的信》。信中说：“中国神圣的抗日战争，是东方弱小民族的解放战争，……所以，组织义勇队直接参加中国抗战，是我们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同声的要求！……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是要建立一条铁一般的「民族联合战线」。因此，我们对内必须「全民族统一团结」，而对外却迫切需要「民族联合战线」，……台湾义勇队，可说是台湾「民族革命」的各支水源的合流，今后将不断地奔汇，滚滚地奔汇成更大的洪流。……我们只有一条心——民族解放，我们只有一条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信中对台湾义勇队的成立及其任务，最后概括在「保卫祖国，解放台湾」八个字上。信还介绍了台湾义勇队的活动情况。1939年10月2日《救亡日报》第三版发表了赖少其《访台湾独立革命党李友邦先生》的特稿，具体介绍了该党的《最近行动大

纲》。在1940年3月10日《救亡日报》第二版发表了《台湾革命领袖李友邦谈台湾义勇队服务情形》一文，又详细报导了台湾义勇队的活动。在文末还谈到为团结台湾同胞，“近似开展海外宣传工作，以取得台湾侨胞之联系和援助”。在王继贤编著的《中国战场上的朝鲜义勇队》一书中，也记述了台湾义勇队等于1940年6月23日，招待了觉悟的日本战俘。席间，中国、朝鲜、日本人民，一致高呼东方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军阀。

桂林的报刊对台湾义勇队在桂林的活动，更是迅速予以报导。因此，从现存的资料中也不难找出李友邦等在桂活动的踪迹。1939年1月，李友邦为接洽组织台湾义勇队，同张一之曾赴桂林。在离桂后的下一天，即1月10日出版的《广西日报》第三版就作了报导。在题为《李友邦氏离桂赴浙》的消息中说：“李友邦为了接洽组织台湾义勇队事宜，在1月9日以前，已级来桂，兹因事毕，于1月9日离桂赴浙。”根据当时桂林报刊的报导，1939年台湾独立革命党和台湾义勇队在桂林曾举办或参与了两次国际友人招待会，开展国际宣传活动的情况。一次是在1939年1月8日下午，据1939年1月10日《广西日报》题为《朝鲜台湾革命同志招待李蒙夫妇等，鹿地亘氏亦被邀参加》的报导中说：1939年1月8日下午，台湾独立革命党及朝鲜义勇队总部假座桂林乐群路乐群社餐厅，举行联欢茶会，欢迎法国名记者李蒙夫妇及美国名记者窦丁，鹿地亘氏被邀参加。桂林各政治、文化机关，亦被邀参加。到会共30余人。由朝鲜义勇队总部指导委员会政治组组长金奎光主持，致词热烈欢迎后，台湾独立革命党总部秘书张一之代表该党主席李友邦致欢迎词。在会上，李蒙说：我们在这里，有中国的朋友，也有美国的朋友，更有日本的朋友，我自己是法国人，我

们在一起，足以代表国际性的集会。”又说：“在座的这一张桌子，正是表现国际正义与和平力量团结一致的象征，这种力量的团结，足以打倒日本法西斯主义者。”窦丁对中韩联合战线的结成，表示无限的同情与兴奋。全场情绪高涨，给听众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另一次是在1939年7月3日下午，国际反侵略会桂林分会及国际宣传委员会，也在乐群社西餐室，招待日本中山泰德、北义雄等3人。据1939年7月4日《救亡日报》第二版报导：与会的各机关团体来宾有60余人，由盛成主席、北义雄、中山泰德等相继发言，台湾义勇队秘书张一之等，热烈致词。会场中，充满着民族间之友爱，有如兄弟。另据1940年4月26日桂林的《救亡日报》报导的《李友邦过桂谈台湾革命运动新开展》一则消息中说：“台湾独立革命党主席兼台湾义勇队总队长李友邦氏，于日昨乘机转渝时语记者：李氏返浙队本部后，将筹设一台湾革命干部学校，组织台湾妇女队，并创办研究台湾问题之刊物，以加强台湾革命之力量云。”又据《新华日报》1943年10月24日第二版发表的消息，李友邦已抵桂林，即将赴渝，并发表谈话说：“光复台湾目前所应积极进行的工作是建省和建军运动。建省的目的在于使台湾在国际上有法定的地位，各地台湾革命志士有所依归；建军的目的在于能随时组织台湾民众，以便必要时配合祖国军队收复台湾。”

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和桂林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是与新安旅行团的联系。新安旅行团系设在桂林的抗日儿童团体，名为旅行团，实际是一所学校，当时有团员50多人，6名教师，还有2名辅导员。李友邦和张一之去桂林时，请新安旅行团派几个小朋友到台湾少年团来，帮助台湾少年团的小朋友学习。新安旅行团很乐于帮助，就派了黄志义和徐光来。两人对台湾少年团的孩子们帮助很大。后来黄志义还当台湾少年团的

指导员。此后，新安旅行团一直与台湾少年团保持着经常联系，彼此有书信往来。有一封旅行团给台湾少年团的信，曾登在《台湾先锋》第六期上。信中热情洋溢地说：“你们是一个值得我们钦佩的团体。你们是为公理而活着的，我们都站在一条战线上，那就是大家知道的抗日阵线。你们是台湾的抗日分子，把台湾同胞从黑暗的路引到光明的路上，你们不但领导台湾民众抗日，而且帮助我们抗战，那是我们应该感谢的。同时更希望全体中国的学校都随你们这样做。”二是与朝鲜“三一”少年团也有亲密的关系。当时，朝鲜“三一”少年团在桂林很活跃。朝鲜义勇队队员何振东把这两个少年团说成是“兄弟的团体”。何振东来金华，看望过台湾少年团，对台湾少年团倍加赞赏。他回桂林后来信（信载《台湾先锋》第五期）说：“你们那集体意识和工作成绩真值得我们称赞，尤其是你们那热诚、活泼的态度，使我永远不能忘记。你们的工作情形和工作作风，一定介绍给我们全体同志，而你们付托我的一切事情，一定要转告我们的‘三一’少年团。我希望你们以后要多多给‘三一’少年团去信，鼓励他们。我觉得他们要向你们学的地方很多。”信的最后对两个少年团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们两个义勇队是兄弟的队伍，而我们两个少年团是兄弟的团体，这在今后东亚历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对此，新安旅行团的童常在所著的发表于1939年7月1日《朝鲜义勇队通讯》第十七期上一文中也有类似说法。文中说：中国的孩子已经在抗战中站了起来！朝鲜的孩子也同样站了起来！为了民族的解放，孩子们和大人一样的联合起来了。孩子们的亲密无间的团结，是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成功的象征！此外，台湾少年团还与国内好些抗日儿童团体有往来，其中有桂林的孩子剧团。桂林的报刊也常报导有关台湾少团的活动，并

给予颂扬。如1939年11月15日《朝鲜义勇队通讯》第二十九期上，刊载的蒋莱《伟大的同情——记台湾少年团》一文中说：“台湾少年团的出现和成长，证明中国的抗战，不仅引起了全世界大人的注意，而且亦带来了下一代伟大的同情。”

(四)

台湾独立革命党主席、台湾义勇队总队长、兼台湾少年团团团长李友邦先生当年组织台湾义勇队，参加祖国抗战，谋求台湾人民解放之义举，被台湾国民党当局，加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于1952年4月将他杀害了。其中所谓罪名之一，就是在浙江金华，经常与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委员会往来。李友邦被杀害了，但他和他所领导的台湾义勇队的热爱祖国、献身抗日战争的革命精神，将永载史册！

(俞龙光改写)

金华县中医名人录

戴兆丰

笔者现仅就所知提供一些金华县历史上的中医师姓名，并未能审知其详。旨在引起各方进一步的访求探索从而介绍他们的学术经验或单方妙药，以为济世之用。

金华县的中医人物首先见于志书的是南宋时期的冯氏，佚其名。丈夫郭姓，原籍陕西。冯氏精于妇科，曾为宋徽宗皇妃治好绝症。有功，封安国夫人，随高宗南渡。其子孙郭姓，多世袭业医。散居金华、兰溪一带。

以后，明洪武时期有：王立，字与权，尚理学，并精医。朱元璋入金华，曾召与谈论，大喜，赏赐优厚。管元德，城西人。从义乌朱震亨学，精于医；又采药金华山得异人授药。时明军在滂雨中作战多病疫，经管医治便愈。太祖厚赠金币，不受；授给医学提领官职。周道观，字景暹，精医，与浦江戴元礼齐名，授鲁王府良医。永乐年间有：陈亨，字大有，号古痴，博学隐于医。永乐初，召至京参与修医家诸书。例当授官，不受。治训医家子弟，卒于职。杜通，字彦远，今古方人。永乐间任太医院御医，随成祖北征有功。孟熊，任医药训科。精针灸点穴，多奇验。叶钊，能凭切脉决人死生，无不奇中。徐琛，字良璧。治婴孩有奇效，年登耄耋。嘉靖年间有：伊蕙，字惟馨，号于溪，今东祝乡人。精医。嘉靖时任福

建永春知县，逢旱疫，亲自下乡治疗，多救活。伊祝，字东泽，东祝乡人，著有《医学正论》、《汤液衍传》。成化时有胡忠，字彦信，青阳（今洋埠乡）人。有残疾，专研医学，著《卧云集》。

清朝顺治年间有：傅为学，字效如，傅村乡名医，曾救人复活。康熙时傅村医生傅为格，擅治麻痘症。乾隆时城区名医周镐，治病视脉为主，有《舍从一得录》。其后又有阮鉴、梁遇清等亦知名。咸丰八年举人汪凤含，今泽口乡下汪村人，家贫，中举后不求仕途进取，业医行道，著医德。洪宽，青阳人，精岐黄，著《医方指要》。金万兴，金家人，医麻痘知名。

自清末至民国时期，金华县及原汤溪县的知名中医生有：（城区）陈鹤鸣、赵霭堂、朱云高、叶永菊、吴玉修、（塘下）黄乃聪、（官田）黄勇林、（江东）郭季樵、（让长）郑兆权、兆楠、（汤溪）李作赋、（罗埠）胡贡锴，（莲湖）严树华、唐小文、（厚大）范纪良、（洋埠）郑文明、童致和、（东祝）方永清、丰致和、丰益和、丰则昌、（上境）刘若宜、刘庆云、（中戴）戴思明等等。

农民的好郎中——黄勇林

杜寿权 傅鸿藩 曹钱增

黄勇林，官田乡金南山村人。生于同治七年（1868），卒于民国33年（1944），享年77岁。他天赋聪慧，自幼好学，尤喜习医，少年从师，青年开始行医，而立之年，已成蜚声金东义西浦南的名中医，群众尊称其为“勇林仙”。

黄勇林医术高明。刻苦攻读医书，悉心钻研刘完素河间学派学说。擅长中医内科，诊治伤寒造诣特深。俗话说“伤寒转疾痢，三天就笔直”。一次，从鞋塘送来一位生命垂危的重病人，勇林诊断即属此症，只在原医师的处方上减去一味“琥珀”，服用一剂，就收药到病除之效。一个经黄勇林同门师兄多次医治而病情越来越重的病人向他求医，诊断后的处方，基本上与原处方相同，只多加进3个葱头，仅一方就使病人转危为安。黄勇林对某些绝症也能比较正确的判断。山头下村老农民庄洪海患病，四处求医无效，且病情每况愈下，昏厥三天后，请勇林出诊。他细致诊断后说：“这是烂肠瘟，已是病入膏肓，太迟了。我的药吃下，只能使他暂时清醒过来，可难以救他之命，你们要准备后事”。一帖药灌下，病人果然苏醒了过来。但3天后还是去世了。黄勇林对妇产科也颇有研究，在浦南一带，妇科重病多请他诊治。产妇如产后不幸病故，娘家来婆家首先会问：“勇林先”请来看过没有，若是他看过，那

定是无法可救，命该如此。若是未请他看过，就要埋怨婆家不负责任，甚至打起官司来。他对妇女难产，还有一种独特方法，只用一种药贴在脚底板上，便能顺利做产。

黄勇林诊断病症十分仔细。切脉时聚精会神，不许别人讲话；细致观察病人气色和眼、耳、鼻、舌，参考病人自诉与家属提供的情况，经过综合分析，判断病症，故诊断较为正确。对熬药、饮服，忌口和调养，也都交代的一清二楚，所以疗效甚佳。

黄勇林不但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他做到同行相助，每当病人拥挤时，就婉言介绍部分人到本镇同行处就医，并积极宣传同行的医术医德。他急病人所急，不管天晴天雨，不论白天黑夜，有人请他看病，无不欣然出诊。后因年事已高，加上社会不够安定，才谢绝夜间出诊。出诊时，总要随身带上蛇药、伤风药、中暑药等急救药物。对一些穷苦病人，他总是免收“红纸包”。一次，有个下芳埠村的病人，送给4块银元的红包，黄勇林见他家里穷，婉言谢绝，并说：“我是医人之病，不是医人之财”。黄勇林对农民体贴入微。他先是在家里设诊所，金南山是个偏僻小山村，没有店铺，黄勇林就吩咐家属每天烧好大锅饭菜，招待病人及抬篋笼者吃中饭。由于求医者躺的篋笼多，他把自家门前的一斗田改建成停放场所。后来，为了方便群众，将诊所迁到曹宅镇。他和面食摊挂好钩，拿来筹码，远道病人抬上门，就发给面筹，再由摊主凭筹向诊所算帐。故被群众誉为“农民的好郎中”。

黄勇林思想进步。清末，就积极响应孙中山先生开展反清斗争的号召，毅然参加张恭领导的革命组织——龙华会。以行医为掩护宣传革命思想，将自己的诊所作为龙华会进行革命活动的联络点。

黄勇林，晚年认真攻读各家药书，积累处方，总结经验，热心医学著作。遗憾的是未待出版身先逝。遗著手稿在金华沦陷期间大部散失。60年代初，官田公社卫生院曾派员前往各处搜集，但已所剩无几（现存县骨伤科医院），此乃我县中医学术上的一个损失。



金华骨伤科名医郑克荣

洪时清

郑克荣（1873—1956），金华县塘雅乡塘雅村人。13岁便在傅村杨家、鞋塘畈田洪等地当铺做学徒。16岁开始拜师学医学武，30岁在金华市净渠头开设伤科医寓行医。其师张春林，字少庭，湖北蕲州武当山附近张村人，早年参加反清组织白莲教，是当地白莲教组织的头目，因遭清廷追杀，于1878年外逃至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一带，一边卖艺行医，一边继续暗中联络反清力量。少庭公武艺高强，精通伤科医理，兼通易经，文武双全。1888年寄住克荣公父郑宏泰家，以医为业，并常以看风水为名到当时捻军、义和团活动的山东、安徽等地进行反清活动。在外浪迹40余年，70多岁才从金华回故乡。

克荣公师承了少庭公精湛的武功和医术，并在此基础上吸取少林等学派的学术观点和专长，对内外伤、骨折、脱臼、毒虫、毒蛇、兽类伤都有一整套诊疗方法，尤其对骨折、脱臼病人，都采用手法复位，就地取材，用杉树皮、马粪纸等塑形夹缚患处以固定，并外敷接骨如意膏，内服中药汤、丸、散剂，辨证论治，一般分三期用药，药到伤愈。克荣公的医药理论有其独到的见解。有一次有一位孕妇小腹部受伤，克荣公诊治后替她开了一张药方，家属到中药店撮药，店主姓严，看到孕妇的处方中用了有孕妇忌用的红花、桃仁、牛膝、归尾等活血化淤

的药物，马上赶到克荣公那里请问，是否开错方了。克荣公说：“有固无殆亦无殆，我根据病情用药，给他配好了，不会伤及孕妇胎儿的”。病家服药以后，伤情马上好转，孕妇胎儿果然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令众人十分佩服。晚年和门人子弟一起总结了师傅张少庭和自己长期的临床经验，写成《伤科心得》和《四十四穴损伤诊治》两手稿传世，并把自己的武功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给后人，其义子黄乃聪先生亦是金华著名中医伤科医师，在省内颇有影响，为金华骨伤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被编入《浙江省名医录》。现他所传之骨伤科内治法，已为社会所公认。外治用的外敷软膏已由其徒孙、浙江中医学院教授沈敦道收入《中国中医骨伤科百家方技精华》。

克荣公不仅医技高超，而且医德高尚。他怀着“不为良相，也当为良医的”的志向，一心一意为病人服务。凡有病家请其出诊，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总是随请随到，且从不愿让病家请人用轿子抬他，而喜以骑马或步行出诊。遇有穷困病家付不起药资，他就倾囊相助。有一次，克荣公傍晚才回到塘雅村，刚好有一位浦江白沙镇横沙塘村姓钱的右大腿骨折的病人抬来。他顾不得休息，马上给他诊治，接骨包扎，因病人来得匆忙，家里又穷，他把自己全部积蓄都带上了还不够付整骨包扎的费用。克荣公知道后，不仅不收他的费用，而且还安排他们住宿，招待饭菜，又免费送给他内服的伤药，住在他家治疗了一段时间，右大腿骨折已临床愈合，就嘱他回家休养。这病人十分感谢克荣公的恩德，康复以后，每年冬天都要挑一担自己烧的炭给克荣公，克荣公每次总是盛情款待他，同时资助他一定的生活费，至今留作佳话。类似这样的事情，群众中流传很多。来求其治伤的人中，常有因打架斗殴致伤者，有时斗殴双方都往克荣公送礼，求其为自己说话，他则并不以钱财权势

所重，总是先收下双方礼物，到时想法约双方会面，好言相劝，进行调解，并当面把双方礼物送还，往往能使双方心平气和地握手言和，有的甚至涕泪俱下，十分感激克荣公的良苦用心。

中国的骨伤科历来与武术有不解之缘，两者有着难以分割的历史渊源，一位好的武师往往同时拥有较好的骨伤科医术。克荣公对武术、气功、点穴等十分精熟，在他晚年仍能使七、八个年轻人难以近身。因此，当时浙江省第七中学聘请他为国术教师，一聘就是十八年。

克荣公还是辛亥革命时期反清反帝的革命志士。在拜张少庭公为师期间，耳濡目染，深受其反清思想影响，早就在心里埋下了反清的种子。当时金华辛亥革命的组织者领导者张恭组织九龙党、龙华会，常在曹宅、塘雅一带活动，许多会党成员都是这一带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和知识分子。克荣公在曹宅、塘雅一带的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且他早有反清思想，因此与张恭心心相印，志同道合，很快成为契友。张恭是熟悉徽戏的行家，曾先后利用“张恭大班”和“张恭小班”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工作，教育群众，激发革命斗志。1903年前后，张恭因工作繁忙，曾一度委托克荣公带领“张恭小班”，继续进行反清反帝的宣传工作。在组建和培养这个小班时，克荣公也破费了不少钱财，付出了不少心血，为辛亥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56年，克荣公病逝于金华，享年83岁。作为克荣公的徒孙，谨作此文，以资纪念。

名中医吴玉修

蔡 东 星

吴玉修（1888—1957）中医师，行医40余年，精通中药，擅长内、妇、儿科，热心为人治病，深得群众赞誉。20—50年代闻名浙中一带，至今，本地前辈常有人传颂他的医术和医德。

他医术高明。长住金华行医，也常被请到兰溪、建德、衢县、义乌、东阳、武义、永康等县治病。二十年代初，金华农村发生时疫，雅畈、琅琊一带，疫情尤重，病死者甚众。当时农村缺医少药，前来求医，经他悉心诊治病愈者众多。如琅琊一个姓徐的农民病危，嘱咐其家属说：“若吴医师来，一定要请他给我看看。”第二天，家属见病人已奄奄一息，认为无法救治，将其移放门板上，准备后事。巧遇吴医师路过该村，家属得知即请他去看。他诊断后立即处方。家属撬开病人牙颌喂药后，竟将病人救活，病家感激不已。有一次，长山村一个妇女来看病，有说有笑，视若无病。他诊断后，认为病情严重，无法救治，当即私下嘱咐抬轿的人速速抬她回家。果然抬至半路，病人死了。

民国25年（1936），浙赣铁路杭玉段段长周某推荐他到湖州一个姓张的大户去看病。他到达时，病家已请到各地名医4人在家。他们要掂掂金华这个小城来的医生的份量，大家互相

推让，一定要推他主治，他也就当仁不让。诊断后认为病人患的是“湿瘟症”，即处方，一剂见效，三剂病情大为好转，随后又改了一方，病痊愈了。后来周某私下告诉吴医师，那4个名医说，想不到金华竟会有这样一个好医生。同年，浙江高二分院首席检察官童某身患重病，经西医久治不愈，也是他医治好的。后童某送他一块特制的“是良医也”的匾额。其他病人感谢他妙手回春而送的银盾、银杯等很多。

抗战时期，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住罗店，有次患热痢，经几个西医医治无效，服了他的处方，三剂而愈。当年，金华法院里的几个法医如汪某、陆某家里的人生病总要请他去看。50年代初，他的一个亲戚，第一胎怀孕时，出于好奇，要他切脉判断是男是女。他切脉后笑着说是男孩，产后果是男孩。这同他有丰富的诊断经验分不开。

他的医术，不仅为中医同行所称道，当年金华一些西医也是钦佩的。解放前省立金华医院就有几位医师的家属生病，西药医治无效，后请他去治愈的。有一次某医师的儿子发高热不退，已用过“握姆那”（当年一种较好的西药退热剂），热还退不下来，但服了吴医师开的方药，热就退下来了。

他为人正直，医德高尚。民国18年（1929），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试图废除中医。他与王树之、赵霭堂、叶永鞠等医师一同发起成立“金华县中医公会”，有会员50余人，以公开名义向南京政府请愿。经全国中医界联合抗议，迫使国民政府废除该提案。民国24年，“金华县中医公会”改称“金华县中医协会”，会员70余人，力谋振兴中医事业。日军侵华期间，协会工作中断。民国35年，中医协会恢复。吴医师一直参与中医协会工作。

抗战期间，日机常来金华轰炸。为了安全，他将门诊所迁

至城郊府上街农村。看病的人多，他整天不得休息，即使敌机在金华上空盘旋，他也镇定自如，继续为病人看病。正由于他有“一心为病人”的思想，才能方寸不乱。有一次金萧支队第八大队队长吴山民患病，吴世荣先生前来邀请。当时国民党严密封锁，他也不顾，毅然去为吴山民同志看病。金华沦陷期间，有些日本人也相信中医，他们慕名前来看病，他也要他们按号次看病，从不低声下气，奴颜媚骨，表现了民族气节。

解放后，合作化初期，他和本市的几位名医率先组织创办金华市第一联合诊所于西市街，为以后成立金华中医院打下良好基础。过去在家看病时，他因年近古稀，每天限看25号，参加集体后，往往日诊百余号，还要每10天一次去罗店疗养院看病。因他医德高尚，工作积极，被聘为该院特约顾问医师，后来被选为金华市政协常委。

他一生热爱中医药事业，理论基础扎实，临床经验丰富。民国25年（1936），他被聘为中央国药馆创办的《国医周刊》顾问，经常为全国各地病家解答疑难杂症。他看病认真负责，十分仔细，常说：“望、闻、问、切谓之神、圣、工、巧，缺一不可。决不能单凭一种或两种方法，只凭掌握部分症状就下结论。”他对中药也颇有研究，不但善辨药物真伪，而且对泡制中药也有经验。因他曾做过药店学徒，他与金华几家大药店的职工都相处得很好，对中成药的制作，饮片的泡制和业务管理常能提出改进意见，供他们参考。大约是民国27年，国民党第十八集团军司令罗卓英请他去看病，处了方。罗的部下就到金华城内某药店撮药。由于撮药的职工粗心大意，将一味药撮错，被罗的医官检验时发现了，前来责问。经核对，才知药方并未开错，是药撮错。从那年起，他建议各药店撮药都要实行校对，并在药方上盖上章以示职责。

他虽名震浙中，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自学成才，未曾拜师。他曾说：“求师不如访友，求师只得一家之专，访友可博采众家之长。”他博览医书，不耻下问，刻苦自学。当时金华名医荟萃，如赵霭堂、叶永鞠等，他要争得一席之地，自然要有一套过硬本领。他年幼时天资颖悟，学习刻苦。寒冬腊月，早起晨读，敲冰取水洗脸，意志弥坚。家境贫寒，无钱买医书就抄，或借书速读，勤摘要义。他还有一手好书法，也是少时以十多块砖用清水写字，一遍遍艰苦练就的。过去西市街福民布店、太和堂等大商店的招牌就是他写的，书法秀丽遒劲。

他生活俭朴，未曾积攒产业。他曾说：“子孙贤还用田”、“积财不如积德”。

吴医师热心医药事业，治病认真仔细，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生活俭朴，为当时人们所称道。

本文资料由李绍翰、吴瑞东等人及吴医师治愈的病人提供。

江东名医郭季樵事略

郭 金 城

据民国丁亥年重修的《汾阳郭氏宗谱》载：“郭季樵，名瑞桓，号季樵，字应圭。光绪庚寅年（1889年）十二月初三日子时生。”落地于现金华市后街24号。戊戌年（1958年）十二月卅日九时病逝于金华县江东乡横店镇，墓葬十八里村，享年七十。

名医出身于世医之家，始祖冯氏太太婆乃明朝御医，父郭锡祉，号阿祉先，清朝名医。传至他已十八代。年轻时，名医在拦路井（今八咏路）元德堂药号做学徒。四年满师后，借款赁屋，到横店创办恒德堂，步上医途。由于笃志创业，钻研医术，造诣颇深，再加普济众生，崇尚医德。因此，名震四方。世人皆称：季樵先，阿华先，活神仙。

诊断如神 蜚声内外

三十年代，江东雅金附近一壮年农民，步行五里，前来诊治。一诊断，即问：“有否陪人？”“无。”即令店堂职工毛雨庚速送回家，病人刚入家门，即气绝身亡。于是“活神仙”之誉鹊起。江东下王村，王根弟之嫂“暴死”。根弟见留下一群儿女，于心不忍，急来求救。经诊断，可救，即巧取穴位，

力到气回，活到如今，她逢人就说起这段“神话”夸神医。婺城文教界前辈赵镜元先生，其姐赵彩琴，定居美国，每当病痛袭身，总要向名医求索秘方，药到病除。至于当时党、政、军要员，工、商、学名流，求医者举不胜举。俗语说：“医别人是先生，医自己是鸡盲。”名医晚年，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但能预知即将病逝之期，在仙逝前八日，告之三女瑞兰：“八天后将仙去，是人，终有此日，要节哀，少悲。”事后，囑言为实。

医德为宝 济世第一

半世纪前，兰溪参行有位小老板，病入膏肓，前来求医。几番望闻问切，多期内服外疗，终于康复。其父抬了半小箩白洋亲来谢恩。名医不受，其父释手而走。最后全数捐赠金华救济院。并仍于每月一、四、七为其诊治，历时一年多，以巩固疗效。如此义举，却从未告之家人。华南石楠塘有一大富户，田产达百余石，独子徐锡龄，步行山崖，失足坠溪，虽死里逃生，但终因惊恐过甚而成疯，病重难治，其家张榜告示，谁能治愈，全部家产与之平分。名医勇挑医担，作一搏击，历时三年，精治巧疗，医功告成。其母守信，将五十石田，另加财物，前来酬谢。名医明言相告：“治病为救人，非为田产”，分文不受。富户最后只好请当时名人王廷扬亲书“世授青囊”一巨匾，奏乐鸣炮，悬于名医中堂，以表心意。借此匾毁于“文革”。六十四年前，江东一带发瘟病，猖獗一时，病来人毙。名医按每年六、七、八月施茶于民的惯例，以药为茶，普济三村，结果药茶起到了无病可防，有病治病的功效。四方村民，感恩不尽，誉之为吃仙药。解放前，杭州中国银行行长王兆彤，曾远道接名医诊治，事毕，再三挽留，玩赏天堂之景，

名医谢绝。抗战前，国民党第十集团军曾驻岭下朱，集团军司令刘建绪之女，病重求诊。愈后，司令定要名医与之同行，名医不肯从命。一生誓与民为伴，不作权势同路人。

专著虽焚 后继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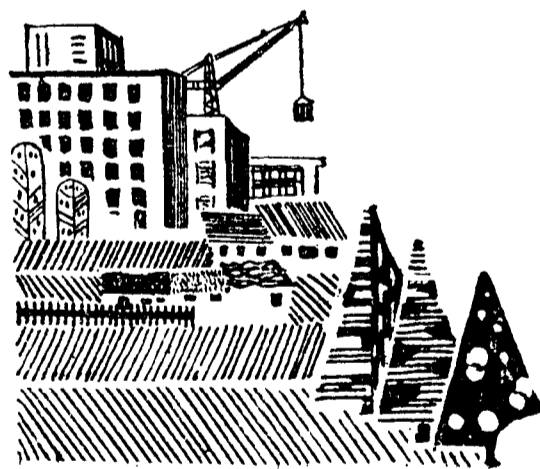
名医妙手回春半世纪，诊治病者上万人，积成药方达千卷。丰富的实践，本该开出理论之花。无奈忙于济世，疲于救人，无暇著述。唯一由三女婿林同舟帮助成文的一册，书名《时病论著》，达廿万字，也于“文革”中被焚灰烬。文字无留实可叹，后继有人可慰人。长子郭树棣，毕业于兰溪中医专科学校，世人称为“郭一贴”，言其对症下药，力重量大，往往一贴见效，常驻雅畷。一时父子名声齐扬。次子郭树勋，行医于多湖，颇有名望。三女婿林同舟，行医横店，名声颇高。五女郭菊航，毕业于杭州卫校，在嘉兴妇幼保健院工作。孙女郭雁珍，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仍孜孜于医疗事业，堪称医务世家。原金华市中医院副院长、名中医许锡珍也是名医高徒之一。

一息尚存 救世不已

这是戊戌年的最后一天，家家忙着为除夕的欢宴张罗。名医心力殚竭，气息奄奄。上午八时余，来一江西远客，申述当地一张治妇女病的药方，灵验如神，广为借用。谁知自己借来忘还，一次洗衣，化为乌有。原主非要原方归还不可，说是浙江金华横店“活神仙”所开。虽年近除夕，还是赶来求赐。名医勉力起坐，抖笔缓书，另立一方。当远客离开不足二十分钟，名医坦然地躺下身，转一个侧，就永远地睡着了，时针正指九点。谁能想象，这样一位医术精湛，崇尚医德，名扬四方

的名家，几十年如一日，竟然没一块手表，无一件洋服，也未穿一双皮鞋，就这样告别了人世。真可谓：

创业一生医术精，
不贪财物济众生。
一息尚存不忘世，
亮节高风励后人。



缅怀先师吴心禅

王 秋 月

先师吴心禅（1900年—1973年），祖籍安徽绩溪。从小随祖父迁居金华。他从医50余年，注重医德，精于内科，是金华名中医之一。我有幸是他的学生，满师后又在他身边业医，受其熏陶和培育十多年，深受教益。

先师从小立志从医。1927年进兰溪中医专科学校学习，次年又到上海红十字医院进修。他孜孜不倦，精研医学，仅二年时间，就学成在金华城里挂牌门诊，独立行医。他白天忙于门诊，晚上秉灯夜读，有时为诊治一个疑难病症甚至几夜翻读医书。他虚心好学，不仅向同行学习，每天看一些当代名医的处方，汲取其精髓，还常向西医请教。就是在他成名后，仍勤读苦研。他不止一次地同我们讲：“现在病人越来越多，我们遇到的病种也多起来了，人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实在不够，只得夜里多翻阅一些医书，有时还得请教西医，才能诊治一些疑难病症。”

先师长期行医，临床经验丰富，他对瘟病特有研究，对治疗肝炎更有经验，所以经常被邀请去参加驻金部队医院定期会诊。另外，对治疗消化系统、神经系统、泌尿系统、呼吸系统的疾病，先师也都有一套可贵的经验。如用滋肾、清胃生津、

清心益阴的三联法治疗糖尿病；用一贯煎治疗慢性胃炎（肝气犯胃）；用甘草泻心汤治疗胃十二指肠溃疡；用地黄饮子治疗脑卒中后遗症等等。先师在用药上也有独到之处，急则先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同时还掌握正虚为本，邪实为标的特点。他常告诫我们：有些药不宜太重，轻可去实。意思是治重病不一定用大剂量，用分量轻的药有时同样可治，这是他用药的巧妙。遗憾的是他平时忙于诊疗，未能把丰富的经验写成书，公开发行，仅留存了《糖尿病治疗》、《肝炎治疗》、《高血压治疗》等遗稿。

先师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也很严。他严格要求处方的字写端正，平时常对我们说，字写不清楚，不仅撮药的同志不喜欢，还会把药撮错，病人怕撮错药也不放心。他不仅在医技上倾心传授，还非常重视医德教育。他常教导我们：做一个医师，不光要有好的医术水平，还应该有良好的医风医德，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看病要不分对象，对农民更应服务周到，他们来城里看病不容易。严师出高徒，他带教的十名学徒后来在医疗上都有一定的成就，光在金华市中医院就有3人，1名副主任医师，2名主治医师。经他带教的中医学院的实习生那就更多了。

先师医风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由于他的医术在当地享有声望，日常门诊的病人很多，面对众多的求诊者，他从未叫苦叫累，对每个病人的诊治都很耐心细致，遇到有重病号或年老病人，叫他出诊，即使是休息时间，也从不推诿。更感人的是在“文革”期间，他被“造反派”揪斗，上班时还得挂着一块“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尽管当时他的内心是痛苦的，但在病人面前从未流露，还是一如既往，满腔热情地对待病人，从未影响医疗工作和质量。1972年，他鼻子经常出血，疑患鼻

咽癌时，仍坚持工作，一手揩鼻血，一手为病人诊脉，置自身病痛于不顾。先师不愧为一个人民的好医师，也是我敬仰的好老师。

（俞龙光整理）



金华伤科名中医黄乃聪

金华市中医医院

黄乃聪医师（1909年1月—1971年5月）系浙江省金华市人。九岁进金华贫民习艺所半工半读。十六岁满师后，跟养父郑克荣学习中医伤科，养父督教甚严。为他后来医术的长进打下扎实的基础。他曾随养父临诊于医局，1945年始在金华净渠头自开诊所行医。

黄老医师一生好学，历代中医伤科著作他无不涉猎，潜心研究，经过多年勤学苦研和反复实践，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人到中年，声誉日高。

1962年至1965年他受聘到浙江省中医学院教授伤科。在授课期间，他精心编写内容完整，通俗易懂的教材，将自己从医的心得体会，毫无保留地传给下一代。其中“腰闪扭伤”、“破伤风”、“气性坏疽”、“脊柱骨折”等教材和论著，被收入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浙江分会、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主编的《医林荟萃》、《浙江省名老中医学术经验选编第七辑》和《广州中医汇编》。

他生前带徒五人，现均为市中医院伤科骨干力量，其女儿继承父业。

黄乃聪医师出身贫寒，对劳动人民有深厚感情，他医德高

尚，素以济世为怀，对有困难者，每每慷慨解囊相助。

他是金华市中医院创建人之一，首任金华市中医院业务副院长，直至病逝。生前曾任历届金华市（县）人民代表、市政协副主席、中华医学总会会员、金华市中医协会会长。十年“文革”动乱期间，他在劫难逃，身心备受摧残，酿成严重疾病，又得不到及时治疗和休息，致使病情逐渐恶化，于1971年5月含恨与世长辞，终年62岁。

黄老医师行医四十余年，平生最推崇《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伤科大成》、《正体类要》、《医宗金鉴》、《伤科补要》等书，认为这些书对伤科治疗，内容丰富，方法齐备，治法简要，效果显著。

他擅长治疗骨折、脱位、金疮、跌打损伤和破伤风、气性坏疽等疑难险症。对骨折的诊断，整骨手法，功夫很深，在治疗骨折中强调整体观念，内外并治，动静结合。使骨折愈合快，功能恢复好。他在伤科内治法中提出：以四诊八纲为治疗依据，证分轻重表里，候分缓急疾徐，势别恍惚，掌握规律，辨别论治，灵活不拘。在治疗骨折中根据骨折的病理变化，提出“七上八落”、“三让四追”的疗法。所谓“七上八落”、“三让四追”即在受伤七天中，其肿势达到高峰，在这期间，诊查矫纳夹缚三次，采用宽松法，以利营卫气血之畅通条达，八天后淤肿逐渐消退，乘这消退时期，约诊视敷药夹敷四次，包扎宜稍紧。他非常重视骨折早期练功疗治，他认为练功能推动气血流通，加速去淤生新，促进骨折愈合，功能恢复。黄乃聪医师敢于闯新，对陈旧性骨折、脱位采用先熏洗摇荡患者关节，使粘连组织剥离，然后进行复位，治疗后每能达到功能恢复。

黄医师对医治破伤风颇有心得，金华地区医院常邀请他会

诊，治法则以：“祛风疏络大表大透，使头汗淋漓及五心汗湿为度，佐以开窍熄风，豁痰利气，益气增液，以疏泄为主，益血滋阴为佐，一增其利，一除其害，不至枯涩，则形体不损，正气不竭，病毒自弱”；外治“彻底清洁创口，尽量彻透”，保持创口清洁和通畅。

有一程姓病人，因外伤感染后继发破伤风。牙关紧闭，烦躁抽搐，经他会诊治疗，至第三天则出现转机，抽搐减而安睡。第四天牙关松开，之后再诊三次，共服药月余而好转。

对气性坏疽，他要求做到全面检查和准确诊断，用药审慎果决，立即暴露创口，排其败血，整洁创口，尽量彻透，药密能进，虽危不急，邪攻毒却，顿形化吉。如病人邵××，因右前臂开放性粉碎性骨折而致发生气性坏疽，证见高热、神昏、呓语，西医认为非截肢不能治，黄老医师诊后认为可救，当夜服药一帖而热退神清，二诊后病情稳定，再诊服药五帖而痊愈，病人感激不尽。

黄乃聪医师对疑难危重病人每试一方都有效验记录，并留有副方注明年、月、日。可惜在“十年动乱”中付之一炬。

黄老医师极为反对门户之见，博采群芳，不断丰富自己，对西医骨科也积极学习。他常说，促进骨折愈合问题急需中西医同道结合，团结一致，共同攻克这一医学难题。

一九九一年五月四日

怀念先师黄乃聪

洪时清

先师黄乃聪谢世已二十年。他那音容笑貌，还时时萦回在我的脑海里。他的医风医德，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先师原籍金华县塘雅乡塘雅村，1909年1月27日出生时已迁住在金华城内。他九岁丧父。家贫，同年进金华贫民习艺所半工半读。十六岁结业后，怀着“不为良相，亦为良医”的心愿，从义父、金华伤科名医克荣公习中医伤科。克荣公医术高超、医德高尚，对先师悉心传授，要求相当严格。不仅教以伤科医技，还授以武功，武功是伤科的基础。先师习技也刻苦勤奋，不管三九严寒，或是盛夏酷暑，坚持不懈苦练武功，炼出了一副好身架、好武功。我曾亲眼看到他坐在那里，一下子把病人举起来；在做骨拔伸牵引时，我们四个学徒在一起还拉不过他，其臂力确是惊人。先师在生活上虽有义父接济，但无钱购书。和他哥哥黄乃民以借、购书为名，到书店看书。一看一整天，有时连中饭也忘记回家吃。书店老板为他俩的好学精神所感动，主动介绍并取书给他俩看。他哥哥黄乃民就靠勤奋苦学，后来成为全国有名的化学家，曾任大连医学院化学系教授。

先师先是从义父在医局临诊，边学习接骨手法和处方用药，边潜心钻研中医骨伤科名著，并汲取其精华运用于临床，

打下了厚实的业务基础。三十六岁时，和义父在金华城内净渠头自己家里开设骨伤科诊所，行医济世，深得广大群众信赖。

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发展中医药事业，他热烈响应党的号召，为中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首先是与其他名老中医一起，积极在市内发动、组织中医走集体化道路，先后组建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联合诊所。于1958年在联合诊所的基础上，筹建了金华市中医院，先师任中医院首任业务副院长；先师也很重视并积极推行中西医结合。五十年代初，铁路上劳模郑汉柘肱骨下段轧断伴皮肉撕伤，在金华第二医院就医。西医诊断要截肢，郑不同意，请先师会诊。先师主张暂不截肢，运用中西医的专长配合治疗，经双方努力，不仅保住了断臂，而且很快恢复了功能。为此，金华火车站敲锣打鼓送他一块“接骨神手”的匾。此后。他要求自己的学生不仅要学好中医伤科方面的知识，而且与金华卫校联系，要他们去学习解剖、生理、病理、药理、生化等系统的西医知识。还与金华第一、第二医院挂钩，相互邀请会诊，交流经验。他与当时第一医院的骨科主任吴凤堂交往甚密，从不摆名医架子；为发展中医事业，使中医事业后继有人，他不仅选择人员亲自带徒培养，还受聘浙江中医学院任教，自编教材，悉心教授。对各中医学院、卫校和省内各地医卫人员来院实习进修，作为业务院长，竭诚欢迎，全力支持，使其完满地完成见习和实习任务。

先师是在全省享有较高声誉的中医骨伤科名家。专攻伤科，擅长治破伤风、狂犬病、气性坏疽等疑症。他学识渊博，对下一代的教育严谨。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进院的第一天，管人事的叶贤良同志对我进行全面的口试，要求很严。有几个问题我回答不出，可站在旁边的先师刚十岁的女儿却一字不漏地替我回答出来，真可谓有其父必有其女。先师在医技

上也有许多独到之处。对骨折、脱臼病人的整复过程中，他强调“稳、准、狠”；在包扎固定的治疗过程中，他强调“三让四追”“七上八落”；肘关节的治疗过程中注意“收放法”。在伤科的治疗过程中，强调要有整体观念，辩证论治。他善用中医的四诊八纲来诊断千变万化的疾病。对处理任何骨伤科疾病，均注重脾胃肝肾的功能，善用补气养阴的药物。先师丰富的临床经验和造诣，现都已收集在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浙江分会、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主编的《医林荟萃》、《浙江省名老中医学术经验选编》第七辑和《广州中医汇编》中。60年代初所著的《伤科心传》选为浙江中医学院教材。

先师一心为病人，为了病人甚至废寝忘食。不论在街上、家里、医院，只要病人找他，总是会满足其要求。特别是对乡下的农民和城里的搬运工人，更是关怀倍至。他一直坚持半天门诊，令人难以想像的是在半天时间里要看80—100号的病人。每天中饭总要推迟到下午一时至二时，六岁的小儿子黄六一天天都要奉师母之命来催他回家用膳，他叫儿子在旁等候，一直到诊治结束后才回家吃中饭。有时我们做学生的也插上几句，劝请他先回家吃中饭，他就说：这些从乡下来的病人，赶到城里已10多点钟，挂号、候诊一等已中午，我们如果不把他们马上看，他们下午的车就要赶不上。他就是这样宁可自己不吃，也要把方便让给病人。

先师心中只有病人和他人，唯独不顾及自己。在“文革”期间，他也“在劫难逃”，身心倍受摧残，身患重病，又得不到及时治疗 and 休息，致使病情逐渐恶化。1971年三、四月间获“解放”，才发现患肺癌送罗店结核病院住院治疗。时咯血一直不止，病已危笃。5月1日我和另一位同学送一些止血的中草药去。他一见我们进病房，就有气无力地动容道：“你们怎

么到这里来了，还不赶快回去！这里是结核病院”。他自己已病危，还想到我们的安危，怕我们染上结核病。我们见他那焦急的样子，只好哭着和他告别，想不到这竟是我们师徒最后的一面。在第二天他被送杭州抢救，但为时已晚，抢救无效，于5月4日与世长辞！



张兆智先生小传

金华市中医院

张华山

张兆智，一九一〇年出生于金华县新狮乡放生塘。一九一五年就读于当地私塾，学习甚为用功，深得老师赞扬。一九二三年开始兼习医学，一九二五年专攻医业并随父佐诊。一九二九经金华县中医协会考试合格，并经浙江省卫生厅登记领取中医证书和开业许可证，正式悬壶于金华县罗店村。一九四五年，因日寇进犯罗店而避难于出生地放生塘。当年其父病故，举家返回罗店村。其时已稍有医名，求诊者日增。一九五一年参加金华地区医院举办的中学西医班进修一年，掌握了一定的西医学知识，对以后的医术造诣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一九五六年发起组织金华县狮岩乡中医联合诊所，兼任诊所主任。同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一九五八年八月进金华市双龙公社卫生院工作，一九七六年退休。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六日病逝。

张兆智先生一生唯学是务，悉心钻研医学，培养中医人才，医德医术，众口皆碑，民众誉之为“北山神仙”。生前多次当选为金华县、市人民代表，一九五四年曾当选为县人委委员，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八七年连任七届县、市政协委员。

虚心求学问 汲取众家技

先生认为《内经》、《本草》、《伤寒》、《金匱》等医

书，是祖国医学之本始，作为医林之士，务须熟读。只要有空，他总是反复研读，以“谨求古训，博采众方”为座右铭。涉猎群书，汲取众长，并常引用“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温故而知新”之格言教导学生。

“草药一味，气死名医。”先生对民间医药非常重视和推崇，常不耻下问，虚心求教，从而使自己掌握了大量的民间草药及单验方。诊桌上放置草药标本，遇有对症者，则示之以样，教之以法，每多见效。如有一患副鼻窦炎者，天天眉稜骨痛，病情反复，时已十年，经西医穿刺冲洗等治疗，终不见好，影响睡眠，影响工作，尤恐癌变，情绪极坏。先生则教之以鲜鹅不食草每天塞鼻，再配以中药内服，连续半月，多年沉痾得以治愈。由于先生对草药应用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故于一九七五年被邀请参加了《浙江省药用植物志》一书应用部分的审稿工作。

实践出真知 擅长妇科病

先生毕生致力于临床，治学不尚浮华，但求实学。理论须与临床结合，敢于突破，方能推陈出新，古人之学术观点，须付诸实践，方可取信；历代医家验方，要经过验证，方能确认。

“望而知之谓之神”。先生认为中医看病，望诊为首，必须努力掌握望诊的本领，特别五色主病，面部脏腑所主及生克关系，必须牢记在心，临诊时才能得心应手。先生在这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常能望其色而知其病，如山根青黑者，为先天不足；鼻如马鞍者，多难嗣育，等等。独俱心得。

先生医术，长于妇科，求诊病人中，妇科十占七八。

妇科之病多于男科，又别于男科，且病因复杂。先生则认

为房事不节,是妇科病的重要原因之一,经带胎产诸病与房事不节关系密切。若房事过度,则肾精亏损,阴血不足,虚热内生,可致经水日少,崩中漏下或经闭,扰动胎元则胎漏,滑胎。经水未净而行房,多致淤热内结而致腹痛,赤白带下等等。如一赵姓妇人,病起产后,时已七年,带下量多,色白或有血丝,腰酸腹痛,经期加剧,潮来色紫而黯,下有血块,西医诊断为“盆腔炎”。身体日见消瘦。细询其因,言及其夫,对于房事,甚为强悍,每每事后,诸症加剧,脉沉涩,舌质暗红,苔白。先生认为此证男强女弱,勉为其事,日久伤肾,致淤血内结,新血不生,治当攻补兼施,服药30剂,果获效。七年病痛,终告痊愈。

先生曾学过西医知识,诊病之中,常能中西互补,如对不孕症,按中医辨证常有不足。诸如子宫发育不良,输卵管阻塞等等。对子宫发育不良所致之不孕证,先生则用“月季饮”一方治之,方中配以红毛大公鸡一只,其意即取西医理论增加激素样作用,以助子宫之发育而治其本。有方姓女,20岁结婚,五年未有孕,经期尚准,唯经量偏少,经多方治疗未果,求治于张老先生。先生则据前述之辨证用药法则,而请西医妇科医生会诊,经查发现子宫发育不良,投以“月季饮”,嘱每月一剂,连服半年而见效。

饮食疗法也是先生的特长。如用鲤鱼汤治疗急性肾炎水肿;鲫鱼花生饮治疗心悸怔忡;饴糖膏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等等。而最典型的要数服食芝麻保胎益孕,是法既可防治滑胎、死胎,更有优生优育之益。曾有一教师连续数次滑胎、死胎,闻名后求治于先生,则嘱服芝麻,每天一匙,直至足月,顺产一男。病家以为机遇,再次怀孕,未再服用,又产死胎。继后又服,得产一女,终而信服,可谓神矣!

主张治痰先治血，血活痰自洁。先生在长期临床实践中认识到，作为病理产物和致病因素双重性的痰饮与淤血，出自同源而异物，具有共性和个性。而疾病之中不乏痰淤相兼之证。所以见痰不能仅治痰，当须活血化淤。而倡言治痰先治血，血活痰自洁，独树活血化痰之法，用当归二陈汤治疗咳喘疗效颇佳。然其心得经验笔录等于十年浩劫中付之一炬，诚为憾事。

用药如用兵 处方专而精

古人对遣方用药，论述颇多。先生极为推崇徐天昭之《用药如兵论》，乃遣药之准绳。他常说：医家临证，犹如兵家临阵，强将精兵，以奇制胜。从仲景辨证论治，用药制方来看，其方多在三、四味或五、七味之数，制方主次分明，量重力专，相辅相成，沿用至今，效不见逊。欲使遣方用药精专，先生认为必须注意：

1、恪守辨证论治原则。只有辨证确，才能用药明，决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症一药，堆砖砌瓦，凑拼成方，必致药多方大，无的放矢。

2、熟读“本草”，掌握药性。性能相同的药物，如青皮、陈皮、枳实、枳壳、佛手、香椽等，作用大同小异，只要选用一、二味，增大药量即可。

3、熟悉药对。药有四气五味，升降浮沉，本草书中，早有记载。苦辛相伍、寒温并用、升降相宜、相辅相成等原则指导下形成的对药作用，在临床中是非常有用的。如桔梗与半夏，当归与白芍、黄连与肉桂、女真子与旱莲草等等。随症施用，制方必精。先生据此创制了不少验方，如参含汤（党参、鹿含草），仙鹤草汤（党参、仙鹤草）、牙痛宁方（红查肉、路路通）、夏枯草汤（夏枯草、枳壳、姜黄、山楂）。先生临

证，处方施药，四、五味者，占其大半。而主药之量，亦倍于常。先生虽极注重精方简药。但亦不否定大方，要求“师其法而不泥其方”，力求多而不杂，君臣有序，繁而有要。

精湛的医术 无私的奉献

先生从青年时开始行医，成了当地一位名望极高的中医师，勤勤恳恳，几十年如一日，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广大病员，在为民众解除疾苦中赢得了广大群众对他的无限信赖，受到了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尊敬，多次当选为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盛名之下，仍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他对中医事业非常热爱，在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切为了病人。

先生极重医德，对学生的教育，有其独特的方法，每位学生满师时，他老人家就要进行一次别具意义的医德教育。这一方法是极其形象生动的，也使每个学生终身难忘。在出师前一天，先生赠送学生三件礼物：一双胶鞋，一把雨伞，一只电筒。并语重心长地叮咛说：学习出师，先生没什么要求，只希望我的学生能在独立工作后，不怕山高路远，无分白天黑夜，风雨无阻，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服务。

中医学术，历来多有门户之见，先生则主张同道之间相互交流，共同提高。他不仅虚心求教，并积极参加讲座，编写讲稿，培养后辈，呕心沥血，倾本传授，先后授徒三十余人。

记于一九九一年清明节，婺州。

仁 寿 堂

周 斌

严宗溥

从现在酒坊巷将军路小学操场边所存的药王庙石碑上所刻“道光癸卯年桂月之吉，兰邑弟子仁寿堂、包冬月、张望辉、戴莲圻同助”，可知仁寿堂在道光二十三（1843）年八月前已创办。

据考，仁寿堂第一代店主系张姓，兰溪市门张人；第二代店主是张某的亲戚姜仁寿，同是兰溪人；第三代店主系姜仁寿的妻舅徐玉衍，也是兰溪人，均以精制饮片出名。今文昌巷南端靠西侧尚有“徐厚馥堂”（即仁寿堂）栈房界石两块。

仁寿堂名闻遐迩，历久不衰，至今依然屹立于金华市区国药业之林，为现有中药店历史最悠久的一家。其秘诀在于“质量第一，管理严格，顾客至上”。

信誉来自质量。进货时即由协理及专管人员把关，如不合规格就向对方提出退货，决不以次充好，做到货真价实，为精制丸、胶、散、丹、露打下质量基础。在炮制成各类中药时，由内行药工按时令季节的不同，炮制不同的药物。根据药物的性能分别采用干切或鲜切，以保持药性不损。细料研磨做到水上飞标准，驴皮膏不陈三年不上柜台。自办养鹿场，（在今金华市府第二招待所，后到天主堂一带）养鹿28—30头。每年布告周知群众，届时搭台将鹿绞死，而后精制鹿茸血片，配制全

鹿丸，让群众亲睹仁寿堂药物货真价实。每年端午节前后，店内必进行清仓查库，对质差、霉变药品当众销毁，决不坑害顾客。

全店人员多是业务里手，兢兢业业，各司其责。每年农历年初四，由店主向职工宣布人事方案，奖勤罚懒，勤者提级提薪，极个别屡教不改者辞退。职工每年有两个月的假期，如放弃假期提前回店工作，论时日按规定给予工资。利润分红，职工也可分得部分，以资奖励。膳食由店主供给，工资从3元—10元（银元）不等。职工不准赌博。晚上9点钟锁店门，不准再外出。业余时间，学徒必须练算盘，习书法。

中药每味分开包折，做到药材道地，质高量足。如缺某种药物，则请顾客稍等，派人四方寻找，绝不用代用品，主动为顾客排忧解难，使其满意而去。

金华的棉花

叶 邦 惠

金华过去不产棉花，仅有农民少量零星种植，用于自纺自织及絮棉。所以早年外出的邑人，都不知金华故乡出产棉花。

金华推广植棉，始于抗日战争期间，据民国28年(1939)《浙江农业》记载：浙江省棉花地方试验扩至金华，全县植棉面积1210亩，分布在石桥、岭下、积道、塘雅等地，亩产皮棉13.6斤。汤溪植棉则较早，由于产棉可供纺织，24年汤溪县外销土布计洋8万元。32年6月，汤溪县成立土布纺织同业公会，时水北土布、永昌土布誉满乡里，可与绍兴、萧山的土布齐名。

解放后，1949年全县植棉面积4700亩，总产皮棉25.5吨，平均亩产皮棉5.4公斤。1959年开始在孝顺、塘雅、澧浦、罗埠、汤溪等区有计划发展棉花生产，当年全县棉田面积5.27万亩，总产皮棉1158吨，平均亩产22公斤。1961年因棉区没有相应调减粮食征购任务，棉农积极性下降，棉花面积缩减为1.4万亩，亩产仅8公斤。1963年，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落实了棉花生产、收购政策，调减了棉区粮食征购任务，保护了棉农利益，全县植棉面积1.67万亩，亩产上升到36公斤。七十年代，由于认真贯彻了历次全国棉花会议精神，切实加强领导，积极推广以选用良种为重点的科学种棉技术，棉花单产迅速提高，1972、1973、1974年亩产分别为65公斤，65.5公斤和61公斤，

单产跃居全省前列。由此，1973和1974年，县农业局局长何延芳和洋埠公社洋埠大队党支部书记胡增田连续二年出席全国棉花会议，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组长宣益新和县农办主任曹助松分别出席了1975年和1979年的全国棉花会议。八十年代初以来，由于棉花连续三年提价，並实行了超购加价和奖粮政策，1982年起又全面实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激发了棉农积极性，加以科学技术的全面推广，棉花生产又上一个新台阶，1982、1983、1984、1985年亩产皮棉分别为64.5、60、75.8和74公斤。1984年全县棉田面积5.92万亩，总产皮棉4484.9吨，总产值1743.96万元，成为全省九个重点产棉县之一。

金华县棉花不但产量高，而且品质好，如以1983年为例：

金华县和全省（平均）棉花品质比较

	平均品级 (级)	绒长 (毫米)	纺棉比例 1—4级 (%)	50公斤 皮棉价 (元)
金华县	2.49	28.45	88.24	165.02
全省	3.95	27.03	66.63	141.33

据省轻工业厅介绍，杭州第二棉纺厂生产帘子线（做胶轮胎衬

里用)原来都用外省棉和进口棉,1973年发现金华棉花丝光好,细度5800米/克以上,单纤维强力4克左右,纤维整齐度好,试纺得分2700分,超过国家规定2500分标准,因此有关厂家誉称金华棉花为“营养棉”(意即搭配部分金华棉花,能提高棉纱质量),积极向金华县购用原棉,并竭力主张金华多发展棉花。

金华县发展棉花生产条件十分有利,一是金华县地处金衢盆地中段,东阳江、武义江、衢江沿岸河谷平原土层深厚肥沃,排灌灵便,宜于植棉。丘陵梯田地下水位低,通风透光好,经过改良土壤,兴修水利,也适宜于种植棉花,植棉土地资源丰富;二是气候条件好。金华县属中亚热带农业气候区,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7.4℃,无霜期240—270天,特别是7、8、9三月平均气温都在25—30℃,对棉花开花结桃,成熟吐絮十分有利。而且夏秋期间受台风影响较少(这是浙江沿海地区棉花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还常带来喜雨,有利于棉花生产;三是目前金华县农业内部结构还比较单一,商品生产尚欠发达,农民收入不高,迫切要求开展多种经营,发展棉花生产;四是金华县农村劳力富裕,农民又有比较丰富的植棉经验,有利于精耕细作,提高科学种棉水平;五是金华县畜牧业较为发达,有机肥料多,也有利于棉花生产的发展。

由于解放后棉花生产的发展,为棉纺织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故本县近几年创办的棉纺厂就有三家。

金华县解放后历年棉花生产情况

年份	面积 万亩	亩产 公斤	皮棉总产 吨	子棉衣分 %	平均品级	绒 毫米	长 毫米	纺 (1—4级) %	收 总金 额 万元
1949	0.47	5.4	25.5						
1950	0.63	9.3	58.6						
1952	0.47	11.3	53.4						
1953	0.51	7.8	39.7						
1957	0.03	8.8	2.7						
1959	5.27	22	1158						
1960	5.60	21	1173.3						
1961	1.40	8	112.1						
1962	1.21	10.5	126.7						
1963	1.67	36	602.1						
1964	3.78	41	1550.6						

年份	面积 万亩	亩产 公斤	皮棉总产 吨	子棉衣分 %	平均品级	绒长 毫米	棉纺 (1—4级) %	收总 金额 万元
1965	3.76	43	1615.4					368.42
1966	2.93	40	1171.4					284.49
1967	2.68	44	1177.3					
1968	3.88	42.5	1646.9	36.67				
1969	2.64	43	1136.7	36.70				
1970	1.79	46.5	832.4	36.00				
1971	1.33	45	596.7	37.01				127.55
1972	1.34	65	870.6	39.34			90.6	237.38
1973	1.80	65.5	1180.3	39.30				288.71
1974	2.79	61	1701.3	39.11	2.9	28.55	91.7	434.68
1975	3.47	55.5	1924.7	38.82	2.66	28.57	89.3	498.23
1976	2.43	48.5	1179.0	38.72	2.06	28.81	94.8	330.62

年份	面积 万亩	亩产 公斤	皮棉总产 吨	子棉衣分 %	平均品级	绒长 毫米	棉(1—4级) %	收总金额 万元
1977	1.58	51.1	814.3	38.42	2.77	28.69	84.04	224.44
1978	1.40	56	781.7	38.22	2.43	28.64	92.9	248.32
1979	2.56	58.5	1495.8	39.17	2.37	28.57	92.06	643.09
1980	8.04	48	3858.4	39.45	2.82	28.42	89.8	1696.35
1981	6.84	49.5	3387.3	35.98	3.28	27.86	80.49	1378.64
1982	6.34	64.5	4103.0	36.72	2.56	28.38	87.81	1732.49
1983	6.30	60	3780.0	36.63	2.49	28.45	88.24	1617.99
1984	5.92	75.8	4484.9	36.96	2.27	28.64	93.43	1743.96
1985	4.96	74	3814.5	36.61	3.14	28.34	89.63	1270.57

金华酒摭谈

唐梓桑

我们中华民族远在上古就已有素称发达的农业。随着农耕生产的发展，我们的祖先便发明了用谷物酿酒的技术。至迟在三千一百年以前，先民们就已会用曲蘖成熟地酿酒了。《尚书·商书·说命下》：“若作酒醴，尔维曲蘖”就是佐证。

金华地方酿酒，其起源至迟也可以追溯到春秋中晚期，距今也已有二千五百余年的悠久历史。当时金华属越地，越国西界的姑蔑（今衢州东北部）和濂水（即兰江）流域一带，先民们酿酒与饮酒已较普遍。至唐、五代时，婺州民间酿酒风气已十分盛行。当地的濂水酒，酿造技术已相当成熟，并已初具声名。《谈荟》一书中称之为“濂溪香”。

随着酿酒技术的成熟，和酒类的大量生产，才会出现专用的酿酒器具和饮酒器皿，这些器具器皿的存在，是酒类酿造、饮用的确凿证据。根据考古发掘证明，“金华地区的祖先，早在四千年前就已知道利用当地瓷土和石灰釉制造陶器……到商晚期，创造烧出成功的原始瓷……东汉晚期真正成熟的瓷器已能生产……唐、北宋，婺州窑瓷业生产达到了鼎盛时期。”今天我们从发掘出来的各个时期的大量古陶瓷器皿来看，婺州窑中生产的樽、罍、盃、盅、杯、执壶等酒器酒具均占有很大的比例。尤其是从现在仍陈列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展出的，金华县古方村三国

墓出土的巨形青黄釉瓷罍，形状似壶，造型匀称，弦纹雅致，高达36.7厘米，口径30厘米，腹径48.5厘米，底径20.4厘米，是迄今国内罕见的古代大型瓷酒具。这不仅说明一千七百多年前，婺州窑制瓷技术的精湛和高超，也充分证明三国时朝金华酿酒和饮酒的发展水平和程度。1987年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浙江古代婺州出土瓷器展览”所陈列的古瓷器中，酒具、酒器比例之大，特别引起有关研究人员的关注和重视。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教授说：“三十年代我曾住在金华，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那里民风尚酒，如果说逊于绍兴，那金华却胜过南北各地；从展览看，说金华在这里开了半个酒文化展览并不过份。”据史料记载，吴越王钱镠占有浙东十三州时，为了偏安江南，岁岁向五代梁、唐、晋、汉、周各王朝进贡。贡品中金华酒和绍兴酒均列为每岁必备的“定制”之品。对民间，两地均开始课征酒税。金华和绍兴酒业之兴旺，于此足见一斑。至今金华工商界的几位耄耋老人，尚能说及儿时听长辈老人讲述宋代时金华黄酒和火腿一道，千里迢迢运往黄河一带抗金前线，稿劳“八字军”的传说。明代长篇小说《金瓶梅》在描述宴饮场面时，很少不提及“金华酒”的。1980年新发掘校注刊行的古典长篇小说《歧路灯》，作者是河南人李绿园，成书年代早于《红楼梦》。该书写到明嘉靖年间祥符（今开封）一带民间饮酒习俗时，也多处说及“金华、绍兴酒”是当时最受人爱饮的，并有以品尝“金华酒”为荣的记述。饮“金华酒”已是当时的时尚乐事；馈送“金华酒若干坛”更是极珍贵而敬重的赠礼。《歧路灯》一书中，并常将金华酒名列绍兴酒（或作“金华绍兴酒”）之前，想必有其一定缘由，值得作进一步探究。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巨著中，引前人汪颖《药物本草》的记述说“入药用东阳酒最佳，其酒自古擅名。

……饮之至醉，不头痛，不口干，不作泻；其水称之，重于他水，邻邑所造，俱不然，皆水土之美也。”时珍曰：“东阳酒即金华酒，……常饮及入药俱良”。《本草纲目》列酒不下七八十种，文中〔发明〕所征引诸家说及〔附方〕多列于“东阳酒”条下，可见东阳酒是当时药物上应用的正宗“药引酒”无疑。

《重修浙江通志稿》卷一〇六，物产志“酒”中记载道：“《名酒记》：金华府有金华酒。”该文在追溯金华酒的发展时亦说：“《食物本草》：‘东阳酒最佳，自古擅名……旧东阳酒殆以郡得名’（唐注：金华古为东阳郡地）。《麴本草》云：‘其水最佳，称之重于他水。……惟用麩曲、蓼汁拌造，假其辛辣之力（唐注：金华乡间亦称黄酒为“蓼草水”，似因于此）。……酒味辛烈，清香远达，入门就闻……俗人因其水好竟造酒。天香风味，奇绝。’”。“金华酒”条目下还记有当时的地方花色名酒十多种，如“真珠酒”“花露酒”“香山酒”“花曲酒”“桃花酒”“三白酒”等等。此外，还引录了钱惟善送东阳酒诗，诗曰：“故人远送东阳酒，野客新开北海樽。不用寻梅溪上路，春风吹与满乾坤。”在古代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液体的酒要远送是很不容易的，非是上品决无此机缘。东阳酒品质之好，不仅诗人赞誉不已，更可从饮者个红光满面，春意盎然上窥见一斑。

金华地方出产名酒，究其原因确在于水清、曲异，同时粮食品种多样并有丰裕的产量作保证。作为主要品种的黄酒，由于用粮用曲及制作方法的差异，又分为新甘生、新陈、陈甘生、三年陈、白字酒、双落酒（《齐民要术》称“桑落酒”）和寿生酒等十余个品种。从基本上保留至今的黄酒品种来看，其中寿生酒品质之醇厚馨香，鲜美可口，远非其它黄酒能与之媲美。金华城乡民间置办喜庆筵宴时，大多以斟寿生酒

款宾待客为贵，约定俗成，已成常习，因此寿生酒在金华酒中其佼佼者的地位和声誉历久不衰。

金华寿生酒，选用当年精白糯米（以生长期长的为佳）作原料，用红曲（米曲）和白曲（麦曲）进行糖化发酵，并用分批投料的传统喂饭法分缸酿造。生产季节严格限于从立冬到立春止的冬令节气内投料酿制，有“冬浆冬水酿冬酒”的特定工艺要求，更有灌坛后进行后发酵的独特工艺过程，故发酵十分充分。一般生产周期要比普通黄酒长五倍以上。压榨盛坛后还要有一年以上的存化期，始可出厂销售。自然也有以越陈越好的说法。因为寿生酒在配曲、发酵、榨制、贮存等工艺流程中有自己独特而精细的酿造方法，所以成品酒兼有红曲酒特有的色味和白曲酒特有的鲜、香品质。我国制曲酒发现和应用红曲霉，始于公元十世纪的唐末宋初时期，金华寿生酒按一定比例并用红、白曲进行低温发酵，这一工艺实际上是古代白曲酿酒法和当时新兴的红曲酿酒法的过渡型酿造的遗存；是我国红、白曲混合酿酒法的一种优选技术，它的保留至今在我国酿酒和整个酿造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同时，它给金华寿生酒创始于北宋以后的说法，以有力的佐证，也是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这种独树一帜的以红、白曲混合酿酒法生产的寿生酒，色泽金黄清亮，香气浓郁芬芳，酒体丰富柔和，口味醇厚鲜美而受到饮者的欣赏和珍爱，该是极其自然的。金华民间传说，南宋女词人李清照漂泊金华时，曾三醉“气压江城十四州”的八咏楼，被人传为佳话。她哀戚悲愤，以酒浇愁“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固然是一面，而那独具魅力的金华佳酿，又怎能不平添词人的几分酒兴和珍爱之心呢！金华寿生酒，不仅是高尚的营养饮料，而且由于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维生素，酒香特别浓郁，解膈去腥力特强，又能增添菜肴鲜香的

地方特色，所以不少金华传统名菜以它为特定调味品，诸如著名的“寿生焖鸡”“寿生鱼条”“寿生火腿鸡”“寿生焖肉”等等。寿生系列名菜，不仅是浙江名馐，而且驰誉中国烹坛。

有关寿生酒的创始问题，典籍虽少记载，但在当地民间却有几说：一说寿生酒创始于北宋中期，不久即闻名，曾用以稿赏“八字军”；一说初创于十九世纪前半期，在金华城内马门头一家酒坊中问世。后经酿酒工人不断总结提高，终于自成一套独特工艺而成；一说创始于金华曹宅一家百年老酒坊，坊名叫曹恒聚，即今金华寿生酒厂的前身，百年前的曲霉糖化菌如今仍在繁衍生长，这里的酒香醇郁胜于他处；另有一说是据《双溪戚氏宗谱》卷六所载，该氏有一“寿三”处士者，为人醇厚，专以造酒为业并致富。原在城内酒坊巷酿酒，后移至弥陀桥边（现溪下街一带）设坊酿酒。因酒特优，人以制作者“寿三”（金华话“寿三”与“寿生”音似）命名，称为“寿三酒”，后记为“寿生酒”。据该宗谱载，寿三处士生于元末至正乙酉（1345年），歿于明永乐戊戌（1418年）。按此说，则寿生酒历史至少也有六百三十年左右了。金华寿生酒的渊源正宗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然而诸说中提及的马门头、酒坊巷和曹宅三地，历史上确有酒坊存在。尤其是城内的酒坊巷和县东北三十里的曹宅古镇，古时大小酒坊林立，且两地都有“酒泉古井，”井水清澈甘甜质重，大旱不枯。两处古井至今尚存，水质极佳。

清光绪《金华县志》卷十二志食货·物产制造一节，有如下的记述：“其为邑所著名者为酒、为茶、为豉、为火腿（注：即火腿）……”。从中可见金华酒是当地物产制造中之居首者。其它特产如茶叶、豆豉乃至后来驰誉中外的金华火腿，当时尚居于金华酒之后。值得注意的是该志转录宋人周密《武林旧

事》里的这样一段话：“史金华造酒，近时京师嘉尚，语云：‘晋字金华，酒围棋左传文’。”《武林旧事》约成于元世祖至元十七年至二十七年（1280—1290年），以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为记述对象，可见金华酒当时已被嘉誉为“字、酒、棋、文”四绝中的一绝而风靡南宋都城。且字、棋、文指的又均系历史产物，唯有金华酒是当时所生产的。金华酒这一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和酒中状元的地位是可确信无疑的。

《光绪金华县志》同时又转录了前朝一些有关酒务（赋税）的情况：北宋时县城酒租额为二千二百六十四贯一百二十五文；（乡）村（酒）坊二十四处一界为钱二万五千一十八贯一百五十文。而同期茶租钱仅为一百七十五贯一百七十六文。元代元贞二年，酒课为中统钞（元世祖中统年间货币名称）一千五百五十三錠三十五两二分二厘，而同期茶课只有六錠二十四两四钱七分。从中进行比较，不难看出当时金华酿酒业盛况之一斑。再说没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和相当的产量，要在供应本地消费之外，满足偌大一个南宋都城并赢得如此高的美誉，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直到清代，金华酒的品质仍为广大饮者所推崇。清代著名诗人、品味家袁枚，在其《随园食单》一书中说：“金华酒，有绍兴之清，无其涩；有女贞之甜，无其俗，亦以陈者为佳，盖金华一路，水清之故也。”袁枚是一位自认“深知酒味”而“律酒过严”的人。面对当时众多名酒，他在该书中仅“取可饮者”十种加以介绍评说。他对金华酒的评析，可谓精辟独到，言之凿凿，确可据信。水清而酒冽，金华一带水系确是得天独厚。因而，唐、宋、元、明、清以来，金华酒业一直比较兴旺。抗日战争爆发后，战乱连年，社会动荡，原料缺乏，销路萎缩，酒价下跌，金华酒业走向下坡。据从业老人回忆，1940年前后，

因粮食恐慌，国民党政府曾下令限酿数额，甚至封闭民间酒坊，致使生产更趋下降，黄酒品种更是所剩无几。抗日胜利后，生产有所恢复，坊厂重开，金华酒业初露重振起色。1949年5月金华解放，不久酒类产量即逐年上升。据原金华地区税务局统计资料表明，1951年所属8县共有大小酒坊464家（金华130家，兰溪47家，东阳11家，义乌44家，永康22家，武义25家，浦江158家，汤溪27家）；年产各类黄酒2791吨，白酒505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后，金华酒业在专卖、合并、集中的基础上，生产又得到稳步发展，技术改造有较大步伐。1956年产黄酒5795吨，白酒1494吨。1970年产黄酒11720吨，白酒1735吨。1975年产黄酒12687吨，白酒1882吨。1980年产黄酒20429吨，白酒4738吨。1987年黄酒产量达57567吨，为解放初期的20倍，创历史最高水平。1988年产白酒6743吨，是历史上最高的一年。

二十世纪以来，作为我国传统黄酒的金华酒，一直为广大饮者所赏识。金华寿生酒更是受到各方的褒扬，因其营养价值高，有液体蛋糕之称。1915年，荣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蜚声海外。1963年全国第二届评酒会上，被评为全国优质酒，荣获银质奖章。1984年获轻工部酒类质量大赛银杯、部优质酒称号。1988年底北京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上，锣鼓洞牌和松鹤牌金华寿生酒，双双荣获国家金奖。锣鼓洞牌金华寿生酒又荣获1990年西湖国际博览会金奖。

金华酒的历史地位正在振兴中逐步恢复，金华寿生酒的声音日益提高，并以崭新的面貌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金华酒将会在更多的家庭餐桌上流芳溢樽，供广大消费者开怀朵颐。

参考资料：

①《光绪金华县志》

- ②《浙江通志》《重修浙江通志稿》
- ③《浙江风物志》
- ④《浙江特产风味指南》
- ⑤《中国陶瓷史》
- ⑥《金华统计四十年》
- ⑦袁枚：《随园食单》
- ⑧曾纵野：《中国名酒志》
- ⑨金志文：《绍兴老酒简史》
- ⑩贡昌：《婺州古瓷》
- ⑪周密：《武林旧事》
- ⑫李时珍：《本草纲目》

婺州名产金佛手

邵介安

“春飞白雪花，秋吐黄金实。”春暖后，佛手枝头缀满朵朵白花，分外耀眼；秋天果实成熟，皮黄如橙，肉白如玉。微风吹拂，香气袭人。金华佛手倍受人喜爱。

佛手学名：*Citrus medicl var Sarcodactylis* (Noof)Sningle。它的异名很多，各地叫法不一。有的叫“佛手香椽”（《闽书》）、“蜜笛柑”（《黔书》）、“蜜罗柑”（《左州杂记》），有的叫“福寿柑”（《民间常用中草药汇编》）、“五指柑”（《广州药志》）等等。人们通常称“佛手”。

佛手属芸香科柑桔属，与柑桔、柚等果木类似，与香椽、柠檬等有近缘关系。佛手一株挂果多的可达90余只，单果重1.5公斤。秋末冬初，佛手枝头挂满金果，只只状如人手，受到人们青睐。

一、金华佛手的栽培历史

关于佛手的来历，说法颇多。当地民间有一则生动的传说：古时候金华山（即北山）麓，住着独户人家，有母子俩人，母亲年老多病，终日双手捂胸，胸腹胀痛，愁眉不展。她有个儿子，名唤孝顺。为了给母亲治病，他四处求医，终无效果。一天夜里，孝顺梦见一位美丽的仙女，赐给一只状如她玉手的

果子，送母亲一闻，病就好了。孝顺下了决心要寻找那仙女玉手般的果子，天一亮就出发。傍晚，爬山越岭一整天的孝顺感到精疲力尽，坐在山岙里的一块大石上歇息。忽然一只小青蛙跳到他面前，咯咯咯地叫了起来，仔细一听，那调儿是这样的：

金华山上有金果，
金果能救你老母。
明晚子时山门口，
大好时机莫错过。

第二天深夜，孝顺爬上了金华山顶，顺利地进了山门。只见繁花遍地，黄果满枝，金光耀眼。一位佳丽女子飘然而来，孝顺定睛一瞧：果然是梦中所见的那位仙女。他喜出望外，恳求一只玉手般的果子。仙女道：“你的孝心真诚，送天桔一只，给你母亲治病。”仙女赐了仙果，并赠一苗让他回去种植，以便让他的母亲天天闻到“天桔”之香气，根除病患。孝顺非常高兴，带回“天桔”果实和苗木。

孝顺将“天桔”给母亲煎汤服用，果显神效，母亲的胸腹胀痛立即痊愈。母子俩喜悦满怀，于是辛勤培育“天桔”苗。数年后苗木大发展，他俩又送给乡邻种植。大家认定那位仙女就是观音佛，“天桔”果就是观音的玉手，因此叫它为“佛手”。

当然这只是民间的有趣传说，从植物学角度讲，佛手就是枸橼的一个变种，原产佛教发源地印度，后传入我国种植。目前在我国的浙江、江苏、广东、福建、云南、广西、安徽、四川等省市均有栽培，其中尤以我市产的佛手质量最佳，久负盛名，受到中外人士的喜爱。

为什么金华佛手有名？这与它的品种、种植的环境条件及

栽培技艺分不开的。

金华佛手大多为南京种（又名金华种），该品种果形适中、美观；药用成份含量高，其它品种远远不及它；且耐贮藏，放在新鲜松针中数月之内，色香味形不变；色泽金黄，芳香不衰。

金华位于金衢盆地，气候温和，无霜期长，雨量充沛，空气湿润，优越的自然条件对栽培佛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金华栽培佛手久负盛名，花农技艺高超，世代相传，不断发展。道光《金华县志》载：“邑之市花者为西吴、白竹二庄，……佛手柑之类皆有之。”光绪二十年（1894）续修的《金华县志》描写更为详细：“佛手柑，邑西吴等庄为仙洞水所经，柑性宜之，其透指有长至尺余者，香色亦胜闽产。”仙洞，指双龙等洞。从这些史料来看，金华种植佛手早具有高超技艺。

据《环溪吴氏十四修宗谱》载，金华佛手的种植始祖是西吴村的巽源公（1592—1674）。他“由吴闾带归佛手柑一种，玲珑奇巧，诚果中之仙品也。”巽源公，讳必刚。吴闾，指苏州。他从苏州一带引种到金华种植。此后，西吴村民十分重视种植佛手，“以养佛手为业，售之商会，橐金而归，手足无甚劳，而衣食有赢余。”从巽源公引种繁殖至今，金华佛手栽培历史距今已有350余年。佛手品种经过当地劳动人民的驯化和辛勤培育，佛手栽培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金华终于成为中外闻名的“佛手之乡”。

二、金华佛手的珍贵价值

金华佛手的珍贵价值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重要方面：

（1）观赏价值高。佛手的花朵小巧标致，一朵一朵的白

花有如天上的繁星；一串一串，恰如簇簇白玉，春夏秋均开花。夏天树上挂满小果，到秋天金色的果实，在碧绿的叶片衬托下，显得十分美观。佛手的果实形状十分奇特：有伸着长长手指的，有紧紧握成拳头的，还有半开半闭的，玲珑剔透，形状各异，佛手挂果时间又长，数月乃至一年不落，可供长期观赏。金黄色的佛手放在房间内，时时放出诱人的幽香，令人心旷神怡。清朝诗人雪樵赞美金华佛手：“苍烟罨丘壑，绿桔种百千。黄柑尤佳丽，伸指或握拳。清香扑我鼻，直欲吐龙涎。”（见《吴氏宗谱》）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1960年冬亲临罗店花果队视察金华佛手生产，并作了重要指示：“佛手国家很需要，你们要好好养。公社要养，大队要养，社员也要养。”1984年日本青年访华团来我国访问，金华佛手作为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赠送东瀛客人。全国举办首届、二届花卉博览会，金华佛手作为浙江花卉代表选送展出。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观光，视佛手为珍宝。1989年4月19日，日本海部首相的朋友、日本花卉专家荻须悟到罗店中学考察，对佛手赞不绝口。市场上金华佛手供不应求，畅销不衰。

（2）药用价值高。佛手全身都是宝，均可入药治病。根可治男人下消及四肢酸软；花可泡茶饮，有消气作用；果实可治胃病、呕吐、噎膈、高血压、气管炎等病症。临床报道，陈佛手可治小儿传染性肝炎，1—3岁每日服10—15克，3—5岁服15—20克，5—7岁服20—25克，7—10岁服30克。每剂药中再加败酱草每日每岁为1克，10岁以上每2岁增加1克。水煎10—15分钟，分三次服。7—10天为一疗程。治疗64例，平均4—5天黄疸消失，精神食欲转佳，有效率在90%以上。

入药的佛手有：

a、鲜佛手。形状下部圆形，近柄处略窄，有残留果柄或

柄痕。果上部分握拳。或伸指佛手手指一般长度为 12—16cm。顶端稍尖或扭曲。表皮橙黄色或绿褐色，有纵横不齐的皱纹，还有疣状突起，较平坦的地方可看到细细的窝点。皮厚1.5—4 mm。内部果肉为白色或黄白色。果实中心有两条纵行筋络条纹，直达顶端。肉质较软而有弹性，芳香，味苦。

b、佛手片，小种佛手，片小质厚，不平整，质较坚硬易折断。药片长4—6 cm，宽约3 cm。绿边白肉，稍有黄色花纹。芳香浓郁。大种佛手，片大质薄，多皱纹，药片长6—10cm，宽4—6 cm，厚度1—2cm。黄边白肉，花纹明显，但香气欠佳。

c、佛手花。干燥花朵，长1.5cm；花柄短，约2—5mm。花萼杯状，或略呈五角形，长1—1.2cm，宽3—5 mm，向内卷曲，外表淡棕黄色，有棕褐色麻点。雄蕊多数，黄白色，长0.8—1cm。雌蕊子房上渐狭，体轻，质脆，味香，微苦。制药以朵大，完整及香气浓郁者为佳，在晴天日出前疏花时采，或拾败落花晒干或烘干。

d、佛手露。为佛手柑的蒸馏液，需要一定设备方能制取。

c、佛手柑根。9—10月挖取，晒干备用。

据《归终》等书记载，佛手药用可“入肝胃二经”。果实的成份有梨萜素($C_{11}H_{10}O_4$)、布柑甙($C_{30}H_{44}O_{21}$)、橙皮甙($C_{28}H_{34}O_{15}$)等，能治鼓胀发肿、妇女白带等病症，又能醒酒。

(3) 经济价值高。由于佛手具有较高的观赏、药用价值，佛手的经济价值也颇高。有一佛手专业户在海拔500m的高山上养佛手，从1979年以来，先后种佛手300盆，占地仅3分5厘，1984年结果400多斤，收入4000余元。1985年又在治

虫防病上下功失，最多一株结果40余只，仅佛手一项年收入达7000余元。金华县政协委员邢海文种佛手，年收入达到近万元。解放军某部制药厂用佛手制成“金佛酒”，芳香扑鼻，醇甘味美，又兼有治病之功效，受到有关专家好评，并获得了国家铜牌奖。

三、金华佛手的品种

佛手为常绿的小乔木或灌木。盆栽结果的佛手树，一般高度为1 m左右；若地栽的话，最高的可达2—3 m，似山坡上大丛的桔树。

佛手果实幼时呈淡绿色。幼果在枝头上坐稳，需要20—30天。发育长大后呈深绿色，成熟后有金黄色的光泽。春果一般在初秋成熟。夏秋果一般在冬初成熟。果实成熟期3个月左右。春果一般顶端分裂如手指，呈手指形，俗呼“开佛手”或“伸佛手”。夏秋果一般为拳头形，人们称之为“闭佛手”或“拳佛手”。大种佛手不论何时结的果，一般均呈“拳佛手”形状。

全国佛手品种颇多，不一一细列。现仅以金华地区栽培的品种略加分类。

接引入的地区来分，本市的佛手品种有：

a. 南京种。该品种自明末清初西吴村巽源公从江苏引种本地栽培。因为品质优良，经过不断驯化培育，它已成为我市的主要品种。因此，人们又称它为“金华种”。该品种形态特征是：树形较高大，主干呈灰绿色，叶形较小，长8 cm，阔5 cm，叶片颜色青绿。花白色，有单性花、两性花两种。果实在幼小时，落果严重。果实长到3 cm时，才不易落果。果实成熟后大小不一，最大的单果可达500以上，小的不足100克。成熟时呈金黄色，有拳指及闭拳两种形状。此品种产量高，大小年现象不严重，晒干率高，药用价值好，色味清香。

惹人喜爱。它是我市佛手的名种。

b. 福建种。该品种是花农从福建漳州市引种而来。树形高大，枝条粗壮直立，短枝较多。叶片大，嫩梢端紫红色，花为红色。果实大，最大的单果达1.5千克以上，一般均在250克左右，产量高。但果实形状不佳，果实内水多，易腐烂，不易贮藏，但可制佛手酒及药材之美，药用价值不及南京种。

若按花朵的颜色来分类，有：

a. 白花佛手。花白色，伏果多为伸手形，秋果为握拳形。果皮疙瘩多，油泡多，香气浓，质地佳。

b. 红花佛手。花红色或紫红色，伏果与秋果均为拳头形。果皮表面光滑，油泡少，质地差。

若按果形大小来分类，本市佛手的主要品种有：

a、大种。长枝下垂，叶形较大，嫩梢紫红色，果实大，大小年明显，耐寒性差。

b、小种。树枝淡灰色，花白色，果实多而小，似鸡蛋状，成熟期早，多呈拳形集合状。质量好，香气浓，抗寒性差。

e、南京种（即金华种）果实美观，大小适中，受到人们青睐。（它的形状大小处于上述两品种之间）它是市场和外商最受欢迎的佳种。

四、金华佛手的生产现状

当前我市佛手种植的有：罗店、后溪河、西吴、竹马、建新、双龙洞洞前村、石墙足、山口、东盛村等等。主要产地在北山麓一带。

据罗店等村庄调查，约有500多农户种植佛手，苗木有40多万株，年产果实5000余斤，年产值6万余元。更可喜的涌现出

一批种植佛手的专业户，为农民致富闯出了一条新路子。

金华佛手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目前生产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栽培技术十分陈旧落后，产量普遍较低，每株平均不到1公斤，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因此加强佛手栽培的科学研究，开展佛手加工的新产品，做到一“手”多用，如制药、制酒、制蜜饯等，争取佛手及其加工产品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已是当务之急。

附：

栽培金华佛手的主要生产技术措施

①佛手园地要选择阳光充足、空气湿润、干净，土壤肥沃的地方，不能建在环境污染、干燥，西北风强烈的地方。

②要做到薄肥勤施、生肥要腐烂过。抽梢先后要施氮肥为主，开花结果期适用磷钾肥。果实膨大期，宜增施肥水。肥水之比为1：9。

③要经常防治病虫害。佛手的主要虫害是红蜘蛛、潜叶蛾（俗称画图虫），前者可用三氯杀螨醇稀释喷杀；后者可用杀虫双稀释喷杀。

④要将病虫枝、残枝、徒长枝、荫膛枝除去，要除去单性花，保留两性花。

⑤注意安全越冬。在霜降前，盆栽佛手可用塑料搭棚防寒；地栽佛手可用稻草披盖，雨雪时要加盖塑料薄膜。

漫话金华豆豉

唐梓桑

豆豉，是用大豆浸透煮熟发酵后制成的传统豆制品。豆豉有咸淡两种，“淡豆豉”入药；咸的供食用。汉末刘熙在《释名·释饮食》中说：“豉，嗜也。五味调和，须之而咸，乃可甘嗜也”。豆豉是继酱之后出现的一种鲜美的调味品和食品。西汉史游《急就篇》里有“茺夷盐豉”之语。《史记·货殖列传》也有“蘖曲盐豉千答（合）”的记载。后魏贾思勰所撰《齐民要术》中更有豆豉制作法的详细记述。这些足以说明早在二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我国人民就已经发明并食用豆豉了。

金华豆豉，在历史上是颇有名的。有关饮食资料表明，金华豆豉在唐末宋初就与四川的成都豆豉，江苏的镇江豆豉齐名，成为古代中国著名的调味佳品和家常菜肴，受到人们的喜食并一直传承下来。

直到宋代，一部集江南（主要是浙江）民间食品制作方法的重要食典《浦江吴氏中馈录》，就已记录下当年金华民间的豆豉作制法：

黄子①一斗五升，筛去面，令净，茄五斤，瓜十二斤，姜觔（斤）十四两，桔丝随放，小茴香一升，炒盐四斤六两，青椒一斤，一处拌入瓮中，捺实，倾金花酒②或酒娘，淹过各物两寸许，纸箬扎缚，泥封，

露③四十九日。坛上写“东”、“西”字记号，轮晒日满，倾大盆内，晒干为度，以黄草、布罩盖。

宋、元数百年来，金华豆豉基本上沿着这个传统方法制作。大豆为主料，有青、黄、白皮等豆类品种变化外，菜瓜、茄子、姜、桔皮、青椒、小茴香及著名的金华酒等已成为金华豆豉的特定的配辅料。经过长期的沿习制作和不断改进，金华豆豉形成了甘咸鲜美，清香糯润的独特风味，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和赞赏。

明代时，万历年间钱塘人高濂，在所撰《遵生八笺·饮馔服食笺》中又一次采录了上述金华豆豉方。金华豆豉制作法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推广，不少地方城乡家庭转相效仿。特别是两浙广大农村，农家制作豆豉，无不以金华为楷范。在金华豆豉制作法广为传播的基础上，人们根据口味爱好，又分别添加入了紫苏、甘草、花椒、大茴香、砂仁、藿香、薄荷、杏仁、白豆蔻等香料，制作成了“五香豆豉”、“十香豆豉”、“九制香豆豉”等风味品种，丰富了豆豉家族的成员，使豆豉在风味品种和烹制菜肴等方面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提高。

金华豆豉传承到清代，制作和食用范围更其广泛和普及了，清初文学家朱彝尊在《食宪鸿秘》这部烹饪典籍中，不仅采录其制法，并指出了防蝇要求。直到清代中叶，四川名人李化楠宦游江浙时撰就的饮食专著——《醒园录》，对制好豆豉必定要配用金华甜酒等制作关键作了强调。清朝著名医学家王士雄在他的食疗名著《随息居食谱》一书里说：“豉，咸平和胃，解鱼腥毒，不仅为素肴佳味也”，评说是极确切的。他还特别盛赞豆豉以“金华造者胜”。清诗人、品味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一书“黄鱼”烹调法里，特别指出要加“金华豆豉一茶杯”同滚。说这样烧制的黄鱼才“有沉浸浓郁之妙”。他得到的经验是：

“大抵黄鱼亦系浓厚之物，不可清治之也”。在这里，他实际上已经总结出豆豉最适宜于烹制浓厚味菜肴和具有解鱼肉腥膻作用的规律了。随着豆类生产的发展，清朝时金华豆豉已成为当地广大城乡民众普遍喜食的民间菜肴。在乡村，农家几乎户户制豉，供全家一年自食和馈赠亲友之需；在城里，不仅官酱园、私人作坊常年有售，南北货店也都有备货，供市场和外地来客购求。就产地来说，这时已遍及前金华府属范围，其中尤以金华、兰溪、义乌、武义等县为最。怪不得清光绪《金华县志》食货物产制造目记载道：“其为邑所著名者为酒、为茶、为豉、为火腿（腿）”了。当时豆豉已成为金华地方四大特产之一，闻名遐迩的烹调辅料。然而其作为调味功能方面，部分地已为使用较之方便的酱油所取代，这也是客观的事实。也就是说金华豆豉面临着挑战的一面。

二十世纪初，由于交通的日益发达，不仅在沪、杭等城市常可买到金华豆豉，就是济南、北京、广州和香港等地市场，也可见到它的踪迹，受大城市居民的赏识。1915年，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上，作为中国传统调味品的金华豆豉受到了国际烹饪界的特别重视，竟荣获了银质奖。嗣后，金华豆豉开拓了国际市场，远销至东南亚及欧美的一些地区，赢得了人们的喜爱。三十年代初，“味之素”“味精”等现代调味品传入中国，金华豆豉又一次经受了新的挑战。然而，在1929年万商云集的杭州西湖博览会期间，用金华豆豉烧制的江南传统民俗菜“豆豉鱼”和“豉汁鸡”，竟以其色泽红亮，清香浓郁，肉质鲜嫩，汁浓味美的独特风味，胜过了用味精之类烹制的同类菜肴，成了博览会上脍炙人口的中国菜名品，为中外食客所称颂。金华豆豉以自己独树一帜的清香美味，经受了与现代调味的竞争，并以其它调味品难以完全替代的独特风味和品质继续传承至今。

金华豆豉，选用优质青皮大豆为主料，经筛选、浸泡、蒸煮，拌麸、发酵、晒黄、搓碎、泔酒、拌香料、闷晒（装坛后发酵）、晾干等十多道工序的工艺流程精制而成。成品颗粒均匀，色泽紫褐透红，油润发亮，清香沁人心脾，味美鲜糯，嚼后香留齿颊，舌富余味，回香经久馥郁。经科学分析，金华豆豉具有的特殊鲜味和香气，主要来自大豆经丝状曲菌发酵分解，产生了多种大量有机酸、醇、脂和氨基酸等物质。同时，不仅使豆类本身变得更易被人体消化吸收，而且具有很强的帮助消化，增进食欲，下气调中，调节生理功能的可贵作用。据分析每100克豆豉中含有蛋白质19.5克，脂肪6.9克，碳水化合物25克，热量240千卡，钙130毫克，磷183毫克，铁4.2毫克，硫胺素0.07毫克，核黄素0.34毫克，尼克酸2.4毫克，更有人体必需氨基酸多种。维生素B₁₂的含量更多，能改善人体代谢，增进造血机能的活力。豆豉对老弱病幼均极为适宜。金华豆豉以它选料严格，配料讲究，三蒸三晒，伏制秋成的操作规程，保证了成品质量的优良上乘，受人喜爱，久传不衰。

金华豆豉的吃食法，在古时除广泛用作增鲜、提味、解腥膻的调味品外（有时专门提取豉汁供调味用），也是素食者的家常耐食小菜品，后来也广泛地用以作烹制荤食肴馐的辅料。清光绪年间人曾懿在她写的《中馈录》中说：“用以炒肉、蒸肉，均极相宜”，可见一斑。金华豆豉炒肉，香味俱佳，粥饭皆宜，又能久存耐食，常食常蒸，清香溢室，诱人食欲，是金华地方民间家常美肴。长期的烹调实践，使豆豉菜品日臻丰富多采。诸如“豆豉肉片烩豆腐”、“豆豉回锅腊肉”、“润江鱼咸豉”、“十色咸豉”、“豉花烩芋子”、“豉汁扁豆”、“豆豉蒸鳊段”、“豆豉肉丁酿鲫鱼”、“豉茸拌莴笋”、“豆豉樱桃肉”、“豉汁牛肉”、“豆豉蒸子排”、

“豉茸烧鳝筒”、“豆豉笃蜂窝豆腐”、“豆鼓烧黄鱼”等等，都是十分可口而富营养的佳肴美味。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地方的，才是全国的。金华豆豉已经从古代传承到了今天，已经从地方走向全国，跨向世界，只要永葆特色，不断精益求精，前景是十分喜人的。

①黄子：指豆粒经过发酵，表面生黄绿色曲菌孢子的豆粒。

②金花酒：即金华酒。指金华黄酒或金华寿生酒。

③露：指在露天存放。

本文参考资料：

- 1、《光绪金华县志》
- 2、《吴氏中馈录》
- 3、《齐民要术》
- 4、《遵生八笺》
- 5、《食宪鸿秘》
- 6、《醒园录》
- 7、《随园食单》
- 9、《中馈录》
- 9、《烹饪按术教材》
- 10、《浙江通志稿》

花果之乡——金华

邵介安

金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美丽的婺江横穿境内。丘岫萦纡，风光旖旎。这里孕育着名花珍果，誉满神州。称它为“花果之乡”，是当之无愧的。

一、金华花果生产历史悠久

金华花果生产史是漫长而又曲折的。奇花异果，品种繁多，久负盛名。金华花果主要分食用和观赏两大类。花卉栽培历史，根据初步考证始于南宋（果树栽培历史可追溯到更远的年代）。花乡罗店镇后溪河村，根据何氏宗谱记载推测，种花历史今至已有六个朝代，约七、八百年。过去婺州盛产兰花，明武帝在游江南时，曾专程前来欣赏，并于兰阴寺题字：“御题：兰阴深处。正德十五年梅月十五日”。现寺内碑文尚存。至今已有四百六十多年的历史。金华佛手根据西吴村《环溪吴氏宗谱》记载，罗店一带种植佛手已有三百六十多年的历史。金华茉莉花栽培也有三百多年历史。芍药有“花相”之称，是我省著名的中药“浙八味”之一，婺州是主要产地，相传宋代就开始种植。据林业部门调查，中央畈村有一棵观赏树种罗汉松，高10多m，胸径1.1m，大约有八百多年树龄。

清道光（1821—1850）年间，金华县的旧志中就称“西吴、白竹二庄民谙花性，时其燥湿，虽非土物而耳目可娱。如

束縛松柏为兽状，……”可见在一百五、六十年前，竹马乡和罗店镇的农民就熟悉各种花的特性，并已掌握了花木造型的技艺，那时种花业已相当发达。据查旧志中记载的金华花卉种类有：兰花、梅花、山茶、瑞香、辛夷、桃、郁李、海棠、梨、牡丹、丽春、杜鹃、金雀、紫荆、剪春罗、蔷薇、绣球、七姐妹、榴、茉莉、珠兰、晚香玉、桂、菊、糖葡、玫瑰等等。果类品种也很多，有：李、桃、梅梨、桔、柑、橙、榴、萄葡、杨梅、枇杷、櫻桃、山楂、无花果、银杏、金钩梨、佛手柑、榧等等。

解放后，花果生产虽曾一度受到挫折，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花果生产发展迅速。花卉面积已达到一万多亩，最高年产值达1300多万元。果类年产量达到560600担，比解放前增加10多倍。过去花木生产多为小面积种植，相当分散，现在向规模化商品性生产发展，初步体现出社会主义时代的生产特色：

(1) 产品结构趋向配套，种类多而齐全。如传统的茶花品种有一百余个。近年花农还从美国、日本等引进许多优良品种。果类也增加了雪桃、桃形李、草莓等优良品种。全市可供山茶花商品苗15万盆，各种绿化苗木1500万株。

(2) 涌现出一批从事花木生产的专业户。全市从事花木生产的农户有5.6万户，万元户约有1000户。

(3) 开始依靠科技进步，重视开发新品种。过去种植以原始方法进行，现在重视科技知识。如金华县的《科技报》，科委编的《致富的科学》等，对花果培植进行探讨研究。长春的君子兰，云南的金花茶，洛阳的牡丹等，也在金华进行栽培繁殖。目前我市已汇集全国绝大多数的名花异草。金华已成为祖国的一个美丽的“大花园”和“大果园”。

二、金华盛产花果的原因

(1) 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金华位于金衢盆地的东部。盆地中部平原和丘陵交错，海拔在35m至600m之间。北山海拔在600m至1000m。它象一道巨大的屏障，冬季拦住西北风袭击。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7℃，最冷的一月平均气温5℃，最热的七月平均气温近30℃。四季分明，年平均无霜期约240天。雨量充沛，年平均降水量超过1400mm。春夏之交“霉雨”季节降水最多。土壤肥沃，大片酸性黄壤。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发展花果生产具有良好的基础。

(2) 交通方便为发展花果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金华地区浙中，是全省的重要交通枢纽。浙赣铁路横贯境内65公里，有10个车站。公路四通八达，通车路程611余公里。金义、金温、金衢三条公路干线在本市境内110公里，乡乡有公路。内河航道总长为125公里。由于交通方便，市场信息快，便于运输和交流，十分有利于金华建成“经营型”、“市场型”花果基地。

(3) 发展花果生产有着特殊的作用。花果逐步繁衍发展，金华现在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水果城。人均消费量(鲜果)居全国155个大中小城市之首。目前，金华已成为江、浙、皖、赣、闽最大的水果集散地之一。花果是幸福、友谊、高尚、文明、喜庆的象征，它是地区文化、科技和园艺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城乡的一片绿色海洋中，花卉给人们带来了生气蓬勃、春意盎然的景象，它能美化生活；果品可以丰富和改善人们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大自然的信息和美的享受。工厂种植花果，能净化空气，防止或减少环境污染，有益于工人健康，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人们将发展花果生产作为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发挥它们的重要作用。

(4) 有一批发展花果生产的科技队伍。近几年，成立了花卉协会、茶花协会、柑桔协会、葡萄协会，在政府领导下交流信息和经验，探讨丰产途径。金华城乡均有一批土生土长的花果栽培能手。他们懂得花果品种的识别、繁殖方法和栽培管理知识。有的还掌握着市场信息。他们腿上有泥土的芳香，互教互学，口授相传，注重实践和操作。他们积极培植花果，并加工使其成为特殊商品，提高经济效益。

(5) 发展花果生产能创造较好的经济效益。花果生产同其它商品一样，受价值规律的制约。花果市场的形势好，群众积极性高。仅据金华市林业部门统计，目前柑桔已有13.4万亩，年产量达到27.6万担；梨3.2万亩，年产31.9万担；桃8.5万亩，年产15.8万担；枣3.2万亩，年产6.4万担；李4.7万亩，年产7.5万担。杨梅、柿子等也很可观。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花卉水果市场走俏。1989年，白兰花每500克售价15元，茉莉花500克要3—5元。名贵的茶花小苗，每株售价达20—50元。佛手每500克售价要15—20元。一株结10只鲜佛手果收入可达100元。柑桔、小佛手盆景、雪梨、葡萄、枇杷等，也颇受顾客青睐。盛产花果的罗店、竹马、源东、建新、赤松等地农民，过上了较幸福的生活。

三、金华花果的栽培

金华花果品种颇多，不能一一细述。兹选取种植广泛、经济价值高、又受人喜爱的主要品种作一介绍。

(一) 山茶花

山茶科山茶属。别名：华东山茶、川茶花、晚山茶、耐冬、曼陀罗树。

金华具有悠久的种植山茶花的历史。山茶花四季常青，经

严冬摧残而不凋。花型优美，有红、白、粉、紫等色。冬春含苞怒放，给人们生活以美。

山茶花不仅具有独特的观赏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种子可榨油，可食用或工业用。木质细致坚硬，可供雕刻。叶片能大量吸硫，净化空气。1986年，金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以山茶花为市花。

依据山茶花的花瓣数目、形态，金华山茶花包含四大类（注：有△者为佳种）。

（1）单瓣类（特征：花瓣数目少，5—9瓣；覆瓦状整齐排列；雌雄蕊发育较完全，结果实多）

大红金心	垂枝金心	大花金心
尖叶金心	早花金心	白玉荷
紫花金心	铁壳宝珠	

（2）半文瓣类（特征：花瓣2—5轮，由大到小向外向中心整齐排列；中心部分有少量小花瓣和雄蕊混杂，或者中心部分全为雄蕊。）

△绿珠球	金丝玉蝶	粉荷花
桃红牡丹	白锦球	新松花
深桃牡丹	粉玲珑	玉玲珑
△花芙蓉	松子	紫松花
△凤仙	△美国大红	小玛瑙
大红宝塔	状元红	紫重楼

（3）文瓣类（特征：雌雄蕊完全退化，花瓣11—15轮左右；花瓣排列整齐、平整。）

六角大红	赤丹	粉丹
△大东方亮	小东方亮	雨春
△大朱砂	△点雪	嫦娥彩

△花鹤翎	抓破脸	十八学士
△白三学士	六角银红	六角白
△玉美人	雪塔	大白
胭脂莲	玫瑰莲	△依栏娇
无瑕玉	△金花茶	

(4) 武瓣类 (特征: 花瓣大小不一, 着生不规则, 花瓣歪曲。)

△花佛鼎	金盆托荔	芙蓉
△花牡丹	秋牡丹	▲花璐
△赛洛阳	大红绣球	花宝珠
△鸳鸯凤冠		

山茶花为暖带树种, 适宜栽种在温暖、湿润的地方。20℃—25℃为最佳温度。盆栽山茶花因受诸多条件制约, 需要创造条件满足它生长的要求。

光照对山茶花有一定的影响。它需要半阴半阳通风良好的环境。夏季烈日, 易致茶花叶片灼伤; 若长期处于荫蔽的条件下, 徒长枝叶, 不会结蕾放花。因此, 茶花需要一定的光照, 一天有4—5小时见到阳光。

山茶花对土壤的理化性质反应极为灵敏。它喜欢偏酸性PH 5—6.5的土壤。土壤通气渗水良好, 不可涝渍。

金华山茶花的生长规律: 三月开始萌动, 四五月抽梢, 六月枝梢成熟, 八九月抽秋梢, 十月老化, 十一月现花, 十二月和翌年一至四月盛花。

山茶花的繁殖方法, 主要是扦插、嫁接, 有的花农也用茶籽萌芽搞嫁接繁殖的。

(二) 茉莉花

茉莉花为木犀科茉莉属。别名: 茉莉、抹厉、玉麝。

茉莉花原产于波斯湾沿岸和印度等地，引入我国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金华各地广泛栽培，总产量位于全国第二。

茉莉花香气清雅而持久，曾被誉为“天下第一香”。它是我国人民普遍喜爱的传统盆栽香花之一。茉莉花不仅可供观赏，还是经济价值较高的轻工原料。用它窰制茉莉花茶清香可口，畅销国内外。茉莉的花和叶能清热解毒，可治感冒、肿毒、腹痛等病症。

茉莉花是热带和亚热带植物。性喜阳光，怕荫蔽。爱炎热，畏严寒。有“晒不死的茉莉”之说。因此，茉莉花在夏季高温和强阳光下生长最旺，花味最浓。生长最适温度在 25°C — 35°C 之间。气温在 20°C 以上时，就开始孕蕾而陆续开花；气温在 30°C 以上时，是抽枝抽芽开花的最盛时期；气温降至 10°C 以下，则生长缓慢，开始进入休眠期。

茉莉花可用扦插、压条、分株的方法繁殖。

（三）白兰花

白兰花为木兰科含笑属。别名白兰、芭兰等。

白兰花原产马来半岛等地。当前罗店一带广泛栽培。白兰花叶片润滑而柔厚，青翠碧绿，给人以凉爽之感。花朵洁白，芳香扑鼻，佩带1—2朵，香气四溢。白兰花不仅供观赏，而且经济用途广泛，例如可制“白兰花茶”、芳香油，还可入药治妇女白带、小儿支气管炎及虚癆久咳等症。

白兰花性喜温暖、湿润，通风良好，又有充分日照的环境。怕寒冷，忌荫蔽。白兰花属肉质根、怕积水，喜大肥。土壤以富含腐殖质、排水良好、微酸性的砂质土为最适宜。花期5—10月。冬季温度适宜，也能开花。

白兰花的繁殖可用靠接、高位压枝等方法。

(四) 葡萄

它是我市近年来发展的一种主要水果。鲜果含糖10—30%，有机酸0.5—1.4%，营养价值高；产量提高快，定植第二年即可结果，三年后丰产，亩产可达1000公斤。

金华主要栽培优良品种有：

(1) 巨峰。粒大汁多味甜。中熟品种，果实无核，产量高。

(2) 先锋。果汁多，味酸甜。果色紫黑，7月下旬成熟。

(3) 红富士。。穗果平均重547克，果粒极大，色鲜红。8月中旬成熟。

此外，还有白香蕉、伊豆锦、红瑞宝、金皇后、龙宝、国宝等优良品种。

(五) 黄桃

黄桃也是我市大量种植的一种新兴水果。颜色鲜黄，营养丰富、果肉含糖7—15%，有机酸0.2—0.9%，还有维生素、蛋白质、脂肪等。除生食外，还可以加工制罐、桃脯、桃酱等，有发展前途。

金华各地栽培的主要品种有：

(1) 丰黄桃：果长圆形，耐贮运，加工成品率高，味香俱佳。

(2) 莲黄桃：皮肉橙黄，向阳面有红晕或断续条纹，风味甜酸。

(3) 罐5：果肉金黄，味道适中，产量高。

另外，还有杭州1号、罐14号明星等品种。

此外，柑桔也是我市的主要品种之一。栽培十分广泛主要品种有兴津、椪柑、官川、早桔、南柑20号、本地早、雪柑

等。

根据政府部门的规划：今后金华花果还要有一个大的发展，花卉除发展传统名花，还应积极引进优良品种，同时积极发展绿化苗木，为美化工厂、机关服务。柑桔面积到2000年，种植面积要达到20万亩，总产量达到52万担；梨子要8万亩，产量达到88万担；桃子要15万亩，总产量达到67.6万担。任务既艰巨而又光荣。我们坚信：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金华花果发展前景是十分美好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金华市地各志》施勤俭等编写《花果栽培技术》，特此致谢）

金 华 酥 饼

汪松福

酥饼是金华特有的风味食品之一，它以酥、香、松、脆的特色而远近闻名，誉满全省。早先，当地茶馆的座客、酒店的酒客常以酥饼作“茶配”和下酒食品，当地人外出时以酥饼作干粮或为礼品馈赠亲友。外地来金华的人，也都慕名品尝并购作回乡礼品。

金华酥饼历史悠久。究竟始于何时，传说不一。民间传说始于隋末唐初，说是程咬金曾流落到金华以卖酥饼为生。此说于史无据，难以置信。有史可查的，最早见诸于南宋时金华府浦江县吴氏著的中国第一部菜谱《中馈录》，在点心部《酥饼方》中对当时酥饼的制作有过记载，迄今也约八百年历史了。

初时的酥饼是用蜂蜜做馅的甜酥饼，据《酥饼方》载：“油酥四两，蜜一两，白面一斤，搜成剂入印作饼上炉，或者猪油亦可用蜜二两尤好”。后来才逐步演变用白糖、板油做馅的甜酥饼，用干菜、肥膘肉做馅的咸酥饼，以及用五香粉、花椒盐做馅的椒盐饼。酥饼规格不一，有大有小。据传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约军师刘伯温在金华城上明月楼商谈军国大事，朱元璋刚咬食一口酥饼，闻刘上楼，迅即将咬过一口的酥饼置于茶杯盖下。在商谈大事后戏问刘伯温茶杯盖下是什么？刘答曰：是被黄龙咬了一口、正面是“日”反面是“月”的一个酥饼。

“日”“月”合之为“明”，龙向为中国皇帝的象征，喻朱元璋能立大明江山。故在民间留有朱、刘以酥饼戏言江山之说。明末清初，曾任处州知府后落泊在金华的李春林，在通济桥开设李春林黍作酥饼店，太平军占据金华时，该店曾担任制作酥饼作慰问品和军需品的任务，李春林黍作酥饼店，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是金华唯一的有四百多年历史的老店。

金华酥饼用料精细，肉用全肥膘，干菜要嫩而味鲜的雪里蕻、三月青制作的干菜。酥饼的制作分发面制皮、剁馅、包馅、烘烤等工序，其中最重要的是发面制皮和烘烤。“酥饼酥不酥，和面是关键”，对面粉的等次并不讲究，主要是发好面，再扞皮上油卷筒，包馅，逐个扞成薄圆形，并用饴糖刷面，表面撒满脱壳芝麻，即可在陶缸饼炉进行烤制；烤制前先将饼炉用木炭烧达180°炉温，在炉壁烧烫后，将酥饼顺序排列贴在炉壁上烘烤13分钟左右，然后塞住炉门，用瓦片将炭火四面包围，炉上盖上铁皮焖烘半小时，炉火全部退净后，顺序铲下，放进烘焙干燥，这样制成的酥饼为边黄底薄，形似蟹壳，外松里脆，醇香味美，落地即碎，手揪成粉状的佳品。

金华酥饼四季均可生产，又便于贮存，即使受潮变软，再行烘烤，又复酥松如初；有它的独特风味，而又价廉物美；是旅行携带和馈送亲友的佳品，也是男女老小人皆喜爱的美食。因此，金华酥饼行业久盛不衰。解放前后，金华大小酥饼店有三、四十家，从业人员有七、八十人，日产量约三、四万只。较有名气的在城里除“李春林”外，还有“杜永裕”、“周义泰”、“恒兴裕”、“庐万春”等酥饼店，乡下有名气的是金华玉坦水机铺酥饼店。这些酥饼店用料精细，所用的干菜都是自制的；制作要求也严格，所制的酥饼要落地即碎、手揪成粉才算达标准。1956年后，“杜永裕”、“恒兴裕”、“李春林”

等六家酥饼店合并为国营金华酥饼厂（即现新新酥饼店）。改革开放以来，酥饼行业迅猛发展，个体酥饼摊、店遍布大街小巷，城乡不少糕店也兼做酥饼；酥饼的花色品种也相应增多，有甜味、辣味、咸味等。不少回国观光、探亲的港、澳台同胞和华侨到金华，也都慕名品尝并购作礼品带回居地，使金华酥饼的名声远扬国外。

后 记

今年是太平天国革命140周年、辛亥革命8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为了纪念这三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周年”，我们在本辑专门组织了三组反映金华县人民在这三个爱国革命运动中英勇奋斗史实的文章，以缅怀革命先烈一个多世纪以来为救国救民而浴血奋战的事迹，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并藉以启发教育下一代。

明年是金华沦陷50周年，下辑文史资料，我们拟组织一组揭露日本侵略军屠杀、掠夺金华人民的暴行和金华人民反抗日本侵略军斗争的文章；同时，本着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精神，我们从史料角度，计划以较多篇幅登载反映金华古往今来经济建设的资料，如农业、水利、低丘红壤开发及工交、商业、金融等文章。希望各界人士踊跃投稿或提供线索，帮助我们共同办好《金华县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浙江省金华县第五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名单

主任：石 夫

副主任：俞焕阳 余晓春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吴思华 章伟文 章炳熙

盛尚纪 傅惠钧 戴金基

聘请委员：李 光 郑浩然 俞龙光

蒋英根 蒋洽潮 蔡东星

封面题字： 艾 青

封面设计： 周荣耀

校 对： 余晓春

俞龙光

5.00

金华市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金华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金华县文教印刷厂承印